

冷战时期的 美苏关系

LENGZHAN SHIQI DE
MEISU GUANXI

本书着重讲述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直接对抗、妥协的情况，涉及的内容有：冷战的地理与概念、国际格局的形成、美国的遏制战略、苏联的外交政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美苏军事控制与竞赛、中美苏三角关系。



牛军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

国际冷战史专题讲义之一

牛军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 / 牛军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
(国际冷战史专题讲义)

ISBN 7-301-09584-8

I. 冷… II. 牛… III. 美苏关系—研究—现代 IV. D851.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8303 号

书 名: 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

著作责任者: 牛 军 主编

责 任 编 辑: 刘 方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09584-8 / K · 0419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 .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00.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x 980mm 16 开本 1575 印张 26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 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录

前言 / 1

第一章美苏冷战史：机理与概观时殷弘 / 1

第一节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 / 1

第二节十月革命到冷战形成期间的美苏关系 / 5

第三节美苏冷战的历程、基本性质和世界历史意义 / 11

第二章冷战的起源与两极格局的形成徐蓝 / 20

第一节冷战的起源 / 22

第二节冷战的爆发 / 27

第三节冷战高潮与两极格局的形成 / 33

第三章冷战时期的美国遏制战略 冯海沧 / 40

第一节遏制战略的提出与形成 / 40

第二节遏制战略的主要内容 / 47

第三节遏制战略的实施、调整与发展 / 50

第四节遏制战略的终结与延续 / 80

第四章冷战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 关贵海 / 82

第一节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思想 / 82

第一节苏联与冷战的形成 / 87

第三节苏联对西方政策的演变 / 90

第四节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 / 96

第五节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 101

第六节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与冷战终结 / 105

第五章冷战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戴超武 / 108

第一节“第四点计划”与杜鲁门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 108

第二节“冷战的主要战场”：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

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 115

第三节从肯尼迪到卡特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

的政策 / 129

第四节“里根主义”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 141

第六章冷战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戴超武 / 146

第一节“两大阵营”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

第三世界的政策 / 147

第二节“和平共处”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

- 第三世界的政繁 / 152
- 第三节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攻势 / 161
- 第四节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 and 变化 / 168
- 第七章 冷战中的美苏军备控制与裁军 朱锋 / 173
 - 第一节军控与核军控 / 173
 - 第二节冷战时期核军控的起步与进展 / 180
 - 第三节 “START 1” 和 “START II” / 185
 - 第四节后冷战时代国际多边军控的发展 / 188
- 第八章 冷战中的中美苏三角关系 牛军 / 198
 - 第一节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 / 200
 - 第二节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发展 / 213
 - 第三节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变动与终结 / 223

前言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至 90 年代初，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进行了一场持续 40 余年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抗与竞争。这场对抗与竞争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几乎所有的领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40 余年的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冷战”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是对 20 世纪国际关系中这一独特状态的形象化的概括。

冷战作为 20 世纪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在其发展演变直到突然结束的整个过程中，包含着一些对今天仍然有深刻启发的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它们包括：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与冷战的缘起，以及世界政治中两极格局的形成；冷战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如两极格局中的地缘政治对抗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及其对美苏各自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影响；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而导致的美苏对抗中的自我控制机制，如所谓美苏之间反复出现的危机与“危机管理”的过程；也是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而造成的美苏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核军备控制同时存在；由于冷战的双方是美国与苏联两个世界级的超大型国家，由此导致的它们对抗从欧洲向全世界蔓延的过程及其后果；冷战同时是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同盟之间的对抗，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内部的关系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过程；冷战的终结与苏联瓦解及其阵营崩溃的基本原因等等。

毫无疑问，对上述那些冷战所包含的基本问题的反复探讨和解答，将帮助人们越来越深入地理解，冷战对 20 世纪历史乃至今后历史，已经和将会产生何种深远的影响。正因为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几乎是与冷战爆发的同时，国际学术界便开始了对冷战的研究。从那时起直到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国际学术界对冷战的研究可谓长盛不衰，冷战后甚至还出现了“新冷战史”。

大致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冷战史研究逐渐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并出版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论著。这些论著涉及到冷战的历史以及在对冷战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些颇具理论色彩的思考与探讨，其中的主要共同点是它们基本上反映出中国学者独特的视角，这种视角当然是同中国在冷战中的独特角色有直接的关系。这部专题讲义正是在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它部分地反映了这

个时期中国学术界对冷战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

这本讲义包括的主要是美国与苏联之间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因为冷战的历史从起源到结束，都主要是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历史。贯穿所有前述重大问题之始终的，便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有关政策和它们之间关系的互动。不过，这本讲义力图与其他的论著有所区别，并适应专题教学的需要，其编写的主旨不是一般地叙述冷战中美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演变历史，也不是一般地分析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更不是面面俱到的。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力图勾画出冷战史的宏观图景。从 19 世纪国际关系历史发展中，梳理出冷战发生的脉络和线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演变，阐释导致冷战爆发的种种原因，包括美国与苏联的对外政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影响，在冷战爆发中所起的作用；从对 20 世纪后半叶国际关系历史进程的宏观透视与概括中，界定冷战的世界历史地位。其次是在宏观图景下，突出强调从冷战兴起到最终结束的过程中，美国与苏联各自的安全战略、对外政策等的形成、主要内容及其发展与演变。在阐述美苏各自的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过程中，分别分析了导致美苏各自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国内政治、双方关系相当复杂的互动过程、美苏处理各自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考虑，等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讲义中的一些部分，如美国的遏制战略、军备控制与裁军等，其内容多少涉及后冷战时期。由于这些部分从历史的进程本身看，的确后冷战时期有比较强的延续性。因此，讲义保留了有关部分中涉及后冷战时代的内容。另外，由于不是采取历史叙述的体例，各章按照专题的体例进行论述，个别内容出现交叉或重复，的确在所难免。

这部专题讲义是集体合作的产物，各章的内容主要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观点和见解，行文风格当然也难免各有其特色。作者分工如下：第一章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撰写；第二章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徐蓝撰写；第三章由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冯海沧撰写；第四章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关贵海撰写；第五章和第六章均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戴超武撰写；第七章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撰写；第八章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撰写。附录的大事年表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荣文编辑。本书主编负责讲义编写的协调和统稿工作。在此向各位合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编 者

2005年1月于北京

第一章

美苏冷战史：机理与概观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从一定意义上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它们之间的冷战，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必然。在这个历史演进过程中，就国际体系的形成而言，冷战来自19世纪期间开始、并且愈益加速的国际权势分布的极化趋势。人口、经济技术、自然资源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要素作为深层原因，两次世界大战作为极其有力和急剧的催化剂，造就了几个世纪里世界政治的头等重大事态之一，即作为现代国际体系传统中心的欧洲的权势迅速衰落，“侧翼大国”美苏的权势勃然兴盛。

另一方面，美苏冷战还在相当程度上孕育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苏关系史：从列宁对威尔逊(Woodrow Wilson)，到斯大林(J. V. Stal. in)对罗斯福(Franklin Delmlo Roosevelt)，日后美苏冷战的一个基本动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包括国际政治观)的摩擦、抵触和对立，都显得至关重要，尽管它们并非唯一的动因，而且并不总是排斥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妥协和进行协调，甚至不排除形成对世界命运头等重要的战时同盟。然而，意识形态对立同基本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超级大国利益竞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性地促成了美苏冷战。

上述过程构造了冷战史的基本问题，它们包括：冷战的起源、冷战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冷战的强烈意识形态性质、美苏军备竞赛、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冷战的全球化、冷战紧张程度的起伏变化、冷战终结和苏联瓦解的基本原因、冷战的世界历史意义，等等。

第一节 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

国际体系是具体的国际关系在其中发生和运行的基本框架。大略地说，在永远相对能动和富于变化的个人因素之外，国际体系与其中各国内部的社会、政治构造等一起作为主要因素，共同规定国际关系的状态和国家的对外行为方式。

国际体系的一个基本方面或要素，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或构造，而

在这构造中，一般最重要也最引人注意的，是国际权势的基本分布状况，或日各国间基本的力量对比状况，及其重大变化。它们在现代尤为突出地表现为强国的数目、规模及其相互间的实力和权势等级排列；表现在强国的兴起、衰落及其相互间的力量对比变更。

哈布斯堡帝国同法国宫廷之间近乎两极的冲突，法、英、奥、俄、普五强之间真正多极的均势，分别是 16 和 18 世纪欧洲国际体系构造的基本特征，而 19 世纪后半叶德、美、日三大新兴强国的急剧兴超，以及相应的列强间力量对比变更趋势，揭开了现当代世界格局演变的序幕。其后，国际权势分布的剧烈变动构成 20 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动态之一。

在 19 世纪(特别是其后期)以前的很长时期里，大致肇始于 16 世纪的现代国际体系总的来说，基本保持了一种相对分散的多元或多极格局，即 16 世纪时业已强大的法国、奥地利同十七八世纪先后跻身于强国行列的英国、沙俄、普鲁士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间力量对比大体平衡、并且长期保持动态稳定的五强格局。

诚然，其间有过路易十四(louis xiv)和近一个世纪后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统治下的法国特别强大，而且据此大力追求霸权引起两番大失衡和大动荡，然而有如 19 世纪德国大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在首次出现代欧洲国际体系变动模式时所言，世界的激流诚然不时破坏这一规范和秩序体制，但在潮退浪缓后它又得到重建。

欧洲取得的这种多强动态均衡局面在维持和充实了“经典的”国际法之外，塑造了“经典的”欧洲外交思想和实践，其中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经典均势论和均势政策。

在 19 世纪初期，经典均势的基本原则及其派生的均势营造章法，仍然是均势大师、奥地利宰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和英国外交大臣卡瑟尔累(Robert S. Castlereagh)等人规划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安排的指南，尽管鉴于这场大战的教训 1，他们同时还摘出了“欧洲协调”这一重要创举主义。简言之，现代国际关系在至少一个多世纪里的面貌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多个强国间力量对比的大致均衡和相对稳定。

然而，19 世纪期间，情况开始大变：从列强间大体势均力敌的状态中，浮现出国际权势构造的极化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我们时代超级大国的雏形；另一方面，列强格局无论就强国的具体身份还是就它们各自的相对实力位置而言，都由于几个新兴强国的迅速崛起而发生急剧变化，原有的稳定不复存在。

极化趋势首先表现在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在列强中的突出优势地位。它尤其出自三大源泉：自 17 世纪末“光荣革命”开始崭露头角的海军、海外殖民地和远洋商业三方面优势；发动工业革命导致的技术和工商业遥遥领先地位；反拿破仑战争及其胜利带来的空前政治、经济、战略裨益。从拿破仑战争末期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期间的俄罗斯，是当代超级大国的又一个雏形。就军事力量和国际政治权势而言，它远超过当时欧洲大陆其他任何国家；或者说，它是同海上超级强国不列颠并列的陆上超级强国。俄国的显赫权势直接来自反拿破仑战争及其胜利，而其根本基础是它经几个世纪领土扩张和相对高速的人口增长而形成的巨型大国规模。这加上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往后虽然步履维艰，但毕竟有所进展的现代化，使之可以在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历史环境中，决定性地压倒欧陆“中等国家”，从而同英国一起，在事实上倾覆多强实力分布大致均衡的原有格局。

至于新兴强国的急剧崛起和列强相对实力位置的大幅度更动，则具有几乎惊人的突发性。大致从 19 世纪 60 年代中叶起，以美国内战结束、普奥战争和其后普法战争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为四大标志，国际权势构造剧烈变动的时代终于来临。在此后约 80 年岁月里，伴随着激烈的国际斗争，乃至规模空前和极其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包括英、俄、法、奥等传统强国或衰落或崩溃，美、德、日、苏在内的四大新兴强国先后崛起，此外更有德、日两大新帝国暴发而后暴亡(德国更是两番经历了这种过程)，超级大国两极格局最终取代传统列强多极格局。

如果说国际权势格局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变化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扩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它们作为首要因素，与其他种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原因相结合，造成了不同国家间非常不平衡的发展，导致了国家相对实力的跳跃式增长和跌落性下降。

20 世纪以前，欧洲(严格地说是中西欧)一直是现代国际体系的中心，甚至可称现代世界的中心。总的来说，欧洲拥有远为优越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势，不仅欧洲的意愿和事态之影响外部世界远甚于外部世界之影响欧洲，而且非欧地区的几乎所有社会和国家，都先后沦于欧洲的统治或支配之下。欧洲列强总合起来大体左右了世界政治基本格局。国际法体制既是在欧洲起源并且大多在欧洲得到发展，也是从欧洲扩展到世界，而那些历史影响非常巨大的更广泛的现代国际关系价值和思想观念，从国家利益、主权和均势，一直到自由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帝

国主义，也是如此。

但是，到 20 世纪后半期开始时，欧洲已经无可争辩地失去了它的传统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东西两个侧翼大国——美国和苏联。欧洲权势的衰落与美苏权势的兴盛是开启世界政治新时期时期的一个决定性事态。

在多年里，美苏拥有即使欧洲列国加起来，也远远不可相比的实力和权势，而且将欧洲本身分割为各自的势力范围，由此主宰欧洲的命运。在欧洲以外世界各地，主要的外部影响已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美苏。

世界政治一军事结构普遍公认由多极变成了两极，美苏两大超级强国及其同盟体系之间的对峙僵局，取代了传统多强均势。几乎同样重要的是，美苏两国作为价值观念和制度的大输出者，以彼此对抗的意识形态，大力从事并多少主导了 20 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尤其激烈的争夺人心的竞争，并且作为欠发达世界的民族主义之外最大的两股力量，推动了国际规范的多种变迁，而欧洲在这两方面至多只是配角。

这个事态可以说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最大必然性之一，它涉及人经济、自然资源、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因素。在自然资源、生态和生产水平可以承受的限度内，人口作为国力的基本成分之一，意义十分重大。

大约从 1890 年起，欧洲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而美俄两国人口迅速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已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大国，此后差距进一步拉大。虽然欧洲在很长时期里可以凭借技术优势弥补它相对于世界其余地区的人口规模劣势，但关键在于技术是扩散的，而欧洲逐步失去显赫的技术优势。美国在欧洲之外最早实现工业化，俄苏可谓紧随其后，现代化与其庞大的人口终于结合为超越欧洲的宏大国力。不仅如此，依靠超级规模的大陆扩张和领土集聚，这两个国家还拥有极为广袤的疆域和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同亿万人口一起，使之具备“洲级大国”独有的巨大规模优势。最后，侧翼大国取代传统中心的显赫地位，还由于一种贯穿几个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大均势机制使然。从 16 世纪哈布斯堡帝国的称霸企图夭折，到 20 世纪纳粹德国的统治野心破灭，欧洲均势历经打击而犹存，首要原因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地引入外部新力量来拯救欧洲的国际平衡。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反复重演的过程中，侧翼大国会形成越来越大的权势，传统中心则逐步丧失其优势地位。犹如先前的反霸大战导致英国兴盛和欧陆相对衰落那样，美国和俄苏从拿破仑战争往后，不止一

次决定性地扭转了欧洲战局，它们的强盛和欧洲的衰落便势所难免。

两次世界大战是这一巨大变更得以实现的主要直接条件。首先出现的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衰落和美国权势兴盛，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个过程终告完成，即使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美国对欧孤立主义卷土重来，加上德国暴发和苏联羸弱等原因，欧洲似乎仍然显赫无上。

其次是苏联权势的形成和兴盛，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极端羸弱开始，继之以斯大林铁腕治理下苏联国力剧增，直至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仅有美国可与之匹敌的一等强国。“欧洲时代消逝”，美苏两极时期来临，而且是两极冷战对抗局面，全球国际体系随之有了与它在问世以来大为不同的构造和状态。

第二节 十月革命到冷战形成期间的美苏关系

美国和苏联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反的国家，它们不仅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基本性质方面大相径庭，而且几乎始终彼此谴责对方。美苏两国都持有改造国际社会的长远目标，各自试图重新安排国际关系和国际体制，使之符合它们彼此对立的理想和利益需要。尽管美国追求这种目标的意愿的一贯性及其强烈程度，总的来说显著超过苏联。

另一方面，美苏两国都不时面临具体需要与长远目标相矛盾的各种形势。这些形势要求主要根据当前利益和现实环境、而非意识形态来决定有关的对外政策和策略，并且往往要求两国以灵活而非僵硬的态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妥协、进行协调甚或谋求合作。美国和苏联又都是拥有巨大实力或潜力以及广泛的国际利益和势力的大国，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了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从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总是受世界政治重大事态的直接影响，同时又直接影响、甚至往往决定世界政治动向。

就美苏的综合国力对比而言，美国始终处于强者地位，在两国对立的时期里，它的对苏态势和政策之损害苏联的程度，一般甚于苏联对美态势和政策之损害美国的程度。上述种种是纵贯 70 年美苏关系历史、包括后半段即美苏冷战史的最基本的事实。

1917 年俄国发生推翻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即将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政府对之表示热烈欢迎。威尔逊总统认为，由此而来的俄国“民主化”大有助于实现他的世界政治理想，即确立美国领导下的、通过“民

主国家伙伴关系”，确保持久和平的战后国际秩序。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威尔逊为确立这一国际秩序而谋求的直接目标——彻底战胜德国和奥匈帝国——需要实际上已经筋疲力尽的俄国继续作战，而这必然大加加剧战争苦难所酝酿的俄国新革命危机，使得临时政府代表的所谓民主力量丧失生存希望。美国政府力促临时政府从事战争，特别是以继续作战为条件给予经济援助，并且派遣一系列使团前往俄国鼓励士气。这同英法等国政府的类似的努力一起，实际上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起了促进作用。

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美国最初的政策是以阻止俄国退出战争为宗旨。为此，威尔逊曾批准，向反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武装提供秘密财政资助，以便推翻苏俄政权，保证俄国留在协约国阵营内。美国的更重要的举动，是在1918年1月宣布美国的战争目的，即自称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其动机之一在于通过其中第六点，即德军撤出俄国，让俄国不受外来干涉地决定自己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以争取正在进行布列斯特和谈的苏联政府不同德国单独媾和。同时，他还试图依靠“十四点”，用事实上已经由列宁提出的、对交战国人民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公正与民主的和平”口号和民族自决原则，抵制十月革命的影响。

布列斯特和约缔结后，美国政府先后向俄国北部港门和西伯利亚地区派遣干涉军。虽然导致这些武装干涉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应付英法两国的敦促，阻止德军夺取堆积在俄国北部港口的协约国军事物资，提防和制约先行决定出兵西伯利亚的日本的扩张图谋等等。但它们同时也表现了威尔逊对苏俄政权愈益强烈、愈益僵硬的敌视态度。他坚决不承认苏俄政权，坚信必须铲除布尔什维主义。

与之相比，列宁的对美政策灵活得多。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一战略思想和基本策略出发，列宁通过各种渠道，多次主动地向美国政府提出达成政治谅解和进行经济合作的建议，例如以相当宽容的条件结束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给予美国广泛的经济租赁权。然而，这些建议无一得到美国政府的认真考虑，更谈不上被美国政府接受。

20年代伊始，苏维埃政权已战胜国内敌人和外国武装干涉而得到初步巩固，与此同时，由于大战而革命浪潮四起的欧洲局势相对稳定下来。在此情况下，西方各大国和苏联之间长期共存共处势所必然。问题只在于这种共存和共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还是全面对立的。

列宁列比较正常的美苏关系寄予相当大的期望，认为在西方各大国中间，美国对苏联的直接威胁最小，而经济实力又最强大，与之交往特

别有助于瓦解国际反苏阵线，加强苏联的外交地位和促进其经济建设。从这样的考虑出发，他继续努力向美国政府显示可以在苏联得到有利的经济机会。但是，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了在西方各大国中间最为敌对也最为僵硬的态度。它拒不承认苏联，拒不与之进行经济交往。不承认政策首次由国务卿科尔比(Bainbridge Colby)1920年8月致意大利驻美大使公开信中，予以正式的系统表述，其中列出不承认的三大理由：(1)布尔什维克政府出自暴力，不代表俄国人民；(2)它拒不履行俄国的“国际义务”，包括临时政府的国际债务；(3)它公开对世界各国政府表示敌意，并且向全世界输出革命。

哈定(Warren G. Harding)政府的国务卿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则于1921年3月宣布，除非布尔什维克政权根本改变其国内社会经济体制，美国政府不会恢复与俄国的贸易。

由于许多美国私人企业对美苏经济交往持积极态度，加上当时盛行的“自由放任”经济原则使美国政府不便干预，因而两国在租赁、贸易和技术合作三方面的经济交往等，在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颇有进展。然而尽管如此，不承认苏联仍是从哈定开始三届共和党政府的不变国策，而苏联指挥下共产国际的广泛活动，据信是美国当时坚持这一国策的头号原因，并且被用作为之辩解的首要论据。

进入30年代后，随着日本侵略浪潮的兴起，美国和苏联政府都开始感到，缺乏外交关系使两国无法就遏阻日本扩张进行协调。1932年，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曾就此同苏联高级外交官秘密会晤，但是美国政府内部仍然强烈的反苏情绪和害怕激怒日本的心理占据上风。

1933年初罗斯福入主白宫后，情况有了变化。罗斯福总统认为，不承认政策既根本无法达到改变苏联国内体制和对外行为的目的，又严重阻碍美国取得苏联的合作来对付日本凶猛的扩张势头。按照他的提议，苏联政府派遣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Maxim Maximovich Litvinov)赴华盛顿谈判承认和建交问题。

多半是为了应付国内反对承认苏联的那部分舆论，罗斯福要求苏联接受取得美国承认的三项先决条件：尊重苏联境内美国公民的宗教自由，许诺偿还十月革命以前临时政府欠美国的债务，停共产国际通过同美国共产党的关系来干预美国内政。李维诺夫明确接受第一个条件，并且用变通和含糊其辞的方式接受后两个条件，双方遂于1933年11月17日签署建交协定，美国长期拒不承认苏联的局面宣告结束。

然而，美苏关系并未因此而有实质性的改善，其原因包括：孤立主义势力束缚下美国对日本扩张长期采取软弱态度，苏联亦在很大程度上因此(加上英国的对口软弱)而实行姑息日本侵略的远东政策；美苏两国就债务和共产国际同美共关系这两个问题争执不已；苏联国内大清洗，连同苏联政府极其严厉地限制本国公民同外国人之间的交往，加剧了美国政府内外的厌苏反苏情绪。到苏联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且按照其秘密议定书采取一系列领土扩张行动后，大多数美国人更是将苏联视同于纳粹德国。

但是，罗斯福坚定地认为，美国的主要对手是德国，而苏联是可以争取的潜在盟友。他不顾政府内外的各种反对，不采取恶化美苏关系的措施，并且试图通过 1940 年 7 月起在美国国务院与苏联驻美大使之间进行的美苏秘密谈判，促使苏联疏远甚或反对德国。

1941 年 6 月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后，罗斯福迅速着手向苏联提供援助。是年底，美国因珍珠港事件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美苏战时同盟迅即正式形成。自此开始，罗斯福的对苏政策宗旨是维持美苏同盟，最大程度地利用苏联打击德国，同时争取消除苏联对西方国家的不信任感和潜在敌意，为战争胜利后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合作体制奠定基础。为此，他将租借法延用于苏联，并且坚持实行以最优惠待遇(同美国对所有其余盟国的待遇相比)，向苏联提供租借物资的政策。这一军事援助总额达 1700 万吨物资，价值 100 多亿美元，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某些环节上是关键性的贡献。

然而，由于首先由德国潜艇战造成的运输方面的巨大困难等原因，在 1943 年年终以前，即苏联军事形势十分危急的时期里，美国实际交付的援助物资显著少于它在有关协定中做出的对苏承诺，这就促使苏联怀疑其合作诚意与动机。

第二战场问题造成了同样的政治和心理影响。尽管在德苏战争爆发后 3 年时间里，尽早开辟欧洲大陆第二战场一直是苏联对西方盟国的头号要求，而且罗斯福曾亲自向苏联领导人许诺，在 1942 年内满足这一要求。但英国的消极、后勤困难以及对于美军大量伤亡的顾虑，使得第二战场的开辟一拖再拖，严重损害了建立罗斯福所希望的美苏相互信赖关系的叫能性。更深刻的矛盾存在于罗斯福的战后世界构想与斯大林定义的苏联战后安全需要之间。罗斯福谋求建立政治上贯彻自决原则、经济上实行门户开放的自由国际主义战后秩序，并且希望以基于大国协调，特别是美苏协调的真正有效的世界性国际组织，维护和保障这种秩序。

这一战后蓝图的本质，是旨在由美国安排和支配世界政治经济的“全球主义”。

就对苏外交来说，自决原则这一条特别重要，它既构成罗斯福的国际政治信仰的一个核心成分，也被他视为防止美国重蹈一战后孤立主义覆辙的必要条件。因为国会和公众被很有理由地认为不会接受一个过于明显地建立在欧亚强国势力范围基础上的战后格局。但是，苏联的战争目的除了彻底粉碎纳粹德国侵略、捍卫自身的生存和独立外，首先是要通过领土变更和控制东欧来谋求战后安全。

就美苏战争目的的这种对立而言，最重要的是：(1)对于美国官员来说，战时经验中最具决定性也最经久的遗产，在于决不能再允许潜在敌手通过经济闭关自守、政治颠覆和(或)军事侵略，取得对欧亚大陆资源的控制”；(2)斯大林相信，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大国，总是企图削弱苏联，甚而消灭其政权，因而苏联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并且改善自身的地缘战略条件，才能遏阻侵略，迫使帝国主义大国较为经久地同苏联和平共处，也才能在东欧侵略发生后立于不败之地。

诚然，罗斯福自1943年底德黑兰会议起，向苏联在东欧的要求做出重大让步，尤其是基本同意了其中的领土要求，但他坚持东欧各国实行基于自由选举的代议民主制，至少形式上必须如此。

继任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大多数行政当局主要官员和国会议员在这方面的态度更是强硬和简单得多。美国反对其他国家建立势力范围的自决原则，同苏联在东欧的政治要求殊难相容。尽管双方都曾试图探求妥协的途径，并且确实达成了若干实质性的和表面的妥协，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东欧问题已经使美苏关系蒙上了非常严重的阴影。

随后，关于德国问题的重大利益抵牾和政策分歧，使得美苏矛盾更加激烈。美国为了确立它支配下的稳定繁荣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和促进西欧重建，采取复兴德国西占区经济的政策，为此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损害了苏联的一项根本利益——通过获取德国的巨额赔偿来加速本国战后重建，并且使苏联严重担心在美国扶持下德国威胁再起。

东欧和德国问题上愈演愈烈的对立同美国政府内外的反苏反共情绪和“世界领导”欲望互为因果，并且作为一个基本原因，促使斯大林改变战时旨在举国上下团结抗德的比较宽容的国内政策，重新实行高压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斯大林治国模式”。

上述三者共同促成了美国冷战思想的形成。这一思想由驻苏使馆代

办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在1946年2月著名的“长电报”中予以综合表述和哲理提炼,并且立即被美国决策者奉为对外政策指南。其核心在于认定苏联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和俄罗斯历史心理传统等因素,促使苏联追求无限的扩张;美国必须、也可以通过不妥协的对抗遏制苏联势力扩展,同时不引起美苏战争。

1946年和1947年间,杜鲁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冷战性行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提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将世界政治的基奉性质归纳为“自由制度”与“极权主义”的对立,宣布美国支持世界上所有抵抗“共产党征服”的力量。

马歇尔计划在其实施过程中包含了三人基本目的:(1)在饱受人战破坏的中西欧,防止“绝对最低的生活水平再降低到会发生革命”,从而大有利于苏联势力扩展;(2)在援助复兴中西欧经济的同时,决定性地促进改组中西欧国际经济结构,使之成为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和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理想的比较统一的市场;(3)将德国西占区经济同西欧经济交织在一起,以致一方面将西部德国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加强西方,另一方面使一个复兴了的德国因为被“包容”(先是在经济上,然后在政治和军事上)而真正脱弃其传统的极端民族主义,不致再度成为西方的灾祸。

在苏联方面,除了重新大力强调西方威胁、加速军事重工业发展和进行若干国内清洗外,特别具有深远后果的行为是激烈地改造东欧,即在东欧国家按照斯大林治国模式,极为急剧地改造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以全面加强苏联控制。

马歇尔计划使斯大林担忧,东欧国家可能被美国援助和中西欧经济复兴所吸引,而且它标志的美国在欧洲确立大规模长久存在的明确意向,以及西部德国的复兴等,进一步使斯大林相信,苏联有再次被敌对阵营包围的危险。此外,先前允许的东欧政治经济多样化使苏联同东欧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政策差异和行动分歧趋于明显,斯大林因此担心后者太多的自主性会危及苏联的支配。

于是,1947—1949年,苏联取消了东欧共产党的自主权,主持摧毁东欧国家的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右翼,变联合政府为一党执政的“人民民主”政府,强制性地实行农业集体化,取消工商手工业中的私有制,建立过度集中和僵硬刻板的中央计划经济,打击教会和严厉限制宗教,越来越严重地践踏法制,用武装进攻以外的几乎所有手段打击不愿俯首帖耳的南斯拉夫,在东欧各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进行清洗。

到1949年晚秋，美国已主持建立联邦德国，德国由此正式分裂，同苏联东欧进行军事对峙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已问世，而且东欧国家同西方的所有经济、文化联系已全部切断。美苏冷战格局至此完全形成，并且采取了它在整个冷战史上最极端的形态。

第三节 美苏冷战的历程、基本性质和世界历史意义

广义地说，冷战时期囊括了冷战形成后的全部美苏关系历程。加年代末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美苏两国处于最紧张和最僵硬的全面对抗之中，彼此间几乎毫无谋求谈判解决争端的认真尝试，而且其中一国直接参加、另一国间接参加了在朝鲜半岛的热战。

1953年起，到60年代初，双方关系经历了一段局部缓和，然后由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包括柏林危机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冲突而重新紧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使这段时间里交替使用外交和武力威胁的心理战达到了顶点，随后双方关系进入了持续10余年的相对缓和状态。这一缓和的主要特征，在于欧洲局势渐趋正常（特别是中欧和东欧的领土界线与国际政治现状大体得到西方的正式认可），战略军备控制谈判取得显著进展，美国正式承认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

70代后期开始，两国关系再度紧张，其原因主要在于苏联在亚非两洲进行频繁的直接或间接军事干涉，连同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后扩展海外军事、政治义务的倾向重新显著抬头。

1985年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担任苏联最高领导后，苏联及其东欧盟国内部发生剧烈变更，与此相应，苏联迅速丧失了同美国抗衡和竞争的意愿与能力。1991年苏联的瓦解为美苏冷战，也为全部美苏关系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美苏冷战对抗有四大基本性质。第一在于其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特征，第二在于其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三是贯彻始终和不断翻新的美苏军备竞赛，最后是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它们使得美苏无论怎样对抗和争斗，都不至于在彼此间爆发热战。

同许多大国对抗一样，美苏冷战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内容，所不同的是其史无前例的、真正全球性的规模。可以说，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两家都在不断评估世界各有关地区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形势，它们的地缘政治就是按照世界地图来进行的超级大国权势斗争。

因为可用史料丰富，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被了解得清楚得多。源于麦金德的海权对陆权的范式，提供了塑造（以及理解）美国冷战地缘政治

和遏制战略的一个关键。冷战时期美国决策者和战略思想界的一个共识，在于必须阻止苏联势力控制欧亚大陆，否则美国的世界地位乃至根本安全将受到致命威胁。

按照其提出者凯南的观点，遏制战略的实质就是立足于麦金德所说的“外月牙形地带”，即北美、英伦三岛、日本等，守护“内月牙形地带”或日外围地带，即欧亚内陆外缘，阻止苏联对它的控制。

旨在遏制的地缘战略又可分成两种：“周线防御”和“要点防御”。前者是将内月牙形地带的所有部分当作同等重要，因而要求在其中任何部分遭到苏联势力进攻或侵蚀时，都一概用保全该部分必需的力量制止之，而不考虑可用资源和当地条件的限度；后者则区分不同地区的不同重要性和不同条件，集中势必有限的资源，将其用于守护那些特别重要也有较大成功希望的地区，就如马歇尔计划那样。

总的来说，1950年下半年开始，“周线防御”越来越占上风，直至越南战争大失败。在冷战的发源地欧洲，地缘政治形势稳定得多，也简明得多。欧洲冷战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在那里的战略僵持。

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终极性质是超级大国竞争。美国要维持和加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全球优势地位，争取控制整个世界政治，苏联则先欲维持同样在二战中形成的欧洲首强地位，继而力争同美国平起平坐，以便最终向美国的优势挑战。然而同几个世纪里大多数大国对抗相比，冷战的真正特征不在于美苏利益冲突，而在于这种利益冲突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加上它始终未升级为超级大国间的战争。

对立的意识形态既是美苏各自在竞争中运用的旗号，更是它们从事竞争和对抗的很大一部分动因。一般被认为正式揭开了冷战序幕的杜鲁门主义，就是用“极权主义”和“自由制度”的两极对立来说明世界政治，苏联则随后针锋相对地提出两大阵营对立的根本口号。

1947—1949年间，苏联按照自己的国内模式全面改造东欧并大大加紧控制，进一步加剧了美苏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到50年代初，在美国有麦卡锡主义代表的反共反苏狂热，在苏联东欧方面则有大大张旗鼓地清洗“内部敌人”的运动。这都是冷战引起的最极端的变态反应。此后，意识形态对抗几乎始终伴随着美苏关系，仅其激烈程度随冷战的起伏有所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对外行为的根本原因很大程度上出于国内制度的“极权主义”性质。美国政府于1949年底正式确立一项基本目标——促使苏联东欧国家内部发生根本变化，而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则是一种

可称为“激变”的战略，即通过煽动性的敌对宣传和隐蔽行动，在苏东助长社会紧张，加剧或激发反政府情绪乃至造反行动，争取最终由苏东内部的反对势力推翻那里的政权。50年代中期，“演变”成为苏东国家体制变更的主导战略，基本内涵在于顺应那里的渐变，逐渐地促使它发展到根本改变苏东国家性质的地步。

到80年代，由于苏东各国先后出现大动荡，加上以自由民主对“邪恶帝国”为意识形态模式和口号的里根(Ronald Reagan)在白宫执政，激变战略有显著抬头，特别是被用来作为改变1980年军事管制后的波兰局势的一个主要工具。

在苏联方面，虽然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其领导人往往出于安全或权势扩张需要而将意识形态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但信仰、合法性需要以及追求对第三世界激进国家和全世界激进运动的影响等因素，使之一贯坚持“社会主义大家庭”领导者和国际共运与进步力量中心的意识形态身份，尽管它们越往后就越显得是自封的。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构成了冷战的一个重要方面。1945年，美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为维持核垄断地位，它给建立原子能国际管制制度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从而使核军备竞赛不可避免。苏联于1949年爆炸原子弹成功，加上朝鲜战争于翌年爆发，导致美国政府在核武器和常规军备两个领域进行双管齐下的大规模扩军。

1953—1960年，美国改行优先发展核力量的政策，大大加强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当时是战略空军)在美国军事力量构成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削减常规部队，特别是急剧削减陆军。在苏联方面，50年代期间防务政策的动态与美国相似，即这一时期的开头几年也进行了双管齐下的大规模重整军备，而后从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1955年主政时起，集中主要防务资源，大力研制洲际导弹，建立和扩充陆海空三军之外独立的战略火箭军。与此同时，苏联常规部队兵员削减过半，战略空军、水面舰只和潜艇的发展规划被大大收缩。

60年代，主要在苏联对洲际核导弹的率先拥有和越南战争需要的刺激下，美国进行战后第二次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并举的大扩军，其主要结果之一是大大加强了对苏核优势，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美国的这一优势致使苏联不得不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屈辱地退让，也使它决心奋起直追。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几乎倾其所有，终于在70年代初达到了核力量方面大致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地步，并且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常规力

量，尤其是远洋海军和洲际空运能力。

到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军事实力的大增长终于做出强烈反应，以巨大的规模发展一系列新型战略武器系统，并且宣布将着手研发旨在截击苏联核导弹、从而（在理论上）争取剥夺其核攻击和核报复能力的“星球大战计划”。而苏联到此时已无力继续同美国竞争。数十年的核军备竞赛以其恶性循环加剧了冷战，但也控制了冷战，因为它确立和维持了“恐怖平衡”，使得美苏两国因为惧怕互相毁灭而努力防止它们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上述军备竞赛的后果必然导致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它使得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彼此对抗和争斗而不兵戎相见。仅就此而言，冷战时代确是个“漫长的和平”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美苏关系可以说有其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准则：这共同利益就是避免美苏战争，而共同准则是在冷战对抗、特别是在危机中将此置于最优先地位。它们先是作为心照不宣的默契，而后于 1972 年签订为正式协议。

在核恐怖平衡即美苏相互核威慑之外，有三类行为起了制约和调节作用。

一是所谓“危机处理”，它旨在防止美苏之间包含严重的直接军事冲突风险的危机局势升级为美苏战争。美苏两国在 40 年代末的柏林封锁和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有关做法，就是如此。

二是美国或苏联不在那些被对方当作至关重要的势力范围的地区进行任何武装干涉，而在作其他形式的干涉时，一般也尽可能审慎和隐蔽，以免使对方感到遭受无法容忍的严重威胁。美国对于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和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政策，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三是美苏两国总是力图防止它们各自的盟友之间的冲突发展为它们两国间的直接碰撞。这种防止地区性冲突越轨的努力，在亚洲和中东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都有所表现，反映了美苏既彼此对抗，又试图共同控制世界政治的某些方面。正因为如此，美苏冷战时代里人们看不到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那种景象，即两大对抗同盟内的次要伙伴能够将双方盟主拖入战争。50 年代，美苏冷战集中于欧洲和西亚地区（主要是伊朗和土耳其）以及朝鲜半岛，但以后它扩及一个个新的地区。首先东亚大陆，然后中近东和非洲，最后拉丁美洲，相继成了冷战的舞台。到 60 年代，冷战成了全球性的。冷战的这种全球化不仅是由于美苏两国越来越广泛地介入欧洲、西亚以外地区，把它们当作争夺或竞争场所，而且是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当地原因，吸引或便利了外部超级大国的干预。在这些当地原因中间，50 年代和 60 年代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

老殖民帝国的瓦解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新独立国家内部或相互间的民族、部族、宗教和领土冲突最为重要。

美苏冷战这一随着国际权势构造极化而来的竞争，同世界欠发达(或发展中)地区主要由于民族解放和国家急剧增多导致的激荡相结合，促成和加剧了世界政治中一大看似矛盾的状况——两极化与多极化并存。

总的来说，美苏两国对于欠发达世界内部以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为内容的巨大变更，所持的态度不同，在这变更过程中得到的政策效果也不同。1955年起，赫鲁晓夫改变斯大林基本上避开欠发达世界的审慎保守的战略，改行积极外向的、谋求确立和扩大苏联在那里的广泛影响的新方针，其核心就是在外交和宣传方面，大力支持和鼓励反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且按照苏联的利益需要和能力以及风险大小，给予某些欠发达国家经济、军事援助。

就苏联对外义务和战略势力扩展的范围而言，甚至就其整个世界政治态势而言，积极建立在“中间地带”的广泛存在，可以说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变化。它一直持续下去，直到随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进入其存在的最后阶段为止。

客观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权势的兴起，有助于欠发达世界反对西方统治的斗争：苏联不仅提供了很长时间内对许多欠发达国家和欠发达世界激进运动很有吸引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楷模，而且它是西方的强大的对立面，因而后者会愿意同它携手(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形成了国际政治中两大较弱成分反对最强者的天然同盟。

美国在欠发达世界被动得多。植根于美利坚政治文化传统中的种族主义成分和对于真正激进的革命出自本能的反感，加上在冷战中迁就西欧盟友的战略需要以及对于所谓亲苏者的强烈厌憎，使美国几乎无例外地站在殖民势力以及封建半封建的反动派一边。对西欧殖民国家的迁就特别有损于战后初期到60年代美国的影响和地位，使之在二战中很高的威望差不多一落千丈。总之，很长时间内，美国在欠发达世界进行的冷战竞争中显著地落后于苏联。

在亚洲，中国革命和越南抗法战争遭到美国的反对和干涉，朝鲜半岛的南北冲突变成了有几十万美军投入的战争。此后美国还大规模地持久从事越南战争，最终彻底失败。

在中东和非洲，阿以冲突、原先由英法统治的独立国家的迅速增多以及1960年在比利时殖民统治结束后爆发的刚果危机之类事态，导致美苏两国作为对手竞相介入，并且大力谋求扩展各自的影响。

在拉丁美洲，美国于 1954 年以阻止共产主义扩张为旗号，颠覆了推行社会改革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1960 年起又打着同样的旗号大力反对古巴革命。到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冷战在拉丁美洲终于达到最极端的形态。

10 余年后，业已大为增强的苏联“远程权势投射能力”同当地原因相结合，导致美苏冷战在非洲达到了一个新高峰：随着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崩溃，加上安哥拉独立运动的分裂，美国和苏联（连同古巴）各自支持一派大打内战，而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领土战争，导致苏联（同样连同古巴）以巨量装备和近两万名军事顾问，帮助埃塞俄比亚作战，美国政府却主要由于国内的“越南综合症”，未能作足够有力的干预。

总的来说，亚洲和拉丁美洲冷战的起源实质上是相同的：当地出现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的激进运动（不管是否由共产党领导），美国以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名义加以反对和干涉，结果促使这些运动寻求苏联的支持，或者加强同苏联的已有联系，苏联则试图借此扩展自己的影响，于是形成了美苏在那里的对立。至于中东和非洲冷战的起源，大致是老殖民势力急速衰落或瓦解导致美苏两国力图填补“势力真空”，从而在那里形成它们之间的竞争格局。

如前所述，冷战时代美苏之间的紧张程度是起伏变化的。有过几段比较缓解的时期。从 1953 年到 1956 年，由于欧洲领土和政治现状大致稳定下来，加上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发生变化以及西欧国家的缓和意愿对美国造成了压力和影响，对抗的气氛有所缓解。奥地利问题得到解决，美苏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了最高级会晤，苏联和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后，逐渐出现了持续时间长得多、成果也多得多的另一段缓解时期——被普遍称作“缓和”的时期。在核军备控制领域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包括 1963 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 年的防止核扩散条约以及 1972 年的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

“欧洲正常化”是这段时期里缓和的中心内容。西德在美国半心半意支持下推行的“东方政策”获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呼应，由此导致了苏联—西德条约、波兰—西德条约以及关于柏林的四方协定，直至 1975 年在赫尔辛基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欧安会）。欧洲现存国际边界得到了西方的正式确认，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府为此表示同意保障人权和人员、信息的自由交往，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随之兴起。

美苏两国都需要通过缓和来减轻军备负担和获得贸易好处，创造有助于它们各自对付第三方(对美国来说先是中国，后是北越，对苏联来说始终是中国)的某些条件，并且都希望通过缓和来限制或削弱对方。然而，军备控制领域和欧洲的缓和未能掩盖美苏在欠发达世界的争夺、对立和竞争。苏联的瓦解大致地说是美苏冷战的终点，更是全部美苏关系的终点。它与美苏关系的起点十月革命一起，构成 20 世纪里两个极其引人注目，并且头等重要的事态。苏联多年里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包括美国的干涉、不承认和遏制造成的困难，发展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最主要力量之一。相反，苏联军事力量达到空前强大、其超级大国地位得到美国正式承认之际，却是它开始以相当惊人的速度趋于衰亡之时。一盛一衰，其远因众说纷纭。

具有全球史意识的人应当可以感觉到，整个西方在 20 世纪前半叶持续动荡，危机迭起，战祸横生，而 20 世纪后半叶在美国主导下相对稳定繁荣，这 100 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走向同苏联的国运之间有根本性的联系。而且，在 20 世纪前半叶非凡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但基本僵化了的苏联体制，最终无法适应 20 世纪后半叶世界的深刻变化。苏联瓦解的某些较近的原因明显得多，其中与美苏冷战相连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沉重的军备竞赛负担、维持东欧势力范围的高昂经济代价以及在亚非拉三大洲广泛介入、干预和干涉的巨大成本，大大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并且因此助长了苏联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

——冷战环境和冷战思想的束缚严重损害了通过改革尝试纠正体制弊病的可能性，许多这样的弊病实际上甚至被苏联领导人当作对付美国并与之竞争权势所必需的，或者说它们反而被当作苏联力量的源泉。

——在冷战的间歇——“缓和”时期发展起来的美苏人员、信息、文化交流，同苏联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同类交流一起，缓慢但有力地影响了苏联社会；这种影响虽然不能说造成了苏联体制的危机，但它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苏联存在最后几年里，该国政治中的主流势力对待体制危机的态度和方式，那就是否定苏联体制，继而取消苏联。就此而言，在所谓“公开性”口号和“新思维”理论的指导和辩解下，戈尔巴乔夫施行的脱缰似的国内政治变更，连司一样快得无法控制的外交转型，构成了苏联瓦解的主要的直接近因。

冷战的主要世界历史意义似乎在于，它是 20 世纪下半叶的一场有世界范围巨大影响的美苏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决赛”。在其中，苏联式社会主义及其国际关系模式彻底失败，而且大概是永久性的。

这一结局证明了杜鲁门在卸任前夕以政客的夸张语言和强烈的美国意识形态倾向表述的一种信心，那是美式资本主义及其世界秩序观念最后赢得美苏冷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原因。

这一结局更证明，原先的社会主义体制如果没有既积极又稳妥、既足够深入又不过头的改革，就无法经久生存下去，直至其光辉的未来。实际上早从威尔逊和列宁起，这场多半取决于能否赢得人心的竞赛就已开始，然而二战结束后它是在总的来说对苏联不利的基本环境中进行。美国领导的西方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体系拥有综合优势，而且到 80 年代已变得相当悬殊。

在一个历史时期里，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活力和巨大财富，在此基础上强大的军事力量，较为开放和较为多样的政治文化，越来越突出并传播得越来越广泛的西方人权价值观，大致基于互利和协商、因而较有凝聚力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所有这些挫败或遏阻了苏联势力的扩展，同时又相对于苏联制度，表示了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替代物。

在很大程度上，冷战是 19 世纪初以来现代国际体系内力量分布格局越来越趋于极化的结果；反过来，冷战又作为基本原因，使这极化趋势在一些重要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在世界政治的多个重大问题领域和多个重要地理区域，形成了非常显著的美国霸权。

不过，冷战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还有另一方面。多半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在战后初期宽待德国和日本，助其复兴，以后又长期在安全、贸易和金融方面予以照顾和特殊优惠，从而有力地帮助了它们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或者说成为美国的比较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同样首先出于冷战需要而由美国促其起步的中西欧一体化，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还有，从安全和战略上考虑，源自冷战军备竞赛、并且扩散开来的远程战略武器，加上一定程度上源自冷战时期中东问题的反美恐怖主义势力，实际上结束了两个世纪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予美国的、历来已久的高度的不易受伤害性。

用一位大战略史家的话说，由于承担了至少保护整个西方的义务，美国就由二战前的一个“后方”强国，变成了代价高得多、风险也大得多的一个“前线”强国。历史有可能最终证明，冷战的真正结果并非美国的真正胜利。

思考题：

1. 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对抗的本质与基本特征。

2. “欧洲中心”衰落与冷战两极体系形成的历史原因。

参考书目：

1. 黄正拍：《美苏冷战争霸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20世纪回顾·国际关系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张小明：《冷战厦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 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

6. Cohen, Stephen F,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dence: Politics and Historysince1917*, New York, 1985.

7. Deudney, Daniel, and G John Ikenberry, “11l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SovietChange,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 16, Winter 1991 / 92.

8. Gaddis, John lew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0.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and New York, 1982).

9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m: Economic Changeand Military Conflictfr0. i 1500 t02000*, New York, 1987.

10. Keylor . William R.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An InternationalHistory*, (New York and Oxford, 1984),

第二章

冷战的起源与两极格局的形成

徐 蓝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所谓冷战，是指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至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进行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的状态。这场冷战持续了 40 多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自冷战爆发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冷战起源的研究持续不断。20 世纪 40 年代到 90 年代以前，研究队伍主要集中在美国，并先后出现了“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等三个学派。

概括地说，“正统派”在四五十年代占据主流。他们认为，苏联寻求世界霸权是导致冷战爆发的主要原因。冷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由于苏联对外扩张及其集权的政治制度。斯大林把追求世界革命的狂热和苏联领土的扩张结合在一起，使西方世界感到震惊，于是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这种说法虽初来自当时美国的一些精英和当政者。

“修正派”在 60 年代成为主流。他们认为，冷战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生的，冷战的爆发应该由美国负责。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一个世界体系，而美国的决策者们担心，苏联和其周围的共产党国家会与世界经济体系相互隔绝，因此对苏联发动了冷战。苏联主要是自卫的，如果美国不疏远苏联，冷战或许可以避免。苏联的安全需要不应该受到指责。美国向苏联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是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美国的强硬政策和行为方式，迫使斯大林与西方敌对。这一派的代表主要是学者，其观点出现于 60 年代前半期，主要阐述于 7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冷战结束后，仍然有学者持这种观点。

“后修正派”于 70 年代兴起。他们认为，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实用主义政策，以及双方的一系列决策错误与误解，是冷战发生的重要原因，双方对冷战的爆发都负有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了欧洲和亚洲，探讨了英国、中国和朝鲜等国家在冷战中的作用。

这一时期苏联学者关于冷战的研究，基本上是反映苏联政府的看法，即将美国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实力政策”等，视为冷战起源，而苏联的反应主要是防御性的。

冷战结束后，随着大量档案的解密，学术界出现了新一轮冷战研究高潮。在美国出现了所谓“新后修正学派”。这一流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冷战是苏联挑起的，斯大林应该对冷战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与此同时，俄罗斯学者也开始通过研究新解密的苏联档案，从新的角度探讨苏联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并认为西方国家和苏联对于冷战的产生和发展，都负有责任。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冷战史研究也逐渐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一些涉及到中国对外政策的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视角，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如“美国霸权论”，即认为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是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再如“美苏共振论”，即认为冷战是美苏双方行为的结果，是一个双向和互动的过程；也有学者提出“综合作用论”，即认为以美苏争夺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另外，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在冷战爆发中的作用，也是学术界探讨的课题之一。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因为美国对苏联在欧洲构成的军事威胁漠然视之，使西欧感到不安，西欧最终成功地说服美国直接介入到欧洲的事务当中。因此美国是由于被“邀请”而不是主动的扩张，最终获得了一个“帝国”。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那么，冷战爆发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它的发生和发展与国际关系两极格局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从历史的长镜头中去考察冷战起源这一在国内外学术界持续不衰的研究课题，不仅要考察冷战爆发的国际背景，更要考察美英苏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差异。

概括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为冷战的爆发提供了条件。美苏两国的国家大战略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它们依据各自的战略而制定的对外政策和行为方式的对立互动，以及英国的推波助澜，最终使冷战未能避免，并一度达到危险的高潮，国际天系的两极格局也最终形成。

第一节 冷战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反法西斯大同盟经过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议，通过一系列公开的或秘密的、书面的或口头的协议，形成了支配战

后世界政治的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打败德、日法西斯，并在两国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以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具体内容如下。

——具体制定打败德、日法西斯的战略战术；

——在打败德、日法西斯以后，盟国对德国(包括柏林)的分区占领和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消除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德国的赔偿，以及对战犯的审判；

——在世界范围内提倡和平、民主、独立的原则。

第二，重新绘制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特别是重新划定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归属与边界。具体内容如下。

——在欧洲：盟国(美英苏+法)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及德国赔偿的原则规定；关于波兰的疆界和临时政府组成的协议；英国和苏联关于东南欧的百分比协议。

——在亚洲：通过关于苏联对日作战条件的秘密协定，满足苏联对外蒙古、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和旅顺大连的要求；苏联则承诺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并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整个亚太战略，让美国控制中国和单独占领日本；朝鲜实行国际托管，以后独立。

第三，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实行“雅尔塔公式”，即“大国一致原则”，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核心，以联合国为主导，保护中小国家的安全，维持世界和平。

第四，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联的委任统治地等，实现托管计划，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19世纪欧洲取得的世界霸权地位一去不复返。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雅尔塔体系建立在美英和苏联战时军事实力均势的基础之上，是美英苏三大国出于对各自利益的现实考虑和对战后世界安排的长远打算，经过长期讨价还价后相互妥协的产物。

尽管美国总统罗斯福并不主张划分势力范围，但是面对英国对保持其原有势力范围的要求，以及苏联坚决要划分明确的势力范围，美国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最后达成的妥协就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英和苏联之间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即在实际上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这种形

势恰恰就是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的地缘政治基础。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欢庆胜利之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历史画面：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欧洲、亚洲和北非地区惨遭破坏，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恢复工作举步维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过去在地理位置上并无直接关系、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超级大国，由于它们各自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实际形成了在中东欧、巴尔干、中近东和远东直接的军事对峙。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的到来，使昔日大同盟建立的基础不复存在，同盟内部原有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这一切为美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条件，并成为冷战产生的温床。不过更重要的是，战后美国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针锋相对，迎头相撞。战后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空前强大，使它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并以“世界领袖”自居。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就表明了这种思想。1944年10月21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

罗斯福的继任人杜鲁门则声称，美国是“经济世界的巨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美国。这种领导世界的强烈欲望，成为美国战后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

美国自身的经济制度和经济需求不仅是它主动向全球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这种扩张的主要目的之一。与美国综合国力的巨大增长相联系，美国不仅认为能够根据美国制定的规则，建立起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始终未能建立起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并在其主导下，建立了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包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实行“双挂钩一固定”制度(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固定为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并按资金的份额决定各国投票权的大小，实际为股份最多的美国所操纵，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同样由于美国是但是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

不仅如此，在战后欧洲经济普遍拮据，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空前动荡的情况下，美国更将追求海外市场视为保持国内的繁荣与稳定，以及

避免危机发生的重要手段。美国力图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打开全球门户，使世界经济自由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认为，再也不能允许其潜在的敌手通过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政治上的颠覆活动以及军事上进行侵略等手段，控制欧亚大陆的资源。那些违反美国试图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国家，会运用军事力量和经济闭关等手段，使国际经济失调，并进而危及美国的安全，这里所说的“潜在的敌手”，显然主要是指苏联，

美国自十月革命以来便形成的反共意识，及其历史所孕育的自认为美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优越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所谓“天定使命观”，即美国有责任将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移植等思想，成为美国向全球扩张的重要的内在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美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即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政体，才能创造一个和平与安全的世界，美国将法西斯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都视为专制政体，并认为他们都在海外搞敌对性扩张，因此必须受到遏制。

上述这一切造成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扩张和大战略。但是，这一大战略的实施却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与苏联的大战略全面遭遇。

苏联在战后以保卫国家安全特别是其西部边界的安全，做为第一要务。鉴于苏联西部边界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而且历史上遭受的几次大规模入侵又都来自西部，苏联在坚决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复活的同时，将其西部边界的安全视为关系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向罗斯福和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明确指出，波兰对苏联不仅仅是荣誉问题，而且是个安全问题，苏联一些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都与波兰有关，它对苏联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斯大林在战时三巨头的一系列会晤中，对波兰问题始终寸步不让。不仅如此，苏联还坚决要在其军事力量所能控制的东欧国家，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从而把东欧这条入侵苏联的危险走廊变成保卫苏联的安全地带。

斯大林坚持认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国家一有机会就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以达到消灭社会主义、消灭苏联的目的，即使核武器出现，也未能使他改变的这种看法。这种认识决定了苏联将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政治、军事和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视为苏联潜在的防御对象。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尽量少受损失，并立于不败

之地，建立“安全带”对苏联就变得格外重要。

在苏联所追求的国家安全利益中，也反映出俄罗斯传统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这不仅表现在它将本国西部边界大大向西推移，并用军事压力迫使东欧国家接受苏联建立的“安全带”，而且还表现在它追求在巴尔干和远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企图进一步向中近东扩张。

与保证国家的边界安全相联系，苏联非常重视维护其经济安全。苏联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战后百废待兴，重建工作庞大而艰巨。因此，苏联要求从战败国索取巨额赔偿，以利于自己的重建。不仅如此，苏联高度集中并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倾向于将其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变成封闭的经济区域。这种状况与不断加强苏联的经济实力、迫使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较长时间的和平共处以及确保打赢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世界革命的信念，也使苏联在其军事能力所及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并尽可能维护与自己类似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帮助东欧国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帮助共产党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北朝鲜帮助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等。不过，上述“世界革命”的主张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苏联国家安全的附属物，即必须服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这从苏联不支持希腊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不支持法共拥有武装，以及在很长时间里未给中国共产党以支持等方面，清楚地表现出来。

上述一切构成了战后苏联以保障国家安全为中心的大战略，苏联也决心充分利用它所掌握的有限力量，通过局部扩张，使其权势超出本国领土。在美苏国家战略相互抵触、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过程中，美国作为比苏联强大得多的国家，对苏联行动的反应相当过度。美国把苏联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视为对西方国家的巨大的战略威胁，认为只有在“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美国才能避免被包围，从而维护其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美国冷战政策的最重要的表述语是“遏制理论”。美国政府对其冷战政策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阐释，即美国“遏制理论”的根据，是全世界的自由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苏联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美国具有无可争议的责任去同它斗争。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那种咄咄逼人、总想以压力迫使苏联就范的外交作风，既是美国国际地位的反映，也是美国意识形态使然。

就苏联方面来说，必须指出的是，在苏联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力量对比中，毕竟是力量要弱得多的一方，而斯大林也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的限度。出于严重的不安全感，苏联在战后初期的许多重要问题上，一方面努力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基本框架，避免同美英等西方大国对抗，甚至不惜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苏联在处置战败国和处理东欧等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僵硬的对抗行动。苏联同样也借助了意识形态的力量，尽管斯大林的最高指导原则不过足意识形态包装了的苏联国家利益。

显然，美苏两国在国家大战略方面的相互对立，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的巨大差异，是冷战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不过也存在其他一些因素，对冷战的爆发产生了不应忽视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历史形成的美苏两国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战后双方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趋势，以及英国在冷战形成过程中的推波助澜。

美苏两国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在苏联建国之初，美国不仅不承认苏联，而且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进行武装干涉。20年代当其他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苏联存在的既成事实，并与苏联建交时，美国却仍然坚持不承认苏联。尽管1933年面对法西斯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美国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双方在维持和平避免战争等问题上，仍然缺乏合作。显然，美苏双方的相互不信任甚至敌意，是相当深刻的。正如一位美国的学者所说，美苏双方“都像在镜子里看人一样，看到的是反像，即把对方看成是世界上的恶霸。每一方都指责对方表现出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姿态”。

特别要指出的是，美苏之间的互不信任并没有因战争中建立的反法西斯大同盟而消失。由于美英未能在二战中苏联最困难的时候，及时兑现它对苏联许诺的租借援助物资的数量，以及未能按照罗斯福的承诺，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致使斯大林极为愤怒与失望。苏联认为西方盟国对苏联并不忠实，并对此多次予以指责。同样，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态度，也不断增加美英的反感和疑虑。

当时美苏各自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美苏国内那种推动对抗的政治因素，都在迅速增长。在美国方面，1946年的中期选举使共和党取得对众、参两院的控制权，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为获得国会支持其内外政策，在对外政策中凸显所谓民主制度对抗共产主义制度的极端意识形态诉求。

从苏联方面看，战前已经暴露出许多弊端的斯大林体制在战后进一

步强化，由此引发了社会危机，特别是导致东欧国家的诸多不满。这种情况促使苏联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力度，以达到增强凝聚力的目的。

英国的对外政策也在美苏对抗中推波助澜，对冷战爆发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英国虽然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带着满身创伤，已经沦为国际舞台上的二等国家。于是，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通过争取美国的帮助，保持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保持英国在其势力范围以及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力，就成为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另一方面，对共产主义的深深怀疑和对苏联在欧洲扩张的担忧和恐惧，使英国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急不可待地与斯大林达成关于东南欧地区的百分比协定，以及在战后与美国遏制苏联方面保持基本致的立场和政策。由于战后的英国经济十分困难而力不从心，所以英国的政策是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并推动美国采取强硬政策，承担更多的责任。

正是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冷战终于在美苏之间逐渐强硬的敌对互动之中爆发。

第二节 冷战的爆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随着美苏在东欧的敌对日益严重，在对德、日战败国的政策上尖锐对立，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激烈争斗，双方的冷战政策也相继出台。美英等西方国家与苏联对立的日益加剧，导致冷战迅速爆发。

美苏在东欧和德国、日本等问题上的对立愈演愈烈，是冷战爆发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东欧及巴尔干部分地区对于苏联来说，是既定的建立“安全带”的地区，因此苏联是不容他人染指的。从1944年至1947年，苏联凭借其军事力量，对东欧和东南欧一些国家实行占领。此后苏联采取一切手段，拒绝执行在雅尔塔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按照苏联的意图在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建立了一系列对苏友好的政府，使这些国家处于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

美国企图通过自由选举方式在东欧建立议会制政府，从而保持西方的影响。英国则希望建立以流亡伦敦的原波兰政府为主的波兰新政权。苏联的政策使美英的打算根本不可能实现，引起了美国和英国的强烈不满与敌对。

罗斯福在去世前曾指责斯大林说，苏联在波兰的行动表明，它已经破坏了它在雅尔塔作出的每一项诺言。杜鲁门在接见莫洛托夫时，直截了当地指责苏联破坏了雅尔塔协议。杜鲁门还企图以经济手段迫使苏联就范，结果被莫洛托夫回绝。面对苏联控制东欧和部分东南欧国家的事实，丘吉尔曾经哀叹，东欧的局势比 1939 年还要危险。

在对待德国和日本等战败国的政策上，双方的分歧和争斗同样严重。战胜法西斯德国是大同盟成立的基础和追求的共同目标，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也成为苏联与其西方盟国之间的重大问题。

根据雅尔塔体系而被分区占领的德国和柏林市，处于美苏各自的势力范围的最前沿。战后初期，苏联的基本考虑是：在对德国社会进行全面根本改造的基础上，使苏占区成为苏联安全带上的重要一环，同时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以致未来威胁苏联的安全。当然苏联也试图从德国索取尽可能多的赔偿。美国的考虑正相反。德国战败后，美国已认定战后的对手是苏联而不是德国，所以它的对德政策开始逐步从肢解和限制转向扶植与恢复。

不同的政策意图使美苏双方不仅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争吵不休，而且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更是意见相左。苏联主张德国先要在政治上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机构，即所谓“政治统一”为先。

美国则担心政治统一后的德国会落入苏联之手，故谋求先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看待，即先要“经济统一”，即使不能保证完全的统一，也要尽可能保证最大限度的统一。英国一方面追随美国的政策，同时也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也希望德国首先成为一个经济统一体。

由于无法同苏联取得一致，美英便于 1946 年 12 月将它们的占领区在经济上合并，这成为美英分裂德国的重要一步，从而导致美苏矛盾不断激化，德国也从此成为冷战的激烈战场。

在日本问题上，杜鲁门政府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小想给苏联任何机会，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行动。美国这种单独占领日本不容苏联染指的政策，引起了后者的强烈愤怒与反对。

1946 年 7 月，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 (Bernard Baruch) 提出了“巴鲁克计划”，对美苏关系也造成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根据这个计划，世界上的原子能发展和使用，要由一个国际原子发展机构来管制，任何把核燃料用于武器发展的违约行为都将受到严惩。在该机构建立起管制之后，将终止制造原子武器，

销毁现存的所有储备。由于当时只有美国一家拥有原子武器，该计划显然有利于美国垄断核技术，因此也必然遭到正在研制核武器的苏联的反对。该计划的提出无疑进一步毒化了两国关系。

美英苏在中近东也展开争夺。双方在伊朗争夺的核心是石油资源，表现形式则是二战后的撤军问题。苏联为获得伊朗的石油租让权和确保其在伊朗北部的势力范围，拒绝在美英军队已经陆续撤出的情况下，按期从伊朗撤出驻军，致使苏伊关系十分紧张，并给美英的干预提供了机会。

英国工党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曾直截了当地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指出，苏联企图将阿塞拜疆纳入苏联的版图或使之依附于苏联，是对英国传统利益的严重侵害。1946年1月，伊朗向联合国控诉苏联干涉伊朗事务，苏伊争端成为联合国成立后首次大会审议的第一个问题，使苏联外交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最后苏联在美英的压力下不得不在6月将苏军全部撤出。

美英苏在土耳其争夺的核心是控制黑海海峡问题。从1945年6月到1946年9月，苏联多次向土耳其提出修改1936年签署的有关黑海海峡的《蒙特勒公约》，希望在海峡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以使其参与黑海海峡的防御等要求。苏联的要求导致苏、土关系紧张，并招致美英的强烈反对和干预。

美国政府在给苏联的复照中表示，如果苏联单方面对土耳其采取行动，联合国将对此作出反应。美国国务院还宣布，美国海军将在海峡地区长期维持秩序。英国则认为土耳其对维护英国在中东的利益至关重要，必须阻止苏联将其影响扩大到红海和波斯湾。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的行为，显然超过了维护本国安全需要的范围，侵犯了两国主权，并加深了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意图的疑虑和敌视。苏联在中近东政策的失误，催生了美国的“遏制政策”。

与美苏展开争夺以填补战后的“权力真空地带”同时，双方使用的语言也越来越激烈，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苏联决心放弃大国合作并与美国进行强硬对抗的政策，相继出台，致使冷战的爆发成为必然的趋势。

1946年1月5日，杜鲁门当面向国务卿贝尔纳斯表示，他对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的做法极度不满，并指责他对苏联不够强硬。他声称，除非苏联碰到铁拳和强硬的抗议，另一次大战就可能发生，所以美国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

一个月以后，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说，对资本主义采取严厉批判态度，明确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表示要再搞三个甚至更多的五年计划来促进国家的工业化，使苏联具有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

这次讲演距二战结束还不到半年，苏联人民需要的是和平与休养生息，美苏之间尽管发生了伊朗和土耳其危机，但关系尚未破裂，许多问题正在或即将进行谈判。斯大林的公开讲演既不合时宜也不明智，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称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时代》杂志则认为，斯大林的演讲是“自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过的最好战的声明”。不仅如此，它对其后的凯南八千字长电报和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就在斯大林演说后不久，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便向华盛顿发回了有名的八千字长电报，全面论述苏联的理论、政策、行为动机与行为方式，以及美国应当采取的对策。凯南写作此文本是应国务院的要求以搞清苏联拒绝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原因，但斯大林的演说无疑对他起了作用。

凯南分析了苏联行为的动机，认为苏联的国内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它必然要谋求无限制的向外扩张，苏联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美国与苏联打交道时，不能仅仅依靠谈判，必须也能够依靠实力，抵制苏联的扩张，同时不会引起美、苏之间的全面军事冲突，因为苏联的力量弱于西方。美国只需要“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表明准备使用它，就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尽管该文并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是他已经实际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遏制苏联的理论，并基本框定了与苏联对抗(美苏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只要保持威慑与压力，无需进行战争。

凯南的长电报在华盛顿受到异常热烈的欢迎，这表明它所代表的对苏强硬政策在政府和国会取得了优势，标志着美国冷战思想的基本形成。此后凯南又在1947年7月份的美国《外交季刊》，发表署名先牛的文章《苏联行为探源》，正式提出“遏制”一词，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遏制思想与遏制战略。遏制政策也由此得名。

与凯南逐渐形成他的遏制思想的同时，在英国方面也存在着与凯南所表达的思想十分相似的长电报，这就是当年英国驻苏联的代办弗兰克·罗伯茨(Flank Roberts)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一系列长电报。罗伯茨

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从莫斯科公国时期就形成的对国家安全的追求，斯大林热衷于推行扩张政策，以使苏联获得“自然边界”苏联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融入其扩张行动之中，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去削弱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英苏矛盾是两国利益冲突的结果，而英美结盟则是遏制苏联的惟一办法。罗伯茨的报告受到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丘吉尔声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的中东欧国家，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并受到苏联的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他号召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运用各种力量和手段，对付所谓的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丘吉尔的演说事先经过精心策划，以“铁幕”一词而闻名。它的主要内容符合美国在战后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对冷战爆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从此拉开了冷战的序幕。3月13日，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丘吉尔的演说是危险的行动，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苏联方面也有与凯南和罗伯茨长电报的对应物，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才解密的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是当年苏联驻美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起草的，有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的指导和实际参与。1946年9月27日，该报告提供给参加五国和约巴黎会议的苏联代表团，题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

该报告的形成情况大致如下：1946年7—10月，讨论制定五国(意、罗、保、匈、芬)和约的巴黎会议，苏联与西方国家争论与分歧严重。9月在对保加利亚的政治和领土辩论最激烈的时候，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指示代表团成员、苏联驻美国大使、和会的保加利亚委员会的苏联代表诺维科夫为苏联代表团写一篇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政策趋势和意图的报告，并限10天必须完成。

在诺维科夫撰写报告期间，莫洛托夫询问进程并给予具体的指示，因此该报告是按照莫洛托夫的旨意和指示写的，诺维科夫也认为“这篇报告只能有条件地被看作是我写的”，莫洛托夫应当是未署名的共同作者。莫洛托夫在阅读报告时，在上面许多重文号并做了眉批。因此该报告的内容基本反映了苏联的官方观点。

诺维科夫的“长报告”同样全面分析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

目的以及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行为，断定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特征是谋求世界霸权，并将苏联视为其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为此美国正在以各种方式扩充军备，准备未来的战争，并且是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由此可见，在战争结束仅仅一年，苏联也已经完全否定和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苏关系的发展前途不抱希望。

同凯南的长电报一样，诺维科夫的长报告也为苏联对美国采取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和政策起到了论证与导向作用。不仅如此，从这份报告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凯南长电报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就这样，伴随美英和苏联在战后许多问题上的对抗与争斗，美苏两国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转向，即逐渐脱离大国合作政策而转向对抗。于是，冷战就在双方的行动与政策的对立互动中，以美国首先发出明确的对苏遏制与对抗的冷战信号——杜鲁门主义为标志而终于爆发。

1947年2月21日，英国使馆紧急约见美国国务院官员，并递交了两份分别关于希腊和土耳其的照会，大意为：英美在过去曾达成共识，由于战略原因，不能让希腊和土耳其落入苏联之手，并曾协议英国主要负责向希腊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则提供经济援助。但是现在希腊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外援，希腊将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和政治动乱，而希腊的军队也急需装备，但英国没有足够的援助可以提供，因此希望美国从4月1日起接过这个负担。土耳其的情况虽然不像希腊那样紧迫，但英国也建议与美国共同研究土耳其的财政需要以及应当采取的援助措施。

美国政府立即意识到这是英国拱手将“世界领导权”交给了美国，美国应该当仁不让地把这个任务接过来。另外，希腊和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地位也不能坐视它们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与东欧连成一片。在美国的遏制政策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终于形成了杜鲁门主义的决策。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众、参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他首先详述了希腊和土耳其的局势，说明美国给予希、土援助以及监督这些援助，涉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然后他把世界政治分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这两个非此即彼的对立营垒，并明确提出，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在这两种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而美国将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表明美国将支持和帮助世界上所有选择“自由制度”抵抗“极权统治”的力量，他因此要求国会批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4亿美元援助。这便是人所熟知的“杜鲁门主义”的问世。

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表明，美国对外政策终于

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主义的转变。杜鲁门主义实际宣布，美国将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进行干涉，只要它认为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杜鲁门主义明确提出了两种制度之争，从而使美国的遏制政策披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标志着美国越来越以两极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杜鲁门主义成为美国开始对苏联进行冷战的重要标识。

对苏联来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证明了诺维科夫长报告对美国意图判断的准确，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本人就认为，杜鲁门主义的真正的目的就在于“抑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从此，美苏关系便由冷战所支配，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两国的冲突也迅速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两大集团的尖锐对立，两极格局逐渐定型。

第三节 冷战高潮与两极格局的形成

杜鲁门主义虽然语言强硬，但它只是一项政策声明，在强化冷战并在两极格局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以经济方式实践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的校友集会上，发表了重要的演说。该演说虽然仅仅1500字，却提出了一项大规模帮助欧洲恢复战争创伤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

——通过美国的经济援助，使世界特别是欧洲恢复到正常经济状态，以保持稳定与和平，并使“自由制度”得以存续；

——强调美国的政策不反对任何国家和主义，只反对饥饿贫穷和混乱；——欧洲的复兴是欧洲人的事，所以援助倡议和具体方案应该首先来自欧洲，美国则视其需要和自己的能力所及给以援助；

——美国的援助不能零敲碎打，而是要求欧洲国家，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国家联合提出一个总体方案，作为美国援助考虑的基础。

与杜鲁门主义的表述不同的是，马歇尔计划刻意“淡化”意识形态，并把东欧和苏联也包括在受援国之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凯南等人认为，如果苏联拒绝美国的提议(实际上许多美国官员希望共产党国家不接受援助)，美国正好就把分裂欧洲的责任推给苏联；如果苏联接受，那么美国就以援助为手段，迫使东欧国家放弃其经济生活中的几乎是排他性的苏联取向；另一方面，美国还可以通过美援进一步加强西欧在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倾向，以抵制苏联的影响。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与实施，对加强美苏和分别以两国为首的东西方集

团之间的冷战对峙，以及对双方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地缘战略的影响都相当深远。

美国政府已经预料到，欧洲可能分裂的计划，恰恰是在以全面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刚刚出世不到 3 个月就提出的，因此苏联对它充满疑虑，并认为该计划具有反苏性质。诺维科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就认为马歇尔计划就等于建立一个西欧集团作为美国政策的工具，并认为美国在宣布马歇尔计划之前就事先预料到苏联不会参加这个计划，因此该计划显然是直接反对苏联的。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之后，苏联断定：马歇尔计划是要强化西方国家造成的德国分裂状态，真正目的是要把欧洲分裂成两个国家集团，为了美国谋求霸权的利益，利用一些欧洲国家去反对另一些欧洲国家。苏联最终决定拒绝接受援助，理由是马歇尔计划那样的“联合项目”和“共同事业”，是对主权的侵犯。由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曾想参加这个计划，苏联也担心东欧国家对苏离心力的增长。

结果，为建立西方集团而奠定经济基础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最终迫使苏联决心进一步加强对其东欧安全带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控制，从而导致莫洛托夫计划的产生，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以及东欧政权的苏联模式化。针对马歇尔计划，苏联在 1947 年 7 月—8 月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先后迅速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等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初步筑起了东欧的经济壁垒。随着 1949 年 1 月经互会的成立，东欧的经济完全纳入了苏联的轨道。1952 年 2 月，斯大林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

紧接经济措施而来的，是苏联收紧政治缰绳。1947 年 9 月，在苏联的主持下，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同时提出战后的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并以此作为各国共产党的路线和行动的根本出发点。

苏联还以驻扎在东欧的几十万军队作为威慑力量，彻底改变斯大林原本对东欧各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采取的较为宽松灵活的政策，取消了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权，并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方位的內政改造，将斯大林模式移植过去。与此同时，苏联把不愿俯首帖耳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并在东欧各国进行了无情大清洗，将包括共产党著名领导人在内的几十万人清除出党。

作为对美国冷战政策的直接反应，上述行动成为苏联在强化冷战过程中的重要步骤。至此，一个与美国和西欧相对立的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已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基本确立。

由于苏联和东欧以及一些不愿与苏联对立的国家的退出，马歇尔计划从“欧洲复兴计划”变成了“西欧复兴计划”。这项计划从1948年2月开始实行，到1952年结束，美国共向西欧16个国家和德国的美英法占领区提供了总额为132亿美元（一说为131.5亿美元）的援助。马歇尔计划解救了西欧各国的燃眉之急，使其经济很快复兴，使欧洲人恢复了对自己国家的信心，从而巩固了资本主义秩序。

马歇尔计划进一步改组了西欧的经济结构，使其更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与美国经济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统一的北大西洋自由市场区域。马歇尔计划以西欧集体制定复兴计划并互相协调生产与流通作为援助的条件和指导原则，使西欧各国包括后来的西德国家的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为西欧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并成为西欧国家政治联合的先声。

马歇尔计划的重要内容和目的之一，是将西占区的德国完全纳入西方的轨道。美国的政策设计者认为，德国在欧洲的经济复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实际已经确认德国不可能统一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占领区应该制定各项政策，使这些占领区能对西欧经济建设作出贡献。美国应该提出并鼓励某种形式的“西欧国家区域性政治联合”。只有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将一个复兴的德国融入欧洲，才能彻底消除极端民族主义对德国的束缚，解决困扰欧洲和世界多年的“德国问题”。

在苏联退出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谈之后，美国正式启动了建立联邦德国的工作，并依次采取了将德国的西方国家的占领区正式纳入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范围之内；将美英双占区和法占区合并，决定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准备建立联邦德国；直至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单方面的币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分裂德国的行动。

美国对德国西占区所实行的政策使苏联认定，他们对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要将西部三个占领区分裂出去，建立依靠并忠实于美国的德国西部国家。于是，以西占区的币制改革为导火索，终于导致苏联在1948年6月对进出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实行封锁，从而爆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当美国的大批飞机从东部德国的头顶呼啸飞过向柏林的西占区大规模空运各种物资的时候，人们真切地感到，美苏这两个战时盟国在战后第一次濒临战争的边缘，冷战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高峰。

正是从柏林封锁这一东西方在战后第一次最为严重的冲突与较量中，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也首次发挥了作用。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始终仅限于球陆交通，而开放着空中的通道，使美国的大规模空运得以实施。美国也没确采取武力手段，强迫苏联解除对水陆交通的封锁，双方都给对方留有余地，并努力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避免危机升级，并最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问题。

尽管第一次柏林危机在历时近一年后，以苏联方面的退却而结束，但捏德国的分裂过程已完全不可逆转。以 1949 年 10 月 3 日和 10 月 7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相继成立为标志，欧洲冷战对峙的经济政治和地理界线基本落定。

不仅如此，伴随马歇尔计划的实行和苏联强化对东欧的控制，尚未复劳的西欧各国也要求按照马歇尔计划的自助互助与他助方式，在军事上谋求美国的援助。1949 年 8 月，以前英、法、比、荷、卢西欧五国的布鲁塞尔条约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以美国为首的包括英、法、比、荷、卢、挪、加、冰、葡意、丹 12 国在内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该组织规定，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各缔约国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所承认之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之行使，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置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北约的建立，标志着跨大西洋的西方军事战略界线也差本划定。

北约的成立与杜鲁门主义一脉相承的，是杜鲁门主义在军事上的贯彻。虽然北约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强调的是安全和防务，但是就其实际作用辣说，政治上的意义显然更占主导地位，正如该公约在一开始就申明的，各缔约国“决心保障基于民主、个人自由及法治原则的各该国人民之自由、共同传统及文明”。显然，北约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军事集团，它更是要自觉维护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苏联也进一步加强了与东欧的军事合作，在苏联与波、罗、匈、保等国缔结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都规定：一旦德国或与德国结盟的其他国家发谢侵略，缔约双方相互支援。小仅如此，苏联还从 1949 年开始重新扩充其武装力量，在向东欧提供军火装备的同时，将大批军事顾问派往东欧，以帮助它们整顿、改组和建设武装力量。苏联和东欧军事上的一体化也由此开始。同样对强化冷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949 年下半

年发生的苏联首次爆炸原子弹成功的消息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者使美国和其盟国感到，它们正面临着苏联空前的军事威胁，甚至是核威胁；后者则因其改变了雅尔塔体系在东力的地缘政治版图，扩大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从而使杜鲁门政府认为它所担心的共产主义浪潮的扩张已成为事实，整个西方处于空前的危险之中。这两大事件的直接后果影响巨大。

首先是促使美国国会迅速批准“共同防御援助法”，即“军援法”，杜鲁门政府随即于1949年10月6日正式签署。根据该法案，美国拨款1314亿美元，为期一年，其中10亿用于援助北约国家。该法案作为向西欧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的重要补充，把美国的外交与军事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北约能够发挥实际作用。

其次是1950年4月，美国出台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将“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两极对立作为主导思想，过分夸大苏联的力量和扩张意图，认为苏联奉行全球侵略与扩张政策，并决定与苏联进行全球对抗。该文件不仅成为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蓝图，也成为美国军事干涉朝鲜战争的重要依据。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美国政府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对苏联意图的判断得到证实，杜鲁门政府遂决定进行全面的军事干涉，冷战进入了最高潮。即使是斯大林逝世这堪称国际事务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也未能立即将其扭转。

在国际上，朝鲜战争作为冷战中第一场特殊的局部热战，是美国企图采用军事手段，打击北朝鲜以“遏制”苏联并进而占领整个朝鲜的开始，也是以所谓“遏制”中国而实施遏制政策的开始。它不仅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进入了“大偏差”时期，而且使冷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程度。美国的出兵及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及中国为保家卫国而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揭开了长达加多年的中美冷战对抗，造成了至今没有解决的“台湾问题”。为了从军事上遏制共产主义，首先是遏制中国，美国在加紧迅速扶植日本的同时，逐步在亚太地区签订了一系列军事防御条约，构建起保卫中国的军事体系。与此同时，美国在欧洲设立了以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陆续将数万美军派驻欧洲，使北约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实体。随后北约两度扩大，在先吸收了希腊和土耳其之后，终于在1955年5月5日使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到1955年，美国建立了一个从大西洋经中东到西太平洋的军事条约网。

作为对西德加入北约的即时而公开的反应，5月11日到14日，苏

联建立了包括民主德国和东欧国家在内的与北约直接相抗衡的另一个欧洲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该组织规定，缔约国准备参加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行动，任何一缔约国遭到武装进攻时，其他缔约国应以一切必要的方式给予援助。结果是两个武装集团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相互怒目而视。

在美国国内，出现了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在苏联与东欧，则继续进行的“党内清洗”运动。它们作为美苏之间近于病态的极端相互仇视的反应，同样成为冷战最高潮的象征。

综上所述，到 50 年代中期，美苏经过实施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敌对政策和措施，终于酿成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军事组织和地缘政治版图的两大集团的全面对峙，两极格局最终形成并相对固定下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具有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在两极格局中，以美苏为首的相互对立竞争的两极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称的。美国和它的伙伴国实际上要比苏联集团强大。以 1950 年为例，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苏联的 3 倍，北约联盟加上日本的财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财富的 4—5 倍。

不过，尽管苏联只在军事能力上与美国基本相当，却有力量摧毁美国的西欧盟国。因此，尽管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整体军事能力上优于苏联，这种优势却从没有大到使美国领导人认为足以直接向苏联挑战的程度。其结果是导致了双方的军事威慑和军备竞赛、特别是核竞赛持续攀升。由于苏联的经济实力始终远逊于美国，因此在两国对立的整个历史时期，冷战对苏联的伤害远远超过对美国的伤害。

即使在冷战最高潮的年代里，两极格局也未能完全囊括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一些独立的国家或没有加入两个竞争的集团，或被开除出其中的某一集团。另外还有主要处于亚非地区的尚未获得独立的广大旧殖民地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对立的两个集团之外，使两极格局多多少少受其牵制与限制。随着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进行，亚非地区的独立运动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苏之间最初的对抗，而且在两极格局的基础上，不断生长出多极的力量。

1955 年 4 月，在北约正式吸收西德和北约成立之前，一个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隆重召开。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平共处，以及增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会议创造了亚非国家为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反帝反殖，在和平共处十项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团结合作的“万

隆精神”。万隆会议持久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增加了一支“第三势力”，是第三世界开始崛起的重要标志。

思考题：

1. 如何认识美国、苏联和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
2. 杜鲁门主义对美国战后的外交政策有何影响？
3. 如何认识马歇尔计划？

参考文献：

1. 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 1988 年。
2. 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法律出版社 2000 年。
3. 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
5. 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6.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7. Francesca God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war. 1943—53*.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第三章

冷战时期的美国遏制战略

冯海沧 国防大学

所谓“遏制战略”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学术研究的范畴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遏制战略仅指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的美国军事战略；广义的遏制战略是指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争霸全球的国家安全战略。遏制战略实施的主要对象是前苏联，也兼及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所说的：“西方战后时期的大战略一直是建立在遏制理论基础上的，即：挫败苏联的扩张目标以期使苏联有朝一日不得不面向其内部的种种矛盾。”

遏制战略以 1947 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为标志，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NSC68 号系列文件为基本政策文件。随着 1991 年苏联的解体，美国遏制战略也告一段落。其间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共 9 位美国总统，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 13，在美国对俄罗斯、中国等大国的战略中还能找到其影响和残余。

第一节 遏制战略的提出与形成

1. 遏制战略产生的背景

遏制战略的缘起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二战结束后，美国综合实力空前壮大，其追求世界霸权的野心急剧膨胀。苏联在二战中虽遭受重大损失，但军事实力迅速发展，工业生产能力恢复很快，国际威望大大提高，拥有一批新兴社会主义盟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政治军事大国。正是在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和双方的实力地位几乎旗鼓相当的背景下，美国逐步酝酿并最终形成了遏制战略。

美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在二战后的迅速发展，是遏制战略的现实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遭到了沉重打击和严重削弱，唯独美国在战争中大受其益，经济和军事力量空前发展。由于一

次大战的战场主要在欧亚非三大洲，美国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而且借助战争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为战争服务的各种经济产业，使其军事和经济迅猛发展。到 1945 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的比重已达 62%。对外贸易总额已占资本主义世界对外贸易总额的 1/3，黄金储备量占 70%，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

在经济上，美国通过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国际性组织，以国际经济自由化为旗帜，建立一整套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济秩序，控制了世界贸易、金融和投资，确立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担心遭受战争的破坏，纷纷将黄金储存到远离战火的美国，使美国在大战期间便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在最盛时期，美国几乎拥有 1000 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与此同时，美国还有强大的工业生产，使美元有十分雄厚的经济力量做后盾。

美国利用这一优势，积极筹划建立由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44 年 7 月，美、英、苏、中等 44 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的新辛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会议基本上按照美国的方案，通过了《最后议定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协定中最重要的是确定美元与黄金挂钩，把黄金官价定为一盎司 35 美元，使美元享受到高于其他国家货币的地位。

《布雷顿森林协定》意味着建立了以美元为支柱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货币体系，确立了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由于美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就能通过美元的发行，通过信用的扩张和收缩，通过它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强有力地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金融。由于美元等同黄金而成为主要的国际支付手段，美国就可以通过增发美元，支付海外驻军的费用，扩大资本输出和对外“援助”，并可以廉价购买别国企业，从国外购买原料和商品。

1945 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正式宣告成立。在这些机构中，美国依靠它的优势和股金的份额，拥有最大的表决权和对重大问题的否决权，从而控制了这两个世界性的金融机构，并成为美国输出资本的有力工具。

在政治上，美国企图通过对全球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施加影响，建立一套符合美国利益和愿望的世界政治秩序。1945 年 10 月，联合国正式成立。联合国原有 51 个创始国，其中有 34 个在西欧和拉丁美洲，

它们都是支持美国的，只有 11 个来自亚洲和非洲，它们绝大多数也是亲西方的。来自苏联集团的只有 6 个。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控制四票。这种状况，使战后初期美国在联合国内处于绝对优势，总能拼凑出符合它的需要的多数。1946—1953 年期间，联合国大会通过 800 多项决议，其中美国支持的只有两项被否决。

在军事上，到 1945 年战争结束时，美国武装部队已发展到 1200 多万人，国防预算超过 800 亿美元。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和空军，有 1200 艘战舰和 5 万艘登陆艇和供应船只。商船的吨位已超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和，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海洋的统治者。同时美国还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数百个军事基地，控制了远离本土 7000 英里的战略要地。美国当时还垄断了核武器，是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这些都充分表明，美国在战后已成为超级军事强国。

实际上，在二战期间，美国统治集团已经开始积极制定战后美国领导世界的计划。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认识到，战争结束后苏联将成为世界上的军事强国，英国也仍然会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美国必须将这些大国纳入到自己设计的世界体系中。罗斯福等当时曾经认为，法西斯战争的威胁促使美英苏成为战时同盟。不过在战争结束后，大国之间仍然存在“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共同需要；苏联在战争中遭到巨大损失，战后为恢复经济也需要美国的援助，所以也会继续同美国合作。罗斯福在战争后期多次与斯大林、丘吉尔会晤，召开三巨头会议，商讨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

1945 年 4 月，罗斯福突然去世，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杜鲁门上台后，逐步改变了罗斯福寻求与苏联合作的政策，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把苏联当作美国在战后的主要战略对手，试图突出实力政策在处理战后与苏联关系中的地位。1945 年 12 月 29 日，杜鲁门国会咨文说：“胜利已使美国人民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了”。

欧洲战后形势的发展和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对美国的世界地位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这是遏制战略形成的直接动因。

杜鲁门上台后，德国和日本先后投降，二次大战最终结束。但欧洲各国处于严重的困境之中。西欧许多国家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工业产量只达到战前的 70%。与经济萧条同时出现的是政局动荡不安。这一时期，欧洲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西欧许多国家的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党员人数从 1937 年的 50 万增加到 1947 年的 400 万。1945 年到 1947 年间，意大利、法国、比利时、丹麦、挪威、冰岛、芬兰、奥地

利和卢森堡等 9 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参加了联合政府。

东欧许多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在国内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东欧政权大多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苏联分别同这些国家签订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发展迅速，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进行广泛合作。

苏联的国民经济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大约有 3.2 万个工矿企业被战争摧毁，国民经济损失达 5000 亿美元。但是，苏联的军事力量在战争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世界超一流的军事大国。苏联的政治军事力量越出了国界，苏联红军占领了东欧，到达中南欧。苏联因此在自己的西部建立起一道安全屏障，摆脱了过去那种被西方国家四面包围的境地，极大地增强了同美国抗衡的地量。

在战争中，苏联曾经从美国获得了 100 多亿美元的租借物资；战争结束后，苏联从德国得到上百亿美元的赔款，又从波兰、芬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获得了 5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 2000 多万人口，此外还有 200 多万战俘在苏联从事强制性劳动。这一系列因素都为苏联在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争结束不久，苏联就采取了有力措施，积极恢复国民经济。到 1946 年，苏联在很短的时间里，一些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的生产能力就恢复到战前 1940 年的水平。到 1948 年，全国工业生产能力已全部得到恢复。

苏联在打败法西斯的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战前从 1917 年到 1939 年，与苏联建交的国家仅有 26 个，战争结束时与苏联建交的国家达到 52 个。

美国决策者认为，上述战后初期欧洲的形势和苏联的迅速崛起，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他们担心苏联的崛起和正在实施的对外政策，最终将摧毁美国的世界地位。他们还认为，美国已经不能也没有必要再延续罗斯福在战争时期与苏联合作的政策。反之，必须坚决采用强硬的措施，才能在世界各地阻止所谓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

2. 遏制战略的提出和形成

美国遏制战略从提出到形成，主要体现在四个文件上。它们包括：1946 年 2 月 22 日凯南的“八千字电报”；1947 年 7 月凯南以 x 先生的名义发表在《外交》杂志夏季号上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1947 年 9 月 24 日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 (Clark Clifford) 提出的绝密长篇报告《美国与苏联的关系》；1950 年 4 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系列文件，即 NSC68 文件。

在上述四个文件中，“八千字电报”和《苏联行为的根源》是最早提出和系统阐述遏制战略的理论文章，是遏制战略的理论基础。其作者乔治·凯南在其中对苏联战略企图的分析，对苏联国家行为特征的描述，以及提出的遏制苏联的目标等，为美国“已经采用的‘强硬’政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逻辑依据”，使美国决策者深为折服。

随着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从合作、友好转变为敌对与对抗之后，美国决策层日益感到需要对苏联进行系统的、理论的分析，全面阐述美国的对苏战略。比如主张改变美国对苏战略的强硬派代表、海军部长福莱斯特(J. Forrestal)就曾委托美国史密斯学院教授爱德华·威利特(Edward F. Willett)研究美国所面对的“谜一样的俄国”，搞清它在国际舞台上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实体，还是一个狂热奉行宗教般哲学的民族实体。一些政界要人如“苏联通”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和一些重要决策机构如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情报委员会等，也对苏联的行为动机和美国的对策作了分析和阐述。

但是，上述个人与机构的努力，都因为理论分析不足，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没能满足美国决策人的要求，因而没有得到足够注意。

战后初期美国外交界头号“苏联通”凯南于是便被推到历史舞台的重要位置上。凯南可以称为“遏制之父”，因为他是最早提出和系统阐述遏制苏联思想的人。他的对苏遏制思想对战后美国对苏战略的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战后40多年来，凯南被称为“美国杰出的战略家”和“美国最有思想的外交家”。

凯南，1904年2月16日出生于威斯康辛州。1921年至1925年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专攻历史，重点是近代欧洲外交史，并对地缘政治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影响了他后来对国际政治以及苏联内政与外交的分析和估价。从1933年底至1946年初，凯南先后担任过美驻苏使馆三秘、二秘、公使衔参赞和代办，成为美国外交界头号“苏联通”。1944年夏，凯南担任驻苏公使衔参赞。1946年1月，凯南被委任为代办，行使馆长的职权。

1946年2月中旬，凯南接到国务院的一封信，电报要求他对苏联不愿意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凯南觉得必须让华盛顿理解苏联的行为动机与美国的对策，而不是用几句话解释苏联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在秘书的帮助下，他起草了一份长达八千字的电报。为了便于发报和接收，这个电报分为5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于2月22日发送华盛顿。“八千字电报”是战后美国

政府的一份高级机密文件,但其内容很快便为一些新闻记者所获知。1946年4月1日的《时代》周刊披露了电文的主要内容。

“八千字电报”在华盛顿引起重视,因为当时在华盛顿占上风的强硬派正在要求改变对苏的认识和对苏政策。它使凯南跻身外交决策圈,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海军部长福莱斯特认为该电报十分重要,将它复制给军队中的高级军官和政府要员。一时之间,“八千字电报”似乎成了“美国决策人的圣经”。

经福莱斯特尔的极力推荐,1946年4月,凯南被调回华盛顿,出任国防学院副院长。1947年初,新上任的国务卿马歇尔又授权凯南筹建国务院政策计划室。该机构于当年5月成立,凯南为首任主任。政策计划室是战后初期美国政府重要智囊机关,主要任务是帮助政府制订较长期的对外战略。“八千字电报”初步阐述了遏制思想,但还没有明确使用“遏制”一词。凯南在一年之后发表的“x文章”则对遏制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而且明确提出了“遏制”概念。正因为如此,大凡论及战后美国遏制战略的著述,都要提到凯南的这篇文章。

1946年12月,海军部长福莱斯特(1947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要求凯南评论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政权的文章。凯南认为,这篇文章所论及的问题与他自己的经历和兴趣太接近了,他宁可自己重新写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不久,凯南便向福莱斯特递交了《苏联对外政策心理背景》。次年1月,凯南在该文的基础上,在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一次小型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苏联的思维方式及其对苏联对外政策的影响》之演讲。

《外交》季刊编辑汉密尔顿·F.阿姆斯特朗(Hamilton F. Armstrong)参加了这个研讨会,对凯南的发言深感兴趣,并向他索取文稿,以供《外交》季刊登载。凯南征得福莱斯特尔的同意并经国务院非官方出版物委员会的审查,将文章交给《外交》季刊,并要求匿名发表。当年7月号《外交》季刊登载了凯南的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因其署名“x”,所以该文被人们称为“x文章”。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八千字电报”的再版。更准确地说,它是电报基本思想的补充、完善和公开表述。

凯南在文章中首次把美国的对苏政策称为“遏制”,即美国对苏政策“最主要的方面就是长期、耐心、坚定与警觉的对俄国扩张倾向的遏制”;他声称,美国以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对苏联政权遏制10—15年,将迫使苏联的行为比近年所为更加“温和与明智”,从而导致苏联政权的

“瓦解或逐步软化”。除凯南外，1946年9月，杜鲁门的主要助手克拉克·克利福德也提出了一份长达50页的题为《美国与苏联关系》的绝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遏制战略。报告认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已经被一个庞大的强国所控制，海洋国家如果要在全球范围的力量均势，就必须遏制住这个国家向大陆边缘地带的扩张。美国必须以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把苏联的力量控制在它目前所占据的地区。也就是首先遏制苏联的进一步扩张，然后再通过其他手段使遏制战略扩展到中间地带及整个世界。

1946年3月，丘吉尔在杜鲁门的故乡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有名的富尔顿演说，提出了“铁幕”概念，拉开了冷战的序幕。丘吉尔讲话的精神实质与“长电报”一脉相承，不过是公开的，用语更为尖锐，更富煽动性。虽然美国此时还没有同苏联公开破裂，丘吉尔已经先美国一步公开了这一决心。

1947年2月21日，英国使馆紧急约见美国国务院官员，送交了两份照会。大意称：英美过去曾达成这样的共识，英国主要负责向希腊提供军事援助，美国负责经济援助。如今希腊经济状况已处于崩溃边缘，如无外援，将发生大规模饥荒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动乱。另外，希腊军队也急需装备。但是英国已无力提供足够援助，希望美国接过此一负担。第二份关于土耳其的照会内容也大同小异。

美国方面几乎立即意识到，这是英国拱手将“世界领导权”交给了美国，美国应该当仁不让。这一观点成为美国决策层的共识，他们立刻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的联席会上发表咨文，要求国会授权在1948年6月底以前向希腊、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同时派遣军事人员和文官，帮助希、土政府维持其统治。这篇咨文所阐述的中心思想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以此为标志，美国开始实施其遏制战略。

1949年8月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认为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全面审议美苏两国的力量对比和防务、外交政策。1950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审议结果形成NSC68系列文件。该系列文件系统总结了自1946年以来美国对苏遏制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应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它是遏制战略的基本文件和政策之大成，是指导美国冷战时期全球战略的基本依据。

第二节 遏制战略的主要内容

1. 理论阐释

凯南对苏联的认识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从地理环境对俄罗斯民族心理和历史影响的角度，分析苏联的内政、外交与国际行为的动机，并据此系统提出了遏制战略的思想。

在“八千字电报”中，凯南分析了俄罗斯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认为苏联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及其行为，是俄国传统的不安全感的产物。他说，苏联领导人对世界事务的看法，根源于俄国传统的不安全感。随着苏联同西方进行接触，又增加了对西方畏惧。因此，苏联对外政策行为的动机，是消除其固有的不安全感。由此产生的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为彻底毁灭同它竞争的国家而进行耐心、殊死的斗争，绝不同敌手达成妥协或协议。苏联需要大大提高其实力，最大限度地发展军事力量，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可能的地方，努力扩大其势力范围。至于苏联对美国的态度，凯南认为，苏联坚信，它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

关于美国的对策，凯南在电文中声称，虽然苏联如此敌视西方，但是它对所谓“力量的逻辑”高度敏感。当它在任何一点上遇到强大的阻力时，便轻易地退却，而且经常这样做。因此，美国如果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表明准备使用它，并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必真正摊牌。这段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遏制”一词，但实际上就是遏制思想的实质内容。

同“八千字电报”一样，凯南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以大量的篇幅首先分析了苏联的行为动机。他认为，苏联在其对外行为中表现出两个“政治性格”，而每个“政治性格”都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政治性格”是既仇视西方又愿意同西方和平共处。第二个“政治性格”是既坚定又灵活。文章除把苏联行为动机归结为其内部固有的不安全感，还进一步从苏联成立 30 多年中所处环境，如内战、外来干涉、权力斗争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突出了有关地缘政治思考的时代色彩。

在凯南看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主要是一种工具，被苏联领导人用来消除其天生的不安全感，为在国内维持“独裁制度”提供合法依据，并进行扩张势力和同敌手作斗争，等等。虽然，《苏联行为的根源》的第一句话就强调苏联当时的政治性格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但通观全文，凯南依然没有把意识形态作为决定苏联行为特征的主要因素，是当作维持内部政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2. 政策表述

遏制战略的政策表述主要体现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 (NSC68 文件) 中。该文件对遏制战略的时代背景, 主要目标、手段、措施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关于提出遏制战略的时代背景。NSC68 文件认为, 19 世纪以来, 全球均势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苏两大国现在控制全球, 并处于对立状态。文件强调, 过去 35 年中, 世界经历了两次全球战争, 目睹了两次重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 也看见了奥托曼、奥匈、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五个帝国的崩溃, 以及英、法两大帝国体系的衰落。现在世界正在形成美苏“两大中心”。由于苏联追求对世界的“绝对权威”, 暴力的或非暴力的冲突随时可能发生。由于原子武器的发展, 如果发生全面战争, 人类“将面临全面毁灭的危险”。因此, 不能采取直接对抗的战争形式来消除苏联的威胁。

关于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NSC68 文件以美国宪法序言中关于“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争取自由幸福”的一段话, 作为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一基本目标, 美国表示决心在全世界反对苏联, 并称这就是决心为美国社会制度的“生存和繁荣创造条件”, 决心“保卫美国的生活方式”。关于苏联威胁的性质和危险性。NSC68 文件因袭了美国占主流地位的地缘战略观, 认为欧亚大陆历来是控制全球的核心地区, 而苏联正朝着“主宰欧亚大陆的方向努力”。美国是“非苏联世界的中心”, 已成为苏联的“头号敌人”。该文件还认为, 由于国际政治力量的两极化, 以及两个对于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所以对抗具有爆发危机的特性。

关于美国全球战略的结构。NSC68 文件指出, 美国的全球战略包括两个部分: 一足力图发展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健全的国际共同体”; 二是遏制苏联的体系。这两个部分“紧密相关, 而且相互作用”。该文件强调, 在一个两极化的世界上, 发展一个“健全的国际共同体”, 比自己拥有实力更为重要。为建立遏制苏联的国际体系, 该文件强调要大力传播美国的价值观, 把其他国家吸引到美国方面来。盟国的力量是美国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应加强同盟国的关系, 必须采取措施将盟国的潜在力量, “汇集到美国的力量之中”。

为了实施遏制战略并实现其目标, NSC68 文件还明确提出了一套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在内的手段和措施。其中具有长远影响的措施之一是提出了威慑战略。

NSC68 文件分析了美苏双方的核态势和核政策，认为现在美苏双方都拥有核武器，而且互不信任，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美国只注意“进行防御战争”，而且只在“遭到直接进攻”的情况下才使用核武器，那苏联就会对美方发动“突然袭击”，或进行“蚕食侵略”。该文件作出了这样的战略判断，即如果到 1954 年苏联拥有热核武器，一旦战争爆发，苏联人肯定会使用核武器。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该文件提出了“威慑”概念，声称只有当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核优势并掌握制空权时，苏联才会被威慑住，并不敢使用其核武器。美国对苏联施加的唯一威慑是使苏联确信，美国会在任何它不能控制其局面的关键问题上，发动毁灭性的全球战争。该文件强调，应全面发展美国的军事力量。一方面要增强美国的核力量，以确保核报复的有效性；同时大力增强海陆空三军力量，增强防空能力，实施平民防御计划，以使美国在军事上不过于依赖核武器。该文件认为只有在军事准备上达到这种水平，才能避免陷入要么投降，要么发动全球战争的“非常糟糕的”境地。

NSC68 文件排除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认为这会被苏联视为“软弱”，被盟友视为是“抛弃他们”，而且苏联也不一定会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政策。

遏制战略的出发点是基于美国政府对其世界地位的这样一种认识，即美国是世界领袖，负有“领导责任”。**NSC68** 文件声称，世界既面临苏联的威胁，也面临着秩序如此的混乱不堪。“这样的事实”和美国“自身的利益”，要求美国“肩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而且美国“作为自由世界实力中心”，有责任将“自由世界”的能力和资源纳入遏制计划之中，以“创造一种苏联被迫适应的环境，挫败克里姆林宫主宰世界的图谋”。

总之，**NSC68** 文件认为，“冷战事实上是一场真正的战争”，美国需要“投入所有的创造性，作出牺牲，并团结一致”，才能达成国家的目标。

可以说 **NSC68** 文件是美国自 50 年代以来发动“冷战”的纲领性文件，是遏制战略的最完整、系统、明确的表述。美国正是根据该文件阐述的原则，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核工业，全面开展军备竞赛，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组织军事集团，干预他国内政，并介入或发动一次又一次局部战争，深刻影响了世界局势。

第三节 遏制战略的实施、调整与发展

遏制战略形成于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但以后历届美国政府都根据该战略的实施结果、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苏力量的对比，不断进行调整、充实和发展。

1 杜鲁门时期(1947—1952)

杜鲁门总统对遏制战略的实施除上述援助希腊、土耳其外，还包括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即：马歇尔计划、组建北大西洋组织、制定“第四点计划”，以及在亚洲扶植日本、干涉中国内战和介入朝鲜战争。

美国把希、土两国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体系的目标，在东地中海建立“抵抗苏联侵略的屏障”和美国势力的前哨阵地，遏制苏联向波斯湾和地中海方向扩张。

1947年5月22日，杜鲁门签署“援助希腊、土耳其法令”。随后，美国便开始大规模插手希腊内战。1947年6月20日，美国同希腊签订了关于美国援助希腊的协定。美国立即派遣庞大的军事代表团进入希腊，帮助训练和重新武装希腊政府军，并成立了由美国人领导的美希联合总参谋部，策划镇压希腊人民武装力量。到1949年年中，希腊共得到6.48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内战中的军事需要。

美国的势力也渗透到土耳其。根据美国的计划，向希、土“援助”共4亿美元，其中给土耳其1亿美元。1947年7月12日，美、土签订关于美国援助土耳其的协定，紧接着美国军事代表团抵达土耳其，改组并控制了土耳其军队，攫取了海空军基地。1948年，美、土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49年，双方又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

实施马歇尔计划，恢复西欧经济，控制西欧，遏制苏联向西发展，是美国政府推行遏制战略的重要经济手段。用杜鲁门自己的话说，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是一个胡桃的两半，“我们对外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提出了马歇尔计划，1948年4月美国国会正式批准。其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拨款援助西欧各国作为复兴经济之用，但受援国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商品，要尽快撤销关税壁垒，取消或放松外汇限制；接受美国对使用美援的监督，向美国提供本国和所属殖民地出产的战略物资，保障美国私人投资和开发的权利；削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放弃“国有化”计划等等。从1948—1952年，美国向欧洲提供了130多亿美元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

帮助西欧各国渡过了战后的经济困难时期。

马歇尔计划有着明显的政治与经济目的。从政治上来说，主要是帮助西欧各国稳定国内形势，遏制共产主义运动在西欧的发展。在经济上美国可以通过经济援助，干预接受援助国家的内部事务，加强对西欧的控制。此外，还可以推动西欧的联合，为组织新的军事集团遏制苏联创造有利的条件。马歇尔计划被杜鲁门看作是一项“明智而有效地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的伟大事业。”

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遏制战略在军事上的一个重大步骤。1948年3月，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同卢森堡5国签订了为期50年的“布鲁塞尔条约”，打出的旗号是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但真实意图却是为了防止所谓的苏联“威胁”。美国在立即支持该条约的同时，表示只有在美国的帮助下，才能有效地解决欧洲防御苏联威胁的问题。从1948年7月开始，美国便与布鲁塞尔条约5国举行会谈，积极筹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9月9日与会国正式签订了《华盛顿文件》，文件对即将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性质、范围、缔约国承担的义务以及与欧洲其他组织的关系等等作了详尽的规定。

1949年4月，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葡萄牙、意大利和冰岛等12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美国和加拿大以苏联“威胁”西欧地区的安全以及致使“北美的安全也受到严重的威胁”等为理由，也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把矛头直接对准苏联阵营的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的主要内容是对签字国中一国或几国的进攻，都被视为对所有签字国的进攻，缔约国可以采取包括武力存内的行动。1952年2月希腊、土耳其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4年10月，美英法和西德签署了吸收西德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巴黎协定，允许西德建立一支50万人的军队。该协定于1955年5月5日正式生效。

“第四点计划”是一项全面实施遏制战略的总体计划，其突出的特点是提出，美国需要在亚、非、拉地区遏止苏联的扩张。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了美国外交方面的四点主要行动原则：一是支持联合国；二是继续推行世界经济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三是加强与爱好自由的国家的合作(指正在酝酿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四是技术援助不发达地区。前三点内容都是美国在战后已经或正在推行的遏髓措施，而四点却是新提出来的，后来被称为“第四点计划”。

当时杜鲁门在谈到“第四点计划”时说：全世界半数以上人口处于贫匪之中，这对他们自己和比较繁荣的地区来说，都是“一种障碍和威胁”。因戈共产主义就是在这种“贫困和不满的土壤里蔓延滋长的”。杜鲁门强调，美国的“援助”不仅可以消除这种“障碍和威胁”，从而消除共产主义扩张的土壤和条件，而且还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得到很大的好处”，即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到美国阵营中。

1950年6月5日，美国第81届国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对外经济援助法案”，“第四点计划”列入该法案的第四节“国际开发法案”。当天，此法案经杜鲁门签署正式生效。“国际开发法案”规定：美国援助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各国人民开发本国资源和改善当地劳动、生活状况，鼓励交换技术知识和技能，向这些国家输出资本。法案强调要把私人投资和技术“援助”结合起来，鼓励私人对外投资，并保证私人投资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法案规定，至1951年6月30日止，用于技术援助的拨款总额不超过3500万美元。为推行“第四点计划”，美国设立了国际开发咨询委员会和“技术合作署”。美国派出大批技术人员到国外进行技术“合作”，并接受许多国家的人员到美国受训。到1950年底，美国已与33个国家和地区缔结了涉及“第四点计划”的一般协定，主要项目是农业、原料开发、运输、职业教育和卫生等。美国用于技术“援助”的拨款也逐年增加。1951年财政年度为3900万美元，1952年财政年度为1.27亿美元，1953年财政年度为1.45亿美元。

“第四点计划”从本质上看，是美国大规模向亚、非、拉渗透的重要措施，是战后初期美国推行遏制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这项政策一方面带动了美国私人垄断资本的资本输出，为美国工业发展取得了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另一方面也起到了遏制苏联在亚非拉地区扩展其影响的作用。

遏制战略在杜鲁门政府期间最突出的表现是强调军事实力，表现为积极建立军事基地，拼凑军事集团，对苏联阵营进行军事威胁、包围，直至采取直接军事干涉，等等。这突出表现在亚洲，美国通过直接的军事干涉，以热战的形式推行遏制战略。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就开始实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抗日战争刚结束后不久，美国曾经以帮助中国受降为名，调派大批飞机船只，帮助国民党政府将近百万军队运到东北和华北广大地区，与中共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美国还直接派遣海军陆战队，抢占中国沿海港口帮助国民常政府控制铁路交通和战略要地。

与此同时，杜鲁门政府派美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诤停国共矛盾，试图避免国共爆发大规模内战。在美国的斡旋和苏联的影响下，1945年10月10日国共代表签订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但此后不久蒋介石即下令，向中共控制地区发动军事进攻。由于担心中国内战蔓延，特别是担心被卷入与苏联的军事对抗甚至战争之中，杜鲁门政府再次派马歇尔作特使，到中国进行“调停”，但最终失败告终。

1946年夏季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在此后的3年内战期间，美国政府先后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60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运送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弹药。然而，美国的援助并没有能阻止中国革命运动的进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从而宣布了战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彻底失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战争爆发后几乎立即宣布进行全面的军事干涉。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投入了1/3的陆军、1/5的空军和1/2的海军力量，支出200亿美元的直接军费，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由于美国在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宣布封锁台湾海峡，直接在军事上介入中国的内战，也是由于美军不顾中国的警告，越过三八线，企图用武力占领朝鲜半岛，迫使中国于1950年10月中旬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中朝军队的打击下，美军被迫退到三八线以南。1953年7月中朝军队与美军达成停战协定，朝鲜战争结束。

从历史的过程看，可以说在杜鲁门任总统的时期，是东西方冷战特别激烈、特别尖锐并迅速蔓延的时期。

2. 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时期(1953—1961)

在1952年大选中，艾森豪威尔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取得了胜利。1956年再次当选，直到1961年。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出任第34任美国总统，他几乎立即开始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进行调整。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8年里，美国政府提出了“新面貌”政策。这项“新面貌”政策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指导方针，其核心是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这也是同一时期美国军事战略的基本内容。

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新面貌”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依据：其一是美国领导人认为，同苏联的对抗将是长期的，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军事力量的发展不能以损害经济力量的健全为代价；其二是与苏联的对抗主要是政治而非军事的，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军与其说是为了进行战争。

总而言之，“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是把赌注押在发展原子武器和核

武器上，大大削减常规兵力，重点扩充核力量与战略空军和海军。结果是陆军的经费大幅度削减，海军的费用只是后来由于研制、采购核潜艇的需要才开始回升，而空军费用则稳步上升。与此同时，美国的核武器生产出现了“大跃进”。从1953到1961年的8年之中，美国的核武器数量由1350枚增加到23万枚，激增了16倍之多。

“新面貌”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推行实力政策的同时，提出应依靠“和平变革”的方式，战胜共产主义。

艾森豪威尔政府实施遏制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首先是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和封锁，围绕亚洲大陆边缘，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基地和军事集团。

其次是以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为理由，加强对该地区的军事干涉，特别是企图防止印度支那地区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美国非常担心西方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将波及东南亚各国甚至整个亚洲。艾森豪威尔政府发明了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美国领导人以此说明，当时越南抗法救国战争的胜利将会造成极其危急的形势，所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东南亚出现“多米诺骨牌”的后果。

根据这一理论，美国采用了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对付东南亚地区发生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1954年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如果东南亚发生革命，美国有必要投入战争。1954年当法国从越南撤出之际，美国立即企图取代法国，在印度支那扩展美国的势力范围。1955年美国大力扶植吴庭艳傀儡集权，废黜了亲法的皇帝保大，建立了吴氏家族的独裁统治，从而破坏了越南全国的普选和统一。同时美国还通过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掌握了南越的经济，并逐步建立起一支拥有数十万人的南越军队，还在越南建立了许多海空军基地，为60年代美国大规模入侵越南打下了基础。

最后是在中东地区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企图填补英法殖民主义失败后的所谓“力量真空”，并防止苏联向中东扩张。

艾森豪威尔政府非常重视对中东地区的控制。这不仅由于中东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还出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考虑。中东是亚、欧、非三大洲交通枢纽，又是欧洲的侧翼，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美苏必争之地。1956年中东地区发生了苏伊士运河危机，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该事件给美国提供了扩大其在中东的势力范围的有利机会。1956年埃及决定收回苏伊士运河，立即遭到了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干涉。埃及人民奋起反抗，粉碎了英法以三国的军事干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种情

况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担心苏联会借机侵入中东。

1957年1月，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关于中东政策的特别咨文。该咨文提出：“为了维护中东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抵抗共产主义侵略”，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中东实行特别的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国会随后通过了联合决议案，授权总统动用2亿美元，向中东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规定在这些国家面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控制的任何国家的武装侵略时”，总统有权应它们的请求提供武力援助。该决议案于3月9日由艾森豪威尔签署生效，其中的原则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

“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后，除了巴格达条约国家和以色列、黎巴嫩外，其他阿拉伯国家均表示拒绝这一侵略性计划。埃及总统纳赛尔明确表示：“首先，这里并没有真空，而即使我们假定存在这种真空，那么也必须由阿拉伯民族主义来填补”，“实际上我们已经填补了这种真空。”

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第一次运用是在1957年4月，美国首先在约旦帮助王室稳定政局，巩固统治。约旦政局稳定后，美国政府又向侯赛因国王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援助，力图扩大美国在约旦的影响，分裂阿拉伯国家。继约旦之后，美国把矛头转向叙利亚。叙利亚从苏联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加强同埃及的合作关系。1957年8月，叙利亚政府以颠覆活动罪，将美国三名外交官员驱逐出境。于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叙利亚已开始转向苏联阵营。

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断唆使叙利亚周围的邻国进攻叙利亚，同时向约旦和黎巴嫩大规模空运武器，并加速履行对土耳其和伊拉克承担的义务，美国将第六舰队调往地中海东部，伺机出动。然而，只有土耳其从1957年9月开始在叙士边境集结重兵，进行挑衅。美国的高压政策遭到叙利亚的坚决抵抗，也遭到不少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1958年黎巴嫩局势恶化，美国政府再次援用“艾森豪威尔主义”。由于黎巴嫩基督教派的夏蒙政府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并赞成美国对约旦和叙利亚的干预，从而遭到人民的反对，发生了群众性的总罢工、总罢市和示威游行，同时由教派的矛盾发展为街头冲突。夏蒙政府决定进行镇压，结果导致黎巴嫩发生武装起义。

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黎巴嫩局势是苏联策动的动乱。美国立即进行干涉，最初是源源不断地向夏蒙政府提供各种军事装备以帮助镇压人民起义，同时向地中海和塞浦路斯集结军事力量。7月15日，艾森豪威

尔政府派出 8000 名美军在黎巴嫩登陆，公开进行军事干涉。

美国的军事干涉立即遭到黎巴嫩人民和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反对。经过 4 个月的斗争，夏蒙政府被推翻，美军也被迫于 10 月撤出黎巴嫩。12 月 1c 日，黎巴嫩新政府宣布不再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

伊拉克是反共军事条约——“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该组织的总部设在巴格达。1958 年 7 月 14 日，以爱国军官阿卜杜勒·卡塞姆 (Abdul Karim Kassem) 为首的青年军官发动起义，推翻了费萨尔王朝 (Faisal Dynasty)，成立了伊拉克共和国。新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天就宣布，退出“伊约联邦”。1959 年 3 月，又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从而打乱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侵略体系，使艾森豪威尔主义又一次遭到惨重的失败。

把中央情报局作为遏制战略的一个重要工具，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重要特色。艾森豪威尔政府总结了杜鲁门政府目标过高，以致花费巨大却力不从心的教训，强调要以较小的开支，进行更有效的遏制。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支配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加强了中央情报局的行动。

艾森豪威尔任命国务卿杜勒斯的胞弟艾伦·杜勒斯 (Allan W Dulles) 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针对共产党国家和亲苏民族政府，大搞各种秘密活动和颠覆破坏活动。中央情报局制造的重大事件包括：1953 年颠覆伊朗政府；1954 年推翻危地马拉政府；1958 年企图在印度尼西亚进行政变；1960 年、1961 年对古巴进行颠覆活动。此外还对东欧国家进行渗透，对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准军事行动，等等。

“大规模报复战略”得以确立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拥有超过苏联核力量的绝对优势。然而，50 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军事力量获得迅速发展，使“大规模报复战略”受到质疑。

首先是 1953 年 8 月，苏联进行了首次热核爆炸。这清楚地表明，苏联正在以出乎美国预料的速度，迅速地发展核武器。1956 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预测，到 1958 年，苏联携带氢弹的远程轰炸机将具有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即使提前一个月作出战略预警，美国也无法进行有效防御。有鉴于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在 1956 年不得不开始修改“新面貌”政策。从本质上讲，修改后的政策仍然是“新面貌”政策的继续，不同之处在于“新面貌”政策主张建立核优势，而“新新面貌”政策则基于这样的认识，即维持绝对的核优势的代价会无限昂贵，因此应以所谓的“充足”威慑论取代“优势”威慑论。

其次是苏联洲际导弹的快速发展，彻底动摇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型础。美苏之间在导弹技术方面的竞赛始于战后初期，从 50 年代开始，双方加快了研制工作的速度。在 50 年代中期之前，美国重点发展远程轰崩机，苏联则重点发展中程弹道导弹。1955 年，苏联开始试验射程为 1600 乏里的中程导弹，1956 年开始部署。1957 年 8 月 26 日，苏联声称它成功地刮验了“多级超远程洲际弹道导弹”。10 月 4 日，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连地球卫星，重 184 磅。11 月 2 日，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卫星，重达 1100 磅相比之下，美国的洲际导弹几经挫折后，才于 1958 年 8 月试射成功。美 1 第一颗人造卫星是在苏联卫星上天一年后才被送上轨道，且仅重 2 磅，根本无法同苏联的卫星相比。

苏联在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方面的遥遥领先，强烈地震动了美国。51 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都证明，“大规模报复战略”使美国既不敢打全面战争又不敢打局部战争，从而证明这一战略原则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因为核亩器所具有的巨大破坏力，使它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有很大的局陞性。

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战争期间，曾两次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但基于利种原因，最终没有付诸实施。在印度支那地区，杜勒斯曾暗示要采取“扩办到印度支那的门罗主义”。最终因为国内政治的压力和盟国的反对，放弃了干涉印度支那战争的念头。1954 年三四月间，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了几次当量的氢弹试验。然而太平洋上的蘑菇云并没有改变奠边府战役的结局。“大规模报复战略”对于遏制有限战争没有多大效果，遏制当时蓬勃挚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更是毫无用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承认，游矗战和抗议活动“使美国很难主要依靠军事手段作出反应”。

从 1957 年开始，“大规模报复战略”遭到来自美国政府内外的尖锐捌评。其中晟具代表性的批评者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陆军参请长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D. Taylor)。

基辛格在 1957 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从外交的角度手日评“大规模报复战略”中的所谓“威慑”与提出者的意图相反，是真正放弃了外交的主动权。因为核武器太可怕了，以至在较小的事件中都不宜使用；基辛格强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是外交战略的一个工具，只有在有阵战争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达成国家的目标服务，并为美国重新夺回战略{动权。

泰勒则从战略的角度观察并批评“大规模报复战略”。他在 1957 年

出版的《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中建议，用“灵活反应”战略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他的这一战略主张为肯尼迪政府所采纳。

作为核时代的一种军事思想，作为“灵活反应战略”等诸多反应手段中的“最后一招”，“大规模报复”仍被包含在后来的美国军事战略中，其中的战略威慑思想一直影响至今。

3. 肯尼迪(John F. Kennedy)、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时期(1961—1969)

1961年1月，肯尼迪当选为美国第35届总统，1963年12月在任内遇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总统，并于1965年连任直到1969年。概括地说，60年代执政的这两届民主党政府继续奉行遏制战略，但是他们的确在一些重大的政策上进行了调整。

肯尼迪在1960年1月1日的演说中，称“遏制政策”为和平战略，认为这种战略的实施是基于这样的基础，即美国垄断了核力量，能对外进行资本输出并提供技术援助。他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投有认真实施这一战略。在他看来，当时在第三世界到处兴起民族解放运动，其主要趋势是亲共产主义的。基于这种看法，肯尼迪上台后着手改变美国的军事战略，用“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作为遏制苏联的主要手段，同时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注重用和平的方式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演变，并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渗透和扩张。

“灵活反应”战略突出地强调，美国军队必须提高打赢有限战争的能力。美国军队要既能打核战争，又能打常规战争，既能打正规的常规战争，又能打非正规的常规战争，如“特种战争”、“反游击战”、“反暴乱”等等，而且要以打局部战争(有限战争)和对付游击战为主。

“灵活反应战略”赋予核威慑新的定义，认为核威慑有两层含义。首先是以优势的核力量使敌人感到没有胜利和生存希望，从而不敢发动核战争；其次是即使敌人使用了核武器，美国还能使用保留下来的核武器，给敌以摧毁性打击，使对方丧失毁灭美国和打赢战争的信心。

肯尼迪政府已经多少意识到，有必要恢复核军控谈判。美苏的核武器已发展到“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的水平，美国应当争取恢复美苏部分禁止核试验谈判，通过谈判达到限制苏联获得核优势的目的。美苏部分禁止核试验谈判于1962年8月恢复，并于1963年7月达成协议，双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空与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美苏核裁军和军控的新起点。

肯尼迪政府在遏制苏联的同时，也强调所谓与共产主义的和平共处。

肯尼迪政府认为，在美苏掌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达到一定规模后，战争很可能会由于当事国谈判或偶然事件而发生。这种认知的错误或偶然事件引发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美苏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和对话，相互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这种认识，肯尼迪政府一方面与苏联争夺寸步不让，强化美国的军事实力，争取军事优势；另一方面也声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不能以武力消灭之，必须与之和平共处。

肯尼迪政府基本放弃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只打核战争一种战争的方针，提出要根据不同情况准备打四种战争，它们包括：用常规武器打常规战争和特种战争；使用战术核武器打有限战争，以及使用战略核武器打核大战。除了准备不同性质的战争以外，肯尼迪政府强调增强常规兵力的重要性，也是为了准备同时打两个半战争，即准备同时在欧洲和亚洲打两场大仗，“一个是保卫欧洲，抵抗苏联的进攻”，另一个“是抵抗中国对东南亚或朝鲜的进攻”，还有半个战争是对付不测事件。例如中东的军事冲突。

肯尼迪政府尤其重视游击战和所谓反叛乱作战，声称所谓“共产党侵略”的主要形式是搞地下战争和游击战，美国必须认真对付不发达国家的丛林和山地的游击战，并下令在巴拿马、冲绳、越南和西德等地建立新的特种作战中心。1962年间，肯尼迪在美国军校毕业生发表讲话时声称，如何对付游击战是未来十年里美国不得不面临的挑战，美国军校的毕业生有必要具有进行“特种战争”的能力。

“灵活反应战略”强调增强常备力量，并不等于放弃核力量的发展。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ra)指出：“核力量与非核力量是互为补充的，就像它们与非军事政策手段互为补充一样。”肯尼迪政府的方针是既要加快增强常规力量，又要进一步发展战略核力量，需要解决的难题主要是如何保持适当的平衡。在肯尼迪任期中，美国的核力量仍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相比，美国核武器的数量到1964年中期增加了150%，核爆炸力的吨位增加了200%，核潜艇增加了10艘，民兵式导弹增加了400枚。

肯尼迪政府实施的“灵活反应战略”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古巴和越南的军事干涉中。

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当时虽然感到突然，但还是承认了古巴新政府。随着古巴革命的深入发展，美国政府对古巴日益采取敌视态度。后来古巴又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协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支持拉丁美洲各国的革命斗争。古巴政府的一系列行动使美国把古巴视为眼中钉，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立即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同时采取措施，进行各种准备，企图推翻古巴政府。

1961年4月，由1400名流亡者组成的古巴旅从尼加拉瓜乘船出发，在美国飞机和军舰的掩护下，在吉隆滩登陆，企图通过与古巴内部反革命势力里应外合，用武力一举推翻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政权。然而，那批雇佣军登陆后便被古巴军队包围在海滩上，不到72小时便全部被击毙和俘虏。这是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发动的历次军事侵略中，第一次遭受彻底失败。1962年7月，苏联以帮助古巴防御美国侵略为理由，决定在古巴秘密部署导弹力量，并抢在美国发现之前完成。美国派出的U. 2飞机高空侦察发现了古巴正在修建导弹发射场和苏联的中程轰炸机。10月15日肯尼迪召集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决定对古巴实行封锁，若不能奏效则实施空中打击。

10月22日晚，肯尼迪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由于苏联已将进攻性导弹运往古巴，美国将对运进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实行海上隔离，对古巴实行军事封锁，并要求苏联撤走设置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美军奉命进入最高戒备状态，50%的战略轰炸机满载着核武器在空中盘旋，核潜艇进入作战阵地，在加勒比海地区部署了180艘舰艇和大量的海军陆战队。

在肯尼迪咄咄逼人的威胁下，赫鲁晓夫于10月26日写信给肯尼迪，表示只要美国不入侵古巴并取消隔离，苏联便撤走导弹。第二天他又附加一项条件，即美国应从土耳其撤走它的中程导弹。但肯尼迪对此不予理会，仍然命令美军做好空袭的准备。在这关键时刻，赫鲁晓夫作出了让步，同意停止修建导弹发射场，把进攻性的武器运回苏联，并在联合国开始谈判。随后，苏联在美国舰队的监督下，撤出了在古巴的导弹和部署导弹的军事人员，苏联的伊尔28型轰炸机也离开古巴。历时13天的古巴导弹危机到此结束。

美国决策层后来总结认为，苏联之所以让步，主要是因为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在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占优势的地方。

大规模地卷入越南战争，阻止越南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统一，是“灵活反应战略”在亚洲的一次大规模实施。

肯尼迪政府一直将中国视为比苏联更危险更富于“侵略性”的敌人，国务院腊斯克(Dean Rusk)曾在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撤南问题听证会说。“侵略的工具”是河内，而“侵略的主义”来自北京。肯尼迪政府

担心在越南的失败像杜鲁门时期丢失中国一样，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从而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所以肯尼迪政府根据“灵活反应战略”的指导思想，积极在越南部署特种部队，进行特种战争，1961年开始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游击战。

肯尼迪政府原准备在18个月消灭南越人民武装力量，但是战争进程完全出乎肯尼迪政府的预期。美国实施的特种战争不仅未能达到消灭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的目的，南越的政局反而更加动荡不安。

约翰逊上台后没有对遏制战略作任何有意义的调整，不过，在与苏联缓和关系的某些领域，还是取得一些有限的进展，例如签署“外层空间非军事化条约”和“禁止核扩散条约”，开始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

约翰逊上台后不久，便在越南采取了两大军事升级行动。第一次是在1964年8月，约翰逊派遣美国军舰入侵北部湾，挑起“北部湾事件”。随后美国海空军开始对越南北方狂轰滥炸，把战火烧到了越南北方。第二次是在1965年3月，约翰逊政府决定向越南南方派遣大批美国地面部队，从此开始直接参加越南战争，“特种战争”从此升级为美国军队直接参战的“局部战争”。

约翰逊政府的另一个重大决定是对多米尼加内政实施军事干涉。1965年5月2日，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为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进行辩解，声称美国的军事干涉是为了“防止在西半球建立另一个古巴”，“美国不能够、不应当、也不允许在西半球建立又一个共产党政府”。约翰逊的这一声明被称为“约翰逊主义”。

显然，加强在第三世界的军事干涉成为约翰逊政府推行遏制战略的突出特点。但是，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不断遭受严重的失败，这表明美国的“灵活反应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军事干涉，尤其是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实力，美国的优势地位受到猛烈冲击，从而导致美苏力量对比开始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

4. 尼克松(Richard Nixon)、福特(Gerald R Ford)时期(1969—1977)

尼克松是在美国的遏制战略和对外政策面临严重困难的时期入主白宫的。上台当年的7月，尼克松在关岛对记者发表谈话，其中心思想后来被称为“关岛主义”，并在以后有关对外政策的报告中被全面阐述，并被正式命名为“尼克松主义”。

“尼克松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要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将肯尼迪

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推行的“灵活反应战略”调整为“现实威慑战略”。具体内容包括收缩海外军事力量，减少美国承担的义务，通过外交手段建立大国间的均势，在东西方关系上推行所谓的“缓和”政策。

“尼克松主义”的出现清楚地反映出尼克松政府正面对美国地位相对衰落的现实。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世界形成五大力量中心的看法。他认为，从经济角度和经济潜力来考虑问题时，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大陆中国和日本。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20世纪最后1/3时间里的经济前途，而且将决定20世纪最后1/3时间里其他方面的前途，而美国影响世界政治局势的能力明显削弱。

在军事上，美国与苏联的军事力量形成均势，尤其在核力量方面，苏联已取得数量优势。在经济方面，美国地位明显下降，1944年确定的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政策停止执行。最为严重的是美国长期深陷越南战争，导致美国内部出现了严重而又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面对世界政治变化和美國地位下降的事实，“尼克松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它们包括：美国将信守它的一切条约义务，如果美国的“盟国”或对美国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受到威胁，美国将提供援助；其他类型的国家受到侵略，美国“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在人力方面，该国应“承担主要责任”。显然，尼克松政府的目的是在不放弃美国“全球责任”的同时，要求其他国家分担更多的责任。

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的调整幅度是相当大的，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作为“尼克松主义”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体现，尼克松政府在越南战争中开始贯彻战争“越南化”的方针，并争取最终撤出越南。为了打开越南战争的僵局，并在美国撤出印度支那地区以后能够牵制苏联，尼克松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华政策，并最终打开中美缓和关系之门。

缓和对苏关系是尼克松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所谓缓和政策的重要步骤是与苏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SALT I)。此外在中东地区，加强推动中东和平的力度，使苏伊士运河得以重新开放；在欧洲则采取行动，明确支持欧洲统一的进程；在亚洲向日本归还冲绳岛，并促使“日美安保条约”顺利延期。

伴随着对外政策的调整，尼克松政府将肯尼迪政府开始执行的“灵活反应战略”调整为“现实威慑战略”。其主要内容如下。

——放弃两个半战争的概念，改为一个半战争。由于美国作战实力

衰弱，中苏分歧公开化，美国确定中苏不会联合起来共同对美作战。随着 70 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尼克松政府进一步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可借助的力量，因此美国可以放弃在亚洲进行战争的战略。

——以核均势论代替核优势理论。60 年代，苏联加快了核扩军步伐，美国对苏联的核优势已不复存在。面对种变化，也是基于美国陷于越南战争的现实，尼克松政府改变了过去谋求核力量相对优势的战略主张，提出要与苏联保持“基本相当”的核均势，即用美国在战略核武器质量与技术上的优势，抵销苏联的数量优势，以维持有效报复能力为限，不拘泥于导弹数量的对比。

——调整军事部署，收缩战线，减少海外驻军。尼克松政府强调，美国不应企图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也不具备同时保卫世界各条战线所需的人力物力，它在海外的军事负担已经超过了自己力量的限度，因此必须收缩海外驻军，以保证欧洲、朝鲜半岛等至关重要并已经承担的义务的实施。——与盟国进行战略分工，强调共同承担战争负担，提出“自由世界防务分级责任制”。美国不能再像在越南战争中那样，由美国单独承担责任，宁愿多花美元也不应损失美国人的生命。如在欧洲爆发常规战争，美国应和西欧盟国共同负责。如果爆发小于战区规模的局部战争，所在国应负主要责任，特别是分担人力负担，美国将给予必要的援助。这种战略方针改变了美国大包大揽的局面，排除了美国部队介入地方性战争的可能，并保证在大规模战争中，其他盟国也能分担防务责任和负担。

总之，在“现实威慑战略”中，美国要以生命和物资方面的最低代价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在保持核威慑的盾牌下，以常规力量为主，同苏联进行争夺；在收缩美国海外军事力量的同时，加强西欧和东北亚的重点部署，盟国和受援国分摊军事负担，美国退居二线。

尼克松主义的实施与影响首先表现在军事上，就是大幅度削减美国常规部队，提高同苏联战略武器抗衡的能力，并力争体面地从越南战争脱身。从 1969 年至 1972 年，美国驻外兵力从 133 万余人减到了 60 余万人，其中驻亚太地区的美军从 88 万人减至 24 万人，驻欧美军则维持在 31 万人左右，占美国海外兵力的 51.8%。

为了改进战略核武器的质量，尼克松政府修建了大型卫兵反弹道导弹发射场系统，以保护美国洲际导弹的发射场。同时大力发展多弹头导弹，以抵销苏联导弹数量的优势。为提高美国战略核武器的质量，1973 年尼克松政府增加军费 12 亿美元，用以研制三叉戟核潜艇和 B-1 轰炸

机。

为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推行“战争南越化”政策，向南越派遣大量军事顾问，运送坦克、飞机等许多新式武器，将南越本国军队从 85 万人增加到 100 万，帮助南越政府加速安抚运动和乡村发展计划，甚至促进南越政府实行土地改革，以便使傀儡政权能加速对南越农村的控制。

为迫使北越在巴黎和谈中屈服，美军于 1970 年 5 月入侵柬埔寨，企图破坏北越的给养基地。1971 年 1 月中旬，美国发动侵略老挝的“蓝山 619 战役”，企图切断胡志明小道，结果以惨败告终。1972 年 5 月 8 日，美国采取战争升级行动，宣布在海防港布雷，对北越实行海上封锁，并进行持续轰炸。这期间，美国和北越代表在巴黎进行了断断续续的和谈。1973 年 1 月 27 日，参加巴黎和谈的四方(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国 1 临时革命政府、西贡政权)在巴黎正式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该协定规定：美国和其他国家尊重 1954 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承认越南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美国军队在协定签字后 60 天内全部撤出越南；北越释放美国战俘；越南问题由越南劳动党、中立力量和阮文绍政府三方组成的全国和解与协商委员会作出安排，并由该委员会负责选举和执行协定；协定还规定了临时分界线等。巴黎协定的签署标志着长达 12 年之久的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

其次是在外交方面，尼克松政府做出了与中国和解的重大决定。60 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尼克松提出了“遏制”与“诱导”相结合，最终说服中国改变政策的设想。1969 年 1 月，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不久会见了戴高乐。他在会谈时说：“在美苏进行对话的同时，美国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 10 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以前增多”。“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 7 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继续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在 1971 年 2 月 25 日的对外政策的报告中，尼克松明确提出，“对美国来说，同北京建立关系正是体现了 70 年代的任务”。尼克松认为，改善对华关系，有助于稳定局势，防止外来势力渗入亚太地区。同时，可解除美国面对两个对手的状态，可以借助中国力量来维持美苏均衡外交。

尼克松在 1969 年访问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时表示，希望同中国直接

对话。美国国务院还发表一项公报，批准在海外的美国旅游者和居民购买一定数量的中国商品，允许国会议员、记者、教师、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等 6 类人员，在有关外事部门直接申请办理去中国的旅游护照，无须上报国务院批准。1969 年 11 月美国停止在台湾海峡的 XI 逻。12 月，允许美国在国外的子公司同中国进行非战略物资的贸易。197 年 1 月 20 日和 5 月 20 日中国代办雷阳与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举行了口次会晤。美国第一次默认，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方式加以决，并表示希望总统特使去北京，商谈高层领导会晤的问题。

在中国方面也作出相应的表示后，1970 年尼克松在会见《时代》杂志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6 月 17 日，尼克松给周恩来一封信，表示他准备访问北京，建议由基辛格来中国举行初步会谈。1971 年 7 月 8 日，从南越途经巴基斯坦的基辛格于第二天凌晨直飞北京，与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7 月 15 日，中美两国同时发布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 1972 年 5 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1972 年 2 月 21—28 日，尼克松携夫人以及大批随从人员对中国进行 I 事访问，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2 月 28 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联合公报。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及外交政策有着本质区别，但是 XI 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结束了中美两国多年的敌对状态。

在同苏联阵营的关系方面，尼克松政府推行以实力求谈判的政策。自 60 年代起，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应该同社会主义国家加强接触，利用交目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尼克松说，美国在东欧实现和平变革的战略必须包括以下因素，即寻求缓和美苏关系，寻求最大限度地增加西方与东欧人民自往来。

以实力求谈判是尼克松推行缓和政治攻势的一种手段，这种谈判既色括对争霸对手——苏联的军事限制，也包含和平演变的意图。为了打开联的大门，在尼克松、福特政府期间美苏首脑举行过 4 次会晤。

1972 年 5 月 22 日—30 日，尼克松前往苏联，同勃列日涅夫举行谈判这是战后第一个美国总统访问苏联。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苏美相互关系原则》等 9 个文件，这些文件确认了“和平共处”、“缓和”为两

国关系的指{原则。会谈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美苏关于限%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使美苏在战略核力量保持大体耳衡方面达成了协议。

这次会晤表明美苏有限缓和时期，即缓和与争夺、对抗与对话并存时剪的开始。会谈以后，美苏双方加强了环境保护、太空计划、医疗卫生和科技等等领域的合作，扩大了贸易往来。

1973年6月16日至25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把缓和外交推向新阶段。美苏签订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和《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美苏农业协定》等13个文件。会晤通过的《基本原则》规定，双方进攻性核武器可以“现代化和更新”，这就为他们进一步发展核武器留下了更大的余地。但两国同意在1974年底以前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永久性协议。

1974年6月27日至7月3日，尼克松再度访问苏联，与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亚举行第二次会晤，签署了《美苏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议定书》。

美国还大力支持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wilHy Brandt)的新东方政策，通过70年代欧安会的召开，在欧洲推行所谓的“缓和”政策。1969年9月，勃兰特出任西德总理，开始推行新东方政策。新东方政策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其主要宗旨就是以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在保持东西方均势的条件下，以谈判缓和为前提，谋求西德的稳定和发展，通过和平方式，打开苏联东欧国家大门，为最后重新统一德国创造条件。

1970年8月12日，勃兰特亲赴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互不使用武力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无条件地遵守所有欧洲国家在其目前边界内的领土完整；现在和将来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等。此后，西德与波兰也签订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承认欧洲现有边界、互不侵犯的“东方条约”。

在接受勃兰特新东方政策同时，美、英、法与苏联谈判签署了苏联称之为《西柏林协定》、西方称之为《四大国协定》的文件。苏联同意美、英、法在西柏林的占领制度。苏联声明，柏林西区和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沿着民主德国境内的公路、铁路和水路，平民货物过境时变通将畅行无阻，但西柏林仍不是联邦德国的组成部分。美国则承认西柏林不属西德管辖。但在附件中规定，在不涉及安全与现状的条件下，西德可以对西柏林常住居民实行领事服务，可以在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上代表

柏林西区的利益等。

1971年11月8日，西德代表与东德代表在波恩签署了两国关系基础的条约，彼此承认为平等国家，互设常驻代表机构，贸易不受国界限制。东西方矛盾出现了缓和。1973年5月，勃列日涅夫访问西德，并签订了经济、技术和工业合作协定、文化协定和航空协定的补充议定书。西德还同捷克斯洛伐克育侯加剩面向牙雨 I 碓寺了琳布羊磊 1972年5月，美苏就双方召开欧安会和中欧裁军问题达成盼议。尼克松政府同意召开欧安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迫使苏联在人道主义问题和扩大美苏合作问题上作出让步。欧安会从开始筹备到举行首脑会议，前后历时将近3年，参加会议的有北约、华约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共35个国家和地区。

1975年8月1日，欧安会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最后文件》。在《人道主义和其他方面的合作》文件中，对东西方人员接触、旅行、通婚、新闻记者活动、文化与教育交流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具体规定。美国把“人员自由往来，思想自由交流”当作欧安会的核心，多方压苏联作出让步。尼克松政府期间，美国同苏联还加强了环境保护、太空计划、医疗卫生和科技方面的合作，签订了贸易协定。

尼克松政府还试图利用和苏联东欧发展经济贸易，一方面推进东西方的缓和，同时向苏联东欧施加压力和影响。这项政策意图的突出表现是瓦尼克修正案出台。

1973年12月11日，俄亥俄州众议员查尔斯·瓦尼克(Charles Vamevck)提出修正案，规定在苏联允许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自由移居国外之前，禁止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关税待遇和得到美政府的信贷。此后参议院又以288票对0票通过了一项修正案，要求苏联每年至少准许6万名犹太人移居国外，才能取得最惠国待遇地位。1974年12月13日，参议院有条件地通过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修正案。

福特继任美国总统后，基本上继承了尼克松政府时期的所谓缓和政策。1974年11月23—24日，福特与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举行会晤，发表了《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和一项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决心使关系改善的进程不断发展，并不致逆转。双方同意根据同等安全的原则，签订关于1985年以前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定，并初步商定今后10年内，美苏各方的进攻性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总额不得超过2400个；1980—1981年前，开始就1985年以前进一步限制、削减核武器问题进行会谈。这一系列的会晤、协议的签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苏关系。

在福特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内部曾围绕国防政策问题展开一场辩论。

以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和国务卿基辛格各为代表,针对“现实威慑战略”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施莱辛格认为,美国应该保持足以与苏联抗衡的强大军事力量,增加军费开支,进一步加强军事实力。其理由是苏联正在加紧扩军备战,核弹头数量和战略轰炸机已领先于美国,美苏力量对比有失去平衡的危险。在进攻目标问题上,施莱辛格认为,应首先集中打击对方的军事目标,然后才是大城市和工业区,为此美国核战略报复力量应当具有选择能力和迅速改变目标的能力。美国应当在欧洲坚持前沿防御和灵活反应战略,加强西欧的常规军力和部署战术核武器。基辛格则主张继续奉行对苏缓和政策,谋求建立新的大国均势的国际制度,以谈判代替对抗。

虽然争论的结果是施莱辛格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但其继任者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amsfield**)上任后,很快也转向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从后来的发展看,福特政府后期明显降低了对苏缓和的调子。

福特政府在推行遏制战略上有两项较大举措。其一是接过尼克松时期传下的“接力棒”,继续谈判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于1975年8月1日在赫尔辛基正式签署了建立欧安会的《最后文件》,并继续进行中欧裁军谈判。欧安会最后文件的达成对推动美苏缓和有重大作用。美国得到的好处是可以利用《最后文件》中关于人权和人员、信息、文化交流方面的条款,对苏东国家施加更直接的政治压力,迫使其在其他领域妥协让步。

其二是推动阿以和平进程取得一定进展。在美国的斡旋下,埃以签订第二个关于西奈问题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从部分西奈领土撤走,埃及允许以色列非军事物资通过苏伊士运河。协议的签订使埃及进一步靠近美国,美国在中东的“仲裁人”地位得到巩固。

在印度支那,福特政府继承了尼克松政府的对越政策,当北越部队发动新的强大攻势时,美国拒绝给南越和柬埔寨提供军事援助。1975年4月16日柬埔寨朗诺政权垮台,5天后阮文绍辞去南越总统职务。23日晚,福特在新奥尔良发表的演说中宣布,就美国而言,越战已经结束。随后南越政府土崩瓦解,不久老挝爱国阵线也夺取了政权。美国从越南撤军后,国际威望大大地下降了。

5. 卡特(**Jimmy Carter**)时期(1977—1981)

1977年1月20日,吉米·卡特宣誓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政府提出了“世界秩序战略”,推行“人权外交”,企图通过挥舞人权旗帜,加强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争取所谓的道义优势。

同时，卡特政府进一步强调缓和政策，力图通过推进裁军和军控谈判，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和政治影响。卡特政府声称要重振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特别是加强对第三世界的号召力，摆脱 70 年代的被动局面。到卡特政府后期，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缓和政策因受到严重批评而宣告失败。卡特政府随后提出“卡特主义”，开始实施所谓“新遏制政策”，对苏联的遏制政策重又趋向强硬。

卡特政府之所以提出“世界秩序战略”，是因为当时的美国领导层认为，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混乱的扩散；美国外交面临的中心问题已不再是对付共产党世界，对美国长远的威胁是世界性的大混乱；面对这种安全威胁，军事实力已不再是决定性力量，经济等非军事力量的作用更加重要。

“世界秩序战略”首先突出“人权外交”的重要性，强调增强美国在全球意识形态对抗中的地位。卡特上台伊始就强调“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灵魂”，美国应成为维护国际人权的“灯塔”。卡特执政期间，美国频频向苏联发动“人权”攻势，并挥舞“人权”旗帜来争夺第三世界国家，企图以美国的“人权”之水，扑灭苏联向第三世界进攻的“革命”之火。

其次是继续同苏进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同时，着手调整美国的军事战略，试图依靠军事技术优势阻遏苏军事扩张。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于 1979 年 6 月 18 日达成协议，协议条款给苏方以数量优势，但美国可以保持美方技术上的优势。后由于苏联侵略阿富汗，该协议未获美国会批准。军事战略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主张可以使用战术核武器对付苏常规力量。

在全球力量部署上，卡特政府采取一系列外交行动，积极改善对苏遏制态势。包括推行加强美、欧、日三边协商合作的“三边主义”，巩固西方阵营的团结；同中国建交，加强美在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中的有利地位；推动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其内容包括结束埃以战争状态，以色列三年内向埃及交还西奈半岛，埃及从此成为美在中东抗苏的可依靠力量；同巴拿马签署运河协议，规定美于 2000 年交还巴运河主权，但运河区永久中立，战时美舰船有优先通行权。

1979 年 12 月 27 日，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在 1980 年 1 月 23 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作出强硬反应。卡特声称：任何外来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的尝试，都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侵犯，这种侵犯将遭到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卡特这一用武力

阻遏苏联势力南下的政策，被称为“卡特主义”。为此美国政府专门创建了“快速部署部队”，以便应付波斯湾地区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

1977年，卡特上任伊始，就提出要用“人权外交”代替尼克松的“现实外交”。同年5月21日，卡特在圣母大学作对外政策讲话中称：“对于人权所负有的义务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基本信条。”从此“人权外交”成为卡特政府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内容，也自然地运用到遏制苏联的战略中。

1977年1月27日，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声明，赞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领袖人物、著名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D. Sakharov)教授，指责苏联政府违背“有关人权问题的公认国际准则”。2月5日，卡特还亲自复信萨哈罗夫，说他非常关心人权问题，要在国内外促进人权运动。4月下旬，美国还用两名在押的苏联间谍，与苏联交换了5名“持不同政见者”，并宣传说他们具有献身精神。1977年10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欧安会”继会上，美国以人权问题为口实，率领西方盟国对苏联展开猛烈的抨击，使苏联处于被动地位。

卡特政府采用电台广播、宗教活动、移民、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手段，在苏联阵营国家内部培植反对派。例如1977年卡特上台后宣称，“美国之音”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关键性因素。1979年“美国之音”重新归属美国国际交流署管辖。同年美国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由当时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领导，负责协调“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行动。

1978年，美国新闻处与国务院教育文化事业局合并，成立国际交流署(后又改名新闻署)。它标榜自己的任务是鼓励、帮助和资助美国同其他国家进行广泛交流，帮助并保证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充分了解外国的舆论及文化，并帮助美国的个人及团体了解其他国家及其文化，负责向其他国家进行政府间文化交流谈判等。

卡特政府一度放慢了军备发展计划，推动军控和裁军计划，争取通过谈判限制苏联军事力量的发展。卡特政府宣布停止研制新型的8-1战略轰炸机，放慢MX导弹的研制，并否决了国会要求生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提案。1977年至1979年，美同军费的实际开支大大少于70年代前半期。卡特政府还宣布从南朝鲜撤出美军地面部队，允诺一旦发生战争，将把美驻太平洋的海军力量调往欧洲或中东地区。

1979年6月18日，卡特同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会晤，签署了《美

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等文件(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美苏双方战略武器发射器最高限额为**2400**件,1981年降为**2250**件,弹头发射器的限额为**1320**件,巡航导弹的发射器不得超过**600**公里等。

卡特政府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关系,以便防止苏联利用美国力量衰退的时机,对这些地区进行渗透和扩张。卡特派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访问中国,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实行关系正常化的**3**个基本条件。**12**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公布了建交联合公报,决定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在第三世界国家,卡特试图改变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后美国的形象,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援助和出售武器的数量,推行人权外交,加强传播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卡特政府不仅谴责乌干达阿明政权的暴虐统治,削减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而且取消或削减对拉美一些亲美军人政府的军事援助。

卡特政府前期推行“世界秩序战略”和“人权外交”,并没有能够阻止苏联力量的增长,美国战略地位反而进一步受到削弱。

美国退出越南以后,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拼凑“印度支那联邦”,威胁到东南亚和马六甲海峡地区的安全。

在非洲,苏联利用古巴军事人员,扩大在安哥拉的势力,威胁扎伊尔。借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发生领土争端的时机,把手伸进非洲,企图制约美国和西欧的海上运输线,从而威胁到西欧的安全和美国的战略利益。

在中东,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牵制美国的行动。**1979**年巴列维(Mohammed Reza Pahlavi)国王倒台,伊朗成了这个地区最激进的反美国家。同年**11**月**4**日,伊朗学生将**53**名美国人扣为人质。

1979年**12**月苏联军队大规模侵入阿富汗后,卡特当即对美国广播公司发表谈话,声称在过去一周里,他对苏联的看法所发生的急剧变化,甚至超过了在此以前两年半的时间。

苏联的扩张势头日益增长,促使卡特政府调整对外政策,开始进一步强调军事实力。对苏联逐渐采取以军事、经济遏制为主的强硬路线。

1980年**1**月**23**日,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遏制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增加军费开支,创建快速部署部队,改进北大西洋地区的防务,重申美国对巴基斯坦安全的保证,逐步恢复征兵制,推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抵制**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等等。

卡特“新遏制政策”的突出特点是加强军备建设，将中东、波斯湾作为美国必须保护的“切身利益”地区。卡特政府全面研制实施 MX 机动洲际导弹等加强战略核力量的计划。1980 年卡特发表总统第 59 号指令，提出了“抵消新战略”，把核进攻的主要目标放在苏联的军事设施、领导人和防御体系上，从 1981 年起增加军费开支 5.4%。

五角大楼提出了加强军备的五项指导方针，全面具体地规定美国到 1986 年应该达到的军事水平，并放弃在战时调遣亚洲、太平洋部队增援欧洲的计划，亚太地区的防御重点从东北亚转到波斯湾、印度洋一带。

美国将其在印度洋的军舰增加到 20 多艘，并与阿曼、肯尼亚达成协议，取得了两国海空军基地的使用权。快速部署部队从原先筹划的 10 余万人增加到 30 万人左右。美国还考虑在波斯湾实行“先机制敌”的策略，即危急时下令快速部队抢先抵达，使苏联面临不得不对是否与美军直接对抗作出决策的困境。

卡特政府力图加强与同盟的关系，建立由盟国和友邦组成的欧洲、远东和中东相互依靠的防线，堵截苏联南下。美国促使盟国与之实行“战略分工”，彼此配合。它要求日本与西欧对东北亚和西亚的防务作出更多的贡献，而美国可在印度洋、波斯湾地区挑起更重的担子。

在 1980 年 4 月召开北约防务计划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建议提前实现北约 15 年长期军备计划的某些项目，如增加武器弹药储备，扩大西欧预备役部队以便代替调往中东的美军，西欧准备巨型民航机接运美国本土部队支援欧洲等等。美国还希望西欧、日本能对受苏联威胁的中东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美国力求同其他六国协调立场，宣布采取禁运谷物、停止转让高级技术等制裁措施，以打击和孤立苏联。

卡特主义出台是美国对苏政策趋向强硬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美苏关系从“缓和”转向新的对抗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卡特主义是在卡特执政的最后一年才提出的。在 1980 年总统竞选时，他的这一主张大部分仍然停留在计划上，他的竞选对手共和党人里根(Ronald Reagan)的一套战略主张，更符合美国国内保守派的口味。卡特最终以软弱总统的形象，离开了白宫。

6. 里根时期(1981—19 船年)

1980 年 11 月，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以压倒多数战胜卡特，成为第 40 任美国总统，并获得连任。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是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

核心，但在两个任期内，里根政府遏制苏联的重点和手段均不同。

在第一任期内，里根政府主要强调美国要“重振国威”，通过实施“新遏制”政策，加强美国军事实力地位，用军备竞赛和经济制裁等手段，逐步拖垮苏联，扭转与苏争夺不利的态势，对苏政策由缓和转向强硬。所谓的“里根主义”主要针对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渗透，声称要将苏联的“扩张势力”推回去。

在第二任期内，随着美国实力的明显恢复和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里根政府强调“现实主义”和“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积极推进与苏联的高层对话，并将“里根主义”运用到整个第三世界地区，以遏制苏联的扩张。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在世界政治局势中仍处于进攻态势。里根政府认为，苏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军事建设，谋求对美国的军事优势。与此同时，苏联继续在上不稳定的地区进行干涉，企图借助武力解决地区冲突，并试图把其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苏联还利用物质手段和舆论工具进行激烈的意识形态战。苏联的这些行为构成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最严重的威胁。所以里根政府认定，美国面临的“根本挑战”就是“制止苏联的全球野心”，对苏联推行以实力进行全面遏制的政策，即所谓的“新遏制”政策。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大力扩充军事实力，全力恢复对苏联的军事优势。1981年3月4日，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er Weinberg)向国会提出了重振军威的军事计划，声称美国准备“同时至少打两个大规模战争”，一个在欧洲，一个在别的什么地方，很可能在中东，以及准备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应付苏联的挑战。美国在核战略方面实施“抵消战略”，颁布三合一战略现代化计划。准备在6年内耗资1803亿美元，实现核力量现代化。

1983年3月23日，里根发表关于国防开支和防务技术的电视讲话，提出一项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他声称，战略防御计划是减少核战争危险的途径。美国政府现在应该用防御手段，对抗苏联的导弹威胁，把战略弹道导弹拦截和摧毁在到达美国国土之前。

1985年1月3日，白宫全文公布了《总统战略防御计划》。该计划的序言阐述了战略防御计划的目的是性质，强调战略防御计划是“一个集中搞先进防御技术的研究计划”，目的是寻找方法，为遏制苏联，加强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提供较好的基础。序言还指出，战略防御计划是针对苏联不断大规模扩大反弹道导弹力量的，同时也是一种使美国和苏联进行大量削减、甚至最终消除弹道导弹及它们携带的核弹头等的有

效途径。

战略防御计划是美国推行强硬的军事新政策的反映。里根政府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后，即采取一系列举措予以实施。里根政府调整核战略的目的是谋求对苏联的核优势。从客观的影响看，里根政府将苏联拖入新的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迫使苏联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军备建设，给苏联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打击，使苏联在国际竞争和争夺中，陷入不利地位。

“新遏制”政策强调在第三世界同苏联对抗，建立遏制苏联扩张的新的战略防线。在中东，里根政府同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等达成防止苏联扩张的“战略一致”，特别是同以色列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稳定中东局势，防止给苏联扩张提供机会。同时支持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国，把巴基斯坦作为遏制苏联的前线国家。1983年1月，美国成立了中央指挥部，以协调太平洋、大西洋和欧洲地区的军事行动。

在亚洲，里根政府同中国签署了“8·17”公报，两国关系得以正常发展。在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上，里根政府继续对苏联和越南施加压力，坚持外国军队必须全部撤出阿富汗和柬埔寨，支持阿富汗游击战争和柬埔寨抗越力量的联合。里根政府还强调维护东盟国家的安全，一再声明如果泰国遭到越南侵犯，美国将履行以往的条约义务。

在非洲，为逼迫苏联退缩，里根政府于1983年对利比亚进行神经战，在黎巴嫩增兵，并轰炸叙利亚在黎巴嫩的阵地。对南部非洲，里根政府加强对津巴布韦政府的援助，逼迫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里根政府一方面声称反对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又强调，美国要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与南非的黑人之间“保持中立”，纵容南非种族主义政府。

在拉丁美洲，里根政府极力设法制止苏联通过古巴进一步打进中美洲。它一面企图截断苏、古对当地某些国家反政府势力的武器供应，另一方面增加对萨尔瓦多现政府的援助。还出兵干涉格林纳达，多次派特使出访中美洲国家，阻止中美洲问题和平解决。同卡特政府标榜“人权政策”的做法相反，里根政府还积极改善同南美洲一些军政府的关系，恢复对它们的武器供应。

里根政府延续了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要求第三世界国家遵守有关人权的某些行为标准，并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挥私营经济的作用，鼓励向第三世界的投资，加强在第三世界国家同苏联的竞争，防止苏联利用这些国家内部的混乱和人民的不满，乘机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权。里根政府还帮助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提高其自卫能力，提高它们的反暴乱

战术，改进通信、情报工作。

“新遏制”政策注重对苏联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里根政府对苏联实行贸易歧视政策，拒不提供最惠国待遇，并严格控制向苏联的高科技及产品的出口，把两国间本属于正常的经贸关系与活动等，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与手段。里根借口波兰问题，收缩美苏之间的接触与联系，中断空中交通，把相互贸易缩小到最低限度。1983年底，由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双方的科学技术交流比1979年减少4/5。

“新遏制”政策所强调的“实力地位”，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实施战略的决心与信心，同时也考虑到敌与友方面的情况。里根政府反复强调，安全战略必须南外交、政治、经济和情报等方面组成，其核心是军事力量。

里根上台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拒绝同苏联对话，后来由于美国力量有所恢复发展，已有实力同苏联进行讨价还价，且美国国内面临大选，加之西欧国家的压力，里根政府才重开关于战略核武器、欧洲中程导弹等问题的谈判。里根政府在同苏联谈判中试图通过不断施加压力，迫使苏联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让步。它一方面向苏联显示力量，以加强自己的谈判优势；同时提出明显不会被苏联接受的建议，把谈判可能失败的责任推给对方。

在里根的第二任期内，美国把重点由军事遏制转向所谓“第二次革命”或“民主革命”战略计划。1988年1月正式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勾勒了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里根政府认为，美国的实力和自信心已经恢复，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严重的困难。所以，美国今后的目标就是凭借其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重建美国的世界地位。美国应该也必须从美国的价值观念出发，把实现“有多元化体制”的世界作为主要战略目标。里根政府声称，二战以后很长时期里，美国都是用“最广义的遏制”，防止苏联控制西欧、亚洲和中东的国家。现在美国要调整自己的全球战略观念，巩固西半球的“民主”制度，和平演变苏联阵营的国家，引导第三世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里根政府提出，有必要用和平变革代替军事高压。首先要坚持综合国力较量 and 采取多种策略的原则。里根说，美国不要简单地把国家实力理解为“高压手段和军事力量”，有效使用国家实力并不仅仅是动用武力。要坚持综合国力较量，要善于利用外交、宣传、经济和军事等多种因素和多种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

其次要充分发挥政治和宣传力量的作用。里根指出，美国必须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宣传计划，用以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利益和政策，而且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增加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与交流。

第三是对苏联继续强调实力、对话和现实主义诸原则，在谋求对苏联太空竞争优势的同时，鼓励苏联阵营内部出现有利于西方的政治变化。在东欧，美国的政策是利用那里同西方的联系，以及苏联的经济价值正在东欧减少的机会，加紧改善美国同那些国家的关系。美国还要和北约各国共同增进东西欧之间更密切的关系，通过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向苏联、东欧施加压力，增进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和交往。

在新的战略指导下，里根政府主动缓和美苏关系，开展对话，加强美苏经济联系。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美苏恢复了中断6年之久的两国首脑会谈，从1985—1988年，里根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雷克雅未克、华盛顿、莫斯科、纽约举行了5次会谈。1987年12月签订了“中导条约”，美苏关系开始由严峻对抗走向缓和。

里根政府还突出利用经济手段，加强对苏联的经济联系和渗透，批准延长美苏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的10年长期协定，恢复了中断多时的美苏联合贸易委员会部长会议工作。

与缓和对苏关系同时，美国加紧对东欧地区进行宣传，利用宗教势力向东欧国家的执政党施加压力。1986—1987年，里根政府增加了“美国之音”活动经费9760万美元，1988年又将其经费增加到3亿美元。目的是加强对东欧国家进行宣传。

波兰军管以后，美国曾对波兰采取经济制裁措施。1987年布什访问波兰时，公开提出恢复美波经济关系、解除经济制裁的前提是团结工会合法化。1988年，美国向团结工会提供的活动经费就有100万美元之多。

1987年6月，里根亲自拜访罗马教皇，协调同罗马教廷的行动，并就苏联和东欧的改革问题举行会晤、磋商。罗马教廷也不负美国的期望，1987年以后增任了在捷主教，鼓动信徒以信仰自由为口号，争取教会与政府平起平坐的地位。

7. 布什(George Bush)(1989—1992年)

布什政府是跨冷战和冷战后两个时代的政府，其安全战略也具有跨时代的特点。早在1989年5月12日，布什在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化大学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21日和24日，布什又在波士顿大学、海岸警卫学院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布什在访问欧洲和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的讲话中重申了上述战略，从此“超越遏制”成为西方对苏

联的共同战略。“超越遏制”战略提出的主要背景首先是世界由战后的两极向多极化演变。美苏支配世界政治舞台的局面明显地趋向瓦解。其次是美苏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美国方面的变化。美国自我标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裕的国家”，“有继续作为世界领袖的能力”。与此同时，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外交政策新思维，并开始实施一套新的外交政策。这些都被美国视为对其施加压力与影响的极好机会。所以布什政府相信，已经到了“越出遏制阶段进而为 90 年代制定一项新政策的时候了”。

所谓“超越遏制”战略，也即“遏制之后”战略，其主旨是强调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美苏由战后的相互遏制逐渐变为合作。美国的目标由遏制苏联转变为争取把苏联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布什政府声称，美国现在的目标不仅是遏制苏联，而且要谋求使苏联“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超越遏制”战略强调加强大西洋共同体国家联盟，以共同努力将苏联和东欧国家纳入“建设性伙伴”的轨道。美国和西欧国家要加强合作与协调，“确保中欧与东欧民主演变的成功”，并且要保持北约的活力，使之成为建立全欧新的和平结构的基础。

布什政府认为，虽然苏联的威胁已减少，但美国仍然面临威胁，即“种族歧视、民族抗衡、宗教关系紧张、武器不断扩散、个人野心和苟延残喘的极权主义”等引起的地区性冲突。美国要重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保持地区力量均势，以使争端在发展为军事冲突之前得到解决。美国要加大军控的力度，尤其要制止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

在面 1 临新的更为复杂的安全威胁的情况下，“超越遏制”战略继续强调实力地位政策，宣称美国必须在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保持强大的地位。“超越遏制”战略在军事上强调以“四个基本要求”为标准，建立一支规模较小，以对付地区性冲突为重点的军队。“四个基本要求”是：确保战略威慑力量；保持在重要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对危机作出有效反应；保持在必要时重建部队的能力。

布什政府认为：海湾战争的经验表明，在全球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的世界上，地区性冲突已成为主要威胁。因此，军队规模可以缩小。160 万是军队规模缩小的底线，也即“基本力量”的指标。“威慑”的概念要更新，要把威慑的对象扩大到“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并可能认为使用这些武器对他们损失不大”的国家。

布什政府采取一系列具体政策与举措来实施其“超越遏制”战略。布什政府继承里根政府的政策，推进美苏最高级会晤。布什先后同戈尔

巴乔夫举行了5次会晤，即1989年12月2—3日马耳他会晤、1990年5月31—6月3日华盛顿会晤、1990年7月7日伦敦会晤、9月9日赫尔辛基会晤、1991年7月30日—8月1日莫斯科会晤。在这些会谈中，他们广泛讨论了人权、军备控制、地区冲突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

与此同时，布什政府利用缓和、裁军等方式，确保美国的核威慑，削弱苏联的军事总体实力和华约的常规部队优势。1989年，华约成员国裁军6万余人，苏联在谈判裁减欧洲常规力量的同时，同意把削减战略核武器与战略防御计划两个领域的谈判分离。

布什政府利用苏联经济困难和急需外援的处境，通过提供经济援助，牵制苏联、迫使其内外政策向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布什政府明确表明，美国的经济援助是以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变革必须符合美国的利益为基本条件的。美国要求苏联实行自由选举、自由移民、政治多元化、彻底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美国政要声称，在苏联没有实行根本改革之前，美国不会提供任何援助。

消除苏联在东欧的军事优势和政治控制，是“超越遏制”战略的重要内容，是美国政府历来争取实现的重要目标，也是促使东欧各国脱离苏联控制得的首要条件。美国政府同苏联展开多轮谈判，迫使苏联在东欧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时布什政府选择波兰、匈牙利为突破口，为东欧“民主化”运动提供经济援助。1989年7月，布什亲自走访波兰和匈牙利，积极推广波、匈“民主化”的样板，并积极坚定地向波兰、匈牙利提供援助。

事实表明，“超越遏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促成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巨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苏联、东欧国家的巨变，布什政府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91年4月13日，布什在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比较集中地论述了“世界新秩序”政策，此后陆续作了补充与阐述。

所谓“世界新秩序”政策的出发点是认为，冷战的结束并未使世界进入持久和平的时代。美国必须为适应变化的世界形势，通过建立一种新的世界新秩序，维护与扩展美国的全球利益。这些利益包括巩固战后以来美国对苏联进行遏制的成果，维持美国战略力量的优势，消除地区冲突，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共同的问题。

在布什政府看来，所谓“世界新秩序”就是按美国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等，建立起来的由美国领导的新世界。

布什政府声称，要建立世界新秩序，首先就必须建立美国的领导地

位。发挥美国在建设“新秩序”中的领导作用。

为了建立和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必须要加强与同盟国家的伙伴关系。布什政府提出的所谓联盟战略，就是要联合行动和与同盟国家分担义务。布什政府强调，美国“必须调整联盟以及集体安排”，说这是一种“基于磋商、合作和集体行动”、“公平地分担经营和义务”的“伙伴关系”。美国承诺保持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同时要求其盟国分担美国在其他地区的责任，支持美国在其他地区的行动。

随着苏联内外政策的变化，布什政府提出要重视发挥苏联的作用。把苏联纳入美国领导下的新秩序，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关键。布什政府强调坚持美国的领导和维持美苏“不对等”的合作，是实现“新秩序”的重要基础。在军事战略方面，布什政府开始调整军事部署，实施地区防御战略，把战略重心放在防止和消除地区冲突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或威胁。布什政府认为，美国必须维持必要的军事力量和可靠的核威慑，在关键地区进行前沿部署，借助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存在来确保稳定。

1989年出台的“超越遏制”战略和1991年出台的“世界新秩序”蓝图同出一辙，都是维系美国世界地位的战略。前者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同苏联争夺东欧，拆除“铁幕”；后者是在苏联这个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威胁消除后，力争巩固遏制战略的成果，实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单极主导。

第四节 遏制战略的终结与延续

1991年“8·19事件”后，苏联急剧走向崩溃与解体。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乌克兰等8国领导人在排除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下，决定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当晚7时38分，克里姆林宫的苏联国旗降下。次日13时，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解体。

随着苏联解体，遏制战略作为美国冷战时期以苏联为主要对象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就结束了自己的历史存在。在苏联解体及其阵营崩溃的过程中，遏制战略只是起了重要的外部作用。但是，并不能简单地将苏联解体及其阵营的崩溃简单地归结为美国推行遏制战略的结果。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这种影响不断增加。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美国的政策必然会对苏联的内外政策

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苏联内外政策变化的基本动力始终存在于内部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苏联的解体及其阵营崩溃是苏联及其阵营内部的矛盾发展的结果。实际上，包括“遏制之父”乔治·凯南在内的几乎所有所谓的战略家、专家等，都不曾预计冷战以人们看到的那种方式结束。其原因当然不在于他们不理解美国的遏制战略，而是在于他们无法理解和确切地把握苏联及其阵营内部的矛盾。

从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遏制战略的实施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的损失和后果。遏制战略是美国凭借举世无双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全方位、长时期敌对行动。在长达数十年的冷战中，美国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最新的科学技术等，投入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之中。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及庞大的军事机器，使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处于战争的威胁与恐怖之下。整个世界都得提心吊胆，担心毁灭性的战争降临。80年代初，美苏双方拥有的战略核运载工具约达 1406 件，战略核弹头达到 1612 枚，军备竞赛由地面发展到太空。80 年代世界每年的军费开支均超过了 6000 亿美元。美苏两国展开的轮番升级的军备竞赛造成的后果，至今仍然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遏制战略既是美国针对苏联及其阵营的战略，也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国家战略。正是由于后一种本质特征的存在，可以说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美国必然和已经完全放弃了遏制战略的思维。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俄罗斯急剧衰落，美国的遏制对象不复存在。但大量的事实表明，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欧亚大陆的大国进行遏制和防范的意图。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基辛格写到：“不论冷战存在与否，单一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两大范围之一（欧洲或亚洲），都会对美国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危险。因为这样的组合会在经济上胜过美国，最后在军事上也凌驾美国之上。即使这个主宰的大国开明，也必须抵制此一危险；因为一旦这个大国改变意向，美国将会发现本身有效抵抗的力量已经大减、也逐渐没有能力影响事件的发展。”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中国威胁论等冷战后一系列包含着防范俄罗斯和中国的意图的行为，的确是“冷战思维”或者说是“遏制战略思维”在冷战后的延续。

思考题：

1. 美国遏制战略产生的时代背景。
2. 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及其主要特点。
3. 苏联解体及其阵营的崩溃与美国遏制战略的关系。

参考书目：

1.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
2. 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3.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梅孜编译，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
4. 《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梅孜编译，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
5. John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 War of America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第四章

冷战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

关贵海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关于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谁应该对冷战爆发负主要责任，至今仍然争论不休。不过肯定地说，苏联也同美国一样，在冷战形成及其后来的演变中，起了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苏联对冷战结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苏联单方面结束了冷战，因为它作为冷战的主体之一，已经不复存在。因此，研究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成为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

探讨苏联卷入冷战的原因，除了需要考察其外部因素如与美国的关系外，还必须考察苏联内部推动冷战的各种因素。进一步说，在承认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分析指导苏联对外政策的思想和理论。因为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变化比较快，而思想、理论等则是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因此，这一章将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相关理论等，作为一个分析的重点。

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外交是多层次、多角度的，这里只能选择其中几个关键性的部分，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它们包括：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起点，即苏联为什么以及是怎样卷入冷战的；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主线，即苏联同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对峙；冷战时期苏联外交的基石，即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冷战时期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

第一节 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思想

一些论著借用西方学术界的分析方法，把苏联介入冷战的原因归纳为国际环境、国家利益和领袖个人因素等三个方面及其相互影响与互动。这种分析方法有其合理性，特别是层次比较清晰。但是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其一是容易把不能放在同一层次的问题，进行简单的比较；其二是通常被视为外因和英雄创造历史论点之体现的国际环境和个人因素，其实也是同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国家利益等，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影响的。

因此，在分析冷战这样全球性的国家集团之间的全面对抗时，必须重视并梳理其中的思想政治原则，即通常所说的理念。不重视这些理念，仅仅用国际环境和领袖人物等因素，无法清楚解释苏联坚持了几十年的与美国全面对抗的政策。以下根据苏联对外政策的发展脉络，分析不同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特点。

1. 斯大林时期

在二战结束之际，苏联外交仍然遵循由列宁奠定基础并由斯大林完善的思想原则。它们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如：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更替是注定的，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观察国际问题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据此苏联不可避免地要承担支持世界革命运动的义务；认定俄国革命者最了解任何建立人类幸福生活的模式，并要向广大民众灌输这样的信念，即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历史和革命使命；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世界上就不可避免要发生战争，人类消灭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彻底埋葬帝国主义。这些思想原则可以大致概括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斯大林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理念，是关于战争性质的观点。斯大林从他理解的马列主义出发，认为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共产党人虽然力求消灭战争，但并不是反对所有战争。斯大林说：苏联反对反革命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支持寻求解放的、反帝的革命战争。由此引申出来的理论认为，一场战争如果是为了进步、为了促进世界革命进程、为了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为了捍卫革命成果或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它就是正义性的。这样的观点主导了苏联对冷战时期国际冲突和对抗的认知。

忽视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指导思想的又一重要特点。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前，苏联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自己处境艰险、战争不可避免等等，忽视或几乎不顾及二战以后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例如东欧、中国和北朝鲜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已经大大改善了苏联的安全环境；再如苏联拥有核武器，使美国为首的西方轻易不敢发动世界战争；另外还有欧洲资本主义大国的实力遭到严重削弱、世界科技革命使科技竞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等等。

当然，在苏联内部也曾经存在过不同的意见。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学者基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重要变化，起草了一系列秘密报告，向苏联决策层建议，将力量集中在国内建设和巩固实力上，慎于在东欧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避免同西方的对抗，因为苏联很可能承受不住这样的对抗。遗憾的是，这样的不同意见不仅没有被听

取，反而给该研究所招来了被关闭的厄运。

1949年11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G. M. Malenkov)在十月革命胜利32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尽管帝国主义包围着苏联，但是社会主义和民主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是必然的，“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那么这次战争将不只会成为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坟墓，而且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坟墓”。苏共中央机关杂志《布尔什维克》在1951年8月指出，资本主义包围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诸如此类的言论，无非是为了全面否定那种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包围已经因为与苏联接壤的新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而瓦解”。

当然，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的理念是复杂多变的，有时甚至表现出相互矛盾的内容。因此，苏联领导人的言论与冷战的起源之间的关系，被历史学家从各自的角度来解释，并得出一些截然不同的结论，是很难避免的。

2. 赫鲁晓夫时期

斯大林去世以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苏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中，赫鲁晓夫就苏联的关于对外政策问题，阐述了一些新的观点。

首先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继续加深，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技术进步已经完全停滞。苏联应当密切关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要简单地理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理论，而要更好地研究科学和技术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影响，以便利用世界技术进步的成就为社会主义的利益服务。这一观点后来被进一步归纳为“和平过渡论”。其次是认为，和平共处不是一种策略，而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斯大林时期，苏联也谈和平共处，但其实质是指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之间在军事上的停火或非交战状态，东西方之间长期和持久的合作则被认为是不可可能的。赫鲁晓夫则明确表示，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仅能够相邻而居，而且应当走得更远一些，走向改善关系、强化相互信任和合作。苏联应承认世界上有两种制度存在，承认每种社会制度都有存在的权利。因此，赫鲁晓夫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突出强调两个阵营必定要进行全面的对抗。

苏共二十大报告还指出，苏联相信社会主义必将会战胜资本主义，但那是终极结果，它的实现是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得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优势，即依靠所谓“竞争性共处”，而不是靠输出革命。这

一点被归纳为“和平竞赛论”。

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领导层认为，不需要也不应该维持高强度的国际对抗。他们当时认为，国际形势的恶化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要尽量制止、减少紧张局势，或者将国际紧张局势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赫鲁晓夫明确意识到，核武器是具有毁灭性的武器。当时的苏联领导层在反思核战争的后果的基础上，得出了战争可以避免、核战争、役有胜利者的结论。赫鲁晓夫视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国家为“和平地带”，确信它们也可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因为在战后，特别是自50年代中期起，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达到高潮，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数量迅速增加，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力量。美苏两个新兴世界大国都力图争夺对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影响和控制权。不过比较独特的是，赫鲁晓夫把第三世界国家看成是防止战争的力量，其力量的增长成为爆发战争几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即帝国主义不仅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而不再是唯一的世界体系，而且因为东方一系列新国家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为之改变，并且有力地加强了和平阵线。

正是在上述一系列思想的影响下，当时的苏联领导层提出了裁军、限制核武器、缓和东西方关系和大力援助民族解放运动等一系列的主张。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还是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等方面，赫鲁晓夫都没有，也不大可能完全突破斯大林时期的思想理论框架，也不可能突破苏联长期形成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局限性。这突出地表现为不肯放弃用武力维持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使用或企图使用武力压制1956年的波匈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3. 勃列日涅夫时期

勃列日涅夫的确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一些外交原则，但有必要指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对外政策思想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存在着三个重要区别。

其一是与赫鲁晓夫以和平共处为重点的原则不同，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是居次要地位的，排在诸如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不懈地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等等原则之后。勃列日涅夫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强调要恢复苏联军队的荣耀、信心以及军事力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并指望建立强大的苏联武装力量，争取在各种类型的战争包括核战争中，都能够取得胜利。

其二是在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方面，不走缓和的路线，而是选

择强硬的“有限主权论”。《真理报》曾遵照勃列日涅夫的观点，刊文明确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似乎采取了超然立场而又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这实际上正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首先是有苏联作为它的中心力量的存在，这里也包括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任何削弱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种联系的行为都直接影响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对此不能漠不关心。”

上述理论的逻辑和实质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高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为了维护所谓“大家庭利益”，就可以也应该牺牲具体国家的利益。进一步说，由于苏联位于“大家庭”的核心，是“大家庭”的领袖，所以它的利益就是“大家庭”的利益，它的权力是无限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在“大家庭”内是有限的。这一理论的提出实际上也是促成冷战结束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的离心倾向的重要因素。

其三是提出了具有全球性和进攻性的安全战略构想。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报告中声称，目前在制定苏联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不是苏联需要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也就是说苏联的影响力具有广泛的、全球的性质。而进攻性则是指苏联要积极介入所有世界事务，与美国一争高低。这一构想的提出标志着苏联对外政策正走上一个崭新阶段，即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展开积极进攻的阶段。

不过在苏联实现了与美国的核均衡以后，苏联领导人逐步意识到核遏制和核恐怖战略的有限性，并开始有限地反思引起全球冷战的核武器问题，其标志就是1977年1月18日勃列日涅夫的图拉讲话。这个讲话提出的核心观点是，苏联不谋求在未来战争中的领先地位，也不想先发制人。

4. 戈尔巴乔夫时期

从1985年开始，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对国际问题进行了新的观察与思考，并试图用新的观念和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和苏联的对外关系。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它导致国际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促成国际形势从尖锐对立对抗走向全面和根本性缓和。其结果足以苏联阵营的瓦解和苏联解体的方式，终结了冷战。必须承认，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在冷战结束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实质就是放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进行全面对抗，从所谓“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重新审视国际关系，寻求

共存、繁荣。戈尔巴乔夫为自己的对外政策新思维辩解说，在当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闭关锁国、思想封闭、与全球的发展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在和其他社会互动而又保持本色时，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

根据上述“外交新思维”，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全方位安全”的观念。所谓“全方位安全”包括民族间和国家间关系的各个方面，也包括人的安全。戈尔巴乔夫声称，不顾及他国的安全利益，就无法保障本国的安全，而在核时代，不可能用军事手段建立起可靠的安全。

根据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原则，苏联的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也必须做相应的调整，重要内容就是按照单纯防御的原则，修改苏联军事学说，削减武装力量和军事装备，也包括将军工企业转为民用等措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在军备控制和裁军等至关重要的领域，不惜做出单方面让步，以谋求同美国的缓和。

从上述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思想的发展轨迹看，有几个相当突出的特点。它们包括：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原则等，在苏联冷战时期对外政策思想中，长期占据核心地位，国家利益和主权原则受到严重削弱或忽视；苏联领导人片面强调国际关系的政治和军事因素，忽视了科技和经济因素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变化的巨大影响。前者使苏联对外政策丧失了必要的灵活性和回旋空间，后者使苏联外交缺乏赖以持续加强的物质基础。可以说苏联在冷战中失败的逻辑一开始就包含在它的对外政策思想中。

第二节 苏联与冷战的形成

由于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曾经试图保持与西方大国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希望能在发展核技术方面，得到美国的帮助，至少也要保证苏联能够在东欧获得核原料，因此在某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上选择了妥协的立场。但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遏制苏联的步骤，使斯大林的设想落空。苏联被迫采取报复性措施，冷战正是在相互对抗的生计过程中爆发。

在二战结束后最初的几个月里，苏联曾经力图保持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战时形成的合作关系，通过外交行动使自己的国际形象更具有和平、缓和与愿意合作的特征。其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是苏联在战后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迅速上升，苏联经历过十月革命后的长期孤立，并感受到融入国际体系的好处。

第二是英法德等老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大国在二战中均受到严重创伤，实力大不如前，苏联认为有机会通过与美国合作，共同主导世界事务。第三是苏联的经济在战争中也遭到重创，需要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休养生息，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集中力量恢复经济。

第四是二战中军事科学技术获得惊人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的发明与使用，迫使苏联必须考虑战争的后果，同时要不遗余力地使自己成为核国家。

基于上述考虑，在1947年以前，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基本上保持了斗争与妥协并行的立场。例如在伊朗问题、土耳其问题等持强硬立场的同时，苏联很快撤出了驻中国东北和丹麦的军队，大幅度裁减军队，同意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大会，在组建东欧亲苏联政府问题上，保持谨慎的态度等等。这个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妥协程度甚至有些学者断定，斯大林实际上执行的是“绥靖”政策。

在被公认为冷战的核心问题的德国问题上，苏联甚至在1947年秋还保持着妥协的意愿。如苏联表示愿意接受西方提出的统一德国的政治构想，包括放弃一党制，让德国社会民主党进入苏占区，乃至停止1946年建立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活动，等等。苏联希望以此换取西方同意苏方关于德国赔偿方式的主张，即把德国正在生产的产品出口到苏联。当然，斯大林非常关心的是德国的浓缩铀，他妥协的目的中的确包含着最终打破美国核垄断的战略意图。

尽管苏联曾经努力谋求妥协，美英等国并没有满足斯大林的愿望，它们不愿使苏联有机会恢复并发展经济，特别是企图阻止苏联获得核武器。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在伦敦四国外长会议上，都曾因为美国拥有核武器而表现得十分嚣张。在1945年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贝尔纳斯向苏方提出在核能领域进行合作的建议，似乎给了苏联一线希望。但美国很快就自己反悔，并相继采取了与苏联在核领域“不合作”的两个步骤。

首先是在1946年2月3日有意泄露关于苏联“核间谍”案的消息，并开始新闻战。其目的是在暗示苏联，不可能从美国得到任何核机密，美国也不会与苏联在核领域进行合作。

其次是1946年4—6月，在制定德国非军事化协议草案时做文章。从形式上看，该协议与核计划没有任何联系。但是，美国方面在其中加上了非常不显眼但极有象征性的一条内容，即严禁在德国生产的产品清

单中有“所有裂变材料”，生产这样的产品必须经过最高签约方(即包括美国)认可。这只能被理解为美国阻挠苏联发展核武器，当然更谈不上合作了。

理论上讲，美国如此刁难苏联，斯大林理应给予激烈批评。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苏联对美国的一系列行动的批评中，只字未提核计划。1946年2月2日，斯大林曾发表讲话，大谈苏美战后合作；2月9日斯大林在另一个演讲中则完全不提美苏合作的可能性。这之间出现的巨大反差与核间谍风波有着必然的联系。必须指出的是，斯大林三次回应均没有直接涉及核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不在乎美国在核问题上的态度，他只是不希望国际社会对苏联发展核武器过分关注。斯大林对美国的失望与不满甚至反感，是确定无疑的。

让斯大林彻底失望的是，美国完全排除了苏联就与核材料生产相关问题提出协商条件的可能性。还在1947年3月四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就已经相当明确地暗示苏联：美国不惧怕苏联的核计划，但不能容忍斯大林以如此狡猾方式，在美国的眼皮底下研制核武器。美国的做法就是由它自己操纵、由英国提出，反对把现成产品出口作为达成任何与德国问题相关协议的条件。不过这时斯大林仍然心存希望，认为还有可能，并力争与美国达成妥协。马歇尔计划彻底粉碎了苏联的期望。该计划要求接受国，必须向美国申报出口产品清单，这主要涉及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它们是向苏联提供浓缩铀的主要国家。这也就意味着苏联将不能再有保障地从东欧获得必要的核材料。诱人的援助和发展核武器之间的艰难选择，曾经让斯大林非常愤怒。他当然不可能放弃核计划，于是苏联对马歇尔计划采取极端强硬的态度，并最终选择了让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的路线。

此后苏联开始全面反击，其行动包括痛斥西欧共产党人，不应加入联合政府；一改对捷克斯洛伐克中派政府的支持态度，将资产阶级部长们赶出了政府；在德国苏占区不声不响地取消了自由、普遍选举的口号，并把资产阶级代表赶出了政府；策划封锁柏林；在波兰召开部分共产党参加的会议，开始组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对于苏占区当局的一些激进做法，苏联有关机构提出过不同看法。1948年春，率领苏共中央赴德专门小组的苏联著名外交官索勃列夫(Sobolev)就在自己的报告中，激烈批评苏占区当局的极“左”做法。在日期标识为1948年3月12日的便条中，苏联外交部欧洲第三司司长斯米尔诺夫(Smirnov)执著地建议，首先应该召开新的德国问题外长会议，

而不要任由对抗性的冲突发展。

然而，既然斯大林的对抗路线已经确定，德国的分裂便不可逆转。“柏林危机”是冷战中的第一次危机事件，它使所有非对抗性的选择变得不再可能，而冷战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实。

由于苏联的解体和许多档案材料解密，与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学者关于冷战问题的看法有了重大变化，其中关于冷战起因的一些新观点最值得关注。

俄罗斯学者认为，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和杜鲁门主义都不能被看成是冷战的起源，它们充其量是冷战的宣言书。他们认为，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中的反苏和反共内容仅仅是一种掩盖而已。丘吉尔与其说是在指责苏联，不如说是在批评美国，因为后者不肯帮助英国实现其核计划，单方面中止与英国在核领域的合作，不让英国参加曼哈顿计划。因此，在丘吉尔发表演讲后离开美国时，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没有出席丘吉尔举行的告别宴会。杜鲁门在国会演说中，为捍卫属于西方范畴的希腊和土耳其不受苏联的共产主义势力威胁，划分出两个对立的阵营。但是他并没有号召消灭共产主义，他仅仅是呼吁把两个阵营的状态固化而已。换句话说，杜鲁门在国会的演说主要是针对西方阵营内部的。所以，当时的西方舆论界并没有对杜鲁门的演说进行大力宣传。

有些俄罗斯学者还认为，冷战的真正原因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的政治对抗，而是核武器问题。苏联及其东欧盟国都极其希望接受马歇尔计划，但是该计划的先决条件中包括受援国必须向美国申报出口产品清单，从而损害了苏联从德国和捷克进口浓缩铀的利益，而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是苏联外交的核心目标之一。他们认为，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才使欧洲分裂，真正出现了两个完全对立的社会阵营，冷战才变成了现实。因此这一事件才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第三节 苏联对西方政策的演变

苏联对美国和西方的政策是其冷战时期外交的主线，其演变过程可分为全面对抗、缓和与对抗并存、全面进攻和战略收缩等四个不同的时期。

1. 全面对抗时期

德国问题是冷战的核心问题之一。苏联对西方采取强硬措施也是从处理德国问题开始的。

二战结束后，苏联与美、英、法在德国问题上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

但基本上维持在可以和平解决的范畴内。从 1948 年春季开始，苏联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激烈行动，封锁柏林便是其中之一。

封锁柏林的直接原因是，1948 年 2 月美、英、法三国副外长伦敦会议决定将三方所占德国部分合并，目的是建立一个联邦德国，其结果当然就是分裂德国。

为表示强烈抗议美英法的行动，苏联在 1948 年 3 月 20 日宣布，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并决定从 4 月 1 日起，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的美国人的证件，检查所有货运和除私人行李以外的所有物品，并随后宣布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通道实施交通管制。

美国对苏联的封锁行动作出强硬反应。一方面动用大量空军力量，向柏林西方占区运输生活物资，另一方面对苏占区实施反封锁，甚至把 8-29 轰炸机派往英国，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柏林封锁”，也称第一次柏林危机。

“柏林封锁”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最严重的冲突事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苏联表面上极其强硬，但是它并没有真正要与美国交战的意图。封锁柏林的行动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即表示苏联强烈反对建立联邦德国。苏联从一开始就为妥协解决危机留下余地，这表现在苏联并没有控制柏林的空中通道，也没有放弃向美国暗示，只要推迟成立联邦德国，并让有苏联参加的四方外长会议来做最后决定。因此，经过秘密协商，1949 年 5 月 5 日，四国同时宣布解除封锁，并于 5 月 23 日在巴黎举行四国外长会议。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苏联有意的冒险行动，其结果一方面表明，美国当时并没有与苏联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打算，另一方面也使西方对苏联的威胁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从而加快了分裂德国和建立北约的步伐。

如果说封锁柏林是苏联与西方第一次直接冲突的话，那么朝鲜战争则是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冲突，只不过这一次苏联没有直接出面，而是站在中朝两国的背后。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投降时，美苏两国商定，以北纬 38 度线为界，朝鲜北部由苏联受降，南部由美方受降。同年 12 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达成了朝鲜未来统一和建立政府的协议，并决定由美苏组成联合委员会，提出建立政府的方案，提交苏、美、英、中四国审议。

当时除朝鲜劳动党外，朝鲜国内各派均强烈反对莫斯科协议。在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坚持只与支持莫斯科协议的派别接触，而美国认为应该同所有党派协商。在第二次会议上，本已达成与

所有当前支持莫斯科协议的党派进行协商的共识，但苏方代表后来又改口，只同意与以前支持莫斯科协议的党派协商。

在联合委员会工作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美国将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大会。1947年11月14日，联合国建立了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以监督朝鲜的选举。由于苏联反对建立该委员会，并不允许其成员进入朝鲜北部，联合国宣布朝鲜选举在联合国代表可以工作的地方举行即为有效。于是，1948年5月10日，朝鲜南部举行选举并于8月15日建立了大韩民国。北部也在同年9月9日宣布，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分裂终于变成事实。苏联的地缘战略考虑是在远东地区建立自己的控制区，以抵御来自美、日的威胁。为此，苏联曾在朝鲜花大气力建立自己的监控体系，包括派一名苏军上将任驻北朝鲜大使，在朝鲜设立包括克格勃在内的五个部门的代表处，有约200位朝裔苏联人在朝鲜国家机关工作，使每个部委至少有一位副部长是朝裔苏联人，并派遣大批苏军专家到朝鲜等等。虽然苏军在1948年12月撤出朝鲜，但在这样的条件下，苏联显然是可以控制和了解北朝鲜的行动计划的。

由于担心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斯大林曾反对北朝鲜的武力统一计划。但在1950年初，斯大林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开始支持金日成的计划。对斯大林态度转变的原因，尚无明确和一致的说法，不过至少可以推断，斯大林相信如果北朝鲜开始武力统一行动，会比较迅速地取得军事胜利，而美国干预的机会并不多。

然而，美国的反应却大大出乎斯大林的预料。美军的直接干涉使北朝鲜速战速决的计划未能实现，更严重的是1950年9月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提出了用武力统一朝鲜的目标，只是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才阻止了美军的进攻，最终迫使美国同意沿线停战。中国参战后，苏联向中国军队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军事装备，苏联空军也在朝鲜北部部分地区上空，直接参加了空战。不过苏联自始至终坚持的原则是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上述事实表明，这个时期苏联一直与美国存在严重的对抗，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是这种对抗的突出表现。不过斯大林清醒地看到了苏联实力的局限性，以及苏联国家战略的基本要求。所以他一直避免使苏联卷入与美国直接的军事冲突。

2. 缓和与对抗并存时期

赫鲁晓夫上台执政，给苏联同西方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他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就明确强调，为了巩固全世界的和平

事业，确立苏美两个世界最大国家之间牢固的友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他认为，就重大的国际问题同美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并达成协议，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他在著名的 1959 年第涅伯彼得罗夫斯克讲话中指出，苏联与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如果是其他国家之间打起来的话，还有可能拉开。如果是美国与苏联之间发生战争的话，谁也制止不了。这将是巨大规模的灾难。因此应当尽可能做出努力，力求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解决美苏之间的争议。

赫鲁晓夫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倡导缓和，在实践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步骤。首先是在和平共处指导思想作用下，苏联在 1955—1957 年间把自己的军队数量裁减了 214 万。

主动与美国缓和关系是赫鲁晓夫的重大外交决策，其突出表现是在 1959 年 9 月实现了对美国的突破性访问。此后赫鲁晓夫大力宣传所谓的“戴维营精神”，即一切国际问题都不应通过武力的办法解决，而应当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赫鲁晓夫还试图通过参加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与美国共同建立核垄断。

与此同时，苏联还积极致力于改善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先后与奥地利缔结和约，与西德建交，与日本恢复邦交，并同意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放弃对日赔款要求，并宣布在缔结对日和约后交还齿舞和色丹两岛。

但事实表明，赫鲁晓夫与西方缓和关系的外交行动是一厢情愿的。就在他倡导并作出缓和姿态的同时，美苏之间的对抗却在间歇性地增强。1960 年 5 月 1 日，苏联防空军击落了美国的 U-2 型高空侦察机。这一事件导致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它证明了苏联缓和政策的脆弱性。第二次柏林危机与柏林墙的出现，是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由攻转守的转折点。1958 年 11 月 27 日，苏联向西方主要国家发出照会，声称苏联准备与东德签约，交还柏林，并建议美、英、法三国也将自己在西柏林的驻军撤走。期限为 6 个月。否则，苏联将单方面采取行动。同年 12 月 31 日，美国拒绝了苏联的建议。柏林地位问题再一次把冷战双方推向热战边缘。

在持续了近 3 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中，苏联并没有放弃通过妥协解决问题的考虑，并且最终还是采纳了东德领导人的建议，封锁边界以阻止其国人西逃。于是在 1961 年 8 月 17 日，冷战期间举世闻名的“柏林墙”出现在东、西柏林之间，直到 1990 年两德统一才被拆除。

1962 年 10 月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它是冷

战时期美苏之间最严重的一次直接对抗，是双方站在“核战争边缘”上的对抗。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取得胜利，美国试图以武力推翻古巴新政权。为了捍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古巴选择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根据1962年8月达成的苏古秘密协定(未正式签署)，苏联向古巴运送了42枚中程导弹、伊尔-28轰炸机等武器。苏联此举的目的既是为了改变苏联与美国战略力量对比的不利局面，也是为了保护古巴不再受美国的侵略威胁。

由于古巴离美国本土最近处只有大约90海里，习惯于海洋天险保护，又拥有最强军事实力的美国，不可能容忍苏联的威胁。肯尼迪政府选择强硬的“战争边缘政策”，即以军事威慑为后盾，强行对古巴实施“隔离”，以迫使苏联把导弹和轰炸机撤出古巴。

苏联领导人显然没有料到美国会采取如此强烈的措施，他们更没有准备好与美国在古巴打一场战争。经过秘密渠道反复磋商，美苏就解决古巴导弹危机达成妥协，即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和飞机，美国则承诺不入侵古巴。1962年11月20日，在苏联撤出导弹和轰炸机以后，美国解除了“隔离”，至此危机宣布结束。

古巴导弹危机是苏联领导人在冷战时期最大的战略性决策失误。首先是他们没有能合理地认识到苏联与美国的战略力量差距；其次是在美国对苏联部署导弹和轰炸机做出强烈反应后，没有周密的应对方案；最后是一方面声称保卫古巴，在撤出导弹时却不顾古巴领导层的意见，从而使苏联的国际威信受到很大的损害。

当然，古巴导弹危机也有其积极的结果，例如美国毕竟公开承诺不侵略古巴。特别是美苏从这次危机中意识到，突发事件可能引发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战争，甚至造成一场灾难。危机过后，美苏开始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如在最高领导人之间建立“热线”等。同时古巴危机也促使美苏加快了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步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军控领域与美国达成的最重要的协议。

3. 全面进攻时期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一方面继承了赫鲁晓夫的和西方既对话又对抗的路线，即在加快发展自己的战略力量以求与美国的均势的同时，大力推进裁军谈判进程；另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利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遇到的困难，推行全面进攻的战略，在全球范围与美国争霸。美国在越南陷入的困境使苏联领导人相信，美国并不是无所不能的。用一些俄罗斯学者的话说，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才真正具有了全球性。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外交政策的全球性主要体现在，苏联由于其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它才真正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超级大国。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几乎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惜同美国在进行着争夺。这个时期的苏联领导人不再像赫鲁晓夫，总是临危退缩。因为他们认为，苏联在核力量方面，已经取得了与美国的均衡；在常规武器方面，苏联当时是明显处于优势的。在这种军事力量对比的背景下，美国不会冒自杀的危险，使用核武器来遏制苏联的扩张。

此外，苏联与美国主导了从裁军到发展问题的主要国际机制，特别是双方共同建立了限制军备机制(如1972年的限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条约)和欧洲安全机制(如1975年成立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勃列日涅夫外交的进攻性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加强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加紧对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的控制；加速军事现代化的步伐。

从冷战历史的进程看，必须承认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攻势外交，才使苏联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在1970—1974年间在第三世界展开大规模的攻势，迫使美国转而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以便联手遏制苏联的扩张。从后来的发展看，美国的战略调整和中美关系的缓和直到正常化，给苏联在全球扩张的战略带来了巨大压力，大量消耗了苏联有限的战略资源，迫使它逐步陷入被动的困境。

4. 战略收缩时期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基于对苏联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有限性以及正在相对下降的认识，开始着手改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全球性进攻战略，在所谓“外交新思维”的口号下，实施全面收缩的国际战略，试图通过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如大幅度单方面削减战略武器和同意德国统一等等，换取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与合作。

戈尔巴乔夫认为，过度的军备竞赛已经使苏联的经济奄奄一息，要想摆脱经济衰退的困境，必须放弃同美国的军备竞赛。基于这种认识，苏联领导人开始改变在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中的政策。

苏联领导人曾经坚持要求，美国必须将削减中程导弹与停止其战略防御计划挂钩。他们在确认这一要求难以实现后，戈尔巴乔夫1987年12月第一次访美时，与里根总统签署了中导条约，表明苏联同意同时销毁部署在欧洲和亚洲的全部中程导弹，而美国则相应地销毁潘兴2型导弹。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置苏军高级将领的告诫于不顾，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苏联将单方面削减军队50万人。1989年9月，苏

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 (Eduard Shevardnadze) 访问美国，再次在军控问题上作出让步，如不再坚持将削减核武器的谈判与反导弹防御问题联系起来等。

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苏联领导人的退却也是非常明显的。在 1989 年底，戈尔巴乔夫还曾经表示，两个德国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并提醒说不要忘记东德是苏联的盟国，不容许别人干涉其内政。但是，柏林墙的开放使他意识到，统一趋势发展极其迅速。到 1990 年初，他表示东德有权与西德统一，但是统一后的德国必须保持中立，不能加入北约。

戈尔巴乔夫曾幻想，借两德统一的机会改造北约和华约，以抵消两德统一给苏联带来的消极影响。苏联领导层在与德国谈判的过程中，非常清楚地表示，希望为从德国撤走苏军而获得相应补偿的意图。1990 年 7 月，西德总理科尔在莫斯科会谈中，允诺给予撤出的苏军 120 亿马克的补偿，并答应向苏联提供 300 亿美元经济援助时，苏联领导人的防线便彻底瓦解了。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德国无条件统一，也不再就统一后的德国是否加入北约提出任何限制性条件。

从一定意义上讲，冷战是从德国问题开端的，德国问题的解决也就意味着冷战的结束已经不远了。只不过西方获得的是实实在在的实惠，而戈尔巴乔夫获得的只是虚名(如诺贝尔和平奖)和经不住考验的幻想(如共建欧洲大厦)。

第四节 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

冷战是以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为标志的，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内不同国家的政策都服从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整个社会主义都要为苏联与美国的对抗或缓和的总政策服务。任何不服从的国家或领导人，必然会受到苏联的打击和惩治。

1. 情报局时期

苏联在抗击德国法西斯、解放中东欧各国斗争中，曾做出巨大的贡献，这些国家的民众和政治上层也希望借助苏联的影响，防止未来可能的德国侵略或来自西方的干涉。这两方面的原因使苏联在战后中东欧国家中，拥有其他世界大国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当然也就有了控制这些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机会。

不过，在冷战爆发以前，基于多方面的考虑，苏联经常有意地表现出，自己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非共产党政治派别之间，保持着中立的形象。苏联的某些做法甚至在那些国家共产党领袖中，引起过某种疑惑

和不满。随着苏联与美英关系的恶化，苏联开始迅速地改变对中东欧国家的政策，用两大阵营对抗的理论和统一思想、统一领导的观念，约束各国共产党，并为此先后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下简称情报局)、经济互助委员会(下简称经互会)、华沙条约组织(下简称华约)。

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9月，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是一个协商性国际机构。1945年，南斯拉夫最早提出了成立该机构的建议。当时斯大林表示支持，但波兰反对。1947年夏，联共(布)中央提议，由波兰党发起欧洲共产党会议，讨论联合问题。会议发表的宣言强调，战后国际舞台上已经形成了两个完全相反和对立的阵营，为了加强共产党阵营的团结协作，会议决定成立情报局，以便“组织经验交流，并在必要时，在互相协商的基础上，配合各党的活动”。

苏联提议召开这样的会议并成立情报局，目的就是要把各国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等，统一到苏联的指挥和控制之下，以便与西方对抗。遗憾的是，苏联没有从共产国际的历史中吸取必要的教训，逐步把情报局变成了苏联共产党“强制命令的传达渠道和执行助手”。苏联不断利用这个组织，指挥各国共产党，打击具有自主倾向的共产党和领袖人物。这一点集中反映在苏南冲突中。

苏南冲突是冷战条件下，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冲突。其主要原因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在内外政策上强调其自主性，从而与苏联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绝对一致的政策形成尖锐的对立。南斯拉夫抱怨苏联在与南流亡政府关系、与意大利领土纠纷、对南经济援助等问题上，无视南的利益和立场。同样，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共同建议成立巴尔干联邦，以及南擅自向阿尔巴尼亚派出军队，支援当地游击队的做法，影响了苏联对战后地区问题的某些安排，结果是激怒了斯大林。

1948年春，在苏斯洛夫(Mikhml Andreyevich Suslov)的授意下，苏其中央对外政策部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批评各国共产党的所谓错误政策和做法，其中对南斯拉夫的批评是最尖锐的。文件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对苏联不友好，三番五次地企图贬低苏联在南斯拉夫解放斗争与经济建设中的贡献，忽视苏联在团结进步和民主力量与美英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尤其让苏联不能容忍的是，铁托(Josip Broz Tito)竟然声称，巴尔国家应当同苏联一道，成为指引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正确道路的航标。显然，斯大林已经无法容忍铁托，他决定杀一儆百。在1948年6月的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在苏联的操纵下，

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公开地严厉批判铁托和南共。从此苏南冲突全面爆发，南斯拉夫走上了接近西方、坚持不结盟的发展道路。

苏南冲突不仅使两国关系严重恶化，也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自主或改革倾向的政治人物遭到清洗。苏联的做法虽然暂时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但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苏南冲突给苏联外交造成很大困难，但在情报局 1956 年解散以前，社会主义阵营总体上还是团结的，苏联的影响力还足决定性的。这集中反映在 1949 年经互会的建立和 1955 年华约的成立上。它们证明，苏联从经济和军事上统一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思路得到贯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加强。

2. 大论战时期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危机的真正出现，是从中苏同盟破裂到武装冲突开始的。中苏关系从友好到恶化的标志，就是持续了 10 年的大论战。这个时期与情报局时期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程度下降。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和苏联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方面提出的一些新观念，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的连锁反应，1956 年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明证。中苏之间的分歧是由来已久的，只是斯大林在世期间被淡化或掩盖住了。当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提出“三和两全”的观点时，中苏矛盾终于表面化了。中苏论战的内容涵盖了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外交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但从冷战的角度看，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共处与革命、主权平等还是所谓的阵营意志至上，等等。

中苏论战反映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之间关系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各国之间地位不平等，存在着强国侵犯弱国的独立和自主权的倾向，这在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有突出的表现。其次是明显地忽视各国文化、经济和历史发展程度的差异，过高估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一致性的决定作用。其突出的表现是，苏联没有认真理解中国长期遭受殖民压迫所形成的对外来干涉的强烈反感与愤慨。

中苏论战及中苏同盟破裂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首先是中苏双方特别是苏联方面，因为担心会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对原有的理论教条讳莫如深，结果在客观上导致贻误改革和创新，延误了发展机遇。这是苏联在与西方的冷战较量中最终处于下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苏同盟破裂也反映了两国对外政策指导思想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对抗性思维，加上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内在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国际缓和局势的出现。

由于中苏分裂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经常不得不在中苏之间摆荡，它们有的无所适从，有的投机取巧。最终的得益者是利用了这种机会的西方阵营。另外中苏相继大幅度改善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都曾经对另外一方的国际处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客观上也为西方获得冷战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3. 严格控制时期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苏联处理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指导思想，进行了重大调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时期因为强调和平共处，放松了对东欧的思想和政治控制，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他们强调要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统一为目标，加强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并据此提出了“有限政权论”等。

勃列日涅夫认为，“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当出现危及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时候，这就已经不仅是这个国家人民的问题了，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了”。

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掩护下，苏联使用武力镇压了主权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倡导的改革。1968年8月20日，苏联联合除罗马尼亚以外的华约成员国，动用25万大军，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把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斯沃博达挟持到莫斯科，强迫他接受苏方的16点要求，包括按苏联模式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发展方向，承认苏联人侵的合法性，并承认国内出现反革命活动，等等。

苏联的宣传工具在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辩解时声称，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处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体系之中，它不能脱离那个大家庭的共同利益。当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着反社会主义变质的危险时，不能拘泥于对主权的某种抽象理解而使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无所作为。相反，苏联①《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五大上的讲话》，载于《真理撮》(苏)1968年11月13日。

反击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向捷克斯洛伐克输出反革命，则是维护捷克斯洛伐克的真正主权。为了“大家庭”的利益，苏联可以决定其他国

家的命运，“包括它的主权的命运在内”。

既然苏联拥有了这样至高无上的维护社会主义人主权的“神圣”权利，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苏联，便成为自然和合理、合法的事情了。

4. 戈尔巴乔夫的“不干涉”时期

与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截然不同，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实行“不干涉”或者“放弃”的政策。这是其“外交新思维”的重要的具体表现之一。

由于过分强调与西方接近的意义和有意淡化军事安全的重要性，戈尔巴乔夫事实上抛弃了俄国历史上从未放弃过的东欧，对其军事和安全上的战略地位熟视无睹。相反，他把东欧看成是苏联的一个“累赘”，一个可以当作礼物甩给西方的“包袱”。

在当选总书记以后，戈尔巴乔夫立即与华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会谈，阐明了自己对东欧兄弟国家的立场。他特别强调不会重复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将依照“平等、相互尊重主权和独立、互利合作”的原则，建设双边关系。在党际关系上，苏共不再指手画脚，“每个党将为自己国家的情况负全部责任”。

在解释实行上述政策的理由时，戈尔巴乔夫指出，对东欧各国来说，苏联的援助、廉价劳动力资源等，在帮助东欧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也使它们产生了对苏联市场和技术的依赖，失去了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既然苏联自己已经选择了改革和民主化的方针，就应该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自决权，承认他们有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自由，而不能再利用盟友关系，把自己的思想方式、自己的模式和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别人。他还引用马克思的话：“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会自由的”。

戈尔巴乔夫不干涉政策有两种具体方式。第一种就是彻底撒手，鼓励自主性，承诺不派军队干涉，如对波兰等的政策。其结果是瓦文萨(**Lech Wałęsa**)领导的团结工会打败波兰统一工人党，夺取了波兰的政权，并引发了东欧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二种就是变相干涉，施加压力促其变革，如对东德等的政策。前苏共中央书记、国际部部长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指责东欧共产党的领导人没能进行改革和不采纳“新思维”，有时他一时性起，就匆忙去访问那些领导人并教训他们，但是，这只能促使当地政权的瓦解，尤其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多勃雷宁指的是 1989 年 10 月，戈尔巴乔夫在访问东德时警告东德

领导人，民主德国需要改革，不改革就会受到生活的惩罚。当昂纳克在1989年底辞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职务时，他还发贺电表示，那里只是发生了本应该发生的事情。当时民主德国已经失去控制，柏林墙已经被推倒。在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既成事实时，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承认，对东欧政策有失误的地方，如同时与东欧各国在贸易上过渡到外汇自由结算等，是考虑不周的，从而导致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经济联系的解体。不过对他给东欧各共产党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戈尔巴乔夫却只字不提。

第五节 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关注程度呈依次递增的态势，苏联与美国在亚非拉地区的竞争日益尖锐化，古巴、越南、阿富汗都是典型的实例。

苏联在二战结束初期，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是比较低调的。这首先是因为在斯大林看来，新独立国家的民族领袖，诸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等，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附庸、帝国主义的傀儡。斯大林认为，对殖民地国家来说，只有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

基于上述认识，在1945年至1955年期间，苏联对新独立国家奉行的是黑白分明的政策，即所谓“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由于当时的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少有共产党领导，苏联事实上放弃了与该运动合作并施加影响的机会。

此外，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苏联自身生存环境恶劣，无暇顾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战争造成的严重破坏使苏联不得不把非常有限的资源用于恢复和建设本国的经济，即使是有一部分资源从国内建设中节省出来，也主要用于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地位和加强对中国的影响上。而且，美国的核威胁也迫使苏联必须集中力量，研制自己的核武器，增强国防能力。

当然，斯大林对亚洲、非洲一些新独立国家等，并非完全无动于衷。如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等国，曾经引起斯大林的关注。斯大林当时试图强迫土耳其允许苏联在其领土上建立海军基地，结果导致苏土关系在1953年以前一直非常紧张。斯大林还试图延长苏军在伊朗北部驻扎的期限，甚至企图在那里建立亲苏的政权。由于美英的强烈抵制，苏联的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随着英法对中东地区控制的弱化，苏联对这个地区的政策开始活跃起来。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建国的国家。苏联领导人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他们相信，在中东出现新的国家，会给西方国家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带来难以克服的难题。

1955年春，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N. A. Bulganin)等，相继访问了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这些访问标志着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斯大林时期对发展中国家的漠视与消极，转变为更加灵活和积极的政策。

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政治报告中，赫鲁晓夫进一步明确了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他声称，在东欧、亚洲和非洲，出现了一个广阔的“和平地带”，新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摆脱了西方的控制与剥削，打破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发展中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是苏联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盟友，它们可以在广泛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他提出“谁不反对我们，谁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口号，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要它提出请求，都会得到苏联的军事、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

在指出苏联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可能性的同时，赫鲁晓夫也表示，这些国家可以通过与苏联不同的道路，甚至是非暴力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苏联对发展中国家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新独立国家并不是像斯大林预言的那样，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相反，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挥着显著作用。如印度坚决地奉行彻底的不结盟政策，埃及、加纳、伊拉克、印尼和几内亚等国，都建立了激进的反西方政权，而且它们的领导人也向苏联提出了援助的请求。其次，苏联急于打破美国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建立的“包围圈”，它与埃及、叙利亚等国的接近，就反映了这种意图。

此外，苏联领导人还有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上的考虑，即削弱、限制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展的政治影响。苏联领导人认为，1955年的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在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中的威信和影响力迅速提高，已经对苏联的地位构成了挑战。赫鲁晓夫对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的访问，以及苏联愿意向印尼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等姿态，均是对中国影响力扩大的反应。

为了争取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反西方阵营，赫鲁晓夫启动了对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援助的进程，帮助那些亲苏的发展中国家修建能源系统、改造农业基础，等等。这些援助项目都是周期长、耗资巨大的工程。

对那些发展中国家影响更深刻、更复杂的，是帮助这些国家培养干部、提供军事援助。苏联培养发展中国家干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当地合作项目执行过程中，就地培训干部；二是邀请那些国家的国家干部，到苏联的企业实习和进修；三是接收他们到苏联的高等院校学习深造，苏联的卢蒙巴友好大学就是这种政策的产物。

赫鲁晓夫执政末期，苏联对发展中国家事务的介入越来越深，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赫鲁晓夫本人同许多发展中国家领袖的关系非常亲密，苏联反帝反殖宣传深入人心，苏联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也使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将它视为第三世界的朋友、革命阵营的领导者。印度、印尼、埃及、缅甸、叙利亚、加纳和伊拉克等国先后宣布，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愿与苏联保持一致。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对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在提供军事、技术和经济援助时，不是仅凭领导人的感情或“反帝斗争”等政治口号，而是以能给苏联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为准。譬如，尽管苏联与伊拉克政权在库尔德人问题、在其与伊拉克共产党关系问题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勃列日涅夫依然继续扩大对伊军事援助，其原因就是伊拉克是仅有的几个能够用硬通货支付武器货款的发展中国家买主之一。

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作出更大的努力，拉拢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等有明显反美倾向的国家，以求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再就是根据苏联的地缘战略需要，拉拢越南、古巴、埃及和也门等国，为苏联海军的扩张寻求基地支持。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演变还受到一种新的理论观念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苏共的一批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即所谓“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国家”，得到苏联领导层的认可。

提出上述概念的依据是列宁的有关理论，即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或者缩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便进入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新独立的亚非国家能否选择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主要取决于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的性质。如果掌权的是革命民主力量，也就是主张对主要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的政治派别，那么社会主义将成为该国家发展的取向。按照他们的观点，这样的国家的出现与增加，会自动把西方势力挤出亚洲和非洲。

事实表明，那些国家并没有按照苏联理论家的逻辑前进，它们日益

脱离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取向，滑向曾经奴役它们的西方国家。为了拉住那些国家，苏联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资源，甚至忽略成本的规模，以满足这些国家的要求，特别是在军事装备上的要求。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武器出口大幅度增加，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更是有增无减。按照西方的统计，从1966年到1975年，苏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总额为9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从1978年至1982年，为354亿美元。在1966—1975年间，接受苏联军事装备的有29个国家，1980—1984年间为36个国家。到帅年代末，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武器供应占那些国家武器进口的35%。

在整个80年代，苏联向第三世界提供了7925辆坦克和装甲车、20470门火炮、17艘潜艇、2620架超音速战机、1705架直升机、32210枚“地—空”导弹。苏联武器的主要买主有印度（苏联出口武器总额的70%）、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其中，伊拉克在这10年间向苏联支付了1300亿美元，占伊拉克当时军购总额的53%。此外，有近千名苏联军官被派往伊拉克。

苏联向发展中国家武器出口有其特殊的原因。首先是获得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它们需要更多和更可靠的武器来源；其次是苏军在军事装备现代化过程中，有大量老化过时的武器需要被更新，大量出门过时武器对苏联当然是有利可图的；最后是为了配合与西方在发展中国家展开争夺的需要。苏联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经常摆脱不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苏联援助的目的之一是企图用援助来造就当地政权的亲苏倾向。一旦这种努力得不到回报，苏联就倾向进行军事干预。苏联在安哥拉、也门、索马里等国家的干涉，都是比较突出的例子。当然影响最大的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其结果是苏联的国际处境急剧恶化。

安德罗波夫(Yury Vladimirovich Andropov)和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当政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开始出现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武器销售上，略要求受援助国家用硬通货支付，并不向那些政权不稳定的国家出售武器；二是在中东地区实行平衡政策，在保持与伊拉克、伊朗等国良好关系的同时，改善与其他产油国，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以有利于世界石油市场价格的相对稳定。

如果说在1985年以前，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带有扩张的色彩，那么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起，苏联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开始发生根

本性的变化。一方面苏联在军备竞赛的压力下，经济实力已经大不如前，难以继续以往的大规模援助政策。另一方面，苏联的外交有所拓展，亚洲和拉美的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如韩国、巴西等，成为苏联的合作伙伴，发展中国家在苏联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特别是苏联开始推行缓和的对外政策，放弃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抗的政策。这些都促使苏联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明显地奉行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政策。

上述变化的结果是苏联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威信和地位迅速下降，苏联在冷战时期最主要的竞争成果几乎损失殆尽。

第六节 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与冷战终结

冷战爆发以后，虽然曾经有过若干次缓和终结冷战的征兆，如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美苏缓和、70 年代中后期的裁军进程等，但真正实质性的变化却始自戈尔巴乔夫执政。戈尔巴乔夫接手政权时，苏联已经像是一辆濒临瓦解的老破车，不仅国内经济形势一片混乱，而且自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多年的扩张战略，也使苏联筋疲力尽。

面对百孔千疮的经济状况和陷入极度紧张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戈尔巴乔夫力图通过内政外交的改革，挽狂澜于既倒。在对外政策方面，他试图根据所谓的“外交政策新思维”，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更不是核手段，维护苏联的安全，并为苏联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他声称苏联不再追求军事优势，要用政治谈判的方式裁减军备，降低与西方的对抗水平。自 1985 年起，每年都举行过以裁军为中心议题的美苏首脑最高级会晤。戈尔巴乔夫在裁军问题上选择了看似很有道理、其实极其冒险的让步立场。

除军控和裁军谈判进程迅速取得进展之外，苏联 1987 年开始从阿富汗撤军，这也是造成冷战结束的重要步骤。阿富汗战争打断了 70 年代中期开始的东西方缓和进程，使冷战的对抗性重新明朗化和激烈化。苏联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后，美苏在第三世界许多热点问题上（如安哥拉、朝鲜、伊拉克），开始采取建设性的、有时甚至是协调一致的立场，基本改变了冷战时期在第三世界针锋相对的对抗模式。

最重要的变化当然还是在欧洲。由于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采取“不干涉”政策，东欧实际上已经不再是苏联对抗西方的堡垒，反而成了与苏联竞相接近西方的比赛对手。1990 年 6 月，作为前苏联阵营的军事组织的华约，在莫斯科举行组织协调会议。来参加会议的东欧各国元首不仅已经是新面孔，而且是另有“新欢”的人物了。1991

年6月，华约宣布解散，其理由就是北约已经不再是敌人，而是合作对象，保留华约组织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了。

1991年7月，作为苏联阵营经济载体的经互会也宣布解散。同时，自感长期“吃亏”的苏联宣布退出卢布结算的体制，要求按照国际经济组织的原则，改组经济关系，特别是要求按照自由货币结算。

当两德实现统一、华约组织和经互会相继解散以后，冷战的结束已经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关于冷战结束的具体时间，有四种不同看法。它们包括：(1)1989年12月美苏首脑的马耳他会晤，戈尔巴乔夫在会谈中说，世界已经告别冷战，进入另一个时代；(2)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同意两德统一；(3)1990年11月21日欧安会正式宣布“冷战结束”；(4)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自动结束。

其实，争论有关冷战结束的哪一种说法更确切，并不那么重要。作为冷战一方的苏联已经是过眼烟云了，不过从昨日冷战到今日冷和平的艰难转变让人们感到，冷战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太深远了。俄罗斯并不承认自己在冷战中被打败了，并且还认为西方应该为俄罗斯和平退出冷战给予相应的补偿。更让俄罗斯无法接受的是，西方不仅没有解散冷战的主要军事机器北约，相反在不断地使它向东扩张，直逼俄罗斯边境。

思考题：

1. 如何评价苏联对外政策在冷战爆发过程中的作用。
2. 比较赫鲁晓夫时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西方政策的异同。
3. 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在冷战结束过程中的作用。

参考书目：

1. 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2.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3. 刘金质：《冷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4. 张小明：《冷战友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HeallmcKafi J1. CoseTcKaa BHeMIIIHQ. YIRTRKa B ro, li, bi x(xri0IIHOfi sOfiU), 1(1945—1985), M.: N1. e: K, KyrmpoKtmIe OTHOIIIeHRR, 1995.

6. Маренц Л. От Ленина до Горбачева: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оветских подходах к отношениям Восток—Запад//США: экономика, политика, идеология. — 1991. — №1.
7. Raymond L. Garthoff, *De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 C. 1985.
8. Raymond L. Garthoff, *The Great Transi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D. C. 1994.

第五章

冷战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戴超武 南京大学历史系

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同美国在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密切相关的。毫无疑问，美国利用超级大国的力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第三世界，其方式同传统殖民帝国的行为并无太大的差别，但也并非是美国有计划地利用其“中心”地位去剥削“边缘地区”那么简单。

冷战时期影响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军事上的信誉、联盟的稳固、人道主义的考虑、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对反美主义的愤怒、国会和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冷战的推动力等等。从冷战的进程来看，当美国和苏联有能力把自己的影响扩散到世界各地，以及在诸如欧洲这样至关重要的地区获得力量均衡的时候，两个超级大国便开始介入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亚洲等地区的争斗。美苏在这些地区的争夺既有战略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其过程构成了冷战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第四点计划”与杜鲁门政府对第二世界的政策

罗斯福政府的一项主要外交成就，就是在其任内坚决地反对殖民主义，并决定在战后终止西方殖民体系。在殖民地问题上，罗斯福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罗斯福及其外交顾问都相信，殖民主义是压迫性的，从伦理上讲是没有任何辩护余地的，同时也是不公正的。从现实的角度看，殖民主义注定要消亡，因为西方殖民主义抵抗不住亚非民族主义运动的反抗，这已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明。因此，试图在战后对亚非地区强加殖民统治，只会招致这些地区人民的强烈反对，并造成新的国际和地区冲突。

基于上述原因，罗斯福政府不断利用自己的影响，促使非洲、中东和亚洲的殖民体系走向解体。但是，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的政策也不是

抽象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同欧洲的殖民统治者合作击败日本，罗斯福怀疑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是否能够迅速走向自治，并担心过早实行自治可能会导致的后果。于是罗斯福提出了国际托管制度。但是这样的妥协并不等于放弃美国的上述目标。美国采取这些行动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奠定了“第三世界”出现的基础，最终导致了在战后时期 100 多个新国家的产生。同 20 世纪其他国际政治力量一样，非殖民化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国际体系的本质，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特性。

《大西洋宪章》在拉丁美洲激发了反专制统治的运动，阿拉伯世界期望美国帮助它们清除英国和法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整个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人民不仅希望美国把这一地区从日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同样希望赶走欧洲的殖民者。但是这些期望在 1945 年至 1948 年间都破灭了。杜鲁门政府几乎对“睦邻政策”避而不谈，阿拉伯人发现，和在中东地区支持民族自决相比，杜鲁门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以色列人的“家园”更感兴趣。杜鲁门政府的确也支持印度独立，利用经济和政治方法迫使荷兰人撤出东印度群岛。但是该政府同样支持恢复法国战前在印度支那的地位。是正在出现的冷战，决定了美国采取上述立场。

在遏制战略的重点被置于欧洲的同时，杜鲁门政府也意识到，欧洲的安全需要第三世界的稳定。杜鲁门政府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本质是，把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同对苏联的遏制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国务卿马歇尔 (George C. Marshall) 在 1947 年 2 月声称：对待危险的、过时的殖民主义的观点和方式等在第三世界的继续存在，美国不能视而不见；但目睹殖民帝国和统治机构屈从并受控于苏联的哲学和政治组织，美国显然也不感兴趣。国务院的一些官员甚至曾经主张支持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民族主义的。对此艾奇逊表示，问题不在于像胡志明那样的领导人是民族主义分子，还是共产党人，因为殖民地的所有所谓的“斯大林分子”，都是民族主义者。

到 1949 年，冷战在欧洲的界限已经被非常清楚地划定了。但是，对致力于建立一个为美国稳定控制的国际秩序的美国官员来说，第三世界的事态发展依然没有解决，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独立的国家，如印度 1947 年从英国独立出来，印度尼西亚 1949 年摆脱荷兰的殖民统治，利比亚 1951 年摆脱意大利的殖民统治。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当美国巩固其在西欧的军事和经济地位的同时，争取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加入美国阵营，美国需要一个花费不多但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点计划”应运而生。

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第四点计划”。他明确指出，美国必须着手拟定“一项大胆的新计划”，以便使美国科学发展和工业进步的成果，造福于“那些经济生活依然处于原始和停滞状态的欠发达地区的贫穷的人民”。

杜鲁门在这次演说中说明了美国实施第四点计划的战略构想，强调了冷战战略对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重要影响。他声称，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正经历着悲惨的境地，他们的贫困状况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较为繁荣的地区，都是一种阻碍和威胁。美国拥有足够的技术和能力，可以帮助改变这种状况，从而消除共产主义滋生和扩张的土壤和条件，美国必须从更好地利用世界人力和自然资源的计划中，获得巨大的收益。

杜鲁门发表第四点计划的演讲时，国务卿艾奇逊坐在杜鲁门的后面，聚精会神地聆听着。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杜鲁门讲述第四点计划，白宫甚至没有通知国务院有关第四点计划的任何内容。

在杜鲁门有关第四点计划演说发表的前一个月，白宫顾问乔治·艾尔西(George Elsey)有了一个“寻求思想的演说”，以及一个“寻求演说的思想”。这样，他同克里福德(C. M. Clifford)一起，说服杜鲁门接受了第四点计划。杜鲁门在1949年1月底承认，“第四点计划”还远不是一个计划，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将会发生什么，会在什么地方发生以及如何发生。但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但由于第四点计划缺乏同其他决策部门的协商，美国政府无法就有关实施的具体步骤做出相应的安排。

1949年6月24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特别咨文，请求批准“第四点计划”。杜鲁门在咨文中警告国会议员：发展中国家如果得不到帮助，他们将“转而接受错误的主义”，落入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为此杜鲁门建议，第一年为“第四点计划”拨款4500万美元。1950年1月4日，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再次呼吁国会通过“技术援助和资本投资的立法”，强调迅速采取行动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5月，“第四点计划”以《国际开发法案》的名称，列入《对外经济援助法案》的第四节，并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6月5日，杜鲁门签署生效。

这一法案仅为技术援助提供了3500万美元的拨款，实际上到1950年9月仅仅拨款2700万美元。同这一时期的马歇尔计划和占领德国的费用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同样，“第四点计划”也没有激发美国增加对第三世界进行大量投资的热情。

从1950年到1957年，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从110.8亿美元增加到

250.2 亿美元，但其中大部分基奉上流向美国影响范围以内的传统国家，包括 50 亿美元投向加拿大，欧洲 24 亿美元，拉丁美洲 35 亿美元。同期，中东和非洲仅仅得到 8 亿美元的美国投资。到 1957 年，美国在亚洲和中东的投资总共达到 20 亿美元，其中 15 亿美元投资在石油上。到 1957 年，美国对中东和亚洲贫穷国家的农业投资总计为 3600 万美元，仅比 1950 年的时候增加了 100 万美元。

毫无疑问的是，杜鲁门政府的“第四点计划”为战后美国处理同第三世界的关系奠定了一个模式，即对外援助成为美国的主要的外交工具之一——一种制止革命、阻挠共产主义、刺激美国经济的方法。美国决策者由此养成了一种思想习惯，认为美元能够买到外交上的朋友和经济上的安全。从历史上看，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利益包括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两个方面。1933 年罗斯福倡导的“睦邻政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同拉美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合作，使美国同拉美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为了在战后进一步发展关系，1945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8 日，在墨西哥城的查普特庇克召开一次特别的泛美会议，讨论美国同拉美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等问题。1947 年 8 月，美洲国家会议几经延期后，终于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美国为会议定下了规则，如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此次会议不讨论经济援助问题，因为欧洲的复兴比拉美的发展更重要得多，会议应该着重建立一种集体安全机制，美国希望拉美各国对未来的侵略者都要有所行动，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真正保持中立的。

9 月 2 日，与会各国代表签订了里约热内卢公约。公约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和 52 条订立了一个集体安全条约。条约规定，对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进攻，都将被视为对全体美洲国家的进攻；只要西半球 2/3 的国家同意抵抗这个进攻，那么所有各国都必须同心协力，或是提供军队，或是提供物资。

9 个月以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Aur Vandenberg)曾感叹说：自从拉丁美洲出现了共产党“高潮”，西半球就分裂了，虽然他也提不出这种“高潮”的任何证据。里约热内卢条约签订后，范登堡对国会的同事说，“这简直是黑暗世界里见到的阳光啊！”

里约热内卢条约并没有让拉美国家感到满意，它们需要同美国达成一个新的经济协议，以便使拉美各国的产品可以更为方便地进入美国市场。当时美国援助的重点是依据马歇尔计划，复兴欧洲的经济，拉美可以从新的欧洲市场获得好处，因而对拉美各国的要求并不重视。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所说：拉丁美洲不过是得了一场普通的感冒，而欧洲却是患

上丁天花。不过，美国最终还是和拉美国家达成了妥协。

1948年3月，第九届美洲国家会议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召开。美国虽然同意向拉美国家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但依然拒绝承担内容广泛的经济援助任务。马歇尔的希望充其量是借这个机会，制造适当的气氛，使拉美各国放宽法令，特别是那些有关石油资源的法令，以便吸引美国的投资者。从这个观点出发，产生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并设立了一套为西半球各国进行协商的行政机构和一个军事战略的防务咨询委员会。

拉美各国要求在宪章上加上西半球各国之间关系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美国虽然反对，但这个提案还是通过了。宪章里加上了第15条和第16条。第15条规定：“任何国家或几个国家均无权干涉他国的内政或外交，不论这种干涉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也不论其所根据的理由是什么。”第16条规定：“任何国家均不得利用或怂恿别国采取经济或政治性质的强制手段，强迫他国改变自己的独立意志，并从中获得任何利益。”美国参议院批准了这个宪章，1951年12月，美洲国家组织宪章正式生效。

战后在中东地区也爆发了发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但同东亚和东南亚情况不同的是，这种斗争在斯大林时期并没有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但局势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看来是相当严重的，其原因部分在于欧洲对中东石油的依赖，部分在于殖民主义在这一地区行将消亡，也部分在于苏联和中国已有效地利用了东亚和东南亚反殖民主义的情绪。因此，美国在苏联开始行动之前，就试图遏制苏联势力在中东的扩张，但美国的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却适得其反。

1946年的伊朗和土耳其危机第一次把冷战带进中东地区。但对莫斯科来说，这几乎不是苏联利用这一地区反殖民主义情绪的成功努力，相反却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恐惧。

伊朗危机首先起因于撤军问题和伊朗境内的石油开采权问题。有关从伊朗撤军问题，美国军队在1946年1月1日全部撤完，英军也准备在一定的期限内撤军，只有苏军按兵不动。苏联还大力支持苏占区内的伊朗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的分离活动，并阻止伊朗军队前往有关地区采取措施。对于苏联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在1945年底提出了解决伊朗问题的三项原则，包括：外国军队尽快撤出，伊朗政府有权在自己的领土上调动军队，伊朗有权在不受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决定在自己领土上的商业租让。当时美国并不愿意在伊朗问题上同苏联的关系破裂，于是主张通过联合国解决问题。1946年1月19日，伊朗政府向联合国控告苏联干

涉内政，阻止镇压叛乱，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这一控汗案正式列入安理会的议程。到了1946年3月2日，苏联依然没有撤军。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分别在3月5日和8日，给苏联发去两份措辞严厉的照会，要求苏联撤军。与此同时，伊朗再次将问题提交安理会。苏联在3月26日同意在六个星期内完成撤军。杜鲁门在3月23日对美国新任驻苏大使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Smith)说，由于伊朗事件，他不再相信斯大林是个信守诺言的人了。

苏联撤军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6年10月提出一份备忘录，以美苏可能发生战争为前提，认为苏联如果控制伊朗的石油资源，将严重危害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应尽量使苏联远离中近东，特别是远离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另外，苏联控制伊朗的库尔德地区，或者同英国划分势力范围，都将危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应在军事、经济、技术等方面更加积极地援助伊朗。国务院提出的有关对伊朗政策的报告，基本上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由此美国开始改变以前较为谨慎的政策，更多地介入伊朗问题，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协助伊朗政府，镇压了北部少数民族的叛乱，以及支持伊朗废除1946年4月的伊苏条约。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宣布成立。11分钟后，白宫新闻秘书就向记者宣布，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临时政府。杜鲁门政府实际上改变了罗斯福政府不介入阿以冲突的政策。

杜鲁门对以色列的承认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丝毫没有考虑来自国务院和国防部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后者担心承认以色列会失去阿拉伯国家丰富的石油，同时更担心由于苏联和以色列的密切关系，会导致这个新国家成为中东地区亲共产主义的一个桥头堡。因此马歇尔主张以联合国托管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使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同一个国家之中，而不是以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国对这一地区加以分治。国务院官员甚至警告杜鲁门，苏联的犹太人机构已经向以色列进行了渗透。

但是，杜鲁门听取了其他强烈主张承认以色列的官员的意见，特别是自己的顾问克利福德的建议，希望在中东地区消除苏联的影响；另外他还担心，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能否在托管制下和平共处。卡鲁门自己长期以来尊重在美国的犹太人，同时他也更了解美国的政治，因为犹太人的选票在纽约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是至关重要的。杜鲁门在1948年告诉二位朋友说，根据他所有的政治经验，他不能在一场非常接近的竞选中，指望得到阿拉伯人的选票。

以色列宣布建国的当天，阿盟血国军队进入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

战争爆发。战争初期，阿拉伯军队得到英国的支持，而美国和苏联一起反对阿拉伯国家，要求安理会干预，实施停火。6月11日实现第一次停火，以色列从美苏获得大量武器装备，7月8日战争再次爆发。在美国的干预下，1949年2月以后，以色列先后同埃及、黎巴嫩、外约旦、叙利亚签订停战协定。所有这些协定都承认了以色列以武力占领的既成事实，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的领土比联合国分治决议中所划定的还多出6700公里。96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原有的家园，流落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和附近的阿拉伯国家，由此构成了阿以关系中长期难以解决的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政治问题。美国战后初期对中东地区本来有较多的政策选择，但最终选择了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在阿拉伯人看来，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支持，是战后这一地区暴力和动乱的主要根源。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和艾奇逊开始采取全球攻势，使之成为冷战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第三世界成为实施全球攻势的主要阵地。东南亚地区由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物产资源，成为美国关注的一个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逐渐认识到法国作为这一地区的殖民大国，已经不可能再控制这一战略要地了。他劝告法国人退出印度支那，将这一地区置于联合国的托管之下，实际上是把印度支那掌握在美国和中国手中。但是，罗斯福在他去世前数周改变了主意，他认为蒋介石不足信赖，而美国在其他地区还有重大的问题。罗斯福面临的抉择很清楚：或是让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或是让该地区的部分地区落入革命的民族主义的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的手中，二者必居其一。在1945年的一年之中，胡志明向华盛顿发出过许多信件，要求给予经济援助并支持其独立，但是罗斯福和杜鲁门都绝不能容忍胡志明独占这一大片战略要地，他们都鼓励法国人重申对殖民地的权益。

杜鲁门政府对待战后印度支那的政策，确立了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做出何种反应的一个标准。华盛顿支持法国击败胡志明的起义，同时也敦促法国人准备让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最终获得独立，即在支持殖民政权的同时，也对之加以改革。

到1946年底，美国国务院认为胡志明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代理人”，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更认为，胡志明是“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东南亚的丧失将无可挽回地损害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对近海岛屿防御链的控制将受到威胁，澳大利亚和中东以及美国和印度之间的海空运输线将被切断，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将会严重阻碍军事行动。同时，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将会被阻

断，使之容易受到攻击。越南则被认为是防卫东南亚的关键。

在中国和苏联承认胡志明的政权后，美国认为印度支那由于其“在东南亚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位”而“面临着最紧迫的危险”，因此决定全力支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1949年，法国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日本人效劳的保大扶植为越南的领导人。1950年2月，美国承认了保大政权。

杜鲁门政府把印度支那视为又一个冷战战场，美国从1950年开始扩大外援，给予15亿美元，并派出一个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帮助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的统治。1945年到1954年，法国为了把越南留在法兰西帝国内而进行的第次印度支那战争，花去了50亿美元，其中20亿美元是美国提供的。1954年，美援占了战争开支的78%，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的人员达到了300多人。

但是，美国拒绝派地面部队参战。艾奇逊(Dean Acheson)明确表示，保卫印度支那是无用的也是错误的，美国“不能再有一个朝鲜”，美国不会派地面部队到印度支那。但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坚信，绝不能允许东南亚像一个“熟透的李子”一样，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继续存在，对保卫这一关键地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美国在1952年6月再向法国提供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同时国家安全委员决定，一旦中国直接介入战争，美国将派出海空军力量防卫印度支那，并考虑对中国本土采取海空军行动。杜鲁门和艾奇逊留给其继任者的印度支那局势，比1950年的时候更加复杂和危险。美国已经承担了战争费用的40%，中国也介入战争，战争也开始波及到了老挝和泰国。法国在越南的控制仅限于河内、海防、西贡以及沿着柬埔寨边界的狭长地带，同时法国也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军事威胁，法国的一些政治家在1952年底第一次提出法国撤出印度支那的建议。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实际上面临着更为艰苦的决策。

第二节“冷战的主要战场”：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

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相对而言，艾森豪威尔不十分重视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他首先关注欧洲事务，不相信美国的未来取决于为了控制那些遥远的、不

发达的部落社会而进行争斗的结果。但艾森豪威尔却相信，这是一些“多米诺骨牌”，是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同时，第三世界还是重要的原料来源地，以及是美国、日本和西欧的潜在的贸易伙伴。杜勒斯则指责苏联，企图把“新的民族主义潮流汇合到它们自己的运动中，这使得总的挑战来势更加猛烈。亚洲、非洲和其他非工业化的国家正式成为冷战的主要战场”。苏联的扩张使得自由世界缩小、盟国减少，美国也因此可能会被推回到美洲，“成为被包围在一片红色海洋中的孤岛”。

1946—1960年，亚洲、非洲和中东有37个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独立。1958年，有28个地区正在进行着持久的游击战。在1960年一年，就有18个国家宣布独立。革命运动以及殖民帝国的崩溃显然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这些巨大的变化发生在第三世界，基本上是那些非自人的、位于南半球、并且大多数是非工业化的“不发达”或者“发展中”的国家。当冷战战线在欧洲相对稳定后，美苏对抗便转移到了第三世界。

艾森豪威尔政府及其继任者都没有把新的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力量，而是把它们视为冷战争中的一部分来看待。他们把“民族主义”、“中立主义”混为一谈，以为第三世界的许多麻烦都是由苏联煽动的。在这种政策指导下，中央情报局作为操纵第三世界事态发展的机构，固然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过外援也成为美国对付想像中的威胁的主要手段。

1949—1952年，美国经济援助总额的3/4以上流向欧洲，1953—1957年则有3/4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到1961年，美国援助的90%以上提供给第三世界。但是，许多受援国拒绝介入冷战，这使得华盛顿大为沮丧。在杜勒斯看来，中立主义只不过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骗人的阶段，所以他宣布它是“不道德的和目光短浅的概念”。美国以这种否定的说法来对付普遍发展的民族主义潮流，使它自己得到了“新罗马帝国”的称号——革命的世界中的一个反革命的堡垒。

除了在亚洲和中东地区外，拉丁美洲也是美国对付民族主义的重要场所。当冷战转向第三世界后，美国越来越密切地注意拉丁美洲的不满情绪。1953年2月，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说明。他强调指出，拉丁美洲的条件有点像3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时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兴起。如果不加以提防，总有一天早上醒来就读到这样的新闻：南美发生了1949年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为了防止在拉丁美洲出现此种崩溃，艾森豪威尔政府实际上放弃了罗斯福的睦邻政策，使用武力以适应美国全球反共产主义的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第三世

界的第一重大的行动，就是对危地马拉的干涉和颠覆。

1950年，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án)上校当选为危地马拉总统。他把土地改革确定为中心目标，因为危地马拉2%的人占有70%的土地，巨大的香蕉出口商和该国最大的土地所有主、有权势的联合果品公司等，便成为一个目标。根据1952年的土地改革法，危地马拉没收了联合果品公司大约40万英亩的荒地。阿本斯答应以政府债券向该公司提供补偿，土地价值大约200万美元。但联合果品公司提出要求赔偿1500多万美元，美国国务院支持这个要求。该公司雇用了一批院外游说者，利用美国的反共情绪，在美国展开了一场广泛的宣传活动，宣称共产主义正在通过阿本斯，在中美洲建立一个滩头阵地。

1953年的某个时候，艾森豪威尔批准了中央情报局旨在推翻阿本斯政府的“普布瑟克塞斯行动”计划。中央情报局使用设在佛罗里达的一个指挥基地和500至700万美元的经费，开始从危地马拉流亡者中招募雇佣兵。1954年初，美国迫使美洲国家组织以17票对1票宣布，任何美洲国家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控制，将构成对西半球的威胁。

阿本斯意识到美国要推翻他，在无法从西方国家获得武器的情况下，他只好求助于共产党国家。1954年5月15日，一艘装有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军火的瑞典商船进入危地马拉，艾森豪威尔下令实施“普布瑟克塞斯行动”计划。

美国向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空运50吨武器，资助中央情报局选定的前危地马拉军官卡洛斯·卡斯蒂洛·阿马斯(Carlos Castillo Armas)上校，同时命令美国海军封锁危地马拉，中央情报局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参加了对危地马拉的空袭。6月18日，卡斯蒂洛·阿马斯的一支150人的小部队从洪都拉斯发动进攻。最后阿本斯被迫辞职，流亡东欧。卡斯蒂洛·阿马斯立即归还了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把批评他的人投入监狱。1957年卡斯特洛·阿马斯遇刺身亡，但新政权仍然是美国的忠实盟友。

危地马拉事件表明，美国决策者相信，美国赢得了一场对共产主义的胜利，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一场冷战的胜利。他们声称，最重要的问题是明确拉丁美洲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特别需要采取及时的行动，阻止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以外的地方传播。

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被认为是对“门罗主义”的挑战和威胁，如何对待古巴，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拉丁美洲政策的中心内容。1953年7月26日，年轻的律师、民族主义者卡斯特罗试图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失

败后，卡斯特罗被监禁，后来获释，逃到墨西哥。1956年他回到古巴，几乎被捕，然后逃往山区。在那里，他用了3年的时间扩大他的游击队力量。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终于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建立了革命临时政府。

从卡斯特罗发动反巴蒂斯塔政权的武装起义的时候起，艾森豪威尔政府就对他采取敌视的态度。1959年4月卡斯特罗访问美国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拒绝同他会面。1959年6月，古巴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废除大庄园制度，征收本国和美国大庄园主的土地，把制糖业、银行业收归国有。1960年2月，苏联副总理米高扬访问古巴，古巴同苏联签订了贸易以及援助协定，苏联在此后5年里每年购买古巴糖100万吨，并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贷款，以购买苏联的设备。对此赫鲁晓夫宣称，门罗主义已经寿终正寝。他还在私下里说，卡斯特罗不得不倒向我们，就像一块铁被磁铁吸引一样。米高扬访问古巴的结果之一，是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加快做出了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决定。1960年2月，艾森豪威尔指示中央情报局为此制定一个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希望通过经济制裁，迫使卡斯特罗重新考虑同苏联的关系。7月，美国削减70万吨古巴本年度进口糖。卡斯特罗政府的反应是投收美国人的糖厂。9月17日，古巴政府将美国银行在古巴的分行和办事处收归国有，美国政府则在10月19日宣布，对古巴进行海上封锁。10月25日，古巴政府宣布征用美国在古巴的全部企业。1961年1月，美国与古巴断交。

艾森豪威尔在其任内的最后几个月内，依然积极准备推翻卡斯特罗的颠覆计划。1960年11月，中央情报局决定，进攻古巴的流亡武装人员扩大到600至750人，配备重火力武器，进攻前先从尼加拉瓜基地向古巴军事目标进行袭击，然后在古巴登陆。这一计划成为肯尼迪政府1961年4月发动猪湾行动的核心内容。

1960年12月6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同当选总统肯尼迪讨论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古巴是“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目标的重大危险”。当美国决策者发现，美国甚至不能在距离自己海岸90英里的地方“赢得革命”时，武装进攻、经济制裁以及隐蔽行动等，就成为美国对付共产主义对拉丁美洲的“威胁”的主要手段。正如国家安全委员的一份备忘录所指出的，如果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同苏联集团结成紧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实质严重损害了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那么美国就准备减少同那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并采取被认为适当的其他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一时期的中东问题

要比其他国际问题和国内预算问题重要得多。杜勒斯在 1953 年的中东之行后发现，中东人反对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势力以及反对以色列的情绪，都非常强烈。他担心与英、法、以色列走得太近会使美国失去阿拉伯世界，他建议美国必须作出努力，重新获得阿拉伯国家的信任。

1954 年 7 月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5428 号文件，突出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的基本构想，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台做好了政策设计上的准备。该文件认为，为了防止苏联影响在阿拉伯世界的扩大而造成的西方利益受损，美国应在中东承担更大的责任。为此公司文件强调，美国要努力建设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在内的“北排”，同时将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引导到有序的渠道，不要同西方为敌；美国应加强沙特阿拉伯的特殊地位，可能的话加强对埃及的援助，阿以争端交由联合国解决。

由于中东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苏联势力向这一地区的渗透，如何控制和遏制中东民族主义的发展和苏联势力的扩展，就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外交解决并没有给中东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继续向中东地区的西部和东北部迅速扩展。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对法国统治的暴动，埃及和叙利亚组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尽管对纳赛尔的野心存有疑问，美国还是迅速承认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是此后不久，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叙利亚打着民族主义的幌子，越过边界向黎巴嫩派遣军事人员。长期以来，美国在这个基督徒和穆斯林各占一半的国家，有着传统的利益，而这一利益由于石油政治而大大提升。

为了对付苏联在中东所形成的威胁，美国运用了多种手段。1953 年，美国公司生产石油的 70% 大约来自中东地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控制着沙特阿拉伯的油田，并作为加利福尼亚的美孚公司、德士古公司以及泽西美孚公司的子公司运营。美国的石油公司在中东地区拥有巨大的利益：吉特公司在位于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之间的油田拥有开采权，泽西美孚公司在伊拉克、德士古和加利福尼亚美孚公司在巴林、海湾石油公司在科威特都拥有开采权。1953 年以后，美国开始在伊拉克的石油工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央情报局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东的政策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埃及，中央情报局特工以一家经营咨询公司代表的身份，从事间谍活动；还有其他特工如弗兰克·科恩斯 (Frank Keams) 等，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记者的身份，从事间谍活动。1952年，中央情报局曾经试图说服法鲁克(Farouk I)国王进行改革，以便对付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在纳赛尔(Gamal Abd. I Nas. er)取得推翻法鲁克国王统治的胜利后，中央情报局帮助新政府建立了广播电台——“阿拉伯之声”，也被称之为“开罗电台”。这个电台后来被纳赛尔用来进行反美宣传。

在开罗，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散发反穆斯林的书籍。在黎巴嫩，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以石油公司雇员作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在叙利亚，中央情报局特工与政府反对派一起，策划推翻了亲纳赛尔政府。在伊朗，他们训练伊朗的秘密警察并提供装备。中央情报局还为约旦航空公司和伊朗航空公司提供资助，为约旦国王侯赛因提供资助。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还利用经济和军事援助等，实现其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在经济援助方面，美国对中东国家的援助主要在学校建设、水利灌溉工程、推广农业技术以及安置巴勒斯坦难民等方面。

从1952—1956年，以色列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为2.566亿美元，埃及为6220万美元，约旦为2520万美元，黎巴嫩和伊拉克也分别得到了几百万美元。最大的援助引划是在伊朗，在这一时期，伊朗总共获得美国经济援助高达2712亿美元。

美国银行还参与对中东国家的贷款。1949—1955年，仅美国“进出口银行”就向以色列贷款1.35亿美元，向埃及贷款730万美元，向其他阿拉伯国家贷款4730万美元。

美国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团在这一时期也源源不断流向伊朗、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1950—1955年，美国向埃及提供军火的金额达到130万美元，叙利亚为418万美元，沙特阿拉伯为2050万美元，黎巴嫩为16.9万美元，约旦为3740美元，伊拉克为15.7万美元，以色列为780万美元，合计为3040万美元。

美国最大的军事行动是策划在中东地区建立军事联盟。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就试图建立一个“中东防御组织”，但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许多阿拉伯国家对签订由西方倡议的军事条约极其谨慎。杜勒斯决心打破这个僵局，力图在美国的防御体系中，填补中东地区这个真空。

1953年5月，杜勒斯前往中东地区游说，向中东领导人说明，建立这种防御体系的目的是为了抵抗苏联的威胁。对此纳赛尔回答说：“苏联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和苏联从来都没有麻烦。他们永远也不会进攻我们，他们永远也不会占领我们的领土，他们永远也不会在这里建立基地，但是，英国人已经在这里七十年了。”

杜勒斯毫无疑问是讨厌纳赛尔的，他私下里谴责纳赛尔是一个“有些像希特勒的、具有扩张性的独裁者”，并将从苏联那里获取帮助。杜勒斯从纳赛尔的态度中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是如果英国不撤离那个充满民族主义仇恨的国家，他的以同埃及结盟作为中东地区安全体系的“基石”的计划，就不可能成功。只有英国撤出埃及，埃及人才会将苏联视为敌人。

其次是构筑地区联盟应该从有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组成的“北排”国家开始，而不是从埃及开始。杜勒斯认为，以后可以用经济和军事援助对埃及加以利诱，包括向阿斯旺水坝提供贷款。同时在美国的帮助下，可以使英国人顺利地撤出埃及。

美国中东政策的第一次成功是在 1954 年 4 月。当时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而美国和伊拉克也签订了一项美国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当巴基斯坦在 1954 年年底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后，土耳其在这一年年底也加入北约，从而使得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为一体。

1955 年 2 月，伊拉克和土耳其组成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因此就将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东地区等，连接成为一条反对苏联的军事链条。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一直向埃及施加压力。纳赛尔抱怨说，“这种反复要求缔结条约的要求只能是过去的怀疑一直存在”，那就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怀疑。他警告说，共产主义力量将会利用这样的怀疑。

1955 年 3 月，纳赛尔通过同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签订条约来对付《巴格达条约》。1955 年 4 月 5 日、9 月 23 日和 10 月 25 日，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分别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这样一个条约体系并不是美国所期望或者欢迎的，尽管它基本上符合杜勒斯的“北排”国家的构想。鉴于英国在这一条约的形成和管理的过程中非常积极，杜勒斯因此担心，英国在中东地区的继续存在，将可能进一步强化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使美国将埃及拉入区域安全体系的努力失败。

对是否加入这一条约，杜勒斯持观望态度，因为美国一旦成为这一条约的成员国，便需要参议院 2 / 3 的赞成票，而那里的犹太人院外集团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伊拉克和埃及当时处于敌对状态，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反对伊拉克加入，但是英国则曜持让伊拉克参加。纳赛尔为此谴责巴格达条约不仅是具有威胁性的西方的工具，而且还是企图分裂阿拉伯人和孤立埃及。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越来越失去耐心，但是在 1955 年年初的时候，埃及还是做出妥协加入条约，并同以色列实现和平。

与此同时，美国和埃及的军事援助谈判毫无进展。纳赛尔反复表示，如果美国不能提供援助，他将寻求苏联的帮助。美国决策者认为他在虚张声势，但事实恰恰相反。巴格达条约的缔结、以色列对加沙的进攻以及美国提供援助的迟缓等，都使得纳赛尔开始寻求苏联的援助。1955年9月，埃及同捷克达成一项军火交易。另外，埃及还同苏联达成协议，用埃及的棉花换取苏联的喷气式战斗机和双引擎轰炸机。美国得知后迅速通知埃及：如果它取消同苏联的协议，美国将立即提供武器装备，这一建议遭到了纳赛尔的拒绝。

纳赛尔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杜勒斯愤怒地声称，如果美国愿意，就可以捏死他。美国对待巴格达条约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先后参加这个条约的政治、军事、经济 and “反颠覆”委员会，向它提供经济、军事和技术援助。但是，面对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要求美国全面加入巴格达条约的请求，美国并没有答应。但美国此时显然需要一个全面的对中东的政策，其结果便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

经过决策者内部的辩论和反复权衡后，1957年1月1日，艾森豪威尔约见国会两党领袖，正式向他们谈了有关中东问题的政策设想。他声称，中东地区持续冲突的真正意义是苏联的干涉，目前英国已经无法抵挡住苏联，现在的真空必须由美国抢在苏联之前填补，而且“时不我待”。艾森豪威尔希望获得国会授权，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自行动用资金，甚至可以使用军队，因为现代战争可能只有几个小时。他请求将他要提出的咨文，作为国会会议的第一件大事来对待。

1957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了有关中东问题的特别咨文，敦请国会批准一项针对中东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防共侵略的三合一政策。艾森豪威尔首先强调苏联对中东地区的威胁，他声称苏联对中东感兴趣的惟一原因在于推行强权政治。其次，艾森豪威尔强调了美国对中东地区所肩负的重大责任，美国要更清楚地表明，愿意支持该地区一些爱好自由的国家的独立。艾森豪威尔同时要求中东国家，应加强自卫和防御颠覆的能力，“具有抵御直接侵略的适当的安全保卫措施”。

艾森豪威尔呼吁国会采取行动，授权总统实施1954年安全法所赋予的权力，批准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支持援助中东那些发展经济和维护独立的国家和集团，允许派美国军队去要求援助的国家，用武力抵御任何一个有苏联控制的国家所从事的“公开的武装侵略”。

这个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中东政策，在众议院得以迅速通过。在参议院的辩论中，一些民主党参议员反对在中东问题上给总统开

出一张空头支票，另外一些参议员还认为，这一政策具有针对以色列的意图，因而损害西方的利益。最后，参议院以 72 票对 19 票，通过了艾森豪威尔的中东政策。3 月 9 日，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做出决议，授权总统对那些需要援助以维持独立的国家和集团，给与经济援助，并同它们进行合作。同时决议授权总统，对那些需要援助的国家和集团，提供军事援助。决议明确指出：“如果总统确定有这种必要，美国准备以武装部队援助任何一个谋求军事援助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反对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下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侵略。”国会给予总统巨大的权力，却从米没有要求他为什么是“国际共产主义”，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

艾森豪威尔主义在国际上产生了复杂的反响。埃及和叙利亚表示公开反对，黎巴嫩的夏蒙 (Camille Chamoun) 政府欢迎艾森豪威尔主义，准备接受。巴格达条约的四个穆斯林成员国对艾森豪威尔主义表示满意，并表示全力支持他所提出的各种措施。随后爆发的约旦 4 月危机、叙利亚危机和黎巴嫩危机等，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推行提供了机会和场所。

1957 年 4 月，约旦国王侯赛因 (Hussein ibn Talal) 将“亲苏”、“亲纳赛尔”的首相解职，国内发生了总罢工，继而引发了动乱。在这种情况下，侯赛因 4 月 24 日密电美国国务院，信中说他准备实施戒严法，指责埃及对动乱负有责任，并谴责叙利亚的入侵行动，他想知道美国是否会帮助他。

杜勒斯立即给予肯定的答复，他打电报给侯赛因说，只要国王需要，美国就会提供帮助。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指出：“约旦的独立和完整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4 月 24 日，美国将载有 90 架飞机、1000 多名士兵的第六舰队，调到地中海东岸。

美国的军事威慑使侯赛因信心大增，4 月 26 日，国王宣布实行戒严，政党活动为非法，下令逮捕反对派人士，从而平定了动乱。5 月 1 日，美国第六舰队撤回到地中海西部海域。4 月危机后，美国加大对约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4 月 29 日，美国宣布给约旦 1000 万美元的经济援助，6 月美国又给约旦 2000 万美元的财政支持。

在约旦 4 月危机中，美国利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威慑力，取得了对约旦政策的胜利，艾森豪威尔主义也经受住了所谓“第一次考验”。对此杜勒斯认为，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一个抽象的可以变换的意识形态工具，通过美国使用警察权力控制整个中东形势的变化及其方向。它实施的前提是，所有的苏联人、所有当地的共产党人、所有的纳赛尔主义者的影响等，都是非法的。叙利亚是中东少数几个允许共产党存在的国家。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叙利亚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十分活跃，叙利亚复兴党人的影响非常广泛。他们要求由叙利亚领导，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反对外来干涉。叙利亚是第一个公开谴责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国家，在约旦 4 月危机期间，叙利亚谴责美国支持侯赛因。另一方面，叙利亚同苏联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进展，1957 年 8 月，叙利亚同苏联签订了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协定。与此同时，叙利亚和美国的的关系日益紧张。1957 年 8 月 13 日，叙利亚以颠覆活动罪将美国驻叙利亚使馆的三名官员驱逐出境，被美国怀疑为同情苏联的阿菲法尔-比兹里被任命为叙利亚军队总司令。

面对上述形势，艾森豪威尔认为共产主义接管叙利亚已经迫在眉睫。杜勒斯也表示，美国正在考虑使用所谓“公正的、较为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9 月 7 日，艾森豪威尔宣称，如果哪个叙利亚的邻国受到苏联集团的打击，美国将接受他们的请求，提供帮助。美国开始采取外交和军事手段应对叙利亚危机。

艾森豪威尔致函土耳其领导人，要他们转告正在伊斯坦布尔的约旦和伊拉克领导人，美国保证当他们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对付叙利亚时，将立即提供武器，并尽快补充他们遭受的损失。美国还保证不让苏联和以色列干预它们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在 9 月初开始向约旦运送大量武器，第六舰队再次前往地中海东部，土耳其在叙利亚边境上的驻军达到了 5 万人。10 月 8 日，赫鲁晓夫公开表示：如果叙利亚遭到入侵，苏联将出面干涉。10 月 14 日，埃及军队增援叙利亚。10 月 16 日，叙利亚向联合国控告土耳其对其进行威胁。对此杜勒斯回应说：如果发生一次苏联对土耳其的进攻，美国就不会采取防御行动了。

面对危机，虽然土耳其立场坚定，但中东其他一些国家反对采取军事行动和美国的介入。对伊拉克而言，战争意味着经过叙利亚的输油管将被切断，伊拉克每年 2 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将成泡影。约旦国王从来不希望卷入战争，所以不想参与任何反对叙利亚的行动，他借口到意大利度假去了。沙特阿拉伯认为美国反对叙利亚复兴党是很愚蠢的，沙特阿拉伯国王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争端。美国经过考虑后决定限制土耳其的行动，虽然土耳其政府不满美国出尔反尔的政策，但在得到美国许诺的军事援助后，放弃了出兵叙利亚的计划。11 月 1 日，叙利亚从联合国撤回了控告，叙利亚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了。

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真正考验是 1958 年的黎巴嫩危机。黎巴嫩是中东地区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黎巴嫩早期是法国的殖民地，受西方的影

响较大，基督教徒占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但同时国内还存在着势力较多的穆斯林教徒。这些穆斯林同情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的思想，主张摆脱西方影响。第二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难民流入黎巴嫩，穆斯林的势力随之有所增强。1952年开始，属天主教马龙派的卡米勒·夏蒙(CamiHe Ch. m0。)一直担任总统，他奉行相当亲西方的政策。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黎巴嫩是中东少有的未与英法断交的国家，黎巴嫩第一个表示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夏蒙的任期到1958年6月结束，他想在此之前修改宪法，争取连任，但遭到穆斯林派的强烈反对。5月8日，黎巴嫩一份同情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报纸《先驱报》的主编被暗杀，由此引发了黎巴嫩反政府力量的罢工、罢市，并逐步发展到内战。由于军队领导人无法确定，一半由穆斯林组成的军队是否忠诚，因此在冲突中保持中立。夏蒙孤立无援，请求美国出兵干涉。艾森豪威尔早前向夏蒙保证，一旦需要，美国将向他提供军事援助，五角大楼也制定了全面的应急计划。但是美国情报机构估计，利用美国已经交付的武器，夏蒙可以有效的应对叙利亚的威胁。艾森豪威尔本人也认为，一旦美军在黎巴嫩登陆，将会招致许多黎巴嫩人的愤恨，会被视为外国的干涉，也会给共产主义攻击美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提供口实。

基于上述考虑，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黎巴嫩政府应该将叙利亚武装渗透的事件提交联合国。美国国务院迅速通知夏蒙：即使联合国承担黎巴嫩的安全保证，美国早先保证向黎巴嫩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依然有效。此时黎巴嫩和美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那就是英国人正在计划援救黎巴嫩，以便恢复英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

5月22日，夏蒙向联太控诉埃及、叙利亚煽动黎巴嫩国内暴乱和武装叛乱。联合国派观察团到黎巴嫩考察，发现那里根本就是国内的权力斗争，既没有发现叙利亚的渗透，也没有什么叙利亚的武器渗入。对此杜勒斯表示，美国反对纳赛尔和共产主义的承诺不变，在中东的亲西方政权是美国的固定资产，而不是包袱；美国不相信联合国观察团的报告，认为根据美国得到的情报，这段时间在叙黎边界的渗透已经减少，联合国和哈马舍尔德(DagHammar skj61d)的活动已经产生了效果。杜勒斯希望夏蒙不要连任，希望黎巴嫩人自己解决危机。

6月底，黎巴嫩的国内局势更加不利于夏蒙政权，反对派已经占领黎巴嫩多数地区，军队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不愿进行反击。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一直强调支持夏蒙政权，虽然希望和平解决，但没有放弃军事干涉黎巴嫩的打算，并为军事干涉做准备。7月初，美国开始搜集情报，

要求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提供黎巴嫩地形图，各地区的政治势力、经济情况、村庄、桥梁、公路分布等等，都在调查之中。

7月14日的伊拉克政变为美国的干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7月14日，伊拉克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亲西方的伊拉克哈希姆王朝，宣布实行共和。这一事件对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等亲西方的中东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场政治地震，特别是在当时最脆弱的黎巴嫩政权和约旦政权，引起的震动尤为强烈。夏蒙在得知伊拉克政变的消息几小时后，正式邀请美国在48小时内进行军事干涉，约旦随后也向英美提出军事干涉的请求。艾森豪威尔立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杜勒斯在会上指出，如果夏蒙政府被推翻，将会对邻国产生严重的危害。杜勒斯的弟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认为，联合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根本不会起任何作用。会议一致认为，被他们称为是阿拉伯扩张主义的人的最终目标，是控制伊拉克和摧毁巴格达条约组织，因此美国必须采取军事行动。随后，由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艾伦·杜勒斯以及国会议员参加的听证会清楚地表明，美国出兵黎巴嫩的目的，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的，即苏联在幕后支持纳赛尔，美国必须在中东地区遏制苏联扩张。众议员富布赖特(wiuim Fulb69ht)说，他们并不清楚黎巴嫩危机是苏联或者是共产主义者干的，也许是纳赛尔单独玩的游戏。艾森豪威尔说，这里确实没有足够的情报来证明这一点，但毫无疑问的是，不论纳赛尔想做什么，苏联在此都有巨大的利益。富布赖特继续问道，假如纳赛尔是独立的，不受苏联支配呢？艾森豪威尔说，由于纳赛尔和苏联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纳赛尔的胜利就是苏联的胜利。对此艾森豪威尔强调说，纳赛尔是一个小人物，只有很小的权力，纳赛尔是一个傀儡，即是他自己不这样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同。

1958年7月15日下午3时，艾森豪威尔下令美国第六舰队在黎巴嫩登陆，到8月8日共出兵14357人，同时将一个团的兵力从冲绳调往波斯湾，以防止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可能的进攻。7月17日，2200名英国伞兵进入约旦首都安曼。艾森豪威尔在7月15日的电视讲话中宣称，美国这次出兵的目的是保护美国侨民，保护黎巴嫩的政治完整免受外部间接侵略的威胁。这一行动是1947年希腊受到威胁时美国所采取政策的继续，现在由他的政府扩展到伊朗、危地马拉和台湾。他还声称，美国的行动符合联合国宪章集体自卫条款。一旦联合国承担起责任，美国将立即撤出。尽管艾森豪威尔并没有使用“艾森豪威尔主义”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出现在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表示同意的电文中。

美国出兵后，随着谢哈布将军代替夏蒙，黎巴嫩国内局势开始平静下来。谢哈布政权表示不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采取中立政策，准备修复同埃及的关系，并要求美国撤军。8月23日，美国开始撤军，10月25日美国撤军完毕。11月2日，英军从约旦撤出。

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实质和美国政策的目的，杜勒斯在黎巴嫩危机期间明确指出，阿拉伯民族主义是泛滥的洪水，美国不可能成功地反对它，但可以用沙袋围堵住它，这样首先可以保护黎巴嫩和以色列，其次可以保护波斯湾的石油。

美国开始担心在伊朗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伊朗争取石油国有化运动掀起了中东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高潮。1951年4月，伊朗民族主义领导人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被选为首相，宣布把控制伊朗经济命脉的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摩萨台可能会使伊朗倒向苏联，最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决定采取行动推翻摩萨台。1953年8月，在英国的帮助下，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场军事政变，伊朗国王宣布解散摩萨台政府，国王重新掌握政权。作为回报，美国公司获得了伊朗石油生产份额的40%。艾森豪威尔预见到美国在军事上援助南越政权的后果。他在1954年2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说过，他简直不能想像，还有什么悲剧比目前在这些地区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深深卷入一场全力以赴的、特别是要投入大量兵力的战争，对美国来说是更为可悲的了。随后爆发了奠边府战役。越盟军队获得重大的胜利。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在如何做出反应上，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国务卿杜勒斯、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及军方一些领导人，主张派美国部队和轰炸机。陆军参谋长李奇微(Mathew B Ridgway)反对大规模的干预，国会也不予支持。

3月20日，法国参谋长保罗-埃利(Paolo Eleih)将军飞抵华盛顿，要求美国进行干预。结果在华盛顿和西方盟国之间引起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辩论。艾森豪威尔在4月4日写信给丘吉尔，认为越南的威胁可以同“裕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威胁相比，他要求美国和英国采取联合行动，防止一场灾祸。

3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多米诺骨牌”理论，用以解释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和局势的危急。艾森豪威尔说：这场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这个地区有锡、钨和橡胶。而且如果法国失败了，就会看到所谓的“骨牌倒下去”的原理。艾森豪威尔特别担心，这种局势对日本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因为日本是美国在远东地

区遏制苏联和中国的关键。

在1954年4月20日至24日奠边府战役的高潮时期，杜勒斯飞到伦敦，要求英国采取行动，但丘吉尔始终没有同意。奠边府的法国军队在5月7日投降，华盛顿此时倾向于不进行军事干预。4月26日，法国、苏联、英国、美国、中国以及保大的越南、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的代表在日内瓦开会。7月20日和21日，与会各方签署了日内瓦协议和日内瓦停战协议，一致同意，胡志明的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实行停战，17度线为临时分界线，法国将从分界线以北撤军，北越和南越既不参加军事联盟，也不允许外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在由印度、加拿大和波兰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的监督下，在两年之内举行全国选举，统一越南；允许亲共的巴特寮部队在老挝重新集结，并将在老挝和柬埔寨举行大选。

美国代表团不是停战谈判的一方，它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日内瓦会议的解决方案是一个“灾难”，意味着“共产主义前进一大步，可能会导致东南亚的丢失”。1954年9月8日，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在马尼拉签署了一个条约，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以防止所谓的共产党对柬埔寨和老挝的侵略，以及越盟对南越的侵略。条约还规定，任何一个缔约国或任何一个议定书中所包括的国家受到颠覆或间接侵略的威胁，各缔约国必须立即进行磋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得到被威胁国家政府的同意，就可以进行干预。更为重要的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指名要保护越南的南半部，这就破坏了日内瓦协议的精神。美国在南越支持吴庭艳政府，一个扩大的美国顾问团违背日内瓦协议，开始训练南越军队，美国向吴庭艳政府提供大量的军队和经济援助。到1955年7月，大部分法国人都已经撤出了越南。吴庭艳宣布，日内瓦协议中所商定的选举不举行了。杜勒斯对此完全支持，其理由是吴庭艳并没有在规定选举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随后吴庭艳在南方举行了他自己的公民投票。从1955年至1961年，美国每年向吴庭艳政府提供3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军事援助每年大约为8500万美元。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

第三节 从肯尼迪到卡特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1960年6月14日，肯尼迪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提出外交政策方针的12点议程，其中第四到第七点是针对第三世界的，特别强调支持帮助那里的人民而不是帮助政权的计划，鼓励非洲新兴独立国家，说服他们

不是非得寻求莫斯科的指导和友谊不可，帮助他们实现人民的福祉，要派技术专家、教育工作者、农业专家去非洲，让更多的非洲学生和未来的非洲领导人到美国大学接受教育，按照美国的意愿，随同这些援助把自由和繁荣带到非洲去。肯尼迪保证，要使冷战从僵持状态和潜在的共产主义的胜利，转向美国的胜利。他认为，第三世界是最容易发生革命和最容易受共产主义的诱惑，同时也是最容易接受美国影响的地区。肯尼迪的指导原则是“国家建设”，他呼吁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人民，开始关注美国总统在做些什么，而不是去看“赫鲁晓夫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做些什么”。

肯尼迪认识到，新兴独立国家的不结盟政策是可以理解的。新兴独立国家由于全神贯注于辛勤建设自己的国家，自然会对冷战中的“道德”问题漠不关心，正像美国人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中，对拿破仑战争的“道德”问题漠不关心一样。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就是要让每个国家都知道，美国将“不惜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任，应付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肯尼迪声称，所谓保卫和扩展自由的伟大战场现在是在地球的南半部，即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

肯尼迪就任总统后，继承了把对外援助作为冷战一部分的传统做法，但是同其前任相比，更加注重经济援助。1961年3月，肯尼迪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个援外咨文中宣称，美国60年代援外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做出一个历史性的证明，即如同19世纪一样，南半球和北半球在20世纪的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肯尼迪强调，为迎接这一挑战，这项工作必须以新的原则为基础，必须有统一的管理和行动。这就要有一个单一的援助机构，不仅把国际合作总署和开发贷款基金包括在内，而且要扩大“粮食用以和平”计划和建立“和平队”，等等。

“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开始于1954年，肯尼迪政府特别重视这一计划，并在白宫专门设立“粮食用于和平办公室”。在肯尼迪任内，“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的援助每年平均在15亿美元左右。对美国来说，这些援助在政治上改善了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关系，有利于美国在这些地区同苏联的争夺。

1961年3月，肯尼迪发布行政命令，成寺和平队并向国会递交一份要求就此立法的咨文。1961年9月22日，和平队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第一批500名和平队员在1961年春天出发，到1963年春达到5000人，1964年为1万人，分布在46个国家，从事教育、卫生、水利和农业等工作。美国政府为和平队的拨款也从每个财政年度的3000万美元，增加

到 9600 万美元。尽管和平队是一个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谋取利益的工具，但毕竟还是缓和了第三世界一些由于贫穷和苦难造成的尖锐矛盾。

肯尼迪政府特别重视拉丁美洲在美国第三世界政策中的样板作用。1961 年 3 月 13 日，肯尼迪向拉丁美洲各国驻美大使提议成立“争取进步联盟”。在以后的 10 年之中，1000 亿美元用以这一计划的发展，其中美国提供了 200 亿美元，拉丁美洲各国提供 800 亿美元。肯尼迪要求拉美受援国进行土改、税收和其他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从而可以使得贫穷的人和中产阶级从中获益。美国和拉美国家的这种共同努力可望使得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 5.5%，即经济增长率比人口增长率高出 2.5%。

在此后的两年内，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遇到了很火的困难。由于华盛顿官僚体制内部的争斗，由于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这些主要的拉美国家都表示，不愿把自己的发展计划送交美国审查，特别是由于许多国家政府的无能或不愿进行已经许诺的一些改革，这些计划被削减了。在有些国家还不能建立必要的政治稳定，肯尼迪政府要么干涉主权国家的事务，要么眼看“争取进步联盟”日益受到削弱，因而不能进行有效的反应。

“争取进步联盟”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拉丁美洲，以免西半球接二连三地爆发卡斯特罗式的革命。为了阻止类似事件的发生，1961 年 4 月 17 日，美国支持古巴流亡分子在古巴的猪湾登陆，结果遭到失败。猪湾事件等于是美国承认，它不了解或不能对付西半球 50 年来所发生的重大的政治变化。但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同时清楚地表明，美国依然不能容忍外来势力进入自己的后院。

约翰逊继承了肯尼迪的拉丁美洲政策。但是，那里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怒火随时可能爆发，军事政变频频发生，卡斯特罗也生存下来了，这些都促使约翰逊的政策带有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的味道。约翰逊对“争取进步联盟”越来越不重视，由新任助理国务卿托马斯·曼 (Tomas Mann) 负责掌握政策。曼优先考虑的是稳定拉丁美洲的政局，保护美国私人资本在这一地区的投资，积极进行反共斗争。

约翰逊政府表示愿意承认拉丁美洲的一些军人政府，特别是如果这些政府取代了那些扬言要破坏经济稳定的自由改革派政府。约翰逊政府的做法否定了肯尼迪那个民主会随经济增长而发展的越来越渺茫的希望。1964 年，约翰逊承认了在巴西第一次发生的这种军事政变。当巴拿马以暴力反对美国控制运河区时，约翰逊强硬地说，美国不会允许对美

国国旗的侮辱。1965年4月，多米尼加的起义者发动了反对军人政权的内战，约翰逊政府很快判定起义是共产党指使的，或是“卡斯特罗式的”，美国派出2万名士兵，出兵这个加勒比岛国。

约翰逊利用这个机会，在1965年5月2日宣布了所谓的“约翰逊主义”。他宣称，美洲国家一定不能允许、而且也决不会允许，在西半球建立另外一个共产党政府。约翰逊主义的重要性同杜鲁门主义和艾森豪威尔主义一样，取决于美国如何从广义上解释“共产主义”，以及如何顺利地让美国军队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这样，美国一方面在全球驻扎军队，防止其他国家建立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却试图保持它自己在拉丁美洲的传统势力范围。肯尼迪入主白宫后，美国已经更深地卷入了对越南的干涉。肯尼迪认为，保持南越的独立，不让其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成为美国至关重要的外交利益。同时美国决策层也相信，对越南的干涉是考验美国对由苏联和中国支持的“民族解放战争”做出反应的能力。到1963年秋天的时候，美国每天花在维持南越政权上的费用达到150万美元，驻南越的美军也达到2万人。1963年11月约翰逊当选总统后，他保证继续执行前任有关保证南越独立的承诺。

在约翰逊任内，美国在越南的承诺越来越多，越南战争已经完全“美国化”。到1969年，美国在南越的军队多达5.43万人。到1973年1月，美国总共阵亡4.8万人，战场以外死亡1.1万人，负伤155万人。在约翰逊离任之前，美国每个星期花在越南战争上的开支达到5亿美元，平均每年达到240亿美元。这些还不包括退役士兵的抚恤金、国债的利息以及其他长期的债务。

越南只是约翰逊政府所要对付的第三世界的一系列革命之一。自从1960年以来，非洲一直是动乱最剧烈的地区，因为拒绝制裁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和罗得西亚，美国在非洲的地位是不稳定的。美国虽然公开表示不赞成种族隔离政策，但它不肯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美国在南非有着大量的投资，并占据着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军港，它也不愿意反对那些仍然控制着一些非洲殖民地的盟国。同时，美国还担心采取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行动，将会为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国内种族情况提出批评开创先例。

但是，美国在约翰逊任内对刚果的干涉，表明了冷战对美国非洲政策的影响。刚果在1960年6月30日独立，刚果加丹加省在莫瓦斯·冲伯(Moise Tshombe)领导下，并在欧美铜钴公司的支持下，企图把加丹加省从刚果中独立出来。在随后两年的斗争中，最受人民拥护的刚果民族

主义领袖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被加丹加当局杀害。

1963年，联合围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协助刚果政府逮捕冲伯。这时美国在刚果已经取代了比利时，成为影响刚果局势发展的最大因素。美国一直支持刚果政府同抵抗武装进行斗争。1964年由约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utu)将军领导的军人政权上台，尽管这个政权阿益腐败，但它却更加亲西方，美国的影响在刚果持续增长。约翰逊曾想增加对蒙博托以及其他非洲领导人的援助，但越南战争使得美国力不从心。

肯尼迪和约翰逊仍然不能维持中东的和平。肯尼迪希望在处理埃及和以色列的争端中采取“公正的”方法，他并不想放弃帮助以色列保持军事优势，也不愿意失去国内犹太选民的投票。不过肯尼迪的确希望同纳赛尔合作，使之不要去寻求苏联的帮助。但肯尼迪的计划在1962年到1963年的时候却落空了。当时也门王国爆发革命，国内政局混乱，纳赛尔派兵7.5万名支持反叛者，沙特阿拉伯迅速介入阻止纳赛尔的行动。

美国起初向纳赛尔施加压力，希望他放弃干涉约旦事务，但后来决定不反对埃及的行动。沙特阿拉伯立即对美国的石油公司加以排斥，以色列和英国也抗议美国仪仗是在言辞上抨击埃及，而不采取实际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改变了政策，宣布纳赛尔是不可信的，并派空军保卫沙特。肯尼迪还向以色列保证，如果需要，美国将以第六舰队保卫以色列，同时向以色列出售包括地对空导弹在内的大量军火。肯尼迪完全采取了亲以色列、亲沙特、反埃及的政策。

约翰逊进一步发展了同以色列的关系。1967年4月，埃及切断了通往以色列的关键的海上通道，让联合国撤出驻扎在西奈半岛上的维和部队，并派10万名埃及部队进驻埃以边界。约翰逊告诉以色列：如果它们进攻埃及，他不会制止它们的行动，就像艾森豪威尔在苏伊士运河战争时期所做的一样。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军队突然发起进攻。在6天战争中，以色列摧毁了埃及大部分的陆军和空军力量，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埃及的盟国约旦和叙利亚，占领了约旦河西岸、西奈半岛、加沙地带和耶路撒冷城等，总计6.5万平方公里阿拉伯领土，使得50万阿拉伯人沦为难民。由于约翰逊政府在6天战争中支持和偏袒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普遍高涨，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伊拉克、苏丹、也门等国先后宣布同美国断交。1967年11月，联合国通过要求以色列从阿拉伯领土上撤退的242号决议，也没有缓和美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第三世界国家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因

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国家容易受到破坏性的激进主义的蛊惑，因此也就容易受到苏联的影响。基辛格相信，发展中国的国内政治是同“国际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每当第三世界发生动荡，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它们解释为大国政治比赛的一步棋。

早在1966年，基辛格就已经公开承认，不可能在军事上取得越南战争的胜利。基辛格在他1969年上任的第一天，就呈送给尼克松两份绝密研究报告，明确指出美国不可能赢得越南战争。当时五角大楼相信，即便是在最好的条件下，美国要完全控制整个南越，将需要8至13年的时间，而所谓的“最好的条件”在这一地区是永远不会出现。在越南的美国军队最多的时候达到54.3万人，军费开始每年高达300亿美元。仅仅在1968年，美军在越南阵亡就达到1.46万人，尼克松决定从越南撤军，但要以他的条件逐步撤军。

尼克松为此实行“越南化”并推行“尼克松主义”。通过越南化，尼克松计划逐步从越南撤出美军，代之以装备精良的越南人。尼克松还打算同北越进行谈判，达成停火并使北越从南越、柬埔寨和老挝撤军。为达到上述目的，尼克松计划对北越实施大规模的轰炸，直至北越同意撤出军队。这一思想最早以“关岛主义”公诸于众，实际上成为尼克松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1969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他在强调美国在处理同“所有的亚洲朋友的关系方面”，必须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一定要遵守条约义务，例如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对泰国承担的条约义务；但是，第二，就内部安全问题而言，在军事防务方面，除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的威胁外，美国要鼓励而且有权利期待，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由亚洲国家自己来处理，而且这样做的责任也由他们来承担。”尼克松在关岛的讲话是他执政后首次发表的有关外交政策重要声明，这一声明宣布了尼克松政府的外交政策纲领。

从1970年开始，一年一度的总统致国会的外交政策报告多次较为系统地阐述这一基本原则。1970年2月，在致国会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尼克松把“尼克松主义”的中心思想解释为，美国仍将参与盟国与友邦的防卫和发展。但美国不能也不会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承担全部的防务责任。在1971年2月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尼克松进一步强调，尼克松主义反映了以下的现实，即美国的重大作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其他国家也能够而且应当为他们同时也为美国，承担更多的责任。

尼克松政府调整了军事战略，将过去准备打“两个半战争”，改为“一个半战争”。到1972年年底，尼克松撤出了大部分在越南的美军，

仅仅留下了 3000 名士兵，从南朝鲜撤出了 2 万名美军士兵，从日本撤出了 1.2 万名士兵，从泰国撤出了 1.6 万名士兵。

但是，撤军并不是尼克松政府解决越南问题的唯一方法。基辛格说，美国“不能简单地从这一涉及到了两届政府、五个盟国以及 3 万名阵亡将士的事业中一走了之，就好像是换了一个电视频道一般”。为此尼克松政府把撤军和对越南的轰炸结合在一起，从 1969 年到 1973 年，美国平均每天扔在越南土地上的炸弹多达一吨。富布赖特赞同《华盛顿邮报》的说法，即尼克松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轰炸机”。与此同时，由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凤凰计划”，通过在南越的农村杀害 2.1 万名被怀疑为北越共产党人的行动，大大削弱了北越共产党在南越的力量，但是北越依然拒绝接受一个分裂的国家。

通过谈判寻求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尼克松政府配合军事压力以实现“越南化”计划的重要手段，也是为了平息国内舆论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尼克松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和谈的努力。1970 年 2 月 21 日，基辛格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在巴黎举行秘密会谈。至 4 月 4 日，会谈进行了三次，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越南化并没有收到效果，北越通过柬埔寨和老挝的边境小道，向南越的北越部队提供军事援助。尼克松政府加大了对柬埔寨实施轰炸的规模，朗诺在 1970 年 3 月推翻了西哈努克政权，并积极同美国进行合作。尼克松抓住这个机会，在 1970 年 4 月 30 日入侵柬埔寨。这是一次极富冒险性的扩大战争的行动，甚至连支持政府政策的艾奇逊都表示怀疑地说，尼克松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一匹向着火的马厩跑同去的马。

一个创历史的抗议浪潮席卷美国，反战示威震撼了美国的大学校园。尼克松称抗议者是“游手好闲的人”，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学的学生和密西西比州立杰克逊学院的学生遭到开枪射击阻击，有些人被打死了。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们直言不讳地对此提出了批评，基辛格手下的一些人辞职表示抗议。6 月，参议院投票终止 1964 年的东京湾决议案，并通过库珀一丘奇修正案，禁止美国在 6 月 30 日以后，继续为柬埔寨提供军事援助或继续在柬埔寨进行军事活动。尼克松面临着国内困境，一种“一不做二不休的心理”开始支配白宫。1971 年年初，尼克松批准南越入侵老挝。

战争的扩大使得美国同北越的谈判陷于停顿，北越在 1972 年 3 月大规模进攻南方，尼克松发誓要打得北越“鼻子流血”。不久，美军的 B. 52 轰炸机对河内和海防周围的燃料库投掷了大量的炸弹。5 月，尼克松宣

布在海防港布雷，用海军对北越实施封锁，并进行了代号为“前锋”的更大规模的轰炸。在实施“前锋”行动的7个月内，美国飞机出动了**41653**架次，向北越的仓库设施、空军基地、发电厂、桥梁、隧道总共投下了**15.5**万吨的炸弹。在此背景下，**1972**年秋，基辛格同黎德寿在巴黎进行了紧张的谈判，由于达成的协议遭到南越阮文绍的拒绝，**11月20日**美国和北越重开谈判。由于非军事化地区的地位问题而无法达成最后的协议，基辛格突然中止了谈判。从**12月18日至20日**，美国开始了被基辛格称为“卡脖子外交”，即代号为“前锋”的轰炸北纬**20度**以北地区的行动。**12月22日**，美国告诉北越，如果北越回到谈判桌上来，轰炸就会停止。

1973年**1月27日**，基辛格与黎德寿终于签订了一项协定，美国保证在**60**天内撤出全部剩余军队；双方交换战俘；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监督停火；设立一个联合机构主持南越的选举。**1月27日**午夜，停火生效。至此，美国历史上历时**12**年的最长的一场战争终于结束了。

中东问题是对尼克松政府缓和政策的严峻考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基本目标就是遏制或消除苏联对中东的影响，确保石油流向西方。**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苏联和美国分别武装了埃及和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埃及的整个西奈半岛。有一半阿拉伯国家断绝同美国的关系，苏联在中东的影响急剧扩大，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向地中海派遣一支常驻舰队。**1968**年**12月**，美国向以色列出售了**50架F4**鬼怪式飞机。**1969**年，苏联的军事人员和飞行员进驻埃及。**1970**年春天，苏联的萨姆导弹运到埃及，以建立对付鬼怪式飞机的防御系统。美国和苏联在中东地区发生直接对抗的危险骤然增加。

到**70**年代初期，苏联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埃及的关系越来越动摇，苏联担心如果中东局势继续紧张下去的话，美国就会放弃缓和，从而不利于苏联的全球利益，因此采取了极力抑制巴解组织和埃及的政策。而尼克松和基辛格从**1970**到**1973**年奉行了“维持现状外交”。美国认为，通过不断武装以色列，苏联采取克制态度，以及在**1970**年**9月**纳赛尔去世后，较为缓和的萨达特(Mohammed Sadat)掌权等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局势已经稳定了。但**1973**年的**10月**战争完全出乎美国和以色列的意料。美国立即向以色列提供大量的军事物资，苏联则以向叙利亚提供军事装备作为反应，但同时也希望埃及接受停火。

1973年**10月22日**，美苏最后安排了中东停火。**10月25日**，联合

国通过决议，要求停火；10月28日，以色列和埃及的军事代表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会面，讨论执行停火协议的事宜，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战争的结束使尼克松度过了自他任职以来最严重的国际危机，战争削弱了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埃及开始倒向美国，美国成为主导中东外交的主要因素。

阿以冲突对美国 and 西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威胁。10月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首先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到1973年10月21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大多数阿拉伯成员国加入了禁运。他们把黑色财富当作武器，对美国实行禁运，把供应西欧和日本的原油价格提高了4倍。10%—15%的石油依靠从中东进口的美国，不得不经受严重的能源危机。加油站的汽油价格不断上升，焦急的司机为了给自己的汽车加油，排着长队，有的时候甚至要等上几个小时。禁运在1974年3月撤销，但油价依然很高。美国和西方的弱点暴露无遗。

由于美国在10月战争中促成了停火的实现，它在解决阿以冲突作为仲裁人的地位得到了加强。为了排斥苏联在中东的影响，战争结束后，美国加紧在中东的和平努力。已于1973年9月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频繁往来于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和以色列的首都，这种做法被称为“穿梭外交”。

基辛格在开罗和特拉维夫的讨价还价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终于使埃及和以色列在1975年9月1日达成了由基辛格设计的一项历史性协定。以色列同意最终部分撤出西奈半岛，建立一个联合国部队巡逻的缓冲地带，美国技术人员将驻扎在预警站，以便监视军事行动，美国同时还答应给埃及和以色列相当可观的外援。

但是在中东，棘手的问题仍然存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依然住在难民营，以色列依然盘踞在被占领土上，约旦依然要求归还西岸土地，叙利亚和以色列依然处于敌对状态。十月战争后，美国的尖端武器依然继续运往阿拉伯和以色列。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同伊朗国王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同盟关系，美国决策者把伊朗视为动乱中东的稳定的台柱。

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访问了德黑兰，答应向伊朗国王提供他想要的切非核武器，并派美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伊朗人掌握尖端武器。美国军火生产公司的人员纷纷涌向伊朗，向他们兜售潜艇、战斗机、攻击型直升机和导弹。

和中东相比，拉丁美洲似乎既平静又驯服。20世纪70年代初，拉丁美洲出口的1/3输往美国，进口的2/5来自美国。1976年，拉丁美

洲向美国供应进口石油的 **34%**，咖啡的 **68%**，糖的 **57%**，铜的 **47%**，铁矾土的 **98%**。美国在其南部邻国的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 **170 亿美元**。尽管有如此密切的经济联系，拉丁美洲各国政府还越来越多地向美国提出了挑战。

墨西哥拒绝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强烈批评美国 **1965 年**对多米尼加的干涉，并在联合国主张小国的经济独立和维护他们没收外国企业的权利。**1968 年**以后，秘鲁将埃克森石油公司的一家附属公司和其他美国资产收归国有，开始打破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加拉加斯在 **70 年代**同阿拉伯国家一起提高油价，在 **1976 年**也将美国人拥有的石油公司收归国有。

在尼克松政府看来，智利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支配地位的威胁最为严重。**1970 年 9 月**，智利选举了公然宣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智利社会党创始人萨尔瓦多·阿连德 (Salvador Allende) 为总统。美国认为苏联和古巴支持这个拉美国家，于是就利用各种颠覆手段，极力推翻阿连德政府。

1973 年，一个军人委员会政变并杀害了阿连德。智利新政府把公司归还给私人，停止言论和出版自由，监禁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政府以拷打和暗杀政敌而臭名昭著，尼克松政府却得到了所需要的东西。毫无疑问，美国的行动实际上是对苏联和共产党在拉美的威胁进行夸大而做出的过度反应。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都认为，孤立古巴是明智的政策。**1970 年**的西恩富戈斯潜艇基地事件引起美苏之间一场重大的实力较量。

1970 年 8 月中旬，美国通过 **u. 2** 飞机的定期侦察，注意到在古巴境内和周围，苏联的军事活动正在增加。从 **8 月下旬**起，美国不断得到有关苏联正在西恩富戈斯修建潜艇基地的情报。尼克松由此断言，苏联违反了 **1962 年**以后达成的不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武器的协议，他和基辛格决定“使苏联屈服”。他们私下告诉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缓和受到了危害。而多勃雷宁则向基辛格保证，苏联没有建造海军基地。**10 月 10 日**，苏联舰队驶离了西恩富戈斯港。尼克松政府声称，美国取得了一场不声不响但强硬的对苏外交胜利。

3 年后，美洲国家组织不顾美国的反对，撤销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但当古巴军队帮助安哥拉激进派执政时，这些积极步骤发生了逆转。对美国而言，在古巴军队撤离以前，任何同古巴关系进一步的正常化都是不可能的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前，非洲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中，并没占有突出的地位。美国对非洲政策的目标是谋求扩大在非洲地区的

经济利益，加强同葡属安哥拉、罗得西亚和南非这些白人政权的联系，但鼓励走向种族和解与融合。美国同时相信，占人口多数的黑人由于害怕白人的军事优势，不会发生重大的暴力对抗。因此，尼克松政府放松了对南非白人政权的武器禁运，尽管联合国宣布对罗得西亚白人政权实行经济制裁，美国国会还是通过了伯德修正案，允许美国从罗得西亚购买铬。美国相信，虽然非洲黑人会抗议，但“他们需要我们”。

但是，安哥拉的事态发展打破了美国这种自鸣得意的心理，迫使尼克松政府改变政策。

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黑人抵抗组织一直在安哥拉同葡萄牙人作战。苏联开始支持游击队组织中的一派，即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由于葡萄牙在1974年—1975年间的一系列政策错误，安哥拉的独立运动发展壮大起来。基辛格认为，安哥拉形势的发展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前途，美国必须挫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以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

1975年，中央情报局花了3200万美元，用于宣传、运送武器和通讯器材、雇佣白人雇佣兵、酬劳反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治人物等。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官员纳撒尼尔·戴维斯(Davies]Nathaniel)，强烈反对这种秘密军事干涉。他认为，美国虽然付出了威望和物资方面的代价，但不会成功，因为美国根本无法控制那罩的事态发展，美国的卷入只会刺激苏联活动的增加。福特总统决定继续秘密进行援助，并依靠军事解决安哥拉，戴维斯只好辞职。

1975年11月，葡萄牙允许安哥拉独立，起义各派随后展开内战，互相争斗。受美国保护的一派尽管得到美国和中国的支持，然而战绩不佳。1975年年底，苏联和古巴大量增加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援助。与此同时，戴维斯的辞职和美国秘密干涉行动被泄露，在国会激起轩然大波。1975年12月，参议院投票表决，停止为在安哥拉的行动提供军事开支；1976年1月，众议院也作出同样的决定。

1976年初，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赢得了内战的胜利。美国政府严厉谴责苏联，同时不再提“缓和”这个词了。安哥拉的经验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对非洲的政策。基辛格认为，由于黑人激进派、苏联和古巴等拒绝同美国发生经济联系，并拒绝提供海军设施，美国有被孤立于非洲大陆之外的危险。基辛格在1976年得出为时已晚的结论：美国必须采取行动，“避免种族战争”，遏制外国干涉，“防止非洲的激进化”。基辛格开始相信，非洲问题必须由非洲人解决。

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关系也遇到了麻烦。基辛格曾经警告说：“贫

富国家之间分裂成两个阵营，会变得像冷战的最黑暗的日子那样可怕。”1972年，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74%，但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7%。1976年，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414美元，但包括生产石油的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只有538美元。

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刻不容缓的是，富国通过降低对工业制成品和技术的索价而减少利润，以低利率提供外援和贷款，降低关税，通过订立商品价格协定而提高进口原料的价格，在外国公司被收归国有和受到限制时，不要进行干涉。发展中国家还坚持，它们应在诸如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经济要求的背后有其政治目的，那就是它们设想经济的改善会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促进政治上的自治，改变国际力量的对比。

1964年间，“七十七国集团”第一次提出上述经济要求。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集团发展到10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利用联合国为讲坛，在1974年通过一项题为《围际经济新秩序》的文件，包括了它们的各种要求。美国、西欧和日本同意与它们谈判，并曾经做出某些妥协。到80年代初，谈判陷入僵局。

1976年总统竞选期间，卡特同那些对尼克松福特—基辛格时代持批评态度的人一起，要求“不再重演越南战争”、“不再重演智利事件”。卡特许诺削减军事预算，撤回驻扎海外的一些美国军队，减少向海外销售武器并放慢核扩散的步子。他严厉谴责共和党政府，由于支持独裁政权而玷污了美国在道义上的名声。

但是，卡特这位华盛顿政界的“局外人”入主白宫时，几乎没有什么外交经验。卡特选择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作为国务卿。万斯认为，由于世界权力的分散，“不会再回到我们认为美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时代”。他不相信苏联介入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冲突，因此建议实行温和的外交政策，以便寻求美苏合作的途径。万斯在1980年4月辞职，不仅是抗议人质营救计划，而且是为了表明，他对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本能的反苏主义”等不感兴趣。

总统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是一个顽固的冷战分子，直率而固执，傲慢而盛气凌人。他坚信“世界政治舞台不是幼稚园”，他把世界上大部分麻烦归咎于苏联，他谋求军事优势，并竭力主张利用中国反对苏联。

刘于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两人不同的作风和主张，特认为可以相互平衡，而他自己可以处理任何冲突。这种决策模式不久便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表现为忽左忽右，时而小心谨慎，时而大张

旗鼓。但是，尽管有这些个人的和官僚政治方面的争斗，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本上还是追求传统的目标，只不过采取了一些新的手法。卡特以美国传统的改革派的热诚，开始把“道义、理智和力量”应用于美国外交。

卡特特别谋求恢复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权力和影响。他认为，美国必须强调南北关系，而不是东西关系的问题，美国必须对民族主义甚至左派政权做出让步，因为军事干涉“缺乏理智和道德”，这一点在越南战争中已经表现出来。卡特相信，第三世界的问题不是由于共产主义的阴谋，而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当地的经济、社会、种族以及政治问题引起的。因此，卡特政府对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努力使美国适应民族主义。卡特坚持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灵魂”是维护和扩大其他国家的人权，并认为这是他个人对世界事务的贡献。通过使权利法案国际化，美国能够恢复它的威信和自豪，并能给美国的武力增加道义的力量。

卡特从威尔逊的思想、1948年的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以及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中汲取力量，声称要为世界各国人民赢得工作、选举、信仰、旅行、言论、集会和受公正审判等等自由权利。奴隶制、种族灭绝、酷刑、强迫劳动、任意逮捕、操纵选举、中止公民权利等等，应该受到谴责。独裁者应该受到警告，要他们尊重人权，否则就要面临削减美国对外援助的局面。

卡特政府在第三世界推行“人权外交”，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关系得到较大的改善。在拉丁美洲，卡特政府取消或减少对一些军人政府的援助。美国拉丁美洲的军援从1976年的2.335亿美元下降到1979年的5400万美元。卡特政府还改善了同古巴的关系，并在1977年同巴拿马政府签订美巴新条约，同意把运河主权交还巴拿马。在中东地区，美国还促成埃及和以色列在1979年3月签署了和平条约，为中东的和平带来的新的转机。

但是，1979年11月由伊朗革命而引发的伊朗人质危机，对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对美国在波斯湾的利益提出了最为直接的挑战。“卡特主义”应运而生。

1980年1月23日，卡特在国情咨文中宣称，任何外来势力企图控制波斯湾的尝试，都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侵犯，这种侵犯将遭到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这就是被称为美国波斯湾新政策的“卡特主义”。卡特主义实际上是美国从强调人权的道义再次转

向注重实力。布热津斯基曾经这样解释卡特主义，即它就是杜鲁门主义的翻版。布热津斯基说，卡特外交政策的最后阶段涉及到在实力和原则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平衡，主要是由于苏联扩张主义的影响，以及伊朗危机所引发的内部辩论，导致在世界事务中以实力为主这一观点，得到更为明确的承认。卡特主义的提出也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里根的第二次冷战时期。

第四节 “里根主义”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无论是作为总统候选人还是作为总统，里根都强烈抨击把缓和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作为美苏关系的基础。里根声称，扩张主义的苏联成为世界上一切正在发生的动荡的根源，当然也就是第三世界动乱的根源。1985年2月6日，里根在国情咨文中指出：美国要通过支持“自由战士”，加强同苏联在地缘政治方面的竞争。1986年3月，里根向国会提出了题为《自由、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的咨文，把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政策，扩大到支持第三世界一切所谓的反共产主义的“自由战士”。

里根在咨文中对里根主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他声称，苏联在全球的扩张，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美国不仅要制止苏联扩张的野心，而且还要鼓励苏联进行自我克制。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政策对全球安全是有害的，是根本改善美苏关系的障碍。里根在咨文中反复强调，美国要使用军事力量和经济活力，“支持自由战士”。至于里根主义的意义，美国官员宣称，“勃列日涅夫主义”已经死亡，“一场新的球赛已经开始”。苏联也认为传统的遏制政策已经过时，里根主义标志着美国推行反击政策。

里根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在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和中美洲等，遏制苏联的进攻。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11.5万名苏军依然不能控制这个国家。到1987年，在阿富汗人的抵抗中已经有4万名苏联士兵阵亡。美国在此期间大力支持阿富汗的抵抗武装，仅在1984年至1985年，就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了4亿美元的援助。

里根对阿富汗的政策虽然得到国会的全力支持，但在如何在非洲实施里根主义问题上，国会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美国自从1975年以来，一直试图推翻安哥拉的共产党政府，一直资助反政府的游击队组织。1985年，里根政府虽然成功地取消了禁止美国介入安哥拉内战的克拉克修正案，但里根主义的实施依然遇到了困难。

一方面，安哥拉政府同美国的石油公司特别是雪弗龙和德士古等，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同时欢迎西方的投资，并进行适当的社会改革。另一方面，反政府的游击队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反政府行动受到南非白人政府的支持。但是，里根政府依然请求国会向该组织提供援助，并对南非白人政权采取“建设性接触”的政策。显而易见的是，里根谴责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制度，但同样反对卡特政府采取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迫使南非改变其制度。

里根政府希望为南非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安全保障，使之愿意向黑人提供各方面的自由。但是，南非白人政权在 1984 年通过一项新宪法，依然没有给予广大的黑人任何实质权利，于是在南非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南非白人政权实施军管法，在 15 个月内杀死了 1000 多名黑人，并赶走了那些报道这些事件的外国电视台的人员。

南非白人政权的行为激起了全世界的抗议，美国国内也不断出现抗议活动。一些著名的大公司纷纷从南非撤出，如福特公司和 IBM 公司等。1980 年，美国在南非的公司有 350 家，到 1988 年为 200 家。1986 年，美国国会开始对南非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在以后的 4 年中，经济制裁似乎产生了作用，南非白人政权开始放松种族隔离，并释放长期监禁的黑人领袖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里根主义实施过程中，最受争议的行动是在中美洲。里根试图阻止极左派的游击队在萨尔瓦多夺取政权，与此同时他还试图推翻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在里根政府看来，萨尔瓦多的内乱已经成为冷战对抗。1981 年初，萨尔瓦多游击队的攻势遭到失败，游击队希望进行谈判，里根对此加以拒绝。在美国的军事帮助下，1.7 万名萨尔瓦多政府军不仅消灭了 4000 名游击队员，而且还向苏联展示，里根政府不打算像卡特政府那样“软弱”。美国的顾问、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源源不断地进入萨尔瓦多，与此同时，数千名萨尔瓦多士兵到美国接受训练。

但里根对萨尔瓦多政策的实施并不顺利，游击队的数量在成倍地增长，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开始进攻包括苗都在内的城市。里根政府的解决办法是在萨尔瓦多这个并不知道民主是什么的国家里，举行民主选举。当 1982 年举行选举时，右翼的军人几乎夺得了总统职位，美国不得不介入，宣布选举无效，并扶植一个较为开明的政治家作为总统。

在 1984 年的大选中，中央情报局花费了 150 万美元，保证何塞-拿破仑杜阿尔特(José Yapolón Duarte)当选。到 1988 年，美国平均每天花费 150 万美元来维持杜阿尔特政权。但是，游击队的势力日益壮大，

杜阿尔特逐渐失去对国内的控制。另一方面，萨尔瓦多反美情绪开始高涨，1986年底，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焚烧美国国旗，向杜阿尔特扔掷石块。1988年右翼集团获得全国大选的胜利，杜阿尔特政党遭到惨败。不停的内战使得这个小国陷入灾难。

里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把萨尔瓦多的动乱归咎于古巴和尼加拉瓜。尼加拉瓜的桑地诺及其支持者在1979年推翻了美国支持的索摩查的独裁统治，他们一心要实现国内革命的诺言，并向古巴、苏联寻求各方面的支援。从一开始，里根政府对尼加拉瓜的政策就是，要么推翻桑地诺政权，要么迫使他们同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分享权力。1981年11月，里根签署一项指令，拨款1900万美元，用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训练。美国还在洪都拉斯建立了大型基地，供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使用，并在那里驻扎了3万名美国士兵。里根把这些反政府武装分子称为“自由的斗士”，并把他们同美国1776年的“建国之父”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与五角大楼和白宫之间，就对尼加拉瓜的政策发生激烈的争论。国务院认为，通过外交谈判，可以更好地遏制桑地诺政权。五角大楼和白宫主张，使用更加强硬的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为此，里根在1983年任命了以基辛格为首的中美洲问题两党全国委员会，研究如何解决上述分歧。1984年1月，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建议增加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援助，继续支持萨尔瓦多政府，提供80亿美元来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中美洲国家。

虽然国会在1982年禁止政府动用专款来推翻尼加拉瓜政府，但里根对此不加理会。中央情报局在1983年底不仅在尼加拉瓜的港口布置水雷，而且还轰炸了尼加拉瓜的石油和机场设施。1984年间，国会曾禁止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里根政府则公开要求私人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中央情报局依然参加这类活动。

里根连任后，继续对尼加拉瓜施加压力。1985年1月，美国中断同尼加拉瓜的谈判。2月21日，里根宣布继续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5月1日，美国宣布对尼加拉瓜实行全面禁运和经济制裁。6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美国无意通过谈判解决尼加拉瓜的争端，但也无力通过反政府武装，达到自己的目的。

1983年10月25日，美国军队出兵格林纳达。这是实施里根主义的一个典型事例。1979年3月，位于东加勒比海的格林纳达发生政变，莫里斯·毕晓普(Maurice Bishop)出任总理后，迅速发展同苏联和古巴的

关系。1983年7月毕晓普访问美国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

10月，亲苏和亲古的激进派领导人发动政变，杀害了毕晓普。里根政府利用这一时机，派遣6000名美军登陆格林纳达，随即占领格林纳达全境。格林纳达新政府成立后不久，宣布同苏联和利比亚断交，限令古巴外交官离境。在英联邦派出多国部队进驻格林纳达后，美军全部撤离。

世界舆论反对这次现代式炮舰外交的样板。联合国安理会做出决议对这次入侵表示遗憾，美国否决了这项决议。美洲国家组织抗议美洲国家组织宪章遭到了践踏。相反，美国人却欢呼美国“赢得一个转折点”。

里根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实施并没有给这一地区带来进步、稳定和繁荣。到20世纪80年代末，睦邻政策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回忆。

中东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外交决策者，华盛顿的官员们从来没有能力去实现他们的目标，如：以色列的安全、埃及的稳定、民族自决问题、领土纠纷、遏制苏联的影响，等等。里根政府的中东政策依然把以色列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在里根第一任内就向以色列提供了大约290亿美元的援助。1981年9月，美国和以色列达成建立战略合作谅解；11月30日，双方正式签订有关协议。

里根政府还扩大同温和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加强同埃及的关系，同时把苏联排斥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在里根任内，中东和平进程出现重大转机，1982年9月，里根提出了解决中东问题的“里根方案”，并以此为基础谋求以色列和阿拉伯各方对其方案的认同。

在美国的斡旋下，1985年6月，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1988年12月，巴解组织表示接受联合国第242号和338号决议，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美国由此同意与巴解组织进行实质性的对话。美国的中东政策从此进入一个新时期。

思考题：

1. “艾森豪威尔主义”及其对冷战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
2. 遏制战略和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主要政策目的。

参考书目：

1. 雷速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2. 亨利·欧文主编：《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中译本，三联书店1975年版。
3. 扬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 5 • Cecil Crabb • Jr., Kevin Mulcahy,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From FDR to Reaga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6. Peter Duignan, Lewis Gan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7. 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8. George C. Herrin,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7,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86.
9. Walter LaFeber, The American Ag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4.
10. Stephen G. Robe, 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The Foreign Policy of Anticommu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第六章

冷战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戴超武 南京大学历史系

同冷战时期苏联其他重大的对外政策一样，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完全是适应苏联整个冷战战略需要的，其中既有国家利益的动力，同时也包括了意识形态的考虑。不过，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等因素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并且一些因素经常是变动不居的，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也必然因为要应付那种复杂和经常变动的情况，不断进行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兴起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第三世界正在变化的现实，明显地影响了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态度、行为和政策。苏联试图把战后非殖民化运动以及第三世界对西方统治的愤怒，转化为反帝国主义和亲苏的政策趋向。苏联利用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中出现的地区冲突，政治上的不稳定，以及结盟关系的不断变化等，采取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外交承认、密切党际关系等方法，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冷战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因美苏关系的变化、苏联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认识、不同领导人决策风格的差异等因素，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多样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政策后果。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联系，同美国争夺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扩大苏联的势力，把第三世界纳入苏联的冷战战略，则是苏联政策的主线。

同时，冷战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也面临着许多困境和危机，它们制约着苏联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多样性，使得它们在许多时候怀疑苏联的动机；第三世界政治上的变化无常以及高度个人化的国内政治模式，则经常导致亲苏政权的垮台。另一方面，苏联自身过去扩张的历史，以及如何处理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等问题，也是苏联在冷战时期进一步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的进程中，无法逾越的障碍。

第一节 “两大阵营”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斯大林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变化很大。尽管这一时期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它也在第三世界采取了一些重要的行动。在如何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上，苏联赞同实行联合国托管制度，认为应该给予殖民地“进步发展的真正的可能性”，民族解放运动应通过谈判，实现其争取国家独立的目标。这一政策表现在英国、法国和荷兰共产党对待其殖民地的态度上。

到1947年，当东西方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许多国家都开始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同时，苏南关系的破裂也使得“民族主义者”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名声受到严重的损害。1947年9月，日丹诺夫(Andrie Zhdanov)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明确表示，民主阵营的核心是苏联和其他新的民主国家，它包括了那些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并坚定地走向民主发展道路的国家。此外，民主阵营还得到了印度、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同情，得到殖民地和附属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战斗者的支持。但是，苏联还是认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最终将导致那些国家成为“英美帝国主义的附庸”。斯大林时期苏联正是按照这种理论来推行其在第三世界的政策的。

在苏联的文献中，近东和中东的地理概念是不同的。苏联所指的“近东”包括埃及、苏丹、以色列、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也门、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巴林、塞浦路斯和土耳其。苏联所称的“中东”，除包括上述国家外，还包括伊朗和阿富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和美国基于自身的利益，对中东地区都极为关注。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美国自然关心中东的战略地位和石油资源。对苏联而言，向地中海、巴尔干、波斯湾和阿富汗等地扩张，是沙俄和苏联的传统战略目标。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对外扩张的历史，南下政策又是俄国扩张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彼得一世曾为俄国南下设计了三条路线。第一条是通过征服奥斯曼帝国，控制黑海及黑海海峡，然后进入地中海；第二条是通过对高加索的占领，经波斯进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第三条是从中亚细亚经阿富汗进入印度，控制印度洋。

彼得大帝为实现其南下政策，打开通往黑海的通道，曾先后对奥斯曼、波斯王朝和中亚地区发动多次战争。攻占了黑海西岸和南岸地区。沙俄在18世纪内继续执行南下政策，先后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黑海北岸的高加索地区。19世纪沙俄继续南下，同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四次战争。另一方面，沙俄开始进取波斯湾，以印度为目标，但遭到波斯的抵抗。此外，英俄在阿富汗展开了争夺战，结果阿富汗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但是，俄国的南下政策没有实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沙皇政府被推翻，奥斯曼帝国被分裂，其本土土耳其也遭到公开瓜分，沦为半殖民地，中东地区成为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军队进驻君士坦丁堡，控制了黑海海峡，遏制了俄国的出海口。苏联成立后，南下政策依然没有改变。1939年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ylovich Molotov)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普(Joachim V. Ribbentrop)会谈时曾说，苏联希望，由巴库向南延伸到波斯湾，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41年，为了抵抗纳粹德国，英国和苏联共同出兵伊朗。战后苏联不愿撤兵，并支持伊朗境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成立了“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和“库尔德人民共和国”，并对土耳其的海峡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这些事件酿成战后美苏之间第一场严重的危机。

由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重要战略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德、意和苏联在海峡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1936年6月至7月，土耳其、英国、法国、苏联、日本以及黑海沿岸的一些国家，在瑞士蒙特勒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海峡问题，达成了有关海峡新制度的《蒙特勒公约》。该公约规定：无论平时和战时，各国商船可自由通过海峡；平时，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可以自由通过，非黑海海峡沿岸国家通过海峡的军舰，必须是吨位在1.5吨以下的水面舰艇，停留期不能超过21天；战时，如果土耳其为中立国，交战国的军舰禁止通过海峡，如果土耳其为参战国，是否准予通过海峡，由土耳其决定。同时土耳其有权在海峡地区设防。

苏联无疑认为，这一公约极大地约束了苏联在海峡地区的行动自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同德国的谈判中，以及在二战中与其他盟国的会谈中，苏联都要求修改公约。

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上，斯大林提出，一旦发生复杂事件，由于土耳其无力保证自由通航的可能性，苏联希望用武力保卫海峡。这一要求遭到杜鲁门和丘吉尔的反对。在1945年9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莫洛

托夫提出要托管利比亚。对此西方显然不以为然。于是，苏联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决定采取单独行动。

1946年8月8日，苏联向土耳其提交了有关修改《蒙特勒公约》的照会。该照会提出，苏联和土耳其将通过联合手段，组建海峡的防御，以防止其他国家出于藐视黑海国家的目的利用海峡。苏联无疑希望把西方国家赶出海峡地区，谋求对海峡的控制权。这必然遭到美英的坚决反对。

8月19日和21日，美英分别照会苏联，表示不能同意苏联的要求。美国政府甚至认为，如果需要的话，美国将使用武力阻止苏联。8月22日，土耳其在在给苏联的照会中，反驳了苏联有关土耳其没有履行《蒙特勒公约》的指责。面对美英的反对，苏联不得不退让。尽管苏联继续对土耳其施加压力，但并没有采取导致冲突的实质性行动。

1942年1月，英国、苏联和伊朗签订条约，规定盟国部队在同轴心国的所有军事行动结束后的6个月之内，撤出伊朗。1942年底，美军进驻伊朗，接管和承担原来由英军负责的铁路和港口的管理。伊朗政府的政策是利用美国，制衡苏联和英国。伊朗在战时就一直向美国通报苏联在伊朗的各种活动，使美国确信苏联的危险。1945年5月对德战争结束后，伊朗要求英美苏三国撤军。在美英军队撤出后，苏联以种种借口拒绝撤兵，从而导致了伊朗危机。

在苏联关于战后安排的设想中，伊朗和土耳其一样，都是苏联南部安全的重要环节。苏联战后对伊朗政策的目标是要保持同伊朗的同盟关系，确保苏联在伊朗北部的势力范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由联共中央领导的“党的外交系统”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的“国家外交系统”共同负责，处理与伊朗的关系。

外交人民委员部以获得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为突破点，同时以拖延撤军为手段，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力争排除英国在伊朗的势力和影响，确立苏联在伊朗的支配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由联共中央指导伊朗人民党和阿塞拜疆民主党，在伊朗发展革命运动，以牵制伊朗政府，并在必要时争取成立亲苏联的政府。

1944年10月，苏联同伊朗进行有关石油租让权的谈判。对苏联提出的开采权的要求，伊朗政府加以拒绝。12月2日，伊朗议会通过法律，禁止政府同外国进行石油租让权的谈判。苏联有关获得伊朗石油开采权的目标暂时无法实现。

1945年5月19日，伊朗政府照会苏美英三国，要求它们提前从伊

朗撤军，因为对德战争已经结束。英美表示同意，苏联非但没有响应，而且加强了对伊朗内政的干涉。

在苏联的支持下，1945年9月6日，在伊朗阿塞拜疆成立了伊朗民主党。12月，伊朗民主党在大不里士组建了自治政府。与此同时，苏联还支持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的民族自治运动。伊朗政府认为阿塞拜疆自治运动是损害伊朗统一的叛乱，决定向伊朗阿塞拜疆增兵，却受到苏军的阻挡。1946年1月19日，伊朗向联合国提出苏联干涉其内政的指控。2月18日，苏联与伊朗举行谈判。伊朗要求苏联撤军，苏联则坚持要求，伊朗政府应当通过与伊朗阿塞拜疆自治领导人谈判，以便使当地局势稳定下来。苏联还要求伊朗政府改变敌视苏联的态度，解决石油租让权的问题。伊朗拒绝接受苏联的要求，并在3月18日再次将苏联告上联合国安理会。

在英美完全撤军的情况下，苏联做出了让步。1945年4月4日，苏联和伊朗达成协议，苏联在半个月內完成撤军，伊朗将把关于建立苏伊石油合营公司的协定交给议会批准，同意调整和伊朗阿塞拜疆民族政府的关系，用波斯语和阿塞拜疆两种语言处理公文，给伊朗阿塞拜疆的民主组织和工会以活动自由，增加伊朗阿塞拜疆在伊朗议会中的席位。5月9日，苏军从伊朗全部撤出，伊朗危机至此结束。

11月21日，伊朗政府以选举为借口，把军队开进包括伊朗阿塞拜疆在内的所有省份。以美国陆军少将罗伯特·格罗(Robert Grow)为顾问的伊朗军队，镇压了伊朗北部的叛乱。苏联对此只能发出“友好的警告”。

1947年10月，伊朗议会审议苏伊联合石油公司的问题，它以102票对2票的表决拒绝了这一协定。苏联对伊朗的政策日标完全化为泡影。1947年在一份递交伊朗政府的文件中，苏联列举伊朗在过去7年内处理两国关系的种种行为，谴责伊朗为美国石油和航空公司大开方便之门，利用美国专家管理伊朗的军队、警察和经济，将两国分歧提交联合国，以及镇压伊朗北部的进步的民主运动等等，而这些都是没有同苏联进行磋商。苏联的愤怒可见一斑。

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巴勒斯坦问题采取了较为大胆的政策。在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分治和成立以色列国的辩论中，苏联采取了强烈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军火。作为回报，以色列也在联合国投票支持苏联有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合法席位的议案。

然而，当以色列采取亲西方立场的时候，苏以关系发生了变化。1951年，以色列议会拒绝批准旨在进一步发展同苏联关系的议案。加上美国、英国和法国保证不改变这一地区的军事平衡，苏联开始把以色列视为“美帝国主义的基地”，同时也开始推行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政策。

战后初期，苏联对亚洲的政策不仅突出体现在对中国、朝鲜和印度支那等国革命运动的支持上，而且还体现在对印度的政策上。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外交以两大阵营束划分敌我，虽然苏联在1947年4月13日同印度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对印度的外交明显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1947年6月，苏联科学院的印度问题专家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印度独立后的内外政策。与会代表基本同意，印度的分治是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同英国帝国主义交易和妥协的结果，印度资产阶级和国大党领导集团已完全倒向反动和帝国主义阵营。印度目前的形势是“印度资产阶级贪婪和背叛的结果，它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独立”。

1947年12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苏联著名印度问题专家茹科夫的文章，呼吁印度共产党通过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领导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尽管苏联领导人在公开宣布“两个阵营”的形成时，认为印度至少是“同情”社会主义阵营的。但是，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以及对印度独立后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负面评价，苏联领导人显然更倾向于相信，印度的政策并非是“不结盟”的中立政策。1949年11月，《真理报》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尼赫鲁政府逐步把印度变成“英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宪兵”。

苏联对独立后印度的性质的判断，还体现在对甘地和“甘地主义”的评价上。《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甘地广泛利用宗教上的歧视，是一个鼓吹种姓制度的反动派。他背叛印度人民，以蛊惑人心的方式，把自己伪装成印度独立的支持者和英国的敌人，并帮助帝国主义者反对人民。因此“甘地主义”是“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当印度驻苏大使梅农(Krishna P. S. Menon)提请苏联驻印大使诺维科夫(K. V. Novikov)注意上述问题时，诺维科夫回答说，如果在苏联的书中找到一句贬低甘地的话，那么就会在印度出版的书中，找到一百句贬低列宁和斯大林的话。诺维科夫还说。在苏联，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的观点从事研究，并得出诸如像甘地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结论。这一时期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关系的变化，也清楚地反映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印政策的基本特征。苏联从

印度的进口额，从 1948 年的 1620 万美元，下降到 1953 年的 70 万美元；同时期苏联对印度的出口额，从 980 万美元下降到 90 万美元。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苏联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政策。对非洲，斯大林时期苏联采取了支持稳步走向自治的政策，而不赞同那些殖民地迅速独立。在拉丁美洲，由于战后许多拉美国家禁止共产党在本国的活动，几乎战前所有同苏联建交的拉美国家在战后都同苏联断交了，危地马拉是一个例外。由于 1952 年危地马拉工人党合法化，阿本斯建立的左翼政府同苏联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也成为以后美国决心推翻阿本斯政府的一个主要原因。

随着冷战的加剧和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在斯大林后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开始有所转变。苏联领导人认为，新独立的国家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以及它们反对美国建立军事同盟和军事基地的计划，使得苏联有必要重新评价这些新独立国家的作用。

1951 年，贝利亚公开赞扬印度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苏联还宣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保卫和平的斗争是密不可分的。1953 年 1 月，苏联强调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关论述，即“支持真正的革命性的民族运动的必要性”，并引用斯大林的话，如“不是民主主义者和无产者的人，也可以成为革命的民族主义者”等。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和赫鲁晓夫提出“三和路线”，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第二节 “和平共处”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步骤，缓和同西方的紧张关系。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此时出现这一发展，同苏联新领导人的影响是有密切联系的。苏联领导人还同意就德国问题、印度支那问题等，举行东西方首脑会晤，并同美国进行了一些双边谈判。同时，苏联新领导层还在联合国提出裁军的倡议，并主张同西方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归还芬兰的军事基地，以及同世界各国建立“互利的友好关系”，等等。

在 1956 年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应以“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总路线。根据这一方针，赫鲁晓夫提出，新

独立的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形成了“和平区”，这将改变世界政治的面貌。因此，苏联在经济援助、军事援助以及外交等方面，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以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赫鲁晓夫时期，仅苏联向第三世界提供的经济援助，就达到 **38** 亿美元。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基本上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和平共处意味着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这对保卫世界和平，以及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对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重新定义的“和平共处”也强调了支持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必要性。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苏联对中东地区的政策转变为支持阿拉伯国家。其主要原因在于，以色列逐步同西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阿拉伯国家开始出现反对殖民统治民族主义政权，特别是埃及的纳赛尔所推行的政策。

1955 年，苏联的武器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运送到了埃及，埃及以棉花换取 **2** 亿美元的苏联武器。埃及和苏联的这一交易引起西方的极度敌视。与此同时，美国利用向埃及修建阿斯湾水坝提供贷款的方式，对纳赛尔施加压力。纳赛尔虽然希望得到西方的贷款，但不愿意接受美国的条件。苏联决定利用这一时机。

1956 年 **6** 月，苏联外长谢皮洛夫 (**Dmjtfil Tmfimofich Shepilov**) 访问埃及，承诺苏联为阿斯湾水坝提供 **11** 亿美元的贷款，不附加任何条件，为期 **20** 年。对于苏联这一举动的政治意义，赫鲁晓夫强调指出，通过建造水坝，苏联会赢得埃及人民的信任和感恩这样的无价之宝；而且还有所有阿拉伯国家人民的信任，也包括所有不发达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信任。苏联加强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就是削弱敌人的阵营。**1956** 年 **7** 月，美国公开宣布取消对埃及修建阿斯湾水坝的援助。作为反击，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以运河每年 **2500** 万美元的收入，作为建设阿斯湾水坝的资金来源之一。英国和法国对埃及这一决定反应非常强烈，决定以军事手段进行干涉，以维护两国的利益。苏联决定首先给予埃及以道义上的支持。**8** 月 **10**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支持埃及将运河国有化的决定。

美国此时决定采取政治手段解决危机，**1956** 年 **8** 月和 **9** 月先后在伦敦召开了有关国家参加的会议。安理会也通过有关决议，希望政治解决。但是，英国和法国决定进行军事干涉。**10** 月 **29** 日，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11** 月 **5** 日，英法军队也在埃及登陆。

战争爆发后，苏联发出一系列外交照会和声明，谴责英国、法国和

以色列的行为，要求立即停火。布尔加宁(N. A. Bulganin)在莫斯科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警告说，西方的干涉有可能导致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还宣称，苏联的“志愿军”已经做好援助埃及部队的准备，他甚至建议美国和苏联联合采取行动以恢复和平。当苏联真正了解到西方盟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分歧后，采取了更加积极的介入政策。

在英法登陆埃及的同一天，苏联外长谢皮洛夫在给联合国的提案中，建议如果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在联合国决议生效后12个小时内不停止对埃及的军事行动，并在3天内从埃及领土上撤军的话，美国、苏联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等，都应该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如派海军、空军、陆军、志愿军、军事顾问到埃及，或给埃及提供其他形式的援助。这一提案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准备好派海军和空军到埃及，为制止侵略者，保护受害国，恢复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

11月5日，布尔加宁致函艾森豪威尔建议，苏美两国根据联合国的决议，决定联合并立即使用军事力量，就可以有效地结束对埃及人民的侵略。同时，苏联还分别致函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英法威胁要袭击它们的本土，对以色列威胁要召回苏联驻以色列大使，并提醒本一占里安(Ben Gurion)，是否还希望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下去。11月6日，在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压力下，英法两国和以色列宣布停火。苏联通过解决运河危机，赢得了阿拉伯国家的信任和好感，并突破了巴格达条约所设置的障碍，扩大了在中东的影响。

叙利亚是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扩大在中东影响的第二个重要的突破口。1956年间，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在叙利亚执政，总统苏克里(Shukry)访问苏联。两国在1957年10月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联在7年内帮助叙利亚修建19项工程，向叙利亚提供1.6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这是当时苏联对中东阿拉伯国家提供的最大一笔经济援助。1957年8月，由于叙利亚驱逐了美国外交官，引发了美国和叙利亚的紧张关系。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战略空军“处于戒备状态”，并向土耳其和约旦提供军事援助，以向叙利亚施加压力。

苏联采取了支持叙利亚的政策立场。苏联领导人发表公开声明，谴责美国的军事干涉，并向土耳其施加压力。苏联还支持叙利亚就美国和土耳其的行动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葛罗米柯在致联大主席的信中甚至表示，苏联准备派兵参加镇压侵略与惩罚和平的破坏者。但是，苏联并不想为叙利亚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发生一场战争。在两国经过一系列外交努力后，叙利亚在10月31日从联合国撤回了控诉，叙利亚危机逐

渐平息下来了。1958年2月，叙利亚和埃及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苏联对此表示支持。

20世纪50年代末期伊拉克局势的变化，也为苏联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提供了契机。1958年7月，一个所谓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了费萨尔王朝，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新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承认共产党合法化，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向苏联请求军事援助，要求修改同西方石油公司的合同等等。苏联恢复了1955年中断的两国关系，两国关系起初发展得较为顺利。苏联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大量的贷款以及技术援助。

伊拉克的事态对黎巴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黎巴嫩总统夏蒙十分担心伊拉克政局的变化会使埃及和苏联的影响扩大，因此要求英美在48小时内，派兵进入黎巴嫩。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在黎巴嫩实施“艾森豪威尔主义”。7月1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英国也向约旦派遣了伞兵。

面对美国和英国的行动，苏联在1958年7月16日发表声明，强烈抨击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公开侵略，并表示坚决要求美国停止对阿拉伯国家内战的武装干涉，立即把自己的军队撤离黎巴嫩。声明还宣布，苏联政府不能对在其国境邻近地区造成严重威胁的时间置若罔闻，并且保留为维护和平和安全而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

在得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后，赫鲁晓夫命令苏军在邻近土耳其和伊朗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演习。7月17日，苏军在外高加索地区举行了由黑海舰队参加的陆海空联合演习。7月19日，赫鲁晓夫分别致函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法国总统戴高乐和印度总理尼赫鲁，敦促美英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军，并要求召开解决中东问题的五大国会议（美、英、法、苏、印）。艾森豪威尔做出了回应。8月9日，联合国召开有关中东问题的特别会议。赫鲁晓夫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一次胜利，迫使西方国家放弃了入侵伊拉克的计划。

但是，苏联并不愿意冒战争的风险，出兵干预中东事务。当纳赛尔到莫斯科寻求苏联的支持，希望赫鲁晓夫能够向西方发出最后通牒，从而阻止西方和土耳其可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攻击时，赫鲁晓夫拒绝了。赫鲁晓夫告诉纳赛尔，苏联并没有准备直接对抗，不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赫鲁晓夫强调，埃及必须冷静。事实上，苏联和埃及的反应是有限的。赫鲁晓夫可以在1957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对英法以三国进行核威胁，但现在他无法威胁美国。

另一方面，为了安抚那些苏联的阿拉伯朋友，赫鲁晓夫命令在保加利亚的苏军进行军事演习。同时赫鲁晓夫在私下警告艾森豪威尔，苏联反对攻击伊拉克，并暗示那有可能导致“世界冲突”。苏联进行军事演习的象征性行动，使纳赛尔可以在宣传上打苏联牌了。他一到大马士革就宣布，苏联将“全力支持我们”。

黎巴嫩危机后，苏联加大了对埃及的援助，苏埃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纳赛尔并没有从这次危机中得到教训，在1967年同以色列的冲突中，埃及把全部的赌注押在苏联身上，结果证明其代价是灾难性的。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同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和发展。在1954年至1962年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战争中，苏联并没有公开卷入。阿尔及利亚1962年宣布独立后，苏联立即予以承认，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ta)政府也扩大同苏联的经贸往来。苏联帮助阿尔及利亚建立纺织厂、钢铁厂和化肥厂，并向本贝拉政府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在1963年阿尔及利亚同摩洛哥的边界冲突中，苏联支持阿尔及利亚，古巴还向本贝拉派遣军队进行支援。1964年本贝拉访问苏联，被授予“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金星勋章”。苏联还加强了同突尼斯和北也门的关系。1962年也门王朝被推翻，内战爆发后，苏联同埃及一起支持反政府力量。

但是，苏联同伊朗的关系发展较不顺利。1956年，伊朗国王同苏联签署了贸易和技术援助协议，但拒绝同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而是同美国签署了类似的条约。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和伊朗的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伊朗保证不允许外国在伊朗领土上设置导弹基地；两国经济关系也得到发展，苏联帮助伊朗建设了发电厂和灌溉设施。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在亚洲得到充分的体现。1955年秋天，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了阿富汗、印度和缅甸。1956年6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Sukarno)、7月柬埔寨王子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8月阿富汗首相穆哈迈德·达乌德(Mohamed Daud)先后访问苏联。苏联向它们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向印度提供2.5亿美元，向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各提供100万美元。

苏共二十大以后，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相适应，苏联对印度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苏联领导人对尼赫鲁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印度和苏联作了很大的努力来维护和巩固和平，并且主张用和平方式，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这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结果。而且尼赫鲁是一位“宝贵的朋友”，他不只是一个资

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家，而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主义者。即使他不采纳马克思主义，他确已开始向社会主义方面做出暗示和姿态。苏联领导人相信，只要苏联做出努力并有耐心，印度就会选择符合苏联利益的政策。1955年11月至12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印度进行访问。

苏共二十一大对印度和尼赫鲁的评价更高。1960年2月11日至16日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多次强调，苏联支持印度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并表示一旦印度需要援助的话，苏联将予以提供，甚至可能会包括军事援助。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印度和苏联的关系是建立在更为牢固的友好和理解的基础之上。

虽然苏联和印度在匈牙利事件上存在分歧，但两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和涉及各自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仍然能够相互合作和支持。赫鲁晓夫在1958年考虑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和伊拉克政变时，建议举行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印度五国会谈。这种排斥中国的做法的意义是明显的。在果阿问题上，苏联支持印度的行动，谴责葡萄牙对果阿的统治是“文明的耻辱”。

在印度看来至关重要的克什米尔问题上，苏联明确支持印度的立场。1955年12月赫鲁晓夫公开表示，“克什米尔是印度共和国的一个邦”。布尔加宁在给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也再次表明了苏联的这一立场。1962年6月，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支持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另外，苏联还明确表示不支持印度共产党的活动，并保证让印度共产党支持尼赫鲁的内外政策。1955年11月至12月，赫鲁晓夫在访问印度时对尼赫鲁表示，苏联自然同情和理解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但绝没有领导这些共产党的意图。苏联共产党通过撤销共产党情报局，事实上已经解散了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苏共和印度共产党没有联系。1957年间，赫鲁晓夫再次向尼赫鲁保证，苏联不会干涉印度的国内事务。1961年4月7日至16日印度共产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率领苏共代表团参加，从而加强了印共党内右派的力量。

在上述政策的影响下，苏印关系在赫鲁晓夫时期发展迅速，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两国经贸关系上。从1955年开始，苏联和印度之间的贸易额持续上升。1958年，印度从苏联的进口额是4560万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1.8%；同年印度向苏联的出口额为4900万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4.2%。1951年到1959年，印度和苏联之间的贸易增长了15倍。同时，苏联还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1959年9月12日，苏联宣布给予印度28亿卢比的第四笔贷款；9月28日，苏联又宣布给予印度

1. 87 亿卢比的第五笔贷款，这些贷款用于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1959 年至 1962 年，印度从苏联的进口增加了 4 倍，向苏联的出口增加了 10 倍。

与此同时，苏联和印度的军事合作关系也日益密切。1961 年 2 月 25 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 (V. Krishna Menon) 宣布，苏联已经向印度提供了可以在北部边境修筑公路的设备。1961 年 4 月，苏联向印度出售 8 架安-12 型运输机，这种机型可以向高度在 1.7 万英尺的地区，投送作战人员和物资，印度当时希望在拉达克地区使用这种飞机。印度此前还从苏联购入伊柳-14 型运输机和米-4 型直升机。1962 年 7 月，印度购得了米格 21 型战斗机。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和印度在这一时期还加强在原子能领域的合作。从 1961 年 2 月开始，苏联和印度就苏联援助印度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进行谈判，并在 1962 年 10 月签订正式协议。

这一时期苏联和阿富汗关系的发展，还体现在苏联对阿富汗同巴基斯坦的边界纠纷中。长期以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普士图尼地区的划界，以及如何对待普士图尼族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矛盾。1954 年美国同巴基斯坦结成军事同盟后，阿富汗同美国的关系恶化，转而发展同苏联的关系，特别是扩展两国的经贸关系。在赫鲁晓夫 1955 年访问阿富汗时，两国重申了 1931 年的苏阿中立条约，苏联支持阿富汗在普士图尼问题上的立场，苏联还同意向阿富汗提供军事设备。1956 年，苏联和阿富汗签订了一项军火协议。

这一时期印度支那的局势较为复杂。奠边府战役后，苏联支持通过谈判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并参加促成了 1954 年的日内瓦协议。1957 年，苏联还试图使南越和北越同时加入联合国，但没有成功。1957 年和 1960 年，苏联先后向北越提供大量的经济发展援助，其目的显然是促使北越集中力量，巩固国家独立，而不是重新使用武力统一越南。这一立场最终导致在 1963 年中苏公开分裂时，越南采取亲华的立场。

1954 年的日内瓦协议规定了老挝的中立。当时老挝的政府组成包括三个政治派别：巴特寮、中立主义者以及美国支持的一派。协议签订后不久，三派开始进行内战。1961 年，苏联和美国举行维也纳会谈，就老挝中立问题再次达成协议，敦促成立了以富马为首的联合政府，但依然没有阻止老挝内战的继续。另外，苏联在 1956 年同柬埔寨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称赞西哈努克的中立外交政策。但是，西哈努克同中国的密切关系，限制了苏柬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还发展了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在 1953 年，

苏联同意与印度尼西亚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两国建交。1956年，苏加诺访问苏联，并获得列宁勋章。随后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苏联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大量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当时最先进的米格 21 型战斗机、海军舰艇、潜艇以及地对空导弹等等。苏联还支持印度尼西亚对西伊里安的兼并。同一时期，苏联同锡兰的关系也得到了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非洲地区的非殖民化运动稳步地发展。这个时期苏联同非洲的关系也得到缓慢的发展，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加纳、马利、比属刚果等国，成为苏联重点发展双边关系的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同埃塞俄比亚断绝了外交关系；1959 年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 (Haik Selassie) 访问苏联，两国恢复了邦交，苏联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 100 万美元的贷款。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非洲政策最戏剧化的收获，就是同几内亚的关系的发展。1958 年几内亚进行公民投票，拒绝加入法兰西共同体，因此艾哈迈·德赛库·图雷 (Erhard Sekou Toure) 领导的几内亚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图雷采取激进的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并很快同苏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

1959 年 9 月，苏共中央代表团参加了几内亚“马克思主义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苏联认为这个党属于“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党。图雷在 1959 年和 1960 年两次访问苏联，并在 1961 年获得“列宁和平奖章”。

但是，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当图雷的社会发展计划在 60 年代初期陷入困境时，他便采取鼓励外国和私人投资的政策。1961 年 12 月，图雷指责苏联支持几内亚的反对派，因此决定将苏联大使驱逐出境。但两国关系倒没有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苏联仍然认为，几内亚是“进步的国家”。苏联在 1959 年同加纳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向加纳提供了贷款，并开始实施对加纳的援助计划，包括训练恩克鲁玛 (Kwame Nkrumah) 的保安部队。1963 年，恩克鲁玛公开宣布他信奉“科学社会主义”，同苏联的关系也得以迅速的发展。

马里是这一时期同苏联发展较为密切关系的另一个非洲国家。马里领导人莫迪伯·凯塔 (Modibo Keita) 宣布他实行中立的外交政策，要求法国人撤走其军事基地，并采取社会主义的经济措施。随后，马里同中国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在 1961 年和 1962 年，向马里提供了两笔贷款。1962 年，凯塔宣布马里采取“科学社会主义”，同苏联的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苏联对刚果事件的反应也大致体现了这一时期苏联对非洲政策的基

本态势。比属刚果争取独立的运动，是战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一个典型。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开始，刚果国内涌现出一批以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政党组织，具有代表性的是以帕特里斯·卢蒙巴为首的民族运动党和以安托万·基赞加(Antoine Gizenga)为首的非洲团结党。

1960 年 5 月刚果大选，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以微弱多数获胜，卢蒙巴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约瑟夫·卡萨武布(Josef Kasavubu)任总统。刚果独立后，比利时依然通过各种方法保持在刚果的传统影响，扶植冲伯担任盛产矿物的加丹加省的省长。1960 年 7 月 8 日，比利时借口刚果士兵要求驱赶比利时军官，对刚果进行武装干涉。7 月 11 日，比利时支持冲伯在加丹加成立共和国。面对这种形势，卢蒙巴请求联合国解决问题。7 月 14 日，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比利时撤军，同时决定向刚果派遣联合国部队。但是联合国部队抵达刚果后，首先开始解除刚果军民的武装。对此卢蒙巴在 8 月 9 日公开表示，刚果永远不做联合国的殖民地，永远不接受联合国托管。8 月 16 日，刚果士兵搜查了在刚果的联合国军队总部，逮捕和审讯一些联合国官员。随后卢蒙巴宣布在刚果实行 6 个月军管，并表示如果联合国军队不能迫使比利时撤出刚果，他将请求苏联出兵。苏联也发表声明宣称，不能听任侵略者继续侵略，并将采取措施击退侵略。同时苏联接受卢蒙巴的请求，向刚果空运了一些作战物资，并协助运送加纳部队到交战区域。联合国军队的指挥官认为苏联的行为是单方面的干涉行动，因此不允许苏联运送物资的飞机在刚果机场降落，苏联对这一决定只能表示“愤怒的谴责”而已。

与此同时，刚果内部的争斗也日益加剧。1960 年 9 月 5 日，卡萨武布宣布解散卢蒙巴政府，卢蒙巴也宣布不承认卡萨武布为国家元首，西方国家表示支持卡萨武布。1961 年 2 月卢蒙巴遭到暗害后，苏联声称这是西方的阴谋，并从刚果撤回大使，但在 1961 年底又同刚果恢复了外交关系。

对西方以联合国的名义对刚果事务的介入，苏联极其不满甚至愤怒。1964 年，苏联拒绝为联合国在刚果的军事行动提供经费，从而引发了一场危机。苏联拖欠联合国的经费之多，几乎使苏联失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投票权。在刚果局势趋向平稳后，苏联还继续支持刚果的反政府运动。战后初期，苏联同拉丁美洲的 14 个国家有过外交关系。斯大林曾把拉美国家看作是美国的战争工具，是完全适应美国的侵略需要的。因此，苏联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后，经贸关系发展缓慢，苏联在拉美地区的影响是相当小的。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对拉丁美洲的政策有所变化。

苏联注重发展同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并向拉美一些国家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和技术援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扩大文化交流，建立外交关系。1953年，苏联同阿根廷签订了贸易协定，后来同巴西、乌拉圭、古巴等国，也签订了贸易协定。苏联同拉美国家的贸易额从1953年的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4.5亿美元。

但是，苏联加强同拉美国家关系的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同苏联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由14个减少到1960年的7个。苏联继续在拉丁美洲寻找抗衡美国的伙伴，而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为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古巴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卡斯特罗谋求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失败后，为苏联进入拉丁美洲提供了机会。1960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Anastas Ivanovich Mikoyan)访问古巴，两国签订了贸易协定，苏联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和技术援助。5月8日，苏联同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6月，两国签订了苏联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协议；7月，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将向古巴购买美国不愿意购买的古巴所有的食糖，支持古巴反对美国进行经济封锁的斗争。

1960年7月6日，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宣布，美国不应该忘记，它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距离苏联如此遥远了，因为苏联在必要时可以使用自己的导弹，帮助古巴反击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在7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宣称，“门罗主义”早已死亡。随后，苏联同古巴的关系迅速走向密切。

1960年，卡斯特的弟弟、古巴政府武装部长劳尔·卡斯特罗(Raul Castro)访问苏联，发表了同赫鲁晓夫的会谈公报。7月3日，格瓦拉(Ernesto Guevara)宣布，古巴从今以后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9月18日，格瓦拉宣布，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运到了苏联。1961年4月，美国支持古巴流亡分子进行猪湾登陆时，赫鲁晓夫致信肯尼迪，反对美国干涉古巴事务。此后，苏联对古巴开始大规模的军事援助，最终发展为苏联在1962年在古巴部署导弹，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

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撤出导弹而结束。在赫鲁晓夫看来，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是苏联的胜利，因为美国公开保证不再入侵古巴，从而保住了古巴的存在。而古巴则批评苏联的行为是退让和投降，苏联和古巴的关系因此一度冷淡。不过不久后，双方关系又得到加强。古巴革命的影响扩展到拉丁美洲的其他一些国家，导致苏联在拉美地区影响的扩大，从而使美苏两国在这一地区争夺的范围也随之扩大。

第三节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攻势

苏联外交政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了进攻性的战略，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加大了对第三世界的干预和扩张。苏联以意识形态为重要武器，发展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关系。被苏联片面界定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包括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刚果、埃塞俄比亚、几内亚、比绍以及莫桑比克等，苏联以此为理由，大力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

同时，苏联向第三世界提供以军事援助为主的各种援助，从 1956 年开始实施对外军事援助计划，到 1968 年共交付 45.85 亿美元，1969—1978 年为 207.25 亿美元。在经济援助方面，1954—1968 年，苏联对第三世界援助 28.7 亿美元，1969—1978 年为 47.25 亿美元。

最严重的是，苏联派军队直接干预第三世界的事务或者打代理人战争，如苏联介入安哥拉内战、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的纠纷等等。

总之，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利用美国收缩力量，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战略和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使得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更加激烈。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中东政策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困难和危机。1965 年，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Houafi Boumedienne)推翻了本·贝拉政权；同年 12 月，布迈丁访问苏联，两国的关系发展迅速。1966 年，叙利亚也发生军事政变，苏联同叙利亚的关系仍然得以迅速地发展。

1967 年，苏联在叙利亚的情报机构错误地断定，以色列即将发动进攻。叙利亚为此向埃及请求援助，苏联总理柯西金也向埃及传达了这样的情报。纳赛尔试图迫使以色列进行两面作战，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撤出埃及和以色列边界地区的缓冲地带，并向亚喀巴湾派遣埃及军队。

1967 年 6 月 5 日，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了“六日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以及戈兰高地。苏联发出了干预的警告，柯西金通过热线告诉约翰逊，如果以色列不在短时间内停止军事行动，苏联将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必要行动”，并开始向叙利亚和埃及派遣数以千计的军事顾问。

“六日战争”后，苏联继续扩大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苏联军事人员进入埃及；苏联海军获得了使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中海沿岸的亚历山大港、塞得港和马特鲁军港的权利；苏联空军也可使用埃及的多处空军基地，苏联的飞机从埃及起飞可以监视在东地中海中活动的美

国、英国等国的舰队。

“六日战争”后，纳赛尔从1969年开始对以色列展开消耗战，以色列在忍耐了9个月后，对埃及的腹地实施不断的空袭。埃及请求苏联援助，苏联向埃及提供了导弹、飞机和许多防空人员，其中包括战斗机飞行员。到1970年8月，苏联在埃及的军事顾问达到2万人。1971年5月，苏联与埃及签订了《苏埃友好合作条约》。这一条约是苏联和阿拉伯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条约，也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缔结的第一个友好合作条约。这一条约不但在阿拉伯国家，而且在第三世界都具有相当的影响。

加强同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关系，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中东政策的一个重点。1964年6月，苏联和伊拉克签订了军事协定，苏联在“六日战争”中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1969年5月，苏联和伊拉克签订了新的军事援助协定。根据这一协定，苏联继续向伊拉克提供武器和军事设施，并派遣军事顾问，为伊拉克训练军队。1972年4月，苏联和伊拉克签署了为期15年的《苏伊友好合作条约》。

1957年以后，苏联和叙利亚的经济合作已经开始密切起来。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更加重视叙利亚的战略地位，从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加强同叙利亚的关系。在埃及驱逐苏联专家后，苏联多次向叙利亚建议，缔结两国友好条约，均遭到叙利亚的拒绝。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签订和约，使得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压力剧增。叙利亚只有依靠苏联才能保持平衡，于是在1980年10月，同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苏叙友好合作条约》。这是苏联中东政策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大力改善同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苏联中东政策最为明显的特点之一。苏联利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时机，积极鼓励土耳其和伊朗在中东的国际争斗中，保持中立的立场。

1972年12月，苏联和土耳其签署了有关边界问题的文件，调整了两国边界。两国还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但土耳其拒绝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78年，苏联和土耳其签署了《苏土睦邻和友好合作原则政治文件》，双方表示，将切实遵守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原则，并拒绝提供领土给其他国家用于实行侵略和颠覆活动。

苏联同伊朗的关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得到极大的发展。1965年6月，两国签订贷款协定，随后还缔结了伊朗向苏联输送天然气的协定和5年贸易协定。1976年10月，两国签订了5年贸易协定。

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中东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10月战争。1970

年9月，纳赛尔因心脏病逝世，萨达特(Mohamad Anwar Sadat)上台执政。萨达特希望用武力解决中东问题，因此寻求苏联的全面支持。

1971年10月，萨达特访问苏联，表示埃及相信，只有武力才是赶走以色列的手段。苏联领导人强调，争取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帮助埃及加强防御力量，是苏联“坚定不移的立场”。苏联领导人告诉萨达特，不支持把1971年定为“决定性的一年”，不同意埃及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萨达特并没有放弃实现“决定性的一年”的计划。1972年2月萨达特第三次访问苏联，希望获得苏联的支持。在会谈中双方发生了争执，甚至相互指责。萨达特抱怨苏联向埃及提供的援助，只是空话，都没有实现。萨达特开始明白，不能指望依靠苏联的帮助，实现在1967年战争中失去的土地。1972年4月，埃及和美国之间开辟了一条秘密联系的渠道。

在1972年的美苏首脑会谈中，两国领导人曾谈到中东问题，但结果让萨达特大为失望。7月18日，萨达特发表声明，宣布将在埃及的大约两万名苏联军事顾问驱逐出去，苏联在埃及建立的军事设施和装备收归埃及所有。萨达特的战略依然是要通过战争手段收复被占领土。1973年4月，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Hafez Al. Assad)秘密会见，就战争计划做出了决定。10月3日，萨达特召见苏联大使，通知他埃及和叙利亚已经决定对以色列发动进攻，以打破当前的僵局，他要求苏联迅速表态。10月4日，阿萨德在大马士革告诉苏联驻叙利亚大使，进攻将在10月6日开始。4日晚和5日，苏联撤走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平民。

1973年10月6日，埃及、叙利亚军队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发动对以色列的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10月6日是犹太教的赎罪日，因此这场战争也被称为“斋月战争”或“赎罪日战争”。埃及、叙利亚在战争初期一度取得主动，收复了一些失地。10月9日，以色列军队开始反攻，11日进攻叙利亚，15日跨过苏伊士运河，赢得了战场上的主动，并不断蚕食埃及和叙利亚的领土。

苏联对这场战争的政策是谋求“政治解决”，争取在有利于阿拉伯世界的情况下，实现停火。同时通过提供军援的速度和规模，控制冲突的发展，尽量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和美国进行某种协调活动，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力量。为此，苏联在战争中，通过海上和空中向埃及和叙利亚运送军事物资。不过，同美国援助以色列的速度和规模相比，苏联的做法使得阿拉伯国家大失所望。从萨达特的回忆录中可以

看出，苏联曾经拒绝向埃及提供战场上急需的武器。萨达特说，苏联给他们的武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陈旧货。另外，苏联提供武器的行动缓慢，还有意拖延武器的供应。随着战场局势的发展，埃及和叙利亚的处境越来越不利。10月18日，苏联建议同美国一起，向安理会提出中东停火联合提案。苏联主张以三项原则为基础，即就地停火、以色列立即撤至1967年以前的边界线以及开始磋商签订一项和平协定。经过美苏之间频繁的接触和商谈，10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339号决议，敦促交战各方回到以前的停火线，并向该地区派出联合国观察员。10月24日，第二次停火协议生效。

十月战争使得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进一步下降，苏联和埃及的关系在战后日趋紧张甚至恶化。1976年3月14日，萨达特宣布终止苏埃友好条约，并谴责苏联是根据它自己作为超级大国的利益，制定和推行对第三世界的政策。3月31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称埃及必须承担废约的全部责任。随后，萨达特决定不向苏联海军提供便利和使用港口设施的权利，苏联停止对埃及的一切援助。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68年间，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Yasser Ararat)以埃及代表团团员的身份，随同纳赛尔访问苏联。这次访问虽然增进了苏联和巴解组织的相互了解，但是苏联拒绝承认巴解组织，也不愿意直接提供武器。

20世纪70年代，随着巴解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及其国际声望不断提高，苏联开始改变政策。1970年以后，阿拉法特几乎每年都要访问苏联。但是，苏联仍避免同巴解组织建立正式的关系。

1972年苏联与埃及关系恶化，莫斯科开始调整对中东的战略和政策，巴解组织成为苏联在中东的盟友。1973年十月战争后，苏埃关系完全破裂，苏联同巴解组织的关系进一步发展。1978年，苏联正式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在莫斯科设立的办事处。但直到这时，苏联仍没有给予巴解组织正式的外交地位。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亚洲的政策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包括在南亚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在东南亚支持越南的对华政策以及越南侵略柬埔寨，在中亚入侵阿富汗等。

苏联在南亚地区的扩张是以支持印度为其支柱的。1965年以后，美国停止对印度的援助，苏联成为印度军火的主要供应国。1966—1977年，苏联向印度转让的武器的价值，占印度武器进口的81.2%。1971年3月6日，以拉赫曼(Sheik M@bur Rahman)为首的东巴人民联盟宣布脱离

巴基斯坦独立，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苏联和印度立即表示支持东巴的独立。

8月9日，苏联和印度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色彩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在苏联的支持下，11月21日，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战争。12月5日，苏联公开宣称，印巴事件涉及苏联的安全利益，苏联不能漠不关心，苏联出动舰队到孟加拉湾支持印度的军事行动。苏联还在联合国三次动用否决权，反对通过印巴立即停火和印度撤军的决议。在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的过程中，苏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表现在对越南地区扩张主义的大力支持。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进一步倒向苏联，两国关系迅速发展。1978年，越南加入经互会，苏联开始使用越南的金兰湾海军基地。11月，两国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发动侵略柬埔寨的战争。战争结束后，苏联迅速承认了越南扶植的韩桑林政权。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存在，大大改善了它在东南亚的战略态势。苏联同美国在菲律宾等地的军事力量直接对峙，威胁西方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通道，并从南翼包围中国。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和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构成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南下战略的两个重要环节。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这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全球扩张的最高潮，也是苏联干涉第三世界事务的典型。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苏联积极介入阿富汗内部事务，加快控制阿富汗的步伐。1973年7月，阿富汗发生军事政变，推翻查希尔(Zahir)王朝，成立阿富汗共和国，苏联第一个予以承认。

1978年4月，苏联支持的阿富汗人民党发动政变上台，并同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1979年9月，阿富汗再次发生政变，阿富汗陷入混乱。苏联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完全控制阿富汗。经过精心准备后，12月27日凌晨，苏军开进阿富汗。喀布尔电台当晚宣布，阿明已经被击毙，卡尔迈勒(Babrak Kan, 讨)被任命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席。1980年1月2日，卡尔迈勒宣称苏联军队是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开进阿富汗的。

1980年2月，苏联决定参加阿富汗内战。从1979年12月到1989年2月，共有62万苏联军人在阿富汗参加战争，其中死14453人，伤53753人，重病415932人。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占领，在苏联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这场侵略战争在耻辱的失败中结束，并且动摇了

整个苏联政权。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体现在加紧对中美洲地区和加勒比地区的扩张。1979年3月，格林纳达发生军事政变。毕晓普上台后，采取了亲苏古的政策。苏联同毕晓普积极发展各方面的关系，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1979年7月，尼加拉瓜的桑地诺(Sandinó)政权推翻了索摩查(Somoza)的统治。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国也开展反政府的游击战，苏联通过古巴向他们提供援助。同时，苏联积极同拉美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60年代末，拉美同苏联建交的国家有10个，到1979年，同苏联有外交关系的拉美国家发展到19个。

苏联还利用经济援助，同拉美国家发展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拉美仅有4个国家(不包括古巴)同苏联签订6项经济协议。到70年代，有11个拉美国家(不包括古巴)同苏联签订了55项经济协定。但是，苏联同这些拉美国家的贸易关系，存在着巨额逆差。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还积极在非洲进行扩张，主要体现在介入安哥拉内战、插手欧加登战争、在南也门策划军事政变。

1961年初，安哥拉爆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到1974年，安哥拉争取独立的武装力量主要分为三派：以内图(Agostinho Neto)为首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得到苏联和古巴的支持；以罗伯特(Roberto Holden)为首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美国给予支持；萨文比(Jonas Malhefio Savimbi)领导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

1975年11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苏联的支持下，宣布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也宣布独立，内战更加激烈。苏联大量增加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军火供应，至少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了3亿美元的援助，并把1.7万名古巴军人送到安哥拉，进行“代理人战争”。1976年3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安哥拉内战结束。内战结束后，苏联大力发展同安哥拉的关系，向安哥拉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并签署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协议。1977年7月，地处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为争夺欧加登地区的主权，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苏联公开支持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宣布废除1974年同苏联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从1977年11月下旬开始，苏联出动海空军。向埃塞俄比亚运送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2000名军事顾问和1.7万名古巴军队。1978年3月，索马里从欧加登地区撤军，埃塞俄比亚在苏联的支持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在南也门策划军事政变，是苏联在非洲之角进行扩张的又一个重大行动。1969年6月，鲁巴伊(Yobaya)和伊斯梅尔(Ismael)分别担任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和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苏联重点发展同伊斯梅尔的关系。1975年，鲁巴伊调整对苏联的政策，关闭苏联在亚丁的文化中心，宣布苏联驻南也门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1978年6月，苏联直接支持伊斯梅尔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鲁巴伊。1979年10月，苏联同南也门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这样，在非洲之角实际上形成了苏联、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的同盟，大大有利于苏联对非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利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机会，大力扩张自己在拉丁美洲的势力。苏联首先重点支持古巴。到20世纪70年代，苏古之间的贸易占苏联对外贸易总额的70%，古巴几乎100%的石油和棉花、80%的粮食依靠苏联进口，古巴生产的蔗糖的50%出口苏联。1972年，古巴正式加入经互会。到70年代末，苏联援建古巴的重点工业项目大约200个，苏联在古巴的专家和顾问达到1万人。苏联对古巴的经济援助也逐年增加，1970—1974年平均每年大约3亿美元，1975—1976年为10亿美元，1977年为20亿美元，1979年增加到30亿美元。1979年，苏联的经济援助相当于古巴国民生产总值的25%。

苏联和古巴还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苏联每年向古巴提供价值1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并在古巴驻扎拥有2800人的战斗旅和2800人的军事顾问。苏联在古巴修建了许多现代化的军事基地，通过古巴向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以及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游击队等提供援助。从1975年开始，古巴派遣大批部队参加安哥拉战争，卷入非洲之角的边界冲突。到70年代末，古巴在非洲的军队达到3.4万人，为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战略服务。

第四节 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对

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 and 变化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在中东地区，苏联在两伊战争中开始倾向伊拉克。到1985年，由于伊朗政府严厉处置伊朗共产党，以及伊朗不满苏联在战争中倾向伊拉克，伊朗和苏联的关系达到最低点。苏联无意对伊朗进行军事干涉，而期望现存政权为一个亲苏的政权所取代。自从伊朗国王1979年春天下台，以及同年年底苏军入侵阿

富汗，苏联和美国对抗的重点已经从阿咀地区，转到波斯湾地区。苏联战略的目标是防止美国同伊朗改善关系，遏制美国势力向波斯湾地区的扩张。为此，苏联不断向波斯湾国家示好，发展同一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关系。1980年至1982年，苏联在阿拉伯半岛国家的关系上有所突破。科威特在1980年与苏联签订了军火协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同意与苏联发展关系。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在1986年1月次提出“新思维”，开始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进行全面调整。戈尔巴乔夫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有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它们的不同选择不应成为发生冲突或军事对抗的理由。地区冲突给第三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解决地区冲突中，军事力量越来越无济于事，必须通过联合国、国际会议、双边或多边合作，通过谈判才能解决。

在“新思维”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和热点地区等，采取了脱身政策。阿拉法特在莫斯科不那么受欢迎了，他被警告，不要举行“巴勒斯坦起义”，否则整个事业就会完结。戈尔巴乔夫对会见曼德拉“一拖再拖”，并几次推迟去古巴的行程，对卡斯特罗的态度明显冷淡。

最为显著的政策变化体现在苏军撤出阿富汗。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中东政策有三个基本的原则，即加强同左倾、激进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改善与温和的、亲西方的中东地区国家的关系；联合有关国家，共同解决中东问题。其中第二个原则并非第一次提出，但这是第一次写入苏共正式的政策文件中，体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中东政策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积极改善与阿拉伯温和国家的关系。他意识到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重要的作用和地位，重点改善同埃及的关系。1985年，苏联大使回到埃及，两国关系开始升温。1986年，苏埃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重新安排了埃及偿还苏联军售债务的时间表，为两国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铺平了道路。

苏联还加强同科威特的关系。1986年7月，两国签订了经济和金融协定。1987年初，科威特向美苏两国请求保卫波斯湾的油轮航行。苏联在1987年3月宣布，同意出租三艘油轮，协助科威特将原油运出波斯湾。

苏联在对约旦关系上的最大成就是，促使约旦在1987年4月赞成召开有苏联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以解决中东问题。与此同时，苏联先后同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沙特的关系也有明显的改善。这一时期，苏联加强了同阿拉伯友好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合作。

苏联不断加强同叙利亚的关系，1974年至1985年，苏联向叙利亚提供的军援达到194亿美元，并将最先进的武器转让给叙利亚。苏联大批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驻扎在叙利亚，最多的时候有7000多人。1987年4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访问苏联，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双方一致赞同共同推动中东国际会议的构想，坚决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中东问题。

利比亚是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个战略盟友，苏联十分重视利比亚的战略地位及其推行的反美政策。1986年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袭击利比亚时，苏联显得过于谨慎，遭到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Omar Mouammer alGaddafi)的不满。对此戈尔巴乔夫承诺，苏联将协助利比亚恢复防御力量。南也门是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友好国家，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也大力发展两国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还改变了对巴解组织的态度，并逐渐恢复同以色列的接触。1985年以后，苏联对阿拉法特的态度出现变化，开始积极促进巴解组织内部各派的团结，并多次派主要官员去大马士革，调解巴解组织与叙利亚之间的矛盾。

1986年8月，苏联在莫斯科同巴解组织主流派举行会议，商讨促进巴解组织各派的团结问题。1986年9月，巴解组织的法塔赫、解放巴勒斯坦阵线、巴勒斯坦共产党等，在布拉格开会，就恢复巴解组织的团结达成初步协议。1987年10月，阿拉法特访问莫斯科，进一步发展了双方的关系。1988年4月，阿拉法特访问大马士革，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进行会谈，结束了双方5年的争执。这种发展有利于苏联中东政策的调整。

苏联调整了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政策，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表示，希望缓和同以色列的关系。1985年7月，苏联和以色列驻巴黎的大使举行秘密会谈，寻求改善双边关系的途径。1985年10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巴黎时表示，苏联不反对以色列的生存权和主权。1987年7月，苏联外交部官员访问以色列。这是20年来苏联官员第一次访问以色列，双方就建立领事关系达成了协议。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苏联也根据“新思维”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外交。苏联继续维持同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的友好关系，加强同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的联系，改善同摩洛哥、突尼斯、苏丹、索马里、几内亚等国的关系，恢复了同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的关系。苏联还参与了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进程。在拉丁美洲，苏联积极改善同拉美国家的关系，除发展同古巴的传统关系外，苏联还发展了同阿根廷、巴西和秘鲁的关

系。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亚洲采取了新的政策。1986年4月，苏联政府发表有关亚太政策的“政府声明”。随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演讲，阐述了苏联对亚太地区的新政策。他声称苏联既是一个欧洲国家，也是一个亚洲国家，极其关心亚洲复杂的国际问题，建议模仿欧洲安全合作会议的形式，召开“太平洋会议”以作为亚太地区的谈判机制。1987年7月，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苏联考虑到亚洲国家的不安，愿意全部销毁中程导弹。1988年9月，戈尔巴乔夫再次重申了苏联对亚太地区的上述政策。

为了为新的亚洲政策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氛围，苏联宣布从1989年6月起，两年内自苏联的亚洲地区单方面裁军20万，其中包括地面部队12个师，一个空军师，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将裁减12艘战舰。1989年6月1日，苏联宣布撤销中苏边界的中亚军区，这个军区是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所设立的。同时苏联还多次表示，将开放苏联远东地区并设立自由经济区。在这一政策指导下，苏联全部撤出了阿富汗，同意政治解决越南占领柬埔寨以及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等，从而大大缓和了亚洲地区紧张的国际局势。同时，苏联还发展了同东盟国家、南太平洋国家的关系。

在发展同第三世界友好关系的同时，苏联还采取积极措施，退出地区冲突。解决阿富汗问题是戈尔巴乔夫调整和改变第三世界政策、实施亚洲新政策的突出体现。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由于人侵和占领阿富汗，苏联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一方面，苏联在八年的战争中，伤亡5万人，损失飞机1000多架，军车2000多辆，军费开支达到400亿美元。另一方面，战争还给苏联带来了严重的国内问题，严重损害苏联的国际形象，并成为改善同美国和中国关系的主要障碍。

戈尔巴乔夫希望早日解决阿富汗问题。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10月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不论苏军在阿富汗支持谁，都应该坚决采取尽早从阿富汗撤兵的方针。戈尔巴乔夫告诉来访的阿富汗领导人卡尔迈勒，1986年夏季之前就学会保卫自己，苏联会提供帮助，但不是派兵和提供武器。1988年2月，戈尔巴乔夫就阿富汗问题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准备从5月15日开始，在10个月内全部撤出阿富汗。在4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苏联领导人决定从5月15日开始撤军。

1988年4月14日，巴基斯坦、阿富汗、美国和苏联等国，在日内瓦分别签署了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五项文件。文件规定：巴基斯坦和

阿富汗互不干涉，阿富汗难民返回家园，美苏两国提供保证以及联合监督。苏联承诺从 1988 年 5 月 15 日开始撤军，3 个月内撤出 50%，9 个月内全部撤完。1989 年 2 月 15 日，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

阿富汗问题解决后，苏联加快了解决其他地区冲突的步伐。戈尔巴乔夫强调，柬埔寨问题必须政治解决，支持安哥拉同美国等方面举行谈判解决问题。1988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同里根在莫斯科会晤时表示，同意按照阿富汗模式，解决西南非洲的问题。在美苏的同意下，1988 年 12 月 13 日，安哥拉、古巴和南非达成了协议书。12 月 12 日，各方在联合国正式签署了安哥拉、古巴、南非条约以及古巴从安哥拉撤军的协议。根据上述协议，古巴军队从 1989 年 4 月 1 日开始撤离安哥拉，27 个月内完成。这标志着苏联在这一地区所进行的代理人战争的结束，苏联从安哥拉脱身。苏联从第三世界的撤退有利于缓和第三世界的冲突，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突出体现。

思考题：

1. “三和路线”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特点。
2.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苏联对第三世界的“脱身政策”。

参考书目：

1. 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2. 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3.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中译本，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4. 罗伯特·唐纳森主编：《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
5.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6. Cole Blasier, *The Giant's Rival: The USSR and the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3.
7. Fawaz A. Gerges,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55-1967*,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8. Thomas Paterson, ed.,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9. Carol R. Saivetz, Sylvia Woodby, *Soviet-Third World Rel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 88, 1985.

10. Shri Ram Sharma, *India—USSR Relations, 1947–71: From Ambivalence to Steadfastness*, New Delhi: Discovery Publishing House, 1999.

第七章

冷战中的美苏军备控制与裁军

朱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军备控制和裁军是增进国际安全的必由之路。任何有关战争的历史经验都已经证明，军备竞赛和不受限制的军备发展，是导致战争的基本原因之一。要防止战争的爆发，降低冲突升级，人类必须控制军备，并进行有效的裁军。在核时代，核军控和核裁军是减少核大战风险、增进国际安全的必要条件。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突出优势，就是握有超级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他们之间的军备竞赛，以及由此产生的在军备控制和裁军等领域的争斗与妥协，是冷战期间美苏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

第一节 军控与核军控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裁军是指销毁武器装备和减少战斗性人员。军备控制在原则上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对某种类型的武器系统予以限制或者削减。学术界通常将军备控制定义为一个过程，即一切有关调整军备的国示谈判的内容与过程。由于冷战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对抗的双方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军事强国，它们都拥有大量的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和运载工具，所以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军备控制，准确地说就是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控制。

军备控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削减军备，二是限制军备。和裁军相比，军备控制更容易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目标。投有有效的军备控制，裁军巨谈不上。虽然军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是裁军努力的一部分。且在现实国际关系中，裁军和军控是可以做明确区分的两个概念。

在冷战时期，军控在双边和多边的范围内，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军控只是在个体国家范围内，根据本国对局势的判断，进行军事力量调整的一个代名词。从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来看，一个成功的军备控制进程，是有效裁军的基础。

从包括冷战时期在内的国际军控发展情况看，军控事业对国际安全

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军控将降低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减少因为武器力量的结构性发展而可能出现的发动突发性战争的可能性。

——控制武器技术和武器系统的发展，防止或者控制军备竞赛。

——建立有关各方的安全关系机制，控制危机升级，降低在安全问题上的紧张和对立。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在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抑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减少直接或者间接威胁安全的武器根源。

——军备规模和军事能力的控制，有助于促进有关国家在安全领域形成对话的习惯，建立信心增强措施，促进在安全领域内的合作的发展。

——为了在国际关系中更广泛、更深刻地体现和追求人道主义，而对某些类型的武器系统进行特别的限制或者裁减。

就实现军控的途径而言，“军备控制”一词包括各种旨在限制战争破坏力和防止战争意外爆发而签署的国际协定。这些协定降低了军备竞赛的程度，并对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发展领域等作出严格的限制。

军备控制的范围可以包括：防止核导弹由于意外原因点火而设计的空间自动引爆装置，为使关键的决策者们能够在危机期间不断保持联系而安装的热线，暂停某种类型的核试验，两国或多国之间为控制武器出口和军事技术向第三国的转让等达成的协议，等等。军备限制还包括国际法中的惯例法原则，这些原则的宗旨是以人道主义战争法的原则，规范和限制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

在人类历史上，成功的裁军条约可以说寥寥无几。1817年美国 and 英国达成的《拉什·巴各特协议》是地区性裁军协议的样板。这一协议最终使得北美洲的五大湖地区，实现了非军事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联主导下，也进行了一系列军控和裁军的努力，但最后都失败了。1933年5月德国首先退出了国联裁军会议，一战后凡尔赛体系就此逐步走向崩溃。6年后，法西斯德国就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例子即说明裁军在稳定国际局势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在力量分散化的国际系统中，裁军作为削弱国家实力和国家权力的途径，是一个难以真正有所作为的领域。

军备限制的例子却比比皆是。从1900—1907年《海牙战争公约》对达姆弹的限制使用到1949年《日内瓦公约》对战俘和伤员的保护性规定，都体现了现代军备限制的内容。但是，在冷战爆发以前的军备控制或者军备限制，主要是为了体现战争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些限制或者控

制对于实际的军备发展和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1922年在华盛顿也签署了《五国海军条约》，对美、英、法、日、意五国的海军军备建设中的战列舰吨位，规定了一个相互之间的比例。但后来的发展证明，《五国海军协定》只是各国海军军备建设方面的暂时妥协，是一次暂时性的外交成果。军备控制实质上反映了各国的外交斗争的现实需要，也是国家间权力争夺的重要手段。

1945年后，冷战迅速爆发。核武器在美苏全球战略对抗的刺激下，迅猛发展。核军备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战争规律，而且也使得军控和裁军变成一个必须进行和加以维护的过程。

首先，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核大国军事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传统结构。由核导弹的生产和发展而引发的所谓“第二次打击”，形成了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恐怖均势”，其基础则是两国拥有的战略核力量能够“相互确保摧毁”。

到60年代初期，“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开始主导美国和苏联的战略安全观念。那以后，因为双方的战争手段所具有的巨大的毁灭性，两个超级大国及其两大军事集团成员之间，形成了军事上的相互依赖，其结果是它们彼此之间的安全利益已经不可分离。

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就曾指出，军事相互依赖状态的变化，是随着大国安全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别国，以及大国用什么平等的手法获得自己国家安全等情况的变化。然而，当美苏在军事上形成相互依赖的同时，它们各自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却减少了。因为美苏在核安全方面，可以通过内部而非外部的手段，形成相互平衡。它们依靠的是自己而不是盟国的力量。总的说来，国家的内部平衡要比外部平衡更可靠、更精确。国家在判断自己的相对力量时，出现的错误可能要少于它们在判断敌对联盟的实力和可靠性时所出现的错误。结果，军控客观上就成为维护美苏军事集团之间在安全利益上相互依赖的稳定性基础性工作。因此美苏的核军控进程升始有了明显发展。

核军备的发展给整个国家关系带来了革命性的因素，也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构筑核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核战略时，必须结合军控与裁军政策等，提出了紧迫性。军控与裁军问题由此获得了以往国际关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的战略地位。

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核武器既是最有用的武器，也是最没有用的武器。核武器不能直接使用于局部战争或者地区纠纷，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共同接受的原则。

1947—1962年间，美苏两国在相互关系中，还以“动用核武器”相互威胁。但是，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两国就再也没有为取得政治、外交上的好处而动用核威胁。在整个冷战尖锐对抗的时期，苏联和美国本土都一直保持在冲突的范围之外。两国的军队从未直接交火，因为两国的领导人都害怕，这样一种敌对的对抗很容易升级为一场无法控制的大规模核冲突。

美苏各自的威慑战略也是基于这样的设计，即如果在局部战争中遭到来自另一国家的即使是常规武器的进攻，那么也将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反击；当战术核武器反击无效的时候，将迅速运用战略核武器进行还击。因此，威慑战略在逻辑上展示了这样的前景，即一国即使面临的是有限的常规战争，其结果也可能遭到战略核力量无法忍受的大规模反击。为了形成有效的威慑效应，核战略突出地强调，从常规冲突到大规模核战争，可能只是十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出现的局面。

另一方面，真正的核战略同样需要避免轻易发生美苏之间的直接对抗，避免轻易发生战争，否则，就等于“自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曾扬言，要在一定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但对冲突升级的担心也导致两国都不得不明确区分，使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之间的界限。如何保持威慑的稳定，成为了美苏两国设计和贯彻可靠的核战略的核心环节。

具体来说，既要有在军备竞赛基础上，保持摧毁对方的足够战略力量，让对方相信自己有在必要时使用这些战略力量的决心与勇气；同时又要采取一种谨慎与“负责”的态度，避免给对方发出错误信号，以免刺激对手“先发制人”，采取冒险或者绝望的政策。能做到这一切，才是核威慑战略得以持续的首要目标。

军备控制恰恰能对核威慑起到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使得威慑更加可靠。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军控谈判不仅可以让美苏这两个对手直接对话，明确各自的并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底线，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美苏的核战略库增加“透明度”，增加各自的战略信心，建立国际战略稳定的基本架构。例如，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规定，要限制美苏双方设立导弹防御系统，这就可以使两个超级大国只保持“进攻性威慑”、双方承诺放弃“防御性威慑”。这是确保“第二次打击”基础上威慑稳定的重要基础。

军控谈判还可以增加各自安全信心的技术措施。例如，1972年谈判反导问题时，美苏双方还达成协议，承诺不干扰彼此的军事间谍卫星。这是为了保证军控协定的执行和可信度的补充措施。对这一点，国际政

治理论专家谢林和霍尔帕林曾经作出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们指出，当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与潜在敌国的军事力量处于对峙状态时，它必须在明里暗里与对手相互配合，以求避免出现无法挽回的危机，也避免虚惊和误解对方的意图。一方面要警告对方，如果对方进行不可容忍的挑战，就要给予反击或报复——以这种威胁对其实行威慑；另一方面，也要使潜在的敌国感到放心——如果它采取克制的态度，对方也一定采取克制的态度。

军控能使核武器只限于起威慑作用，避免刺激对手，或因为不了解对方的核力量底牌，导致铤而走险，降低未经授权随便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就是规则对实力的补充作用。同时电是以政治意志和战略能力，思考和掌握核武器的逻辑结果。核力量只有在充分地实施规则的前提下，才能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只有在保证战略稳定的政治意志支配下，才能达到保障国家安全的作用。否则，核力量发展出的威慑效应完全有可能被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或者缺乏危机管理而出现的冲突升级，甚至“擦枪走火”等所破坏，而无法达到真正的威慑效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冷战时期产生的军备控制的基础就是明确承认，大国之间并不完全是对抗关系。这也充分说明，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的基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均势——的形成和稳定，不但是一个有关各方相互实力间的制衡过程，更是一个如何运用和管理实力的外交、政治和战略的互动过程。

美苏冷战期间的核军控机制的产生和建立，在相当大程度上巩固了两极体制，也是为美苏各自的军事战略服务的。英国、法国和中国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相继研制成功核武器，是对两极体制的挑战，也是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的必要举措。

美苏之间直接的“核安全依赖”，在冷战期间推动了两国在核军控和裁军方面的发展，并以这种发展作为美苏尖锐的战略对峙关系“缓和”的标志，成为追求缓和政策的重要成果。

尽管在和平时代，裁军谈判都是各国所“支持的”，但充其量是所谓“和平意愿”的点缀而已。但是在核时代，对美苏两国而言，核军控和核裁军有其自身的迫切性。核军控、并且通过核军控来稳定彼此关系、进而走向核裁军，成为美苏都不可回避的共同利益。因为双方都发现对方置人于死地的力量在不断增长，结果导致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即对核武器无可防御。一旦核战争爆发，彼此都无藏身之地。双方都实行的是“考验意志力的战略”，都刚彼此的战略核力量存在着深深的畏惧感。

所以，尽一切可能避免最后摊牌、进行危机管理以及制订“游戏规则”，就成为双方都可以获益的共同利益。由此产生了美苏两国通过军备控制来管理其核关系的必要性。

虽然谋求共同利益从一开始不是美苏冷战的目的，但正如一些专家所言，有时美苏的利益会不谋而合，关键问题是它们能否承认这种共同利益，并共同采取相应的行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苏冷战期间双方必须而且确实在仔细地考虑和制订核战略。实际上，如果美苏双方没有彼此谅解的余地，如果双方根本没有共同利益，甚至连避免相互毁灭的共同利益都没有，就没有必要去讨论核时代的战略问题了。

建立美苏双边的核军控机制、并按其需要将这些机制部分扩展到国际多边场合，如核不扩散，构成了美苏冷战时期在核军备竞赛上的“游戏规则”，也成为了它们各自需要尊重和接受的共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冷战时期，美苏方面要进行大规模的、疯狂的核军备竞赛；另一方面，正是从这两个国家开始，国际核军控和核裁军架构不断形成和发展。这种既是“游戏”执行者、又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的现象，在以往的国际关系中是看不到的。

管理美苏之间的战略核力量关系，客观上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与威慑战略平行的安全与战略需要，其目的是避免因为事故、不必要的擦枪走火、缺乏对各自战略意图最起码的沟通等，导致误判。或者因为缺乏必要的军事透明度，导致鼓励冒险的政策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美苏军事对抗。总之是在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已经使任何国家都无法承担大规模战争代价的情况下，避免美苏之间轻易地走向“最后摊牌”。

曾经发生过一个生动的事件。1961年春，美国的侦察飞机深入苏联领空执行空中间谍使命，结果遭到苏联的反击。当时的美国驻欧洲部队派遣了12架装载有核炸弹的F-102战略轰炸机，起飞将U-2飞机护航回来。这一消息报告给当时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后，肯尼迪大发雷霆。他说“为什么总是有一些狗娘养的不能领会我们的意图。”肯尼迪的这句话典型地反映出，美国在进行核军备竞赛的同时，具有强烈的“危机管理”意识。它也是美国希望对核武器运用必须保持高度谨慎性的典型例子。

最后一个可以用来解释冷战时期美苏进行核军备竞赛的历史，同时又是核军控发展的历史这一事实的因素，是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本身。由于两极体系的存在，美苏的军控政策不需要太多地根据其盟国的政策来制订，只要根据自身的考虑和安排就可以了。美苏两极体系的结构性

特点之一是，两大阵营的盟主的战略可以是灵活的。因为在过去老式的均势政治中，同盟的灵活性既有利于战略的稳定性，又有利于限制决策的自由度。在冷战的新式的均势政治中，情况刚好相反。同盟的稳定性反而有利于战略的灵活性，有利于扩大决策的自由度。

总之，美国和苏联决定自身的政策时，都不必太顾及同盟国的态度。国际政治理论中有关两极体系稳定的论述，为冷战时期的核军控进程提供了有力的说明。冷战时期那些核军控机制的发展，的确带有“两极体系”的鲜明特色。

在冷战期间，国际社会在核军控和核裁军方面，确实取得了不少的突破。按照这两个目的，形成了一系列的条约约束，建立了国际核军控和核裁军的基本架构。事实上，美苏两国的核军控行动进一步巩固了美苏之间的“恐怖均衡”，也是对它们“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补充和发展。核军控与核裁军能使核武器只限于威慑的作用，避免将核武器用于任何军事或者政治冒险，也不会出现任何未经授权而随意动用核武器的现象。美苏等国都为此建立一整套的“核保险柜”制度，只有总统在掌握有“核钥匙”。

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现代核战争的“两败俱伤”的特点，也是为了巩固彼此的核威慑和核均衡，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达成了一系列稳定它们核关系的规制。这些规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美苏相互核威慑的基本规范、原则、规则和处理核问题时的基本程序。这些规制包括如下内容。——每个超级大国都保持有足以使对方遭到无法接受的打击的核力量，这种双方所具有的核能力使得彼此可以“确保摧毁”。

——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都不应针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军队或者领土，来部署自己的军队，因为这种行动可能引起无法控制的冲突的逐步升级。——对核武器的控制不转交给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盟国。

——超级大国之间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并只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情况下对非核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上述规制在一定意义上帮助美苏稳定了它们之间的“恐怖均势”，也形成了冷战时代“两极结构”对核武器技术的国际控制规则。从这个意义上，冷战期间的核军控的发展，既使得这些规制固定化、法律化，也是推动美苏战略力量均衡、稳定彼此战略竞争态势的补充性措施。

第二节 冷战时期核军控的起步与进展

为了对核力量和常规武器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于1946年建立了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又于1947年建立了常规军备委员会。但是，美苏冷战的爆发，使这两个委员会到50年代初已经无所作为了。1952年1月，联合国大会建立了裁军委员会，取代了上述两个机构。1954年间，联合国还设立了裁军问题小组委员会，希望为裁军设立一个新的国际论坛。1955—1957年间，该小组委员会举行多次讨论，委员会的成员也提出不少提案。由于当时正是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抗的时期，这些是根本无法真正付诸实施的。苏联在1957年退出了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的谈判。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政治力量等，无不坚决反对美苏核试验和大规模发展核武器。是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推动了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发展。

1954年3月，发生了日本渔船受美国核试验伤害的“福龙丸事件”，导致日本朝野对美国核试验作出了强烈反应。日本国会曾在1954年4月1日和5日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将核武器宣布为非法，并要求毫不迟疑地停止核试验。“福龙丸事件”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1954年4月，印度尼西亚总统沙思特鲁阿米佐和印度总理尼赫鲁都呼吁停止核试验。

在尖锐激烈的冷战对抗中，美苏两国为了争取政治主动，都很重视利用国际裁军论坛攻击对手，以造就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政治环境。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要求，它们不论是在双边还是在多边关系，不得不开始了有关停止核试验问题的对话和谈判。但是，当时的有核国家美、苏、英三国一方面进行军控谈判，另一方面都在抓紧进行核军备竞赛。从1956—1957年，三国核试验的总爆炸当量为8900万吨；1957—1958年间达到了1.74亿吨。

1958年之后，美苏两国已经取得了大气层内核试验的足够经验，核谈判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上进入了较为实质性的阶段。其中，美国改变以往一直坚持的政策，即将停止核试验与裁军相结合。这对推动美苏禁止核试验谈判，起了重要作用。1958年9月开始，美英苏三国纷纷宣布，暂停核试验两年。到1960年3月，美苏有关禁止核试验的立场不断拉近。“U. 2事件”和东西方关系新的紧张，一度使得会谈趋于停顿。

到1961年9月，苏美等又相继恢复了核试验。在试验中，苏联爆炸

了当量为 6000 万吨的核弹头，超过了 1953 年美国爆炸的 5000 万吨当量的核实验。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当量的核试验。

1962 年 3 月，联合国日内瓦裁军委员会建立了美苏英三国专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继续讨论禁止核试验问题。1963 年 7 月 25 日，美苏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简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随后不久，在 1963 年 11 月召开的 18 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部分禁止核试验的决议。但是，该项条约并没有禁止地下核试验，甚至使地下核试验合法化了。美国在 1964—1967 年间，共进行了 221 次核试验，而未签署该条约时的 1955—1964 年间，美国所进行的核试验也只不过为 205 次。

在美苏英三国就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举行会谈的同时，反对核扩散问题也成为国际核安全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止核扩散的意义不仅在于减少世界核武器发展的规模和范围，控制核军备的随意性；更重要的是，反核扩散有助于稳定美苏两极体制，避免核军备竞赛蔓延到更多国家，从而导致核战争爆发可能性的扩大。

美苏等核大国认为，当核武器主要局限在美苏或者少数核大国的范围里时，它们之间相互的战略威慑一旦确定，核战争危险就被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如果核扩散使得核军备流失，新的地区性国家使用核武器风险的增加，将会使控制核战争越来越困难，爆发核战争的几率也会随之增加。如果美苏在各自所控制的军事集团势力范围之外，发现有新的核力量的存在，为了取得这样的地区性核力量的支持，必然导致更为尖锐的全球性地区争夺。地区性核力量更会提高美苏核均势的不确定性，客观上也会给恐怖均势带来新的挑战。

同时，美苏等超级大国都认识到，核扩散也会给它们带来新的国际竞争对手，挑战世界性大国的地位。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有可能使得即使力量占据巨大优势的美苏超级大国等，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上均变得更加无所作为，它们都有可能危机或冲突中，成为核扩散结果的“人质”。

虽然在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削弱对于、占领和保持优势等，是它们各自强化其战略地位的基本需要。但是在核扩散问题上，它们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或者说，反核扩散给两大超级大国带来的好处，要远远大于两国有可能为此付出的代价。

在以美苏为主导的两极世界结构中，核扩散可能是改变这个秩序的最大因素。无论是从稳定两极体制，还是从加强美苏危机管理、降低

有可能出现的核冲突等等各个角度看，反对核扩散是冷战时代国际社会想要减少核战争噩梦所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也是美苏两大军事集团为了稳定对峙状态、控制全面核冲突的爆发等，所必不可少的战略性选择。

1961年，爱尔兰首先在国际社会中提出了反核扩散建议，同年被联合国决议所采纳。60年代后期，核扩散有严重化的趋势。阿根廷、巴西、以色列、南非、印度和巴基斯坦，甚至台湾地区等，都有可能掌握核武器技术，或者拥有核武器。当时的一种普遍看法是，核扩散会导致连锁反应。在美国存在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核扩散不可逆转的转折点就看“第6个核大国”什么时间出现。如果出现了第6个核大国，那么“从第6个发展到第16个有核国家的进度将是非常迅速的”。

1968年6月，在美苏立场一致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简称《核不扩散条约》。1968年7月1日，《核不扩散条约》在华盛顿、莫斯科和伦敦等地，同时举行签字仪式。当时有59个国家成为该条约的签署国。1970年3月，该条约达到法定成员国数，从而正式生效，有效期为25年。在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同时，美、苏两国宣布进行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1968年11月苏联人侵捷克，使该谈判一度陷入停顿。

1969年11月，美苏两国恢复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到1972年5月，双方先后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举行了123次会谈。1972年5月26日，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了《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和《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中文简称“反弹道导弹条约”。这两项条约合起来，通称为《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规定将双方的进攻性洲际导弹冻结在现有水平上。具体来说，在陆基洲际导弹方面，美国可以拥有1054枚，苏联为1618枚。在潜艇发射的洲际导弹方面，美国为710枚，苏联为950枚。美国可以拥有携带洲际导弹的核潜艇“艘，苏联为62艘。苏联所拥有的重型洲际导弹的数额，不得超过313枚。该条约没有对当时美国在技术和装备上都处领先地位的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做出任何限制，也没有规定限制美国同样处于领先地位的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虽然苏联在这份条约中获得了洲际导弹数量上的优势，但在核弹头总数上，美国仍处于优势。该条约的有效期为5年。

《反弹道导弹条约》规定，美苏双方只能建设两处反弹道导弹发射

场，其中一处用于保卫首都，另一处用于保卫洲际导弹基地。在每个发射场不得部署超过**100**枚的反弹道导弹。在这个基础上，条约规定美苏任何一方不得研制和部署陆基机动性、空基和海基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美苏双方还就减少偶发战争风险以及改善华盛顿—莫斯科之间的电话“热线”达成了协议，以防止和处理双方之间有可能出现的核危机。此外，双方还建立了一个长设协商委员会，以便就协定执行中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磋商。为了保证对条约所设限定的核查，双方还承担义务，保证不干扰卫星侦察等核查手段。

1973年6月21日，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美，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防止核战争协定》和《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提出，要在一年内签署一项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永久协定。由于美苏在分导式、多弹头导弹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谈判未能成功。

1974年6月底尼克松访苏，**7月3日**，美苏双方签署了《美苏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该条约规定从**1976年3月31日**开始，美苏两国停止试验爆炸当量超过**15万吨**的地下核试验，但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试验不在受限制之列。同时，美苏两国还签署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议定书》。该议定书将双方拥有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从两处减少到了一处。**1974年11月24日**，美国总统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举行会谈，签署了《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的联合声明》。该项声明规定，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向上平衡”的基本界限，即把各方的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的总限额，定为**2400**件，其中分导式、多弹头导弹为**1320**枚。

原定的正式协定应该在**1975年**上半年完成签署。但是由于美苏关系围绕着安哥拉事件出现了新的紧张，勃列日涅夫访美计划推迟。但美苏双方在和平核爆炸问题上的谈判取得了突破。**1976年5月28日**，美苏双方签署了《和平核爆炸条约》。条约规定美苏单次核爆炸试验的当量不得超过**15万吨**，可以辨别的组合核爆炸的总当量，不得超过**150万吨**。

卡特上台之后，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列为优先日程。**1979年6月18日**，美苏双方最终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该条约由序言、一项有效期到**1985年12月31日**为止的条约正文、一项指导下一阶段谈判的《原则声明》，以及若干附件等组成。条约的基本内容如下。

——双方战略武器总数的最高限额是**2400**件，从**1981年**初开始进

行削减，到1981年年底r降到2250件。

——双方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运载工具，以及可以携带射程在600公里上的巡航导弹的战略轰炸机的总数等，不得超过1320件。

——在上述限额内，双方分导式多弹头陆基和潜射弹道导弹的总数，不得超过1200件。

——重型洲际导弹限定为308件。

——在上述限额内，美苏两国只能研制和部署一种新型战略武器。

——每枚分导式多弹头陆基导弹所携带的核弹头，不得超过10个，海基导弹不得超过14个。

——陆基和海基巡航导弹的射程限制在600公里以内。

除上述七条外，条约还对导弹的发射量和投射量等，作出了规定。苏联则声明“逆火式”战略轰炸机的年产量不超过30架。

进入80年代后，美苏关系围绕阿富汗问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紧张，第二阶段条约在美国国会没有得到批准。但是，里根政府依然主张，美苏双方都应该在实际上遵守《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的约束。

1981年11月30日，美苏围绕欧洲中程导弹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1982年6月29日，美苏削减战略核武器会谈也在日内瓦开始举行。1983年3月，里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后，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美苏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和欧洲中程导弹谈判于1984年1月双双破裂。在僵持了近1年之久后，会谈于1985年3月在日内瓦重新开始。

由于苏联国内政治的变动而导致的政策不断调整，终于导致1987年12月8日美苏双方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美苏销毁中程和短程核导弹条约》，中文简称《中导条约》。

该条约规定：双方在3年内全部销毁各自射程在500—5000公里的陆基核导弹。美国将销毁导弹859枚，其中潘兴-11和陆基巡航导弹689枚（包括已经在欧洲部署的429枚），潘兴-1A导弹170枚（尚未部署）。苏联将销毁导弹1752枚，其中分导式、多弹头的SS-20导弹410枚，单弹头的SS-20和SS-4导弹826枚，SS-12和SS-23导弹926枚。

该条约还规定了严格的核查措施，即在3年的销毁期内，各方每年可对对方进行20次现场检查；在随后的5年内，每年15次；在最后的5年内，每年10次。在现场检查时，双方可以互派检查人员，常驻对方生产导弹的工厂和设施，并有权进行突击性检查。

美苏1987年12月签署的中导条约是冷战时期美苏核军备竞赛的一

个转折点。虽然所销毁的中、短程核导弹的弹头数量，在美苏核武库中只占总数的4%左右，却是两国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的缓和走向高峰的标志。该条约的签署为两国在核武器领域内的战略对峙走向缓和拉开了序幕。东西方首先在核军备方面发出了结束冷战的信号。

自60年代以来，美苏在双边核军控领域获得了一定进展。这些条约在“两极体制”的架构内，大致稳定了美苏之间的核竞争，也稳定了双方战略核武器的对峙格局。双方通过谈判所建立的一些机制，如设立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电话热线，为减少一场偶发性战争所拟订的其他各种条款等等，对在两极对抗的格局下维护稳定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基本和平等等，无疑都是有益的。

但是，通过谈判所签署的协议是有限的，美苏战略核力量的发展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从1945年美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到199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这51年间，全世界共进行了2046次核武器爆炸试验。几乎是平均每9天，世界上就进行一次核试验。美国无疑是世界上进行核武器爆炸试验最多的国家。几乎是平均17天，美国就要进行一次核试验。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冷战期间美苏所达成的军控协定，没有一项否定了美国增强军事力量的必要性，也没有一项(反弹道导弹条约是例外)使原定的增强军事力量计划发生很大的改变。

第三节 “START I” 和 “START II”

“START I”指《美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指《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

美苏两国大规模的核裁军出现在冷战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军控事业所面临的基本任务和冷战时代相比，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由于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在全球战略对抗的瓦解，以及东西方之间军事敌对状态的结束，核大国之间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大规模发展，已经失去了冷战时期才具有的大部分的政治、军事和战略依据。

1989年6月19日，美苏开始了第11轮削减战略核武器会谈。在美苏结束冷战努力的推动下，1990年6月1日，美苏两国首脑发表了《关于削减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已就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主要条款等，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达成了一个框架性协议。1991年7月31日，美国总统布什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签署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即《美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条约的主要

内容如下。

——美苏两国所拥有的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包括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和战略远程轰炸机)的总数,各自为**1600**件。苏联所拥有的**ss. 18**重型洲际导弹不超过**154**枚。

——美苏所拥有的战略核弹头总数各自削减到**6000**个。其中,洲际和潜射导弹所携带的核弹头总数不超过**4900**个,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所携带的核弹头不超过**1540**个,机动洲际导弹所携带的核弹头不超过**1100**个。

——美苏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总投掷重量,各自削减到苏联现有水平的**50%**。

——不携带远程空地核巡航导弹的重型轰炸机,每架算作**1**件战略运载工具,其所携带的核炸弹和短程攻击核导弹等,算做一个战略核弹头。——凡射程超过**600**公里的空地巡航导弹,列为远程空地巡航导弹。携带此类巡航导弹的重型轰炸机,每架算作**1**件战略运载工具。美国可拥有此类轰炸机的总数不超过**150**架,苏联不超过**180**架。美国轰炸机每架可实际携带远程空地巡航导弹的数量,不超过**20**枚,但按照条约的规定计算,只算做**10**个战略核弹头。苏联每架轰炸机可实际携带的数量不得超过**16**枚,但只算做**8**个战略核弹头。

——明确规定条约执行过程中的相互核查机制,包括:为了确定基本数据而进行的现场核查;就武器系统的改装和销毁进行现场核查;对洲际弹道导弹的生产设施的周围和出入口,进行连续不断的监控;对战略核武器和载人飞行器等有关设施,进行突击核查;按双方同意的程序,对“可疑地点”实施核查;建立联合监察委员会,监督条约的执行情况,解决双方可能出现的争执。

——采取分阶段裁减原则,在条约生效后**7**年内分三个阶段进行裁减,每个阶段均有商定的限额,以保持双方战略核力量的平衡。

按照条约规定,美苏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将美苏各自拥有的战略核武器储备等,削减**30%—40%**。**1994**年**12**月,该条约正式生效。美国在**1992—1998**年间,为俄罗斯提供了大约**4.3**亿美元的核武器销毁和处理费用。到**1997**年,美国和俄罗斯所拥有的核弹头总数已经从**1990**年时期的**9600**件,下降到**7000**件或**6800**件之间。到条约全部执行之后,美俄的核力量将减少**30%**。

第一阶段美苏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签署,是自**1987**年**12**月中导条约之后,美苏在核裁军方面迈出的重大步伐。在冷战开始以后的历史

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心愿，即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在条约签署后不久，美俄双方又在 1991 年 9—10 月分别宣布削减各自所拥有的战术核武器。

1992 年初，美俄又相继通过谈判，制定出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框架。1992 年 1 月 28 日和 29 日，美国总统布什 (George Bush) 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Boris Yeltsin) 相继提出新的裁军倡议，主张在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裁减美俄两国的核武器。1992 年 6 月 16 日，美俄两国总统在华盛顿会晤，达成了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谅解协议。

该协议规定，美俄双方决定在 2003 年之前，将各自拥有的战略核弹头，削减到 3000—3500 枚。两国总统还决定，为实现该谅解备忘录的精神签定一份和约。1993 年 1 月 3 日，美俄两国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该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对美俄所拥有的核武器分两个阶段进行总额削减：第一阶段是从条约生效的 7 年内，双方将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导弹和重型轰炸机三者所携带的核弹头的总数各自削减到 3800—4250 枚。第二阶段，即到 2003 年 1 月 1 日以前，双方将上述各类核弹头总数削减到 3000—3500 枚。

——削减战略弹道导弹：美俄双方将各自销毁包括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全部陆基多弹头、分导式洲际导弹；各自将潜射弹道导弹的弹头削减 1700—1750 枚；销毁包括试验和训练用的所有重型洲际导弹发射井；从 2003 年 1 月 1 日起，双方不得生产、拥有、试验和部署多弹头洲际导弹。

——关于重型轰炸机的限制：规定双方部署的机载核武器数日按照实际载弹数计算，每方不得超过 750—1250 枚。

在 1993 年 1 月美俄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之后，由于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对美国和北约政策，也是为了保持俄罗斯大国实力，减缓国家综合国力下滑的趋势，俄罗斯国家杜马一直反对批准该条约。但美俄有关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合作一直在继续。

1994 年 1 月，美俄首脑举行莫斯科会晤，与当时的乌克兰领导人共同达成了一份三边协议，为削减乌克兰拥有的核武器铺平了道路。1994 年 9 月，叶利钦与克林顿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 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谈，决定加速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执行进程。1996 年 1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俄罗斯，由于国家杜马中占据多数的俄共反对，该条约在俄国始终没有得到批准。不过俄罗斯历届政府持续不断地推动条约的批准，并以此作为发展与西方关系的一项重要工作。1997年3月，叶利钦和克林顿在赫尔辛基举行首脑会晤，这是美俄核裁军进程中的又一历史性事件。这次首脑会晤签订了《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议定书》，宣布两国决定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执行完成时间，从2003年1月31日，推迟到2007年12月。双方还同意，在俄国杜马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后，立即展开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会谈。同时，美俄两国还初步达成共识，在2007年12月31日，即第二阶段条约完成时间之前，进一步将双方的核弹头削减到2500—2000枚之间。同意第三阶段条约将在2003年年底之前，销毁各自拥有的全部多弹头、分导式洲际导弹，包括美苏原来都引以为“王牌武器”的MX机动洲际导弹和SS.18和SS.24洲际导弹。

美国一直希望推动俄罗斯与美国进行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会谈，这也符合俄罗斯的基本利益。在整个90年代，美俄在核裁军领域的合作一直保持了发展的势头。2000年4月14日，俄国国家杜马终于批准了《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俄之间的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将从建议阶段转向实质谈判阶段。

第四节 后冷战时代国际多边军控的发展

除了美苏之间的核裁军机制之外，90年代国际社会在防止核扩散和进一步推动核军控发展等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国际军控在后冷战时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国际安全意义。

冷战的结束和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发展，为国际军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在军控领域的斗争中，两极对抗的瓦解有利于国际社会真正实现军控合作；合作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军控机制得到了不断发展。在后冷战时代，国际军控的目标不再是为了降低局部军事领域的紧张状态，或者只是为了稳定美苏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关系，而是出现了向全面降低国际安全紧张关系发展的趋势。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在后冷战时代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心声，也成为国际军控事业的一个目标。与冷战时期相比，后冷战时代国际军控事业成为国际社会不断走向团结与合作的象征。大国在军控领域的合作与协调进一步发展，以中、小国家为代表的国际军控力量在军控舞台上空前活跃，非政

府组织积极参与了军控谈判进程，并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影响力，少数大国垄断国际军控的局面基本结束。国际军控成为了追求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国际社会的共同事业。在后冷战时代，国际军控更多地反应了国际社会而不是少数国家对冷战后世界安全的关注，推动核裁军以及实现杀伤性武器的不扩散等，成为当前国际军控事业的两大关注点。著名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为此曾经断言，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军控事业是“国际安全不能重返冷战结构的重要保障”，也是在相互依赖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国际社会的凝聚力在安全领域必须具有的发展。

不扩散体制是当前国际社会防止核扩散和实现后冷战时代核安全的重要建构。如前所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于 1968 年，在 1970 年由于签字国达到了法定数目而正式生效。到 1999 年底，不扩散条约已经拥有了 187 个批准国。这是一项旨在防止核武器扩散、促进世界核安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条约。该条约的基本内容如下。

——只允许 5 个公认的核大国——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器，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实现逐步裁军。

——无核国家必须永久放弃拥有核武器，不研制、制造和装备核武器。——国际原子能机构将通过检查来监督该条约的实施情况，防止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裂变物质的扩散。

——核能应该用于和平事业。不扩散机制中包括 5 年一度的不扩散审议会议，由该条约的所有缔约国参加。

在 1995 年的续约及审议会议上，所有的国家都同意无限期地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上述后冷战时代存军控和裁军领域的发展，是整个冷战时代国际社会致力于军控和裁军的巨大努力的结果，也是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呼吁和平，反对军备竞赛，特别是反对核军备竞赛的历史潮流的延续。

自 50 年代以来，在国际社会中签署多边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而抑制核扩散和核军备竞赛、降低核战争危险，一直是国际社会的奋斗目标。自 70 年代以来，随着绿色和平组织悟面的兴起，禁止核试验对地球生态与环境家和人民要求禁核试验的呼声不断高涨。

1954 年 4 月 28 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国际社会中最早提出终止核试验的倡议，主张所有国家签署“停摆协定”。从那时以来到 1996 年的 42 年间，联合国裁军机构一直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话与谈判，争取停止核试验，实现核军控，继而真正走向核裁军。这些谈判从最初美、苏、英三国磋商，扩大到了联合国

在日内瓦的 18 国裁军委员会。1983 年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改名为“裁军会议”之后，有关禁止核试验的讨论一直是联合国裁军机构的重点对话内容。1990 年，裁军会议下属的研究核试验查证问题的特别委员会，扩大改组成“禁止核试验特别委员会”，专门就签署全球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磋商和研究。在《核不扩散条约》每 5 年所举行的历次条约审议会议上，禁止核试验问题都是重要议题。由于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禁止核试验采取不同的立场，谈判各方总是相持不下，争执不清，条约的通过工作也无法成行。美国在冷战时期一直倾向于“限制”核试验，而苏联为了谋求在国际裁军论坛上对美国的政治优势，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主张，一直提出要“禁止”而不是“限制”核试验。但在背后，美苏两国为了谋求战略力量优势，都把发展和巩固战略核武器的威慑力量，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禁止核试验与美苏从 60 年代以来在双边核军控谈判中所达成的一系列条约和让步有很大不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限制地下核试验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等等，对美苏来说，都只有局部性的意义。这些条约充其量只是稳定了美苏之间“相互确保摧毁”基础上的战略力量稳定，而并非有真正对它们核力量的发展起到实质性的限制作用，更不妨碍美苏之间战略核力量的均衡地位。因此，美苏两国在谈判中的说法和实际做法，常常是表里不一、阳奉阴违的。冷战的存在，使得国际社会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缺乏起码的合作空间。

冷战后，美国的核军备政策相应作出了较大调整。除了继续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削减战略核武器之外，其他一系列的因素也导致美国转而对禁止核试验采取积极的态度。

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都使美国不再面临全球性核军备竞赛的巨大压力。苏联瓦解之后，美国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保持建守在美苏大规模核对抗基础上的庞大的核军备。禁止核试验对美国来说，已经不会威胁或者损害美国拥有的优势性核战略力量。作为冷战后最强大的核武器制造国和拥有国，美国现有的核技术基本可以满足美国保持核威慑力量的需要。如果国际社会能够通过禁止核试验条约，不仅有助于美俄之间削减战略核武器会谈的进程，史有利于美国维持其核大国的超级地位，防止美俄之间发生新的核军备竞赛，还可以防其他国家核力量的发展，对美国的战略利益造成冲击和挑战。

进入 90 年代后，美国在技术上对核试验的需求显著降低。在里根政府的“战略防御倡议”不断进行收缩和调整，美国对定向能核武器的

研制和装备需求，已不占重要位置，为发展第三代核武器而进行核试验也就不迫切了。特别是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美国可以通过电脑模拟核试验，达到改进核武器爆炸技术的目的。美国军方和核武器实验室传统上直反对美国政府承诺不进行核试验，其主要理由是不进行核试验，就无法保证核武器的安全性和发展新一代的核武器技术。但计算机模拟核爆炸技术的突破，使得美国军方和核武器实验室不再需要实地核爆炸。许多科学家相信，不进行核试验也能解决核武器的安全性问题。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核武器领域面临的挑战，从原来与苏联的核对峙，转向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技术扩散。两极体制对武器扩散具有相当程度的抑制力。在两极体制下，核扩散受到美、苏全球性战略对抗的遏止，地区性冲突往往由于美苏两极对抗，很难上升到需要拥有或动用核武器的程度，核武器难以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真正有所作为。80年代印度就爆炸了第一个核装置，以色列也具备了制造原子弹的实际能力，但印度和以色列的核技术始终没有转化为现实的军事装备。美苏的全球战略对峙结束后，地犀冲突成为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在美苏力量收缩的同时，一系列地区强国力图弥补权力真空，核扩散比冷战时期反而更严峻，防止核扩散因此成为美国军控和安全政策的重要目标。

为此，美国希望实现禁止核试验，一方面可以促使1995年的不扩散审议会议顺利延长《核不扩散条约》；另一方面，也希望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防止那些未参加《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进一步发展核力量。从90年代初开始，美国将积极反核扩散政策与军栻政策结合在一起，推动国际社会无期限延长《核不扩散条约》，并推动在联合国多边核裁军架构之下，实现所有的国家签署和加入《全向禁止核试验条约》。

1992年9月2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93财政年度能源与水源发展拨款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将从1993年起暂停核试验9个月；到1996年前，美国核试验的总数不得超过15次；1996年9月30日之后，美国将永远停止核试验。但是，如果其他核大国继续进行核试验，美国也将恢复进行核试验。

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补充性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尽快与各国就禁止核试验进行磋商，最晚应在1996年9月之前，签署多边禁止核试验条约。10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这项法案。推动世界各国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以此作为美国停止核试验的条件，从此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

1993年1月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美俄双方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距

离不断拉近。在**1993年6月**的美俄莫斯科首脑会晤中，双方都同意尽快开始禁止核试验的多边谈判，改变了过去美俄两大核国家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较量。

这一时期，美国国内也爆发了赞成停止核试验和主张继续进行核试验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主张禁止核试验的观点占据上风。**1993年7月3日**，克林顿政府正式决定，将禁止核试验与推动国际社会达成禁核条约，列为美国基本的安全政策。其内容首先是明确了，禁止核试验可以加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阻止核扩散的努力。其次是推动世界**5大**拥有核武器国家，首先同意全面禁止核试验。只要其他核大国同意停止核试验，美国将暂停核试验到**1994年9月**或更长的时间。第三是争取在**1995年**延长《核不扩散条约》，并在**1996年**达成多边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由于美国大力推动禁止核试验条约，国际核军控谈判进程明显加速。**1993年8月10日**，联合国裁军会议通过决议，授权禁止核试验特别委员会组织与会各国，于**1994年1月**开始就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谈判。这一谈判进程由于**5大**有核国家在该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以及国际社会的热情支持，终于取得巨大突破。

90年代后，苏联与俄罗斯一直都在国际裁军论坛主张和支持防止核扩散和禁止核试验。**1990年10月24日**，苏联在新地岛进行了**90年代**以来最后一次核试验，随后在**1991年1月12日**决定，在该年的头**4个月**暂停核试验，并关闭了哈萨克斯蛭境内的塞米帕拉会斯克核试验场。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从苏联继承了数百次核试验经验，无论是从核力量现状，还是从核技术看，都牢牢地保持着世界一流核大国的地位。同时，经济困难也使它没有能力大力更新核技术和核力量。俄罗斯一方面希望通过禁止核试验，继续推动美俄之间的安全合作；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冻结各国的核武器发展水平，继续保持其核大国地位。俄罗斯多次延长并一直维持了暂停核试验。俄罗斯还不断敦促美国参加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有关禁止核试验的国际多边谈判。

冷战结束后，英国在防务问题上与美国的合作继续加强。在核试验问题上，则长期受制于美国。因为英国的核试验需要借用美国的内华达试验场，在美国暂停核试验之后，英国事实上也无法再继续核试验了。美英长期以来在核武器发展上，一直进行着积极的合作。美国为了推动英国支持禁止核试验条约，也向英国提供了一些技术合作，减少其对核试验的依赖。英国对禁止核试验条约也采取了积极的支持立场。

自**80年代**以来，法国的核试验计划一直面临国际和国内“绿色和

平”力量的强烈反对。1992年4月8日，法国政府曾经提出暂停核试验1年，此后法国继续暂停核试验。1995年4月希拉克(Jacques Chirac) 就任法国总统后，表示将从1995年9月到1996年5月在南太平洋进行8次地下核试验。1996年1月29日，希拉克总统宣布法国提前完成核试验，并将从此停止核试验。

中国对禁止核试验一贯采取支持与合作的立场。1993年10月15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声明。声明提出，中国将积极参加有关禁止核试验的国际多边谈判，中国也支持国际社会不晚于1996年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条约通过之后，中国政府将停止所有的核武器爆炸试验。1996年7月，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

核大国立场的发展是推动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的基础。1995年3月24日，美、俄、英、法、中5个核大国首次共同保证，不对无核签约国使用核武器。随后，5国还与销毁核武器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签署了双边核保证条约。保证在这些国家销毁核武器之后，如果国家安全受到核威胁，将由现有的核大国来予以核安全保证。

1994年，禁止核试验特别委员会举行了4次条约磋商会议。在1994年7—9月的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份条约草案。在11—12月第四次会议上，就禁止核试验的国际监督系统达成了一致。在80年代，裁军会议讨论禁止核试验问题难以取得进展，其中的一大障碍是国际社会的监督与查证问题。该问题其实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少有核国家利用查证作为借口，反对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但90年代初以后，由于技术的发展，查证的可靠性已经不容置疑。这也为裁军会议谈判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成功，解决了技术性障碍。

1995年4月17日至5月13日，在纽约举行了关于《核不扩散条约》续约及审议的国际会议。当时，实行了25年之久的《核不扩散条约》即将到期，是否续约是国际社会在核安全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抉择。1970年生效的《核不扩散条约》明确载有对禁止核试验的期盼，国际社会多年来也一直将禁止核试验与防止核扩散相提并论。尽管该条约对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所规定的义务有失平衡，但25年来，这一条约在防止核武器扩散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推动裁军、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到1995年该条约进行审议和续约时，签署国已经达到了175个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愿意让该条约继续延长。

在续约及审议会议上，禁止核试验成为会议的焦点。100多个《核

不扩散条约》的会员国要求，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履行条约义务，尽快就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一致。5月11日，在5个公认的核大国承诺“诚心诚意”地就核裁军问题举行谈判的基础上，无核国家同意无限期延长约束其放弃研制核武器的《核不扩散条约》。会议在核大国的让步下，还通过了《禁止核武器扩散及裁军的原则与目标》的文件。该文件要求缔约国在1996年年底之前，透过裁军会议，完成一项全球性的、并具有实效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工作。

日内瓦裁军会议在1995年9月的会议中作出一项决议，将裁军会议原有的38个成员国在1996年的会议上扩大为61个成员国。这意味着，1996年的裁军会议将有新增加的23个成员国代表参加。裁军会议成员国的扩大，为禁止核试验条约草案在会议上的通过创造了条件。此外，1996年3月开幕的裁军会议中，各国代表达成共识，将在1996年6月28日之前批准条约草案，以便在9月联合国第51届联大会议期间，由各国通过条约草案，尽快将条约付诸签字。但是，由于印度在特别委员会讨论中发难，随后印度得到了伊朗支持，1996年8月的特别委员会和裁军会议等，都未能最后投票通过条约草案。由裁军会议通过条约草案并送交联合国大会表决的设想夭折了。

但是，个别国家的作梗并不能阻止代表国际社会共同心声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出台。1996年8月22日，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大使直接致信给联合国秘书长，要求根据1995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50/65号决议，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表决正式列入即将开幕的第51届联大。信中还附有一份条约草案，并说明该草案与裁军会议磋商后的最后草案内容完全吻合。9月9日，第51届联大开幕，共有126个国家连署了澳大利亚的提案。这样，条约得以绕开原来设想的裁军会议程序，直接送交联大表决。

1996年9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158票赞成、3票反对和5票弃权，通过了举世盼望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9月24日，联合国在总部举行了条约开放签字仪式。在开放签字的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即有96个国家成为该条约的正式签字国。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指出，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通过，是世界迈向全面核裁军、并进而实现全面废除核武器理想进程中的重大起步。美国总统克林顿也表示，联合国大会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扫除威胁全世界达50年的核武器阴霾的重要步骤。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共由序言、17个条款的正文、两个附录和

一个议定书所组成。条约序言明确指出，“全面禁止核试验不但足裁减核武器和禁止核武器扩散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逐步完成核裁军的重要步骤。”条约的第一条规定了所禁止的核试验的范围：“任何国家不得进行任何核武器爆炸试验以及其他核爆炸试验。”

第二条规定了条约所建立的监督机构的组成，决定设立条约成员国大会，在大会之下设立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执行委员会委员由成员国大会依地域分配原则选举出的 51 个国家的代表组成，设在维也纳。秘书处负责日常行政事务，下设国际资料中心汇集信息和交换资料。

第三条规定成员国应该在国内所采取的条约执行措施。第四条规定了查证事项及程序。

第八条规定每 10 年举行一次条约的审议会议。

条约的议定书规定，设立国际监视系统，监视系统有驻地查证功能，查证中各方都应履行诚信原则。条约还规定，将在 44 个具有核反应堆或正在研究核反应堆的日内瓦裁军会议成员国交存批准书之 13 起 180 天后，正式开始生效。

到 1999 年年底，全世界共有 155 个国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条约所规定的 44 个国家批准之后条约即可生效的这 44 个不同程度拥有核设施的国家中，已有 29 个批准了该条约。

除不扩散条约无限期延长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被正式通过外，90 年代国际军控事业还在其他领域获得了进展。继 1975 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效以来，1993 年，国际社会通过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公约在 1997 年因批准国达到法定多数而正式生效。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以来，国际社会在推动无核化方面，可以说喜忧参半。喜的是世界安全在禁止核试验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增强。1995 年 12 月 15 日，10 个东南亚国家签署了《建立东南亚无核区的曼谷条约》。这是继南太平洋无核区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无核区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建立无核区的多边公约。

①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文本，请参见“The United Nations: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off legalMaterials*, Vol 35, November 1996, pp 1439—1479

1986年8月，澳大利亚、新西兰等7个南太平洋国家签署了《拉洛通加条约》，宣布在南太平洋建立无核区。该条约在1986年12月正式生效。到1999年年底，已经有9个国家批准了旨在建立东南亚无核区的《曼谷条约》。

1996年4月11日，45个非洲国家签署了《佩林达巴条约》，非洲也正式宣布成为了世界上第4个无核区。

目前，5个核大国都已经终止了核试验。2000年4月14日和21日，俄罗斯国家杜马相继批准了《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俄罗斯批准这两项条约，对于继续推进美俄核裁军和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有核国家履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具有深远意义。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了核军备竞赛。1998年5月11日—13日，印度进行了5次地下核试验。5月28—30日，巴基斯坦进行了6次地下核试验。印度和巴基斯坦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无视1968年的不扩散条约和1996年联合国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1998年9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它们愿意遵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这么做的话。然而，直到今天，印、巴两国依然拒绝签署该项条约。更令人担心的是，一向主张和支持不扩散机制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机制、并作为世界上最大核武器大国的美国，却在1999年10月13日，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一天，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48票，拒绝了这项条约。国际社会为建立无核化世界和全面推进核裁军的进程，的确是任重道远。

思考题：

1. 为什么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军控谈判能够得到起步和发展。
2. 为什么核不扩散能够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心愿。
3. 冷战结束后美俄两国的核裁军对世界走出核战争的阴影具有什么样的作用。

NPT条约第9条第3款规定：以1967年1月1日为界，在此之前已经制造和举行核试验的国家为核武器国家，否则为非核武器国家。条约第2条规定：非核武器国家不得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从任何国家或地方转移来的核武器，也不得制造、拥有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不得协助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参考书目：

- 1 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2 丹·麦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
3. 哈罗德·布朗：《美国未来二十年的对外战略》，时事出版社，1986年。
4. 潘振强主编：《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
5. Barry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87.
6. Michael Nacht, *The Age of Vulnerability: Threats to the Nuclear Stalemate*,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1985.
7. Joseph F. Pilat and Robert E Pendley, eds., *Beyond 1995: the Future of the
Nuclear Regime*.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0
- 8 Josef Cmltblat and David Cox. eds.. *Nuclear Weapon Tests: Prohibition or Limit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第八章

冷战中的中美苏三角关系

牛 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如果从比较宽泛的角度观察，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在美苏两极对抗的大格局下，曾经出现过美苏中三方关系互动的现象。例如新中国在成立前后决定选择“一边倒”的战略方针，从外部环境影响的角度说，就是在冷战爆发的特定背景下，受到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影响的结果，而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又受到它们各自对对方的政策、它们在东亚甚至在全球的关系的影响。同样，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决定，包括对美苏两国的政策和其他有关的政策，也影响着美苏的对华政策以及它们同中国的关系。此后由于中国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同时与美国处于隔绝状态，三方互动的现象如果还存在的话，由于其影响不大，也不值得给予特别的重视。

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形成是一个过程。7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紧张和中美关系缓和，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设想和概念开始出现。到70年代末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苏三国才形成战略三角关系。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中阐述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也被称为“三极结构”、“战略大三角”、“三角政治”等等）包含着两个基本的内容。

其一是“战略”的含义。这里所谈的战略关系实际上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中美苏三边关系是当时国际政治中具有战略影响的关系。从中苏同盟破裂和中美关系缓和这类重大历史事件导致的后果看，由此而形成的中美苏三边关系及其以后的历次变化，都对70年代初期以后的冷战国际关系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存在着不同类型或不同层次的三边或四边关系，但在改变国际格局方面，没有哪一个具有中美苏三边关系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巨大的战略影响。

其次是指在中美苏三边关系中，不论是中美、中苏或美苏等双边关系如何变化，起主导作用的都是安全战略因素。进一步说，在这种以战略关系（不论是合作、缓和还是对抗）为主要内容的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展开的三角关系，也必然是以安全战略为其主要动力和内容的。换句话说，

安全战略是支配中美苏三角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因此也是理解这个三角关系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

其二足“二角关系”。这里所说的“二角关系”就是指在那个时期中美苏之间形成的特殊的关系结构。这个结构在当时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美苏三角关系是在冷战的两极对抗体系中形成的，从根本上说，这种三角关系必定要受到两极结构的制约。这种三角关系对有大国家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与这个三角关系有关的政策的影响，在宏观上不可能摆脱冷战的制约，不可能冲破两极结构的束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作用主要是维持两极的平衡，尽管有时候这并不一定是三方决策者制订政策时的主要考虑。

第二，中美苏三角关系作为一种结构，对三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每个国家对其他两个国家的政策的影响，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惟其如此才有了所谓“三角关系”的概念。充分揭示和全面深入地分析三角结构对中美苏的有关政策的影响，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应该关注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三角结构对三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总的影晌；二是三角结构对每个国家的独特的影响。例如，中美苏三国在每个特定的阶段，如何根据各自相对于另外两个国家的地位，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对三角结构带来的挑战或压力，并作出各自独特的反应，等等。

第三，在承认三角结构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的同时，必须看到国际结构对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也是相对的，而且在三角结构中，大国之间的互动也不可能是机械的过程，即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相互作用的过程。必须考虑到中美苏三国的内政变化对它们各自的对外政策的影响。从当时的历史看，中美苏三国的国内政治变化的程度和性质是不一样的。例如与中国和前苏联相比，美国的国内政治变化的程度是比较小的。另外还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等等。

第四，不同时期各国在三角结构中相对地位的变化，也应该给予关注。相对地位问题的关键是各有关国家的实力地位，因为中美苏三国的力量从一开始就不是均等的，其中突出的是中国不是一个超级大国，这一点是决定中国肘有关的形势作出自己独特反应的重要因素。另外，美苏虽然都是超级大国，它们的力量对比也不是时刻均等和一成不变的。事实表明在不同的时期，从战略态势上看，美苏之间谁拥有优势地位，是发生了转换的。而每一次转换都会给美苏各自的政策带来变化。

以上的内容是对中美苏三角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重要因素的初步分析和概括，这些因素反映了研究中中美苏三角关系所应关注的重要内容和特点，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研究和把握中美苏三角关系从形成、发展变化到终结的过程的基本框架。这些略显抽象的分析必须还原到中美苏三角关系形成、发展变化到终结的过程中，才能加深对这个三角关系的理解和认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美苏三方的政策有其各自发展的节奏，而且如上所述，每一方对另外两方的政策都不是仅仅受到三角结构变化的影响，存在着诸多导致其中一方政策发展变化的因素，如各自的国内政治情况等等。所以，以下分阶段的论述中对时间段的划分，只能算是一个粗略的时间表。它们对每一方的政策变化并不都是十分确切的，而且实际上也很难找到那种能够将三方政策发展变化做一致划分的时间表，因为中美苏的政策发展在时间上本来就不是整齐划一的。

第一节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

中美苏三角关系大致形成于 1969 年—1972 年，它是在冷战这个国际关系史上特殊的时代形成的特殊的国际关系结构，有两个基本因素或者说是基本条件的出现，才导致了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这两个因素是：中苏同盟破裂和中美关系缓和。中苏同盟破裂的特点和中美关系缓和的特点，从一开始就给中美苏三角关系烙上了引人注意的印记。

1. 中苏同盟破裂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以此为标志，中国全面进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这一战略性决策不仅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长时间的影响，而且对冷战的两极格局形成了冲击。在此后的 10 年里，中国一直是苏联忠实盟友的身份，在冷战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双方的关系曾经是如此的密切，以致在中苏同盟出现裂痕并表现出越来越难以弥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决策层都不曾认真关注并相信，中苏同盟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破裂。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有关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升放有限的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特别是对一些重要案例的描述，为任何深入的探讨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其二是指出并论证了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的复杂性，颇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中苏同盟破裂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战略利益的矛盾、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分歧和争论、国内政

策的不同发展方向、领袖个人的风格与个性等等，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问题上起着不同的作用。当这些矛盾最终被归结为是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背叛以致双方都没有妥协的余地时，中苏同盟的破裂就不可挽回了。

如果在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审视中苏同盟破裂过程中呈现的一些特点，就有必要首先对中苏关系的复杂性做进一步分析、概括和梳理。中苏关系是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相当复杂的关系，这在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所谓多重性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苏关系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两国关系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中共和苏共两党的关系在两国的关系中起着核心和支配的作用。进一步说，中共和苏共的体制决定了两党的领袖必定要对两国关系拥有特别巨大的影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党关系与国家关系共居一体之中，造成了中苏两国领导层在处理双方关系时，面临特别复杂的局面，即他们不得不经常需要同时遵循两种不同的关系准则。中苏作为两个民族国家，它们必须要遵守当代基本的国家关系准则；同时作为共产党领导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又要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考虑和处理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双方领导人在当时很可能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们在实践中遇到矛盾和麻烦时，一直试图找到解决办法。

其次，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党关系历史和当时具体条件的影响，中苏在结盟时，双方在客观上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实际上也被中苏双方认可，至少也是心照不宣的。问题是在 1956 年的波匈事件以后，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改变这种关系，以适应两国关系中被认为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即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中国方面很可能相信，苏联领导人接受中国方面的立场，否则苏共就不会在当年 10 月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强调了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一些理论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而且正是这个分歧埋下了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方面是，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中国领导层普遍认为并且相当重视这一占期叶丰荒群与抖垒士口辟昔甘柚丽密批覃与由同问关系”、“父子关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中国领导人也有理由认为，中国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相对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一是中国领导人利用苏联在波匈事件中面临的严重危机，迫使其改变以往处理苏联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式和规则，并通过公布《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以往的错误。其二是中国至少暂时取得了在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的地位，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波匈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其三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力明显加强。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各国领导人的活动反映了这种情况。

上述种种使中国领导人不能容忍苏联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被认为是以势压人的态度，并斥之为是重演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在同盟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很难想像，1958年夏毛泽东在“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两个问题上，会那样怒不可遏。他说苏联的要求使他“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当时中苏关系的变化的确就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需要探讨的问题是这种提高达到了什么程度？苏联能够允许这种变化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当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中国领导人能否迫使苏联按照他们对双方关系变化的理解，改变其态度和政策？进一步说，中苏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曾经是中苏同盟得以建立并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当这个条件被改变以后，中苏同盟该如何维系？双方关系建立在何种准则之上？或者说苏联是否接受中国希望遵循的关系准则？当时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很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回答。

中苏关系的另一个简单但特别重要的属性是，中苏是两个在地理上接壤的大国，两国在当时有着长达7000多公里的边界。在近代历史上，中苏之间曾经长期存在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沙皇俄国多次使用武力，迫使中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当时即使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根据，中苏边界也存在未划界地区和有关争议地区。像中苏这样的大国之间，任何建立在忽视地缘政治和受地缘政治影响的特殊历史进程之上的政策，都不可能长时间地指导维护良好的双边关系和有效地应对复杂的局面。

在中苏关系友好时期，中苏边界可以说是“有边无界”或“有界无防”的、战略合作和意识形态的和谐等，显然掩盖了领土接壤和边界问题有可能给双方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及其严重性和复杂性。后来的事实表明，当中苏关系恶化时，双方几乎都曾利用边界问题打击对方。最严

重的是，边界问题一度将两国推向战争边缘。

中苏同盟破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从双方的政策发展看，很可能两国的决策层都没有意识到上述中苏关系的多重性质，以及由此带来的中苏同盟在不同阶段上出现的具体矛盾的复杂性和深层原因。因此，尽管两国决策层很有可能都不希望看到后来两国严重对抗的结果，但是当时他们既没有(也不太可能)制定出能够比较全面系统地应对中苏关系复杂性的政策，也没找到能有效防止两党关系破裂后继续维持国家正常关系的具体办法。

如果以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事件的性质为线索，可以大致将中苏同盟破裂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56 年波匈事件发生到 1958 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苏之间出现了调整双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相对地位的竞争。这场竞争比较突出地表现在 1956 年的波匈事件、1957 年的莫斯科会议和 1958 年两国就军事合作产生分歧等历史事件中。

第二个阶段是从 1959 年夏季到 1962 年。其中导致中苏关系出现起伏的主要因素是双方的“总路线”(包括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特别是国内政策)出现了重大分歧。从后来的发展看，当时出现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双方总路线将沿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个阶段的关键性事件是中国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失败。围绕“大跃进”的评价展开的中国高层政治斗争和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的批评，导致中苏同盟出现了难以逆转的恶化。1959 年 10 月初赫鲁晓夫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失败，揭示了中苏双方在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等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它是中苏同盟从兴起到衰落的转折点。此后中苏关系一度出现缓和，但 1961 年 10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和 1962 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再次凸显了中苏各自的“总路线”的不同发展方向，以及两国将因此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

第三阶段是 1963 年的中苏论战到 1965 年 3 月苏联主持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同盟终于破裂。这期间的关键事件是中苏两党高级会谈破裂、苏联与美国和英国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中苏边界谈判破裂、中国领导人访苏未能缓解中苏关系、苏联争取与中国建立援越抗美统一战线失败、苏联不顾中国反对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等。

从上述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脉络看，随着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中苏关系固有的多重性带来的矛盾被充分展示出来。双方在意识形态、战略利益、地缘政治等领域的分歧带给双边关系的问题，如边界纠纷、对外政策等等，几乎无不陷入不可开交的矛盾与混乱。两国领导人都将中苏关

系恶化归结为对方对马列意识形态的背叛。那种准宗教式的论战不仅严重地毒化了中苏关系的气氛，而且使任何试图改善甚至是维持正常关系的努力，在中苏国内都成为大逆不道的政治错误。

正是在中苏同盟破裂的背景下，在中苏论战的炽热气氛中，从1964年秋季以后，边界问题逐步成为中苏关系的主要内容，并最终酿成了60年代末的边界军事冲突。

2. 中美关系缓和

导致中美苏三角关系形成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中美关系缓和。中美关系缓和是由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一是中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对美政策的相应改变；二是美国亚洲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对华政策的改变。

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的安全环境得到重大改善。导致60年代中期中国的安全环境迅速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当时中国在南北两线同时面临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压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领导人一直有着相当强烈的地缘安全意识。这种地缘安全意识部分来自中国的传统安全概念，部分来自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部分来自列宁主义的理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中国不能允许敌对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分接近中国的边境地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认为中国没有安全感并倾向作出强烈的反应。所以，研究60年代中期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对这种变化的反应，是理解中国安全战略演变的关键之一。

中国安全环境恶化首先是由印度支那地区的紧张局势引起的。1962年7月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后，中国领导人曾经认为，美国直接进攻越南的可能性不大。1964年8月3日，突然爆发了“东京湾事件”，美军随即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境内的目标。几乎与此同时，美军开始不断投放无人驾驶侦察机侵入中国境内，从事军事侦察活动。

美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东京湾事件”爆发前不久，由于美国不断对北越发出战争威胁，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作出反应。5月15日—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开始扭转原定以解决“吃穿用”为主要目标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而且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进一步反复强调备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甚至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要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7月27日，毛泽东会见北越代表团成员。他在声明将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抗战时，表示中

国也要准备打仗，并提出了中国参战的可能性。

8月上旬，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更加关注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8月5日，就在美空军开始轰炸北越境内目标的当天，解放军总参谋部即命令有关部队和军兵种进入战备状态。在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抓紧时间准备应付侵略战争，他甚至提出要不要搞三线建设，就如同大革命时期要不要到农村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10月间，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一项批示中称，三线建设是长远的战略问题，现在不为，后悔莫及。毛泽东的决定很快便成为中国决策层的共识，并被迅速贯彻下去。

1965年3月2日，美军发动所谓“雷鸣行动”，开始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美地面部队则以保卫美空军基地为理由，开始直接在南越与越南人民武装力量作战。首批美海军陆战队于4月间在南越的岬港登陆。5月间，美空军突破北纬20度线，将空袭扩大到整个越南北方。与此同时，美空军加强了对中国领海领空的侵扰活动，美海军舰只频繁地在中国南海巡弋，美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甚至袭击中国的商船和渔船。

美国扩大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和对中国领海领空的侵犯，对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1965年初中国空军奉命进驻海南岛。4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对入侵美机“只起飞监视”等规定，命令“对侵入我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解放军空军随后制定了与美空军作战的计划，计划包括在边境地区与美空军作战和反轰炸的方案，同时也制定了在中国本土进行长期和大规模空战的方针。

中国当时显然对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空中打击极度敏感。周恩来通过访华的外国领导人向美国方面转告，“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4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认为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中国，“要切实作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在加紧备战的同时，中国领导人还试图利用外交途径，向美国转达中国政策的底线，以避免因误解而导致与美国的直接战争。4月2日，周恩来利用访问巴基斯坦的机会，向即将前往美国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系统地说明了中国政府的三点方针：“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他还对何谓美国对中国开战做了明确的定义，即美国即使只是对中国进行空中战争，也将被视为对中国开战。由于阿尤布·汗推迟访美，

周恩来又利用访问坦桑尼亚的机会，于**6月8日**委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美国方面转达中国政府的三点方针。**8月20日**，周恩来又向赞比亚政府代表团阐述了上述方针。

全力以赴地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1965年4月初**，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访华，双方签订了一系列涉及中国向越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协定。**5月下旬**，越南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具体讨论军事援助和作战问题。中共中央根据大规模援越工作的需要，组成了中央援越领导小组。从**6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部队开始进入北越，参加防空作战和协助修筑军事工程、铁路和提供后勤保障。到**1970年7月**，中国先后向越南派遣防空、铁道、工程和后勤保障部队共达**32万余人**，其中最高年份达**17万人**。

由于失去了中苏同盟的依托，中国抗击美国入侵、主要是抗击美国使用海空力量攻击的能力，肯定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因此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和对中国领海领空的侵扰，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相对来说加强了，中国也不得不采取强硬的紧急措施。

这一时期中国安全形势恶化还表现在与苏联不断发生边界纠纷。从**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边界事件起，中苏边境地区便无安宁之日了。据中国方面公布的统计数字，从这时起到**1964年10月**，共发生**1000**余起边境纠纷。**1963年7月间**，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开始进驻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曾经宣布，由于自己处在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经没有必要保持常备军，而且苏军也于**50年代**分批撤出。苏军重新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与中国毗邻地区，显然是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苏联决定向中苏边境地区增兵，致使双方存在争议的边界地段逐步发展为引起军事冲突的热点。

赫鲁晓夫的有关讲话和苏联的军事部署，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毛泽东在**10月7日和9日**分别会见北朝鲜的崔庸健和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时，均提到要对赫鲁晓夫对中国使用武力有所准备。他在考虑部署华北大城市的防御时，特别指出“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要准备战争早打、大打，“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打核战争”，“准备两面打”。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公布的最能够直接说

明中国当时曾经有过应付苏联发动战争的准备的文献。

主要是由于在南面面临美国的压力，中国领导人在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虽然对苏联可能采取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抱有高度的警惕，但在处理边界问题上总的说来是谨慎的和有节制的，对边界争论采取了冻结的态度。当时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苏联的威胁与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有根本区别，美国的扩张才是全球性的和直接的威胁。

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并向中蒙边界地区大量增兵，导致中国领导人作出强烈反应。3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激烈地指责苏联企图入侵中国东北和新疆，与美国一起分裂中国。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华政策的上述认识和反应同迅速增加的中苏边界纠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们决定在中苏边界采取强硬行动的主要原因。根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从1964年10月起至1969年3月，双方的边界纠纷达4189起，比此前增加了3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决策层于1968年1月作出了在中苏边界东段进行军事反击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在给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的指示中，要求解放军有关部队作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在警告无效和苏军打死中方人员时，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

1968年8月21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成为推动中国领导人开始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全局考虑苏联威胁问题的关键因素。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形势，会议决定对苏联进行严厉的谴责。《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即将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结果”。10月31日通过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确认了美苏“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判断。在此期间，毛泽东一再提出，现在需要考虑世界大战的问题。他认为不仅美国，苏联也有发动世界大战的能力，而且它们都在准备扩大战争。

从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到1968年10月苏军人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时期，中国的安全战略出现了重大的调整。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在面临美苏从南北两个方向威胁中国的安全时，中国国防的战略重点从“重南(美国)”逐步转向“南北并重(美苏)”。此后不久发生的美越和谈与珍宝岛事件则促成了中国安全战略从“南面”防御美国为主向“北面”防御苏联为主的转变。

中国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必然要带动中国的对美政策发生变化，即

在确定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时，中国决策层将通过缓和美国的关系来避免两面受敌。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方向必然要遵循安今战略调整的需要，但是能否实现转变和转变的速度、程度等，在当时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因素是国内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它一方面极大地助长了对外政策的“左”倾，另一方面严重破坏了国家外交的决策系统。这两方面的问题在经历了1967年8月外交部夺权造成的大混乱以后都有所改变。

首先是1967年8月22日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后，毛泽东下决心支持周恩来控制并整顿政府的外交系统。结果外交系统的动乱受到遏止，一度失控的局面有所恢复，并形成或者说是确立了毛泽东一周恩来的决策机制。后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1967年8月开始形成的毛泽东一周恩来外交决策体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其次是从1967年夏季到中共九大召开前，毛泽东多次就涉外事务发表批示，批评那些自我标榜、自我中心和强加于人的宣传和做法。毛泽东那些就事论事的措施当然不可能根本纠正外交领域的“左”倾错误，但毕竟为周恩来着手恢复外交系统的秩序和正常的工作，提供了回旋余地。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几乎是全力以赴地贯彻援越抗美政策。这项政策首先反映了中国在地缘安全方面的需要；其次，援越抗美也成为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佐证，使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口号在印度支那落到实处，并成为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有力武器；最后，援越抗美还可以鼓舞人们更加热情地投入到“文革”的极“左”运动中。正是因为援越抗美政策同时反映并满足了上述多方面的需要，所以它在当时的中国外交中几乎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认为，中美关系包含着全球战略、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等三个层次的矛盾和冲突。在双边层次上主要是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和破坏中国的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在地区层次上，当时主要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在全球战略层次上，美国要称霸，中国则以支持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为己任。在60年代中期，中国与美国在越南战场的对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美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上的矛盾和斗争。换句话说，只要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中国就必定要加强同北越的政治和军事关系，承担援助和支持北越的义务，因而也就很难改变对美国的政策。

历史的机缘是中国与北越的关系恰恰在 1968 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68 年初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了新春攻势。这场军事攻势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空前高涨的美国反战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的战争意志趋于瓦解。但是从军事角度看，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在战斗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作战能力明显下降，士气也因牺牲巨大而严重低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约翰逊于 3 月 31 日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停止轰炸北越北纬 20 度以北地区。4 月 3 日北越即同意派代表与美国谈判。

中国领导人在事后获知北越的决定后，表示坚决反对北越立即开始与美国举行和谈。在同北越领导人的多次会谈中，中国领导人表示，北越的谈判决定与它过去宣布的立场不符，而且当前时机对北越并不有利。中国在和谈问题上与北越方面的分歧和北越在宣布与美国和谈前未与中国协商的做法，显然严重地损害了双方的关系。11 月 14 日，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等北越领导人的会谈后说：“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1969 年 6 月 9 日，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谈时，公开说明了中国与北越拉开距离的方针。

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角度看，中国因种种原因而决定与北越拉开距离，的确是历史提供的机缘。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越南战争因为美越开始和谈而相对降温，中国国防重点完成向北转移几乎是不可能的。进一步说，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同北越的密切关系并因此承担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义务，特别是北越自己不首先迈出调整与美国关系的步伐，后来中国领导人要作出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决定，至少也会困难得多。

总之，60 年代末中国的安全战略、对外政策及外交决策机制、中越关系等，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虽然是在涉及中国外交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分别发生的，而且有些变化并非是中国领导人有意为打开中美关系之门而为之，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些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变化，构成成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大背景。

60 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同样也酝酿着重大的调整。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尖锐对抗和在越南战场进行的间接战争，无疑推迟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进程，但同时也为美国政府根本改变其政策，造成了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

从 50 年代末开始，美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动向。在 1960 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对华政策成为民主党和共和

党辩论的重要议题之一。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多少表现出调整对华政策的意愿。不过包括肯尼迪在内的参与处理中美关系的人，基本上没有理解中美关系的症结。他们一直企图绕过台湾问题，通过一些“微调”先缓和中美之间的气氛。

肯尼迪进行政策“微调”的尝试很快便不了了之，其原因除了做法不得要领外，还包括在美国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反对力量。特别是在美国国会中，亲台湾的势力不断通过各种各样的决议，以便反对和挫败任何有可能削弱美台关系的行动。另外肯尼迪等认为，他们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都面临着远比对华关系更为重要的问题，因此不希望在对华政策这样敏感和困难的问题上，招致公众舆论的过分关注。

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继任总统，在对华政策上毫无建树。其实两届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都面临着中苏分裂、中国发展核武器和越南战争等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关于中美关系。肯尼迪上台后不久，即下令对中苏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关于中苏分歧的性质，美国政府居主流的看法是，虽然中苏的分歧是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但其深层原因的确相当复杂。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目标互不相容，历史上中俄两个民族的矛盾的影响，中苏结盟后双方在军事和经济问题上的分歧等等因素，都是导致中苏分裂和矛盾升级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因为造成中苏分歧的原因如此复杂，所以从根本上看双方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

至于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响，肯尼迪政府中的主流看法是，苏联和中国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保持敌对的态度，这一点并没有因为它们之间的争论而发生根本变化。不过相比较而言，中围更为“激进”和“好战”。根据 1962 年底检讨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肯尼迪政府认为，只有使中国“软弱、孤立”，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一旦断定中苏同盟不复存在，肯尼迪政府首先采取的策略就是利用苏联与中国的分歧，向中国施加压力，对中国采取更加敌视的政策，而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则基本是萧规曹随的。

第二，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在肯尼迪上台以前，美国政府便在跟踪了解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随着情报部门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资料，美国政府中的文武官员们越来越感到紧张。肯尼迪本人更是坚决地表示，他“无法忍受”中国掌握核武器，美国必须在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的问题上“有所作为”。

肯尼迪的智囊们曾经企图利用美苏首脑会晤，争取苏联与美国合作，共同阻止中国研制核武器。与此同时，美国领导人也曾考虑过使用武力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结果都归于失败。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在美国政府内部不少人心里都明白，不管美国愿意不愿意，中国因为握有核武器而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和参与核裁军等国际事务的谈判，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第三，关于越南战争问题。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逐步使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几乎无一不信奉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而且将这种理论同对中国的敌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特别是直接参与越南战争，目的都是为了遏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但是美国也因此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首先是因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实力和地位，从一开始就限制了美国干预的规模和限度。换句话说，美国既要遏制中国，又不希望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这种困境从一开始就在折磨美国领导人。

美国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北越由于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一再拒绝美国关于举行和谈的建议。据美国方面的统计，直到1968年，美国为和谈而进行的大小试探多达2000多次，但是从未有结果。北越坚持武装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在向北越提供全面援助的同时，也一再劝告北越领导人不要轻易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中国领导人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国际上制造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舆论。

中国支持北越坚决抵抗和顽强反对美国和谈“谋”的两手政策，确实使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进退两难。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这种局面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背景，它决定了美国如要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就有必要改变其对华政策，起码小能将遏制中国作为进行干涉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要缓和中美关系，就必须放弃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至少需要首先表明，它确实准备为结束军事干涉作出切实的努力。

事实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到印年代中期确实已经陷入绝境，从根本上调整对华政策已经势在必行。

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舆论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当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陷入绝境而无法自拔时，要求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舆论却愈显活跃，声势与日俱增。特别是从1965年开始，随着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的升级，国会中的反战势力和公众舆论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这种背景下，国会参、众两院就美国的对越南政

策举行听证会。作为这听证会的组成部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于 1966 年 3 月 8 日至 30 日，举行了 12 次对华政策听证会。应邀出席作证的包括一些持各种观点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或国际问题专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

富布赖特听证会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美国对华舆论的一次转折。听证会结束后，公开讨论和批评美国对华政策再也不是禁区了。当尼克松政府终于下决心打开与中国交往的大门时，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本节所分析的对华舆论实际上是所谓的“精英舆论”，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它的产生和形成与美国的决策层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制造这种舆论的机构和运行机制中，包括许多与这一时期各届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他们有时接受政府的咨询，有时甚至反映的是政府中一些人不宜公开表达的某种观点。

其次是这种舆论有时有可能对重要决策产生影响，或对政策转变创造有利的气氛和条件。

第三是一些参与对华决策的关键人物往往是这种舆论的参与者。最典型的还是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历史性人物尼克松，他在 1967 年发表的那篇受到毛泽东关注的文章《越南以后的亚洲》，其实就是当时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参与制造舆论以及在此过程中思考有关问题和感受国内的政治气氛，是尼克松上台后决心改变对华政策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准备。

1969 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很快开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当时美国面临两个严峻的挑战。其一是越南战争的失败，使美国政府在国际上空前的孤立，在国内也陷入巨大的困难，政治矛盾尖锐，社会剧烈动荡。其二是战线过长，经济呈现衰落的征兆，难以维持庞大的战争开支。

在上述背景下，尼克松上台不久，就提出了以“缓和”和在亚洲收缩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尼克松主义”。1969 年 7 月，尼克松出访亚洲，在关岛发表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政策的讲话，强调美国将继续承担条约义务，但是美国不能在每个地方的每个事情上承担每个责任，亚洲的盟友也要分担管理亚洲事务的责任。1970 年 2 月，尼克松向国会提交了《七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新战略》的报告，提出美国可以帮助盟友的防务，但不会承担保卫它们的所有义务。美国对外政策将包括“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三个支柱。根据这种倾向于现实和灵活外交战略

思想，尼克松政府逐步认识到，应该“抓住中国的现实”，并终于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实行“联华制苏”政策。

1972年2月，在经过艰苦地外交努力以后，尼克松终于实现访华。中美双方签订了联合公报，从而迈出了中美缓和并最终实现正常化的第一步。从世界政治的角度看，以此为标志，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终于出现了。

第二节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发展

中美苏战略三角的形成从过程上看如前所述，是中苏同盟破裂和中美关系缓解导致的结果。在随后70年代后半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中苏一直处于尖锐对立，所以美苏缓和的进展与失败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成为认识和理解这个时期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主要线索。

1. 美苏“缓和”及其失败

在整个冷战时期，美苏关系都是国际政治的中心，在中美苏关系中，美苏两国都主要是从两极格局的角度看待各自同中国的关系的，尽管它们各自同中国的关系都有着双边关系中必然具有的独特内容。换句话说，美苏关系的发展是影响它们考虑各自的对华关系的主要因素。当然它们的对华政策的成败，也部分地取决于中国在三角关系中的倾向和取舍。

如前所述，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不久，即开始推行缓和政策，声称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要开始一个“从对抗走向谈判”的时代。根据尼克松政府的设想，美国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美苏的全面缓和，首先就是要争取同苏联达成有关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

1972年5月，尼克松在访问北京后不久即访问莫斯科，并同苏联领导人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协定。这标志着尼克松“缓和”政策的阶段性进展，“缓和”一度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代名词。中美关系和解在促使苏联与美国达成有关协议方面起了多大作用，无法做出确切的估计。不过尼克松企图利用中美和解后的有利地位改善美苏关系，是确定无疑的。

尼克松政府推行缓和政策有其复杂的国内外背景，这项政策反映了这个时期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决策者对这种变化的认知及选择的应对之策。

60年代末美苏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形成了战略均势。这一变化是美国宁愿选择对苏“缓和”的基础和根本原因。尼克松的个人作用在于，他比较敏锐、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地位

的衰落，美国已经无法像以往那样，在所有的战线上采取咄咄逼人的遏制战略。在美苏战略打击力量达到可以“确保相互摧毁”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通过谈判来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与美国战略地位衰落相联系的是，美国必须从越南战争中摆脱出来。长期深陷越南战争是美国战略优势丧失的直接原因。只要美国一日不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它就不可能恢复其战略优势。美国要从越南战争中“体面”地撤出，就有必要同越南的重要支持者之一苏联达成谅解，以便动摇、软化北越的立场。

越南战争给美国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在对外政策方面，这场战争也严重地伤害了美国的社会。尼克松政府指望通过与苏联缓和关系来证明，自己的确在为结束越南战争而努力，从而缓解国内舆论的批评，并平息持续高涨的反战运动。

60年代在欧洲出现了缓和的进程，并对当时的东西方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法国戴高乐的“缓和政策”到西德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均表明欧洲的东西方关系缓和已经成为大潮流，而且不可阻挡。美国实际上面临着欧洲缓和的大环境的压力，它只有顺应潮流，扛起缓和的旗帜，才能继续领导其盟友，并将欧洲的缓和控制在美国的战略轨道内。

上述国内外形势促使尼克松从上台开始，就主张从多元政治格局的角度，认识世界的变化并制定出更现实、更灵活的政策。尼克松政府决心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无疑是建立在比较务实地认识中美关系的基础上的。不过就短期目标而言，尼克松和基辛格是企图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迫使苏联与美国谈判，并在美苏关系的各个领域作出让步。他们相信，利用中苏分歧，打开中美关系，肯定将使美国取得对苏联的有利地位，迫使苏联走上与美国妥协的轨道。

福特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入主白宫。这时尼克松政府推行的缓和政策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沉重打击。首先是在美国国内，由于“水门事件”的影响，共和党政府的政治地位江河日下，失去了推行缓和政策所需要的强势地位。福特由副总统接任总统，本来就缺乏外交经验，美国公众对他未经考验的能力广泛持怀疑态度。

另一方面，苏联在中东和安哥拉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并在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不肯做出妥协。福特政府的外交挫折导致了美国国内一些政治势力越来越严厉地批评缓和政策，他们强烈要求警惕日益扩大的苏联威胁，针对苏联的威胁建立更加强大的国防力量，在战略武器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1976年由于苏联干涉安哥拉，美苏关系出现逆转，战略

武器谈判的僵局又迟迟不能打破，“缓和”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这一年是美国大选年，福特政府的对外政策遭到政治对手的严厉批评和挑战。福特为了竞选连任，决定在美苏关系的各个领域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3月5日，福特在一次讲演中声称：“我们将忘掉缓和这个词。”至此美国将改变尼克松执政以来的对苏政策，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进入70年代时，苏联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使它终于能够在战略核力量领域达到与美国相抗衡的地位。美苏核均势的形成给双方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对外政策问题，即在美苏关系中选择继续对抗，还是选择缓和。苏联选择了前者。

1972年5月，美苏签订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为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奠定了基础，尽管是不牢固的。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是，这标志着美国不论是否情愿，都已经将苏联视为平等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在各个领域将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苏联的立场，并更愿意做出让步。

另一方面，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也清楚地认识到，苏联的核战略力量与美国相比，不论是在质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处于劣势，而且即便如此，美国也不会停止加强其核力量。所以，苏联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订后，不仅没有停止进行军备竞赛，反而进一步投入巨大的资源，加倍地努力增强自己的战略核打击力量。在整个70年代，苏联的对外政策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军备竞赛，取得对美国的军事战略优势。

这一时期苏联的重要外交成果之一，是促成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并于1975年8月在赫尔辛基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文件确认“所有欧洲国家的边界都是不可侵犯的”，并确定了建立欧洲安全与合作体制的原则。苏联领导人认为，欧安会的召开和“最后文件”的签署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胜利，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得到西方大国的承认，苏联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得以加强。

在欧洲的外交成就使苏联外交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在欧洲缓和的基础上，继续在亚洲推行缓和政策，通过缓和来谋求苏联亚洲地区的安全。一是利用欧洲的安全压力缓解的机会，在其他地区扩张，谋求对美国的优势地位。苏联选择了后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随着美军撤出印度支那和越南完成了国家统一，美国在那里的干涉以彻底失败而结束。苏联领导人因此相信，印度支那的形势表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在决定性地下降，并且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和意愿，在广大的亚洲和非洲地区进行干涉，这对苏联是历史性的机遇。甚至有

苏联学者提出：“已经有实际可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一系列环节实现进攻性阶级斗争战略。”这一时期，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程度不同的动荡，内部矛盾复杂尖锐。美国力量的衰退和这些地区形势的动荡等，对苏联内部形成了巨大的诱惑。这个时期苏联的经济持续增长，1971—1975年平均增长6%，对外贸易进出1:2额迅速增加，外汇储备状况明显改善，从而能够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和国内短缺的农业物资。同时，苏联通过提供对外援助来扩大政治影响力的能力也得以加强。这些因素促使苏联领导人走上了扩张的道路，在中东和非洲到处干涉，四面出击。1979年直接出兵阿富汗是苏联对外扩张的最高潮，当然也是它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苏联在战略核力量领域的巨大进展和在第三世界的干涉与侵略，导致了它与美国关系的持续紧张，这是促成福特政府开始调整缓和政策的重要原因，当然也可以说是给美国扩张提供了重要的借口。正足苏联核战略力量的发展和入侵阿富汗，使卡特政府执政后期终于抛弃了缓和政策，并下决心与中国在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遏制苏联扩张的战略合作。到70年代末期，美苏“缓和”终于寿终正寝。

2. 中美关系正常化

从尼克松访华到70年代末中美关系正常化的6年里，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看，主要是美苏关系在起着主要作用。从中美各自的有关政策看，有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决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其一是中美各自对国际格局的基本看法；其二是两国的国内政治。

在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中，中国逐步将苏联定义为对中国安全的首要威胁和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并根据这个判断全面调整了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打开中美关系之门则是中国安全战略调整和对外政策转变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说是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成果。反之，中美关系缓和当时中国外交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之一是促成了毛泽东“三个世界”思想的形成。

如前所述，从6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认为世界格局止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分崩离析”；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是亚非拉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毛泽东称整个世界形势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到60年代末，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中苏边界冲突的影响下，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理解出现了新的变化。他认为：世界“大动荡、大

分化、大改组”的结果，是造成了两种可能性：爆发世界性革命和爆发世界战争。相比较而言，“战争”的可能性要高于“革命”，因为美苏都想“统一世界”，它们都有力量发动战争，当然也都有困难。

根据上述分析，毛泽东重新解释了他的“中间地带”理论，将西欧和日本等称为第二中间地带，将亚非拉称为第一中间地带，并称这些国家都不想打仗。由于这些力量的存在，到底是否会爆发世界大战，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还不能确定。这可以说是后来指导中国外交的“三个世界”思想的萌芽。从基本倾向看，毛泽东当时很可能倾向于战争的可能性大于革命的可能性，或者说他根据以往的思维方式，宁可将前者的危险性估计得高一些。

此后的一系列事件，主要是中苏边界冲突和中美关系缓和，导致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化。特别是由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克服了同许多西方国家、日本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障碍，中国外交几乎立刻出现了新的局面。正是这种变化为“三个世界”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即在反对霸权主义和苏联威胁的斗争中，中国不仅可以发动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可以联合第二世界国家，在两个超级大国中可以孤立和打击最危险的敌人苏联。

显然，“三个世界”思想浸透了毛泽东长期进行国内斗争的政治经验，是中国领导人的统一战线理论模式在国际问题上的反映。它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依靠属于革命力量的第三世界，联合具有两重性的第二世界，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美苏之间也要利用矛盾，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苏联，对美国则是又团结又斗争。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三个世界”思想，并说明了中国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奉行的对外政策。“三个世界”思想的提出和形成标志着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结构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他们看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个过渡阶段结束，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组合已经完成，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也基本确定。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任务是：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同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并支持世界革命运动。

在“三个世界”思想的认识框架中，苏联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是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是世界革命的主要敌人。为了反对和打败苏联的扩张，为了维护中国的安全，有必要利用美苏矛盾。联美抗苏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在实践中就是争取实现与美国和其他主要西方国

家的关系正常化。苏联在 70 年代中期以后采取的一系列扩张行动，包括干涉安哥拉、入侵扎伊尔、干涉埃塞俄比亚和北也门等国内政、支持越南人侵柬埔寨、直接出兵阿富汗等等，强化了中国对苏联谋求霸权和扩张的认识。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政局出现了重大的变动，但是在对苏政策上却明显表现出连续性，“三个世界”思想仍然是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中美关系缓和同样是美国外交思想转变的结果，不过对后来的美国外交产生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

尼克松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是美国调整战略、推行联华制苏的结果，是为了在与苏联抗衡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都将苏联作为主要敌人。但是在 70 年代很长的一个时期里，美国同苏联对抗的方式同以前不同，即推行以“缓和”为重点的对苏政策，采取更加灵活现实的策略处理与苏联的关系。

尼克松政府开始推行缓和政策的根本原因是美苏角逐的战略态势出现了重大变化。美国由于长时间对外干涉，战线拉得太长，特别是长期陷入越南战争，导致其实力地位的明显下降。为了改变战略上的被动和避免苏联继续扩大其优势，尼克松上台后不久便公布了他的新战略构想。

在政策层面上，尼克松政府强调在一些地区收缩战线，在亚太实行“尼克松主义”，在军事上从准备同时“打两个半战争”改为准备同时“打一个半战争”。1970 年 2 月尼克松向国会提出题为“70 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的咨文，阐述了美国外交应该有三个支柱，即“伙伴关系”、“实力”、“谈判”。他强调美国为了对付苏联，首先必须有强大的实力，但对付的具体方式应该以谈判代替对抗，“从实力地位出发，明智地进行谈判”。这被称为是美国对外政策向政治现实主义的转变。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上述政策转变实际上反映了尼克松等人对国际政治的思考。他们认为，美苏两极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在被复杂得多的“五极(美苏中欧日)”的权力结构所取代。这个新格局给世界安全形势带来不可忽视的变化，国际安全体系将由三个体系构成，即美苏的战略安全体系、已经出现的中美苏战略三角体系、美苏中欧日为主的多极经济体系等。尼克松等提出的“五大力量中心”实际上是承认，美国的地位相对下降，苏联、中国、欧洲、日本等的力量相对上升。美国必须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调整政策，利用各种复杂的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尼克松、基辛格提出了“缓和”的战略概念，即以实力为后盾，通过谈判与对话来束缚苏联，达到遏制的目的。

中美关系在 70 年代初的缓和是美国调整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尼克松政府认为，中美和解为美国与苏联打交道提供了有利条件。尼克松在 1972 年访问北京以后不久，即前往苏联，成为战后第一个访问苏联的美国总统。他同苏联领导人共同签署了《苏美相互关系原则》、《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临时协定》等九个文件。此后美苏关系进一步缓和，双方在安全、贸易等领域都有某种程度的合作。

可以说，打开中美关系已经使美国处在有利的地位，即美国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分别好于中苏之间的关系。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和从初步形成的战略三角关系已经获得的战略利益，使它缺乏推动中美关系尽快正常化的热情。

中美各自的国内政治在这个时期也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方面，中美关系和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下实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是其主要动力，打开中美关系基本上就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威胁，不仅缺少内在的动力，而且就打开中美关系所需要的气氛而言，与国内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的。

1973 年底对周恩来的批评和随后不久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再次冲击到外交领域。加之中共十大和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外交在政治日程中被排在后位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不可能作出任何通过妥协来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努力。更何况美国政府热衷于与苏联“缓和”，这使中国领导层中即使有人希望推动中美关系，也很难采取行动。

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同样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最严重的是 1974 年 8 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因而无法履行其在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

尼克松辞职后，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福特因为是由副总统升任，政治威望远不如尼克松，加上缺乏外交和防务方面的经验，故不具备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这种异常复杂的外交问题的主观条件。另一方面，美国不得不应付印度支那、中东和其他地区不断出现的危机，因此对华政策难以在福特政府的议程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福特政府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被继承下来的缓和政策受到国内民主党和共和党右翼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实际上福特人主白宫后很快就已经表现出，在外交上难以有所作为。在来自国内左右两个方面的压力下，福特政府开始逐步放弃“缓和”，在对华关系上不仅没有突破，甚至出现倒退的趋势。

以上的分析表明，尼克松访华以后到 70 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出现困难和曲折。只有双方在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上进一步形成共识，以及中美各自的国内政策出现必要的变化，中美关系正常化才有实现的可能。

1978 年 12 月中美经过艰苦的谈判，决定于 1979 年 1 月 1 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导致中美关系在 70 年代末出现突破性进展是多方面的。根据前述分析，中美之所以在尼克松访华后很长时间里难以实现正常化，是受到双方各自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的限制。

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将苏联视为主要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和对中国安全的首要威胁。美国则在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况下，谋求通过推行“缓和”政策，建立起新的均势。所以当美苏出现缓和的势头和美国从越南战争脱身后，美国对中国的重视相对下降。在国内政治方面，中国的政局从 1973 年以后持续动荡，起伏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任何务实的对外政策都难以落实。美国共和党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也因为“水门事件”而被严重削弱，新领导人基本不具备那种足以应付改变对华政策所带来的挑战的能力。1978 年有两方面的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中国在毛泽东去世以后，经过短暂的政治动荡，迅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以经济建设作为中共党的工作中心，将发展经济并为此进行改革开放，作为国家战略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邓小平恢复了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后时代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人。

务实的发展战略和务实的政治领袖必然将中国对外政策引导到务实的方向。中国发展经济所需要的主要条件，包括基本稳定的安全环境、投资和技术引进、教育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等等，均成为推动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发展合作关系的动力。从后来中美谈判的进程看，如果没有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和改革开放方针的提出与确立，中国能够将美国卡特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视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机遇，并在未能解决美国对台武器销售情况下，下决心与美国建交，至少是相当困难的。

美国方面的变化主要是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联的政策。福特政府执政后期，在国际国内各方面形势变化的压力下，已经开始改变尼克松执政时期推行的缓和政策。福特政府甚至决定，在对外政策中不再使用“缓和”这个词，代之以“以实力谋求和平”。从国际形势看，主要是苏联推行全面的扩张战略，导致缓和政策受到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挑战

和质疑。

卡特入主白宫初期，试图继续执行尼克松的缓和政策。卡特政府当时认为，苏联在军事上所取得的进展并不那么巨大，美国仍然保持着战略上的优势，苏联威胁虽然存在并且是严重的，但被夸大了。卡特在执政后第一次对外政策讲话中，声称他“相信缓和”，因为“缓和”就是“向和平迈进”。

如同 1973 年出现的情况一样，卡特政府推行对苏缓和政策的必然结果是不重视中美关系。在将争取美苏合作作为主要政策方向的背景下，卡特政府认为不必急于与中国发展战略关系，美国可以等待。实际上在向中国转让高技术和武器装备等领域，美国的政策还在倒退。这时美国政府的外交重点，是争取参议院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以及与苏联达成有关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武器的协议。

由于苏联当时正在稳步取得战略平衡甚至优势，卡特政府为“缓和”所做的努力很快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大致从 1978 年春季开始，卡特政府越来越尖锐地批评苏联的对外扩张政策，并认为苏联加速发展战略打击力量并加强在欧洲部署战略核力量的情况下，美国战略地位“恶化的程度”比预期的“要快得多”，而且如果不采取措施，还会继续恶化下去。1979 年 12 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促使卡特政府将对苏政策作重大调整。

几乎与重新评估对苏政策同时，卡特政府终于迈开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78 年 5 月，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美国有意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以对抗苏联的扩张，同时希望开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在此前后，美国放宽了对盟国向中国转让可能用于军事的技术。有标志性意义的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卡特政府终于决定，允许向中国出口军事技术和非致命性装备。

1978 年 12 月中美签署建交公报，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历史的进程表明，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在中国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和美国对外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从对苏缓和转向与苏联对抗)的背景实现的。在中国方面，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动力已经从单纯对抗苏联扩张，提升到配合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层次。在美国方面，对华政策的发展主要是从战略三角考虑的结果。显然，中美正常化进程得以重新启动并取得成果，主要是双方再次出现联手共同对抗苏联扩张的需要，即出现了寻求战略合作的共识。不过这种需要的强度在中国是持续不变的，而在美国则是“缓和”

政策失败后开始加强的。理解双方政策发展动力的复杂性，对认识正常化以后中美关系的演变是有重要价值的。

3. 中苏尖锐对立

在整个 70 年代，中苏都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双方不仅继续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强化对对方的批判和谴责，而且在安全战略上互相视为威胁，特 8 中国继续将苏联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和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70 年代中期苏联的大规模对外扩张，加剧了中苏之间的对立和紧张，是中苏对抗的主要原因。

70 年代苏联对华政策主要包括两个内容。其一是继续推行 60 年代的方针，向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70 年代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了 50 个师，并在蒙古驻扎了 8 万军队。部署的武器装备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提高，包括增加部署先进的坦克和重型轰炸机，ss. 20 导弹，苏太平洋舰队增加了航空母舰等 20 多艘大型水面舰艇等。苏联还企图在中国周围建立军事包围网。1969 年苏联就提出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到 70 年代后期，苏联先后同越南和阿富汗签订了含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声称对这些国家负有安全义务。随后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不久苏联出兵占领了阿富汗。

其二是离间美国、日本等同中国的关系，防止美国同中国结成反苏战略同盟，阻止中国建立起反苏国际统一战线。苏联分别在 1972 年和 1979 年两次同美国谈判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都同牵制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时间上看也是如此。第一次是在 1972 年 5 月，正是尼克松访华后 3 个月。第二次是 1979 年 6 月，是中美建交后 6 个月。另一方面苏联也不断向美国和日本施加压力，苏联舆论不断发表言论，抨击中国的对外政策，挑拨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恫吓日本不要积极发展中日合作，等等。

面对苏联的威胁，中国采取更加坚决的反击和对抗。70 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以后，中国始终将苏联视为主要的敌人，而且与苏联对抗的决心从未动摇。即使是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两届中国领导人均坚持反对苏联扩张的立场。特别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中国进行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并同美国一起，积极支持阿富汗反抗苏联占领的军事斗争。

中国加强在广大第三世界的地位以抵制苏联扩张的同时，一直致力于发展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战略合作。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随着国家新的发展战略的形成，中国领导人积极坚决地迈出了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中美在安全战略领

域的合作进一步发展，中国与苏联对抗的地位空前增强。

70年代苏联推行强硬与僵化的对华政策是它在全球进行战略扩张的反映，苏联企图取得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战略对手的优势，其结果是严重加剧了中苏关系的紧张与对抗。这种建立在过高估计自己战略潜力和低估中国战略潜力上的政策，导致了苏联在亚洲战线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从历史的演变看，苏联扩张战略的溃败差不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三节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变动与终结

整个80年代，中美苏关系的变化是相当明显的。将中美苏三角关系在这10年的发展作为一个阶段，只是为了描述和分析的需要。它们之间关系的互动和三国各自国内政治的演变，对这10年战略三角的影响都是相当明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苏战略三角是在80年代才名副其实的。

1. 中美关系的巩固与发展

之所以说中美苏战略三角是在80年代才名副其实的，主要是因为中美关系在1979年实现正常化，才使中美关系最终能够同中苏关系和美苏关系一样，在建立国家外交关系的基础上展开。尽管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就是友好关系，或者就一定比不具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更友好、更密切，但是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的象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

如前所述，推动中美两国在70年代末建交的首要动力，是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使中美都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为了共同遏制苏联在全世界的攻势，中美克服或者说是暂时搁置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在此巨大进步的基础上，迅速加强在安全战略领域的合作。

在共同遏制苏联扩张方面，中国的政策和立场始终是坚决和明确的。而美国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卡特政府才下决心根本改变缓和政策，并因此下决心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

在198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击败卡特，成为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对苏联素以态度强硬著称，他在选举中的对外政策纲领就是“以实力求和平”，即保持美国在军事上的全面优势，遏制苏联的扩张，以保护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受侵犯。里根在竞选中猛烈抨击卡特在对外政策方面“软弱”、“犹豫不决”，致使苏联的扩张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里根入主白宫后，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了明显的调整，其主旨是通过强调实力地位，在同苏联的战略竞争中“重振国威”。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强调美国必须负起领导责任，坚决地推行遏制政策，才能抵御苏联在全世界的扩张；第二是突出意识形态斗争，强调苏联的制度是其威胁世界的根源，美国必须在依靠实力遏制苏联的同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改变苏联的现行制度；第三是强调实力政策，“以实万求和平”，依靠重整军备，强化实力地位，迫使苏联放弃其扩张政策。

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从本质上说，是依靠实力与苏联争夺霸权，改变以往的被动地位。这项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为了同苏联争夺霸权，美国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以加强其与苏联对抗的地位。另一方面，里根政府强调安力和意识形态斗争，事实上也对中美关系造成冲击，这突出地表现在里根在竞选时，就台湾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挑衅性的言论。里根上台初期，明显地试图抬高台湾的地位，致使中美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矛盾急剧尖锐化，中美关系陷入一场危机。

由于美国的战略是遏制苏联，而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是要靠实力威慑苏联，在全球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这在逻辑上必然要求美国保持同中国的战略合作，至少不能成为战略对手。在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的背景下，里根政府经过内部的激烈争论后，最终决定继续保持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其具体表现就是在1982年夏，与中国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并达成了中美关系史上著名的“8·17公报”。

促使里根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和苏联都表现出了缓和中苏关系的意愿。不论双方当时是根据何种理由作出缓和的姿态，在美国看来其后果都将削弱它在与苏联对抗中的战略地位。因此存“8·17”公报签定后，美国为加强中美关系采取了不少措施，1983年和1984年，中美进行了首脑互访，两国关系进一步巩固，双方的战略合作和经济贸易、科学文化交流等，都有比较迅速的发展。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中美关系一直比中苏关系更密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80年代初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尽管当时中美两国出于战略考虑，为解决危机找到了显然是暂时性的解决办法，但中国决策层已经因此下定决心，较大幅度地调整对外政策，在美苏之间寻找更适当的距离，以便在三角关系中争取有利的战略位置。

以往的研究充分地证明，70年代初促使中美从对抗走向和解的主要

因素，是对付苏联扩张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共同利益。可以说从 70 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以后一个时期里，反对苏联的战略扩张直足中美关系不断巩固和向前发展直到关系正常化的主要推动力，安全战略合作是当时中美关系改善的基础。

在从和解到正常化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外力推动型”的关系，即双方改善关系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付共同面临的外部威胁的需要。不过其中有两个问题当时被忽略了，而后来的发展证明，它们的影响的确是长期的，有时还是颇大的。

其一是关于安全战略关系的作用和局限性。中国领导人在 70 年代初决定与美国和解，主要是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对美政策的调整与国内的极“左”政策是背道而驰的。美国领导人同样将安全战略放在首要位置，他们甚至没有考虑，中美关系是否存在不受战略关系支配的内在价值。事实表明，共同的战略利益只是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同步的。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中美走向和解时，在各自社会内部的支持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双方都需要采取措施来塑造对方的好形象，以使对方在本国公众中至少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样做的结果与中美合作必然产生的巨大震动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对对方过高的期望，并使人们误以为，只要有安全战略方面的共同利益，就足以使中美关系万古长青。这种心理状态的承重力相当脆弱。在中美关系逆转时则起到强化误解和敌意的作用。

从 80 年代初开始，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巨大但一时还难以被清楚认识到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动力是来自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历史性变动，即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国内政治的革命性变化的结果之一，是根本改变了中美关系仅靠反对第三者来维系的历史局面。

综观整个 80 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最具有意义的并不是双方曾经克服多少具体的困难，如台湾问题引起的矛盾等。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止逐步从单纯的“外力(应付共同面临的外部威胁)”驱动型转变为“内力(产生于各自主要的国内政策的合作愿望)”和“外力(在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合作需要)”的双向驱动型。

从历史演变的脉络看，自 1972 年毛泽东与尼克松打开中美和解的大门，两国先是为了对付共同威胁而形成了没有内在要求的战略合作关系；

然后在战略合作过程中，逐步产生出发展双边关系的“内在动力”。所谓“内在动力”是相对于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外部因素(如共同对抗苏联扩张必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等)而言的，它是指产生于中美两国社会内部的对发展、扩大双边关系的需要，包括发展经济贸易、文化与科学技术交流、人员之间的交往，等等。

毋庸讳言，中美社会内部发展双方关系的推动力的强弱是不同的。中国社会中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超过了美国方面，它包括了发展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了解和学习美国的文化、甚至在政治改革中学习美国民主政治的某些经验。美国方面则更多地考虑贸易和安全领域的需要，其发展关系的内在需求不如中国那么强劲。这是理解当时和后来中美关系中一系列问题发生及其解决方式的重要因素。

80年代中美关系的转型为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没有这种转型，中美关系能够经受住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造成的巨大冲击并获得后来的发展，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中美关系在转型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基本特征，概括地说它们包括“重要”、“全面”、“复杂”和“具有渗透性”等四个方面。

“重要”是指中美关系涉及到两国重大的战略利益，而且对全球和地区的国际政治形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正是这种双重的重要性，促使两国必须谨慎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外部力量的严重牵制和影响下，它们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自行其是。

“全面”是指中美关系涉及到双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各地区。这种状况决定了双方对对方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各自国内不同的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和集团利益等等的的影响，很难在各个领域里表现出整齐划一的态度，也很难在某一个领域里保持始终如一的态度。

“复杂”是指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内容和范围都越来越广泛的利害关系结构，不同层次上的利害关系日趋复杂。利与害并存、冲突与妥协并存、竞争与合作并存。“敌”或“友”、“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等等范畴，都不足以概括中美关系的现状，而且很有可能在今后一个时期里也是如此。

“渗透性”是指中美关系已经渗透到双方各自的社会生活之中，对两国的国内政治均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很难说在两国内部对对方的某种看法会具有多么重大的普遍意义，或者

一个时期甚嚣尘上的呼声就一定会一成不变地张扬下去。进一步说，双方都有可能通过影响对方社会内部的形势来影响对方的政策。

上述四个特征在其出现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对当时的中美关系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在冷战结束后对于维系中美关系和塑造中美关系的形态，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80年代中美关系的演变也揭示了维持双方关系正常化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不出现根本性的逆转和美国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如果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冷战结束后中国会争取与美国保持建设性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美国持续不断地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如在台湾问题上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中美能够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也是不可能的。

2. 中苏关系正常化

80年代中苏关系经历了从尖锐对立到重新正常化的过程。推动这个过程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包括双方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双方各自国内政治的变化，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双方国内政治的变化。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84年，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89年。

如前所述，70年代末南于苏联在亚湘地区的扩张和中国的坚决反击，80年代初两国关系仍然处于尖锐和全面的对抗，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双方在印度支那和阿富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过在尖锐对抗的同时，中苏双方都出现了缓和甚至改善双边关系的需求。

从中国方面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国家战略的转变必定要带动和指导对外政策，进行与之相适应的调整。中国为了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因此必然需要一个相对稳定与健康的中苏关系。

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国就利用终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机会，尝试缓和与苏联的关系。1979年9月25日至11月3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幼平率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方面进行了第一次国家关系谈判，以确定两国结束同盟条约后建立新关系的准则和基础。由于苏联当年底人侵阿富汗，致使中国宣布推迟谈判。从此谈判搁置了两年多，中苏关系陷入更加严重的对抗。

1979年以后，中国在亚洲采取坚决与苏联对抗的政策，包括采取军事行动，固然有以往政策影响的痕迹，但总的来说是对苏联在亚洲扩张

的反应。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蓄意地奉行与苏联对抗的政策。1982年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了80年代中国国家战略的具体目标，并强调在经济建设、国家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指出：中国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这个方针已经包含了调整对苏联的政策逻辑。

中国在1982年明显调整外交战略布局也有其具体原因。根据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基本特征，中国在这个时期调整对苏联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中美关系的变化有关。里根执政后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性言行，使中美关系一度陷入危机，直到“8-17公报”签署，才得以缓和。经过如此的反复以后，中国领导人明显地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警惕和不信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警惕和不信任是合理的，因为美国尽管在反对苏联扩张的战略方面，与中国进行了积极的合作，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作出了努力，但始终没有放弃干预台湾问题的立场。

与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同时，苏联也开始考虑调整其在70年代推行的遏制中国的政策。在苏共二十六大会上，苏联领导人初步表达了希望缓和中苏关系的意愿。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就对华政策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有三点重要内容表明苏联有意改善中苏关系：1. 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否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2. 苏联过去和现在都完全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3. 准备同中国讨论边界问题，并采取改善中苏关系的措施。

导致苏联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外部环境看，苏联70年代推行的扩张政策，已经造成它在世界上空前地孤立。尤其是在亚洲，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使它遭到绝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反对，它在亚洲陷入极度的孤立。

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苏联的扩张是促成中美战略合作的主要原因，结果是苏联的战略地位被严重地削弱。

苏联面临的军备竞赛压力也越来越大。美国于70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扩充军备，里根执政后不久，宣布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已经死亡”，并提出了庞大的扩张军备的“战略现代化计划”，更积极地谋求战略武器的优势。在里根执政的前三年里，美国的防务预算平均每年递增9.5%。其次是从国内情况看，苏联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到80年代初已经接近停滞。长时期的对外扩张、与美国的大规模军备竞赛等，使苏联的军费开支增长速度长期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不断增加的

巨额军费成为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而且造成了畸形的国民经济军事化。这些因素加上西方国家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苏联的国民经济在 80 年代处于空前严重的危机状态。

虽然面临着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困难，苏联领导人在 80 年代初期并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其扩张战略。他们只是试图通过调整对外政策来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并由此来减轻在国内经济上面临的压力。这种对外政策逻辑一方面促使苏联领导人认真考虑缓和中苏关系，另一方面不肯放弃那些使中国感到安全受到威胁的政策，即不接受中国提出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包括从中苏边界地区撤军，采取措施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军撤出阿富汗等。

到 1984 年为止，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空前地加强了。它在这个地区部署了 140 枚 SS. 20 导弹和 100 多架可运载核武器的逆火式轰炸机；太平洋舰队增加了导弹潜艇和核动力潜艇，苏军的 4 艘航空母舰中有两艘部署在太平洋地区。苏联部署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比美国和中国等都占有优势，其目的就是要继续向中国施压，并遏制美国、日本等国的影响力。

相比较而言，苏联这一时期调整对华政策显然更多地是为了缓解自身安全环境恶化，争取改变在与美国对抗中已经出现的不利地位，它既不是从根本上放弃其扩张政策的结果，也不像当时中国那样，改变对外政策是为了适应国家大战略的转变。因此苏联当时调整对华政策的幅度是相当有限的，不可能根本消除中国在安全上的被威胁感，中苏关系也就不可能获得重大的突破，尽管两国紧张关系的确出现了缓解的迹象。

1982 年以来中苏关系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是毕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气氛。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联领导人频繁更换，固然影响到苏联对华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但是苏联试图缓和中苏关系的政策基调并没有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关系都大幅度改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都有比较迅速的发展。总之，中国同苏联和苏联阵营的关系都在向缓和方向移动。

这个时期中苏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的因素固然是相当复杂的，不过苏联国内政治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发生的巨大变化，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则是苏联国内政治转变的转折点。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很快认为，苏联尽管在军事上显赫一时，但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危机。由于长期奉行扩张政策，苏联的安全环境全面恶化，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国民经济受到对外扩张政策拖累，已经停滞不前，

无法在已经出现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与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发展相融和。更严重的是，苏联在经济、技术等方面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长此以往后果必然更加严重。这种危机在苏联新领导人看来，不仅严重削弱了苏联的世界地位，而且关系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

正是基于对苏联面临的危机的深刻体会，戈尔巴乔夫很快便决定，进行一场堪称是革命性的政治经济改革。为了保证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苏联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因而必须放弃对外扩张的政策。苏联国家大战略的转变必然会带动其对外政策随之转变，其内在的趋势就是放弃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全面缓和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的关系。

苏联国家战略的转变在客观上塑造了苏联放弃对外扩张的趋势，这个趋势成为现实以及如何和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则取决于苏联决策层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当时苏联领导人的确提出了一整套关于苏联安全战略的新理念。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他高技术兵器的发展，使国家靠军事手段保障安全的观念过时了，维护国家安全越来越需要运用政治手段。

其二是军备竞赛、特别是战略核武器竞赛，不可能给竞赛的任何一方带来政治上的利益和实质性的安全感，而且军备竞赛的无限制性将最终破坏均势，从而使战争无法避免。

其三是认为安全是互相的，单方面追求绝对安全将造成自己更大的不安全，因此应致力于实现有关国家，包括美苏之间的同等安拿。

随着包含在所谓“新思维”中的这些新安全理念逐步贯彻到苏联对外政策中，必然导致其对华政策出现相应的变化。

1985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契尔年科的丧礼上，戈尔巴乔夫向前往吊唁的中国副总理李鹏表达了缓和中苏关系的意愿。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对中国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做出初步的让步，并表示愿意认真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此后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步缓和，苏联新领导层对中国的安全关切和内外政策有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了解和认识，双方的信任度逐步升高。

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与之相配合的和平睦邻政策逐步落实，同时在国际战略大格局中，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合作的限度逐步清晰。虽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仍然在明显地向前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认同和支持美国追求霸权的政策。实际上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批评里根政府为谋求战略优势而大张旗鼓地进行军备竞赛，并反对美国在一些地区的干涉。特别是中国政府宣布，1985年到1987年进行百万大裁军。在这一时期，随着中苏双方的敌意不断下降和了解与信任不断加强，中国的对苏政策也在逐步调整，更加灵活务实。

苏联新领导人根据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进一步认识到，中国1979年以后的有关政策是基于对苏联事实上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威胁的反应，中国与美国的合作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不是蓄意奉行所谓的“反苏”政策。1988年间，苏联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和承诺促使越南于1989年底全部撤出柬埔寨。在此之前，于1987年2月恢复的中苏边界谈判取得了双方都满意的进展，中苏边境局势迅速缓和。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基本消除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访问北京。中苏领导人共同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这次访问标志着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突出特点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两国并不谋求建立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关系，而其根源就在于，中苏关系这次历史性转变的动力来自中苏双方都在国内致力于改革。它们在改革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理念，已经超越了冷战思维的一些基本框架。

3. 美苏关系

80年代的美苏关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前半期，第二阶段是80年代后半期。在整个8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像两个全力以赴地拼搏的巨人，都已经斗的筋疲力尽了，都试图缓和下来有个喘息时机。只是苏联首先轰然倒掉，美国才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从而获得了冷战后独强的世界地位。

苏联在70年代后半期推行扩张政策使它面临严峻的国际压力，在国内则陷入严重的经济停滞危机。特别是入侵阿富汗以后，苏联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安全环境恶化，经济方面遭到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迫切需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减轻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缓解与中国等对抗造成的孤立的状态。

80年代初苏联领导人发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信号，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宣称，苏联认为目前的东西方均

势是有利于国际稳定的，他呼吁停止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因为那样做不可能有真正的赢家。

苏联当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呼吁没有得到响应，因为苏联并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准备放弃扩张政策。它的缓和姿态在国际社会看来是企图用较低的代价，维持以往扩张获得的成果，甚至还想谋求更大的优势。美国则是利用苏联扩张造成的紧张局势和有关国家的担心，推行更加强硬的对苏政策。

1980年卡特政府已经开始强调军事实力，对苏联采取以军事、经济遏制为主的强硬路线。1980年11月里根上台后，对苏联采取新遏制战略成为共和党政府的对外政策核心。这项政策的主旨是加强美国的军事实力，通过军备竞赛和经济制裁，根本扭转与苏联竞争中的不利态势。

在整个80年代前半期，里根政府采取了系列措施，包括不断加强军事实力，扩张军备特别是核军备，谋求对苏联的军事优势；加强在第三世界同苏联的全面对抗，巩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加强在亚洲遏制苏联的防线；联合西方国家对苏联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加剧苏联的经济困难；加强反苏宣传和意识形态进攻，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总而言之，里根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同苏联对抗，这是这一时期美苏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

面对执意将谋求战略优势地位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的里根政府，80年代前半期的三位苏联领导人都选择了继续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政策，以便维护苏联在70年代获得的成果。特别是1983年里根政府提出建立广泛的反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也称“星球大战计划”)以后，苏联领导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以阻止美国在任何武器系统领域取得或保持优势。

为了抵消里根政府的战略防御计划的影响，苏联一方面继续加紧部署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和其他类型的中、远程导弹，同时积极研制开发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和远程巡航导弹、核潜艇和远程轰炸机。在常规武器方面，苏联也加紧研发新型坦克、作战飞机和大型核动力海面舰船。在这一时期的军备控制谈判中，苏联坚决反对任何有可能破坏苏联业已形成的有利的核战略态势的建议。特别是在双方的主要竞争点——在欧洲部署中程核武器问题上，苏联更是寸步不让。1983年底美国开始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后，苏联宣布退出中程导弹谈判和战略武器谈判，常规武器谈判也名存实亡。可以说到1985年时，苏联的战略攻击力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战略防御力量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显然，以军备竞赛为中心、同时所有领域全面对抗，成为这个时期美苏关系的土要内容。

从 80 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和里根第二任期起，美苏关系出现了明显的重大变化，双方从尖锐激烈的对抗逐步转向对抗与对话同时进行的新“缓和”阶段。如果说 70 年代的“缓和”是美国的尼克松政府发起的，那么这次“缓和”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国内推行改革和在国际上推行外交“新思维”的结果。

里根第二任期和后来的布什政府的政策调整主要是对苏联内外政策的变化作出的反应。美国领导人逐步认识到，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对外政策转变是基于战略性的考虑，其根源在于国内政治的大变动，因此将是持续的。不过从当时美苏力量对比变化的实际情况看，美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基本扭转了军备竞赛中对美国不利的趋势，但是它也筋疲力尽了。在背负巨额的预算与贸易赤字的情况下，里根政府也很难再通过新的巨大财政和资源的投入，改变美苏之间的军事战略均势。里根政府实际上也指望找到机会，同苏联达成协议来限制那种无止境的军备竞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里根政府后期调整了对苏政策，用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代替了执政初期一味追求和依靠军事实力的方针。布什执政后提出的所谓的“超越遏制”，与里根政府后期的对苏政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美苏政策的相继调整导致了双方关系逐步缓和。1985 年 3 月，美苏恢复了在日内瓦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经过两轮首脑会晤后，1987 年底美苏终于签订了关于中程导弹的条约。以此为标志，美苏关系进入新的缓和时期，并带动整个国际形势出现缓解。当时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是，美苏的新缓和的终点竟然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

苏联的突然崩溃造成的巨大震动是全面的，就学术领域而言，这一历史事件带来的最大挑战是，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那些将冷战的本质和前途作为终生研究对象的人群，没有一个人、一个学派在当时预见到，冷战将以苏联的解体而结束；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的世界地位将因此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80 年代国际政治中出现的重大变动是极其深刻的。它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起决定作用的两极格局的终结，同时也就结束了从 70 年代初开始出现并逐步形成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如果仅从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着眼，可以说它在走向结束的过程中，中国和苏联的国内政治变革所起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应该给予特别的

重视。因为在整个 80 年代，特别是 80 年代中期以后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发展，既是导致冷战结束和战略三角关系消亡的重要因素，也逐步孕育了冷战后中美俄相互关系中的一些基本特点。可以说这个时期是理解冷战后中美俄三方相互关系的线索的开端处。

思考题：

1. 中苏同盟破裂与中美关系缓和和对 70 年代美苏关系的影响。
2. 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形成与演变对冷战进程的影响。

参考书目：

- 1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2.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
3.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
4. 倪孝铨主编：《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 年代》，人民出版社，1993 年。
5. Nancy Bernkopf Tucker: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J 叮 4—199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Robert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J 嘶 9—19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 Keylor, William R.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and Oxford. 1984.

大事年表

(1945—1991)

1945年

2月4—12日 苏、美、英等国领导人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首脑会议，商讨战后世界问题，签署《雅尔塔协定》。5月8日 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宣告结束。7月17日—8月2日 苏、美、英三国领导人在德国柏林西南波茨坦举行会议，史称波茨坦会议。

9月2日 日本政府代表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向盟国投降书。

9月11日—10月2日 苏、美、英、法、中五国伦敦外长会议，讨论对意、罗、保、匈、芬五国的和约及共同管制日本问题。

10月24日 《联合国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

12月25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与莫斯科外长会议精神相同。

1946年

2月9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

2月22日 美国驻苏 I 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传送“八千字”电报，概括了苏联对战后世界的看法，提出了美国对苏政策的设想。

3月5日 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揭开冷战序幕。

6月26日 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挑起中国全面内战。

9月27日 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就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给外长莫洛托夫发了一封电报，系统分析了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

1947年

3月12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特别会议上，发表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演说，提出“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冷战的正式开始。

6月5日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帮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

7月 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动的根源》，阐述美国对苏政策的战略目标。

9月2日 美国和18个拉美国家签订《美洲国家互助条约》。

9月22—27日 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波兰举行会议，提出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的观念，宣布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

1948年

4月3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经济合作法》，规定在今后15个月内对参加马歇尔计划的16个国家提供56亿美元。

6月24日 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苏联对德国西柏林和西方占领区之间的通道实行“封锁”，美国开始对西柏林大规模空运物资。

6月28日 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1949年

1月20日 杜鲁门发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提出美国对外政策“第四点计划”。

1月25日 苏联与保、匈、波、罗、捷五国代表在莫斯科宣布成市“经济互助委员会”。

4月4日 《北大西洋公约》在华盛顿签署。

8月5日 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8月24日 公约生效，“北约”宣告成立。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2月16日 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

1950年

2月14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

4月14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第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的和纲领”。

5月8日 艾奇逊宣布向法国提供援助，以帮助其维护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

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6月27日 杜鲁门宣布美国军事干涉朝鲜战争，并命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

9月15日 美军在仁川登陆。

10月2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1年

7月9日 美、英、法等40多个国家政府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

7月10日 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后移至板门店)举行。

9月4—8日 旧金山会议签订片面对日和约，中国、苏联拒绝承认。

9月8日 日本与美国签订《美日安全保障条约》。

1952年

2月27日 美日签订 13 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条约。

5月27日 西欧六国在巴黎召开会议，签署欧洲防务集团条约。

5月31日 民主德国宣布封锁东、西柏林分界线。

1953年

1月15日 杜勒斯在美国国会批准他为国务卿的听证会上，提出“解放”政策。

2月2日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第一个国情咨文，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

3月5日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

7月27日 朝鲜停战谈判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朝鲜战争结束。

1954年

1月12日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

4月7日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

4月26日 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7月21日 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

9月8日 美、英、法、澳、新西兰、菲、泰、巴基斯坦 8 国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1955年

4月18—24日 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提出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5月9日 联邦德国正式加入北约，成为该组织的第 15 个成员国。

5月14日 苏联、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等 8 国在华沙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华沙条约组织成立。

7月18—23日 美、苏、英、法四国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会议。

8月1日 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至 1970 年 2 月 20 日共举行 136 次会议。

1956年

2月14—25日 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

4月17日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解散。6月28日 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

7月26日 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10月23日 “匈牙利事件”爆发。11月4日苏军进入布达佩斯。

10月29日 以色列军队占领埃及西奈半岛，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

10月31日 英、法军队联合入侵埃及。

1957年

1月5日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国会宣读中东政策特别咨文，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

3月25日 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首脑在罗马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盟条约(罗马条约)。

7月28日 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签署“柏林宣言”，要求成立“自由和重新统一的德国”。

10月5日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11月14—16日 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会议通过莫斯科宣言。

1958年

7月15日美军在黎巴嫩海岸登陆。

11月27日 苏联照会美国、英国和法国，结束西柏林占领状态。

12月31日 美英法三国拒绝了苏联的建议。

1959年

6月20日 苏联政府单方面中止中、苏双方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9月15日 赫鲁晓夫抵达华盛顿，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

1960年

1月19日 日、美签订《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5月1日 美国U-2间谍飞机入侵苏联领空被击落。

6月24—26日 5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

7月16日 苏联政府撕毁与中国的协定和几百项合同，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

12月11日 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会议闭幕并发表宣言。

1961年

1月6日 赫鲁晓夫就1960年12月各国共产党会议宣言发表讲话，提出两个制度和乎共处、公平竞赛。

3月28日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国防问题咨文中明确地阐述了“灵活

反应战略”。

4月12日 苏联发射载人人造卫星。

4月17—19日 美国雇佣军在古巴猪湾的吉隆滩登陆，遭失败。

6月3—4日 苏美首脑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了禁止核试验和柏林问题。

8月13日 东德封锁东、西柏林边界。8月15日筑起“柏林墙”。

9月1—6日 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

1962年

7月23日 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签署老挝中立宣言及其议定书。

10月22日—11月20日 爆发古巴导弹危机。

1963年

7月5日 中苏在莫斯科举行两党高级会谈。

7月14日 苏共中央发表《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苏论战公开化。

7月15日 美、英、苏在莫斯科召开关于禁止核试验的会议。

8月5日 美、苏、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9月6日—19“年7月 中共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九评”）。

1964年

8月2—4日 爆发东京湾事件，美国海空军轰炸北越。10月16日 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为核国家。

11月30日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美，同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就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举行会谈。

12月 越南人民军开始直接在南方作战。

1965年

3月8日 首批美军地面部队在越南岷港登陆参战。

4月28日 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对多米尼加进行军事干涉。

1966年

3月8—30日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在主席富布赖特主持下举行有关中国问题的听证会。

1967年

6月5—10日 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等六国宣布与美国断交，苏联与东欧国家同以色列断交。

6月23—25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与美国总统约翰逊在新泽西州的葛拉斯堡举行会谈，就防止核扩散达成基本协议。

1968年

8月20日 苏联领导部分华约国家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无限期地推迟原定于**9月30日**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议。

1969年

3月2—17日 由于苏军进入中国领土珍宝岛，双方爆发武装冲突，苏军被击退。

7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关岛发表演说，提出“新亚洲政策”，其主要内容后被称为“尼克松主义”。

8月1—2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问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时表示，美国有意缓和中美关系。

8月13日 苏联军队在中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流血事件。

9月11日 中国总理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就两国边界问题达成谅解。

11月17日 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开始。

1970年

1月20日 中美谈判在华沙进行。

4月30日 尼克松正式宣布美军入侵柬埔寨，美国扩大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

5月20日 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6月30日 尼克松政府宣布，从柬埔寨撤出最后一批美军。

8月11—13日 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苏联，签订(西)德苏条约，东两欧关系出现新的转折。

1971年

4月10日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批记者访问中国。

7月9—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

8月9日 《苏联印度和平友好条约》在新德里签订。

9月3日 苏、美、英、法在柏林签订关于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

10月25日 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11月21日—12月17日 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

1972年

2月21—28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

5月22—30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苏，同苏联领导人举行高级会晤，并签署一系列宣言和协议。此次会晤标志着美苏缓和进入高潮。

9月29日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访华，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

11月21日 苏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开始。

1973年

1月27日 美国与越南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巴黎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同日停火生效。

6月24日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双方签署《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型战略武器会谈的基本原则》和《防止核战争的协定》等多项文件。

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10月22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美苏联合提出的中东停火的338号决议提案，讨论中东问题的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1974年

2月22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

6月27日 尼克松访苏，美苏举行第三次高级会晤，就反弹道导弹系统、限制地下核试验签署协议。

11月23日 美苏首脑在苏联海参崴举行会晤，双方达成有关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初步协定。

1975年

1月31日 美苏两国代表在日内瓦开始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举行会谈。

7月30日—8月1日 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安会”35国首脑会议签署“最后文件”，历时3年的“欧安会”结束。

12月7日 美国总统福特在檀香山发表讲话，提出美国对亚太地区政策纲领，即“新太平洋主义”。

12月 在苏联支持下，古巴派遣首批部队7000人进入安哥拉。

1976年

1月20日 美、苏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莫斯科进行谈判。5月28日 美、苏签订和平核爆炸协定。

10月8日 苏联与安哥拉签订“友好合作条约”。

1977年

3月18日 美国总统卡特在国会宣称，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要根据人权状况而定。

3月31日 苏联与莫桑比克签订“友好合作条约”。

5月18日 苏丹政府宣布解除苏联专家在苏丹工作的合同，并驱逐驻苏丹的苏联外交官。

5月22日 美国总统卡特在圣母大学发表政策演说，强调人权外交。

9月21日 美苏和其他13个国家签订防止核扩散条约。

11月1日 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一项60亿美元的援外拨款法案，以侵犯人权为由削减或禁止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1978年

8月8—12日 日本外务大臣访华，与中国政府进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

9月6—17日 埃及、以色列、美国在戴维营举行最高级会谈，签署“戴维营协议”。

12月16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

1979年

1月1日 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日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2月11日 伊朗巴列维王朝被推翻，4月1日什叶派领袖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月28—29日 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

4月3日 中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4月11日期满后，不延长其有效期。

6月15日 美苏两国首脑在维也纳会晤。

6月18日 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在SAITII条约及有关文件上签字。

11月4日 伊朗发生扣留美国人质事件。

12月 苏军入侵阿富汗。

1980年

1月23日 美国总统卡特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针对苏联扩张的新波斯湾战略，即“卡特主义”。

9月22日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爆发。

10月16日 11月18日 美苏举行关于限制欧洲中程核导弹会谈。

1981年

1月19日 伊朗同美国达成解决人质问题协议。

9月15日 埃及政府宣布驱逐苏联驻埃大使和全部专家。

1982年

1月12日 美苏限制欧洲中导的谈判复会，经三轮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于11月30日休会。

3月24日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改善中苏关系。

8月17日 中美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

1983年

3月23日 美国总统里根宣布开始执行研究新式反导弹防御系统的长期计划，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

10月25日 美军入侵格林纳达。

11月23—30日 胡耀邦总书记访日，进一步确立中日关系四原则。

1984年

1月10—16日 中国总理访美，两国签署多项合作协定。

4月26日—5月1日 美国总统里根访华。

11月28—30日 美苏在莫斯科举行关于不扩散武器的磋商。

12月18—20日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

12月21—28日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

1985年

3月11日 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3月12日 美苏“一揽子裁军谈判”在日内瓦开始。

7月22—31日 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美，双方签署了多项协定和议定书。

9月30日 戈尔巴乔夫对法国电视观众发表谈话，首次提出建立“欧洲共同大厦”的倡议。

11月19—21日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日内瓦举行美苏首脑会谈。

1986年

1月15日 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裁军等国际问题发表声明，首次提出“新思维”。

3月14日 美国总统里根向国会发表题为《自由、地区安全和全球和平》的咨文，系统阐述“里根主义”。

4月15日 美国大规模空袭利比亚的黎波里、班加西，苏联因此取消原定5月中旬举行的美苏外长华盛顿会议。

7月28日 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苏联对亚太地区政策的讲话。

10月11—12日 美苏领导人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会晤，主要讨、允军备控制问题。

11月 美国与伊朗以武器交换人质的秘密被揭露，美国“伊朗门事件”爆发。

1987年

6月4—21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访问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是20多年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上述五国。

10月1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北方军事港口摩尔曼斯克发表讲话，提出苏联对北欧国家政策6点建议。

12月7—10日 美苏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最高级会晤，双方签署《关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1988年

4月14日 苏、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签署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

5月15日 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

5月29日—6月2日 美苏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双方交换《中导条约》批准书，并签署7项协定。

8月8日 安哥拉、古巴、南非、美国达成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立即停火协议。

12月2日 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倡议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1989年

2月5日 中苏外长在北京发表《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

5月12日 美国总统布什在得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化大学发表演说，提出“超越遏制战略”。

5月25—18日 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11月9日 东德开放“柏林墙”，允许公民自由出入国境。

12月2—3日 布引‘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举行美苏首脑非正式会晤。

12月4日 美国总统布什在北约首脑会议上提出美国对欧洲新政

策，即“新大西洋主义”。

12月20日美国入侵巴拿马。

1990年

3月12日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案，决定取消宪法中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第6条款)。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

4月23—26日 中国总理李鹏访问苏联。

9月5—6日 朝鲜半岛北南双方总理在汉城举行首次高级会谈。

9月12日 “2+4”(东、西德与苏、美、英、法)外长会议签署《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

10月3日 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德国统一。

1991年

1月17日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沙漠风暴”行动的大规模空袭，海湾战争爆发。

4月1日 华沙条约组织军事机构解散。

4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在亚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发表讲话，论述“世界新秩序”的政策主张。

5月15—19日 江泽民主席访问苏联。

6月28日经互会9个成员国签订协议书，宣布90天后经互会解散。

7月1日 华沙条约组织政治机构解散。

7月30日—8月1日 美国总统布什访苏，双方签署《苏美削减进攻型战略武器条约》。

12月21日 前苏联11个共和国领导人签署《阿拉木图宣言》，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12月25日 苏联解体，主导战后国际关系的两极体制解体，冷战结束。



博雅大学堂·历史

责任编辑 / 刘 方

封面设计 / 奇文云海 www.99999999.com

ISBN 7-301-09584-8



9 787301 095843 >

ISBN 7-301-09584-8/K · 041

定价：22.00 元